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Copyright © 1985 by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4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①

## 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

---

原書名 /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作者 / 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

譯者 / 陳璋津

主編 / 沈起予

責任編輯 / 彭春美·李心聖

---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者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02)365-3707

傳真號碼 / (02)365-8989

發行代理 /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 (02)365-1212 傳真號碼 / (02)365-7979

---

著作權顧問 / 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 / 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

排版 /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4(民 83)年 6 月 1 日 初版一刷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25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 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2340-6

文化霸權和  
社會主義的戰略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Ernesto Laclau / 著◎陳璋津 / 譯  
Chantal Mouffe



# 主編總序

嚴謹的新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內是一門新興的事業。隨著解嚴和開放的政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學者對這門學科感到興趣。我們可以看到，不僅在學校課堂傳授這門學科的老師是日漸增多，把研究和學習的對象擺在這個方向上來的研究生，現在亦不在少數。而坊間出售的這類書籍目前更是普遍獲得讀者的喜愛，供不應求。這些發展亦說明我們的社會裡，還是有許許多多的人關心著思想、關心著社會。但是在這樣朝氣蓬勃的發展背後，目前卻仍然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與難題。這些問題和難題是許許多多的讀者和研究者都有同感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

首先問題最大的是：對於無法親炙這門學科或領域精彩內容的學生或讀者來說，這門學科或領域仍然是屬於少數人的讀書特權。他們或苦於沒有門徑進入這門領域，或是苦於進入這門領域後卻不知如何下手讀書。因此常令許許多多有心的讀者或學生對這門學問僅能「止於興趣」。對於比較想花精神深入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而言，問題似乎也多。他們希望從事研究，希望這門學問能夠多少幫助他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世界、瞭解問題。可是經典的接觸、二手詮釋資料的蒐集、研究題材的選取等等，在在都是他們的困擾，使他們在這個領域無法海闊



天空的馳騁，挫折感很重。但是對教學的人員來說，感觸還更大。上課教學資料與教材欠缺，學生的參考資料付之闕如，常常使他們的教學效果大打折扣。許多人都感覺到教學困難，手脚被綁施展不出學問來，可是一時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而這些問題多年來卻沒有人出來為他們設想，為他們解決這樣急迫的問題。我們的社會裡，對於人文科學或是社會思想比較熟稔的專家或學者，他們從事的工作多半只是負責研究。頂多做一些批評、介紹就已經了不起了。對於如何在各門領域「傳、幫、帶」以提昇社會的知識水平，好像熱心的程度還不是那麼的足夠。有鑒於此，我們不崇淺陋，願意貢獻一己之力，為一些有需求的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服務。

我們的做法是在這門學科上做了一些大的規劃，計劃分批、分類地出版六大類的叢書，設法分門別類為讀者、學生、研究生和教學人員分憂解勞，讓大家對這門學科和領域的要求與滿足俱無遺憾。我們要分批出版的這六大類叢書，分別是：《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新馬克思主義叢刊》、《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我們費盡心血網羅了海內外對於這門學問學有專長的學者和名家來為大家服務，希望好好地把這六大叢書的工作做好，為大家略盡一點心意。

這六大類叢書的設計構想，主要是想讓每一位入門的讀者、學生、研究生或教學人員都能夠直接成套地、全盤地利用我們這批叢書進行讀書、研究和教學的工作，不假他求。我們的構想目標，是希望做到從入門的學徒到專業人士我們都能照顧，甚至希望最後做到從學徒到專家的養成也都能仰賴我們的地步。

這六大類叢書在《新馬克思主義經典譯叢》方面，我們首先打算出齊所有新馬克思主義者的經典作品。國內目前這方面的中譯書籍非常的欠缺，已經出版的成品也是做得零零散散，譯筆又不算緊嚴，在學術運用上不太能派上用場。我們打算把這些問題都做改進，使這樣的經典能夠成套成批地呈現在國人的眼前。因此原來市面上已有的譯本不行的，我們改譯；不錯的，我們參考補譯。在譯本方面，我們儘量以原有經典的出版文字為主；情況不允許的話，我們在校訂的時候儘也可能地參考原外文版來補正。所有的版本，除非必要，否則我們絕對不做增補刪節的工作。這樣能夠讓原著以新的中文版的面貌和讀者見面，也能夠讓讀者放心地閱讀和進行學術的徵引。經典內的譯名、術語、地名或書名，我們是從習慣用法統一。如果無習慣用法，我們從已經有的專著和研究裡頭的用法，不另創新譯名滋生讀者的困擾。我們的要求是做到各種譯名能夠從俗統一，不但這套叢書裡頭所有的各類經典的各種譯名能夠統一，就是我們以下的其他五大類叢書內的各套書籍的譯名也能夠配合一起統一起來。這套叢書是所有以後各類叢書的構想得以成立和各類叢書能夠讓讀者順利應用的基礎，自然所有的格式從學術的慣例，在體例方面我們就不另做說明。

其次，我們想把現有在期刊或其他場合發表但未被收錄編纂成書的經典作品，以相關主題或思想人物作為一輯，有系統地加以整理，編譯出版。這種編譯出版品，我們也是以原有經典原發表的文字為編譯參考版本著手翻譯。情況不允許時，我們參考別種譯本校正。所有的譯文註明出處來源，格式悉遵照學術慣例。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是我們配合著經典的譯著要出版的第二類叢書。這類的叢書涵蓋的範圍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關新馬克思

主義的各種思想家或學派的思想概述，另一種是與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重要思想範疇的專門研究。這類的叢書我們打算翻譯出版論述各家和各派思想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談論專門思想範疇的著作各五種至十種，配合著各類的經典的出版。在這類的叢書裡，我們打算把國外現在比較重要而且談得比較具體的相關作品，依次分批有系統完整地翻譯出版。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想有系統地把主題相關但不易找到的各種期刊論文的資料，整理編譯成套出版。這類叢書的翻譯，主要作用是想以中文的方式提供資料，讓讀者比較容易瞭解前述的各種經典的重要內容、著述的時空背景，以及它們在一個思想家的思想裡或者整個社會科學界，佔著什麼樣的地位。當然我們知道僅僅是這些譯作的出版，還不足以讓讀者全面的理解現有國際出版界和學術界研究和出版的方向、概況與素質。不過有了這些作品的譯述，讀者在閱讀經典時，至少可以有個方向摸索。不用說，我們也不會認為只仰賴這些作品，讀者就足以掌握所有經典裡的思想了。我們以為這些作品只是我們所提供讓讀者可以比較容易進入經典領域的「工具」而已，其他的認識和突破要靠讀者自己的努力。自然我們同樣期望著將來也能夠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這類的譯著，出版更多成批成套齊全的作品，來幫助讀者，讓讀者能夠更加全面地掌握這類的資源。

第三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入門叢書》是針對著入門和希望從事研究工作的讀者而設計的，但是我們也想讓這類叢書能夠成為研究工作者和教學工作人員的一本小手冊。這套叢書編輯的方向主要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編纂適合瞭解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介紹性書籍，另一是編纂適合於理解各類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範疇的介紹性書籍。這類叢書的編輯在材料來源上，我們不限是編譯或者是創作，我們主要

扣緊的東西，是要讓這類叢書的讀者能用最短的時間，掌握住每一個相關的思想人物或者思想範疇的內容和進一步研究的方向與資料。因此我們把這套叢書的主要格式都做了統一的設計，不管叢書內的各類書籍屬於那一種領域，都是這樣的格式。這套叢書內的每一種書籍，基本上都分為這五部份：思想家生平傳略(或思想範疇簡介)、思想重點研究、相關的書評、有關讀書入門建議和重要的參考書目等。我們在這套入門叢書裡，主要是想讓讀者對於一個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或一個有關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範疇有個大致的理解，知道思想的重點在那裡？以前是怎麼討論的？有那些東西可以研究？有那些題目可以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怎麼和其他的問題聯繫起來看？可以怎麼入門和可以怎麼研究？又有那些重要的原始經典需要看？有那些二手的詮釋可以參考？有了這套叢書，讀者大致可以掌握每一個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的重要經典、思想重點、研究主題和方向、參考的資料等。有了這樣的一套叢書，至少讀者對於各種新馬克思主義思想人物或思想範疇不會陌生，對於要想進一步深入的領域該讀什麼書、有什麼書可看，也不會摸不到。當然按這套叢書提供的資訊，有心想研究的讀者一定很容易理解到，我們在前面的兩類叢書裡為讀者提供了什麼重要的經典或二手詮釋，剩下什麼東西是自己應該去補足的。不過我們稍覺遺憾的是，國內社會科學一直都是處在落後的狀況，我們無法為讀者再進一步的提供服務，指出那些地方可以找到那些資料，有那些先生或學者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或研究的指導，不然這套叢書一定會更加完滿。我們只希望來日環境改善，有這個機會為讀者增加這一項服務。

在第四類的《新馬克思主義叢刊》裡，我們打算出版討論新馬克

思主義各家和各派思想的研究各五種到十種，討論新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想範疇的研究書籍各五種到十種。這套叢書和前述第二類叢書《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不同的地方是：前面的第二類叢書，我們主要是以翻譯出版西方的研究成果為主。我們在這類叢書是主要以出版國人的研究為主。但是我們在這套叢書裡出版的各種研究成果，在內容方面基本的要求是不和第二類叢書重複。我們要求作品的水準是起碼能夠站在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地創作，同時要求作品的內容應能夠適合我們國家的現實要求與需要。導論和簡介的書籍因而不是我們這套叢書主要的出版對象。

我們出版這類的叢書，主要的理由有兩點。首先是，我們都知道一件很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不是所有西方出版的研究成果都能適合我們國人的需要與現實，而且也不是所有西方的研究都是毫無缺點不可超越。所以縱使我們在第二類的叢書裡推出了西方的相關研究成果，同時也精挑細選出了比較可觀的成果，可是我們不能也不敢拍胸脯保證說，這些研究成果所研究的課題無需再深入探索，進一步提昇。這也就是說，我們實在需要在中文世界再出版相關的各項足以提昇這些研究成果的作品，以廣國內讀者的認識和見識。就針對著這一點，我們事實上是應該在中文世界出版這樣一類的研究成果，以合乎事實的需要。另外出版這樣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另一面的作用。我們認為，如果能夠出版在原有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的作品，那麼就能夠在中文世界對有心研究這門學科的研究者起示範作用，知道問題也可以「這樣的看」。因此我們在構想上也是希望有這樣的叢書作為借鏡，刺激研究者利用我們前述提供的各類叢書的條件，再深入的探討其他的問題，帶動研究的空氣。

其次，西方至今所有出版過的這類叢書，對所有相關主題的探索我們不能說都完全照顧到了。儘管我們也精挑細選，希望我們能夠在前述的第二類叢書裡頭儘可能把所有的重點書，都挑出來編譯出版。但是所有我們能夠挑到的書，也不見得全部都把我們認為應該處理到的問題完全涵蓋在內討論，可能西方的出版界根本都沒有出版討論這類問題的書籍。因此在現實上我們就有必要請學者專家針對這些被遺漏掉的主題，再撰寫一些書籍出版。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出版類似第二類叢書的一些書籍的根本原因。

在最後兩類的叢書《馬克思學新知譯叢》和《馬克思學研究叢刊》裡頭，我們打算把和理解新馬克思主義有關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書籍拿來編譯出版。其實我們想出版這兩類叢書的最大因素，是因為過去國內在這個領域無論是研究或出版都嫌不足，這種不足讓我們一般的讀書和研究工作者無法站在這個基礎上來深入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出版這類其實算是基礎知識的各種參考書籍，那麼我們花在新馬克思主義上的所有心血也都是白費。在這兩類的叢書裡頭，我們打算把跟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關、屬於詮釋馬克思主義這個領域的各種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都放在「馬克思學」(Marxology)的這個項下來出版。在《馬克思學新知譯叢》裡面，我們希望就西方現有的各項相關研究在各項思想範疇、各類學科和各門各派的見解的這個範圍內，各挑五本到十本分批的編譯出版。而西方的各項研究沒能照顧到的，的確又屬於國人自己的創見或新的詮釋，我們放在《馬克思學研究叢刊》這套叢書裡來出版。出版的數量與範圍，和《馬克思學新知譯叢》一樣。

這六大類叢書的出版和編譯，我們不敢說我們是做得盡善盡美了，

### VIII 主編總序

但是我們絕對可以「毫無愧色」地向讀者坦然交待。我們的編譯和出版請讀者支持，我們的缺失和舛錯也請讀者給我們指正。我們更歡迎有心得亦有志於這門領域的研究和發展的讀者，投入他的心血加入我們的行列，讓我們這門領域的研究和出版能夠綻放出更加燦爛的花朵來。

\*上述六大叢書，由於出版數量雜多，爲了爭取時效，在出版工作的分工上，從一九九二年起我們把屬於譯作方面的稿件由「遠流出版公司」繼續完成，屬於創作方面的稿件由「唐山出版社」出版。也請一向支持我們的讀者一本初衷，繼續給我們支持和鼓勵。

沈起予

一九八九年六月

# 目次

主編總序 .....	沈起予
譯序 .....	陳璋津
導論 .....	5
<b>第一章 文化霸權：概念的系譜學</b> .....	11
第一節 羅莎·盧森堡的兩難 .....	12
第二節 危機，零度 .....	20
第三節 第一種對於這場危機的反應：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的 形成 .....	26
第四節 第二種對於這場危機的反應：修正主義 .....	40
第五節 第三種對於這場危機的反應：革命的辛迪加主義 .....	49
<b>第二章 文化霸權：辛苦推出的新政治邏輯</b> .....	67
第一節 聯合發展和關於偶然性的邏輯 .....	68
第二節 「階級聯盟」：民主和威權主義之間 .....	77
第三節 葛蘭西的分界線 .....	90
第四節 社會民主黨：從停滯到「計劃觀念」 .....	98
第五節 本質主義最後的據點：經濟 .....	103
第六節 正視結果 .....	115
<b>第三章 超越社會的肯定性：對抗性和文化霸權</b> .....	127
第一節 社會形態和多元決定 .....	132



第二節	接合和言說 .....	142
第三節	「主體」的範疇 .....	155
第四節	對抗和客體性 .....	164
第五節	同等和差異 .....	171
第六節	文化霸權 .....	179
<b>第四章</b>	<b>文化霸權和激進的民主</b> .....	<b>201</b>
第一節	民主的革命 .....	205
第二節	民主的革命和新的對抗 .....	213
第三節	反民主的攻勢 .....	228
第四節	激進的民主：左派的選擇 .....	233
<b>參考書目</b>	.....	<b>259</b>
<b>譯名索引</b>	.....	<b>275</b>

## 譯 序

一九八〇年代初，我和參加當時工黨組織的林寶元先生曾經計劃，一起合作翻譯數本有關社會運動方面的理論書籍，本書和一九九一年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化霸權》(Hegemony)，是其中相關的兩本書。這兩本書都是因應當時台灣日益蓬勃的社會運動之需要，著手進行組譯的。《文化霸權》這本書後來歷經波折，才翻譯完稿；本書的情況則更糟，因為人事變遷和譯者本人分身乏術，一直無法動手。甚至於到中文版的版權拿到，都還沒有開始著手。這本書最後是在「兵臨城下」的情況下，由譯者本人短時間內勉力完成的。

這本書的翻譯拖了這麼久，並不是說這本書無關緊要。其實這本書比起《文化霸權》來說，對於台灣的社會運動還更具有重要性。在一九八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時，有許多強調社會運動理論基礎的雜誌，例如《南方》雜誌等，曾經直接或間接地轉述了這本書的許多概念。可惜因為一知半解或者囫圇吞棗，這本書中所分析的概念常有被扭曲的現象，最明顯的地方莫過於「人民鬥爭」、「民主鬥爭」、「對抗」或「人民民主」等這類概念。這種一知半解或者囫圇吞棗的現象，部份反映了那時代的現實：剛從解嚴的政治緊張氣氛中解脫出來，戒嚴時期應該吸取的理論知識現在才能夠接觸，時間上根

本來不及思考和瞭解有關的理論背景知識，就必須要直接理解所需要的那些理論知識；部份表現那時代的社會運動對組織運動的理論需求孔急，但是時間、空間都不允許做系統地研究，就必須上陣運用，所以只能夠斷章取義就近捋拾或者就方便者擷取。這本在左派理論界叫好又叫座的書籍，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折騰得不成樣子。把這本書盡快翻譯出來，讓它跟讀者直接見面，就成為比起翻譯其他的書籍還要更加迫切的事情。

但是這本拖了許久不過又具有迫切性意義的書籍，這個時候才出現，其實也有它占天時的好處的地方。這本書現在譯出來，是時值譯者比較能夠得心應手地成熟處理左派概念和理論問題的時期。在過去近二十年的左派理論學習和研究的學徒期，譯者的很多理論性作品或者譯作，幾乎都是在潛心學習的情形下，學習闡述和希望別人能夠分享自己學習的成果的前提下做出來的一些「工作成績」，談不上理論著述或者介紹。自然要把這些「工作成績」運用在理論書籍的譯述上，實在是非常勉強。近幾年，譯者在這方面面臨的困難慢慢感覺到減輕一些，能夠以比較圓融的語言講出自己所要表述的內容，這種機率占的比較偏高。不用說，用這樣的理解程度來做譯述工作，是比較合宜和妥當了。本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製作出來的產物。儘管本書譯作的時間很短，但是它的質量肯定是比前面的要高出許多。不過，每一個人都還是有他知識和理論的理解局限與盲點，尤其每一個人都深受他所受的知識教育背景的這一歷史條件所限制，要誇大佯裝自己的理論譯述或者著述工作已經可以做到盡善盡美了，那是不可能的。自然本書譯述的內容，就免不了有譯者知識和理論局限性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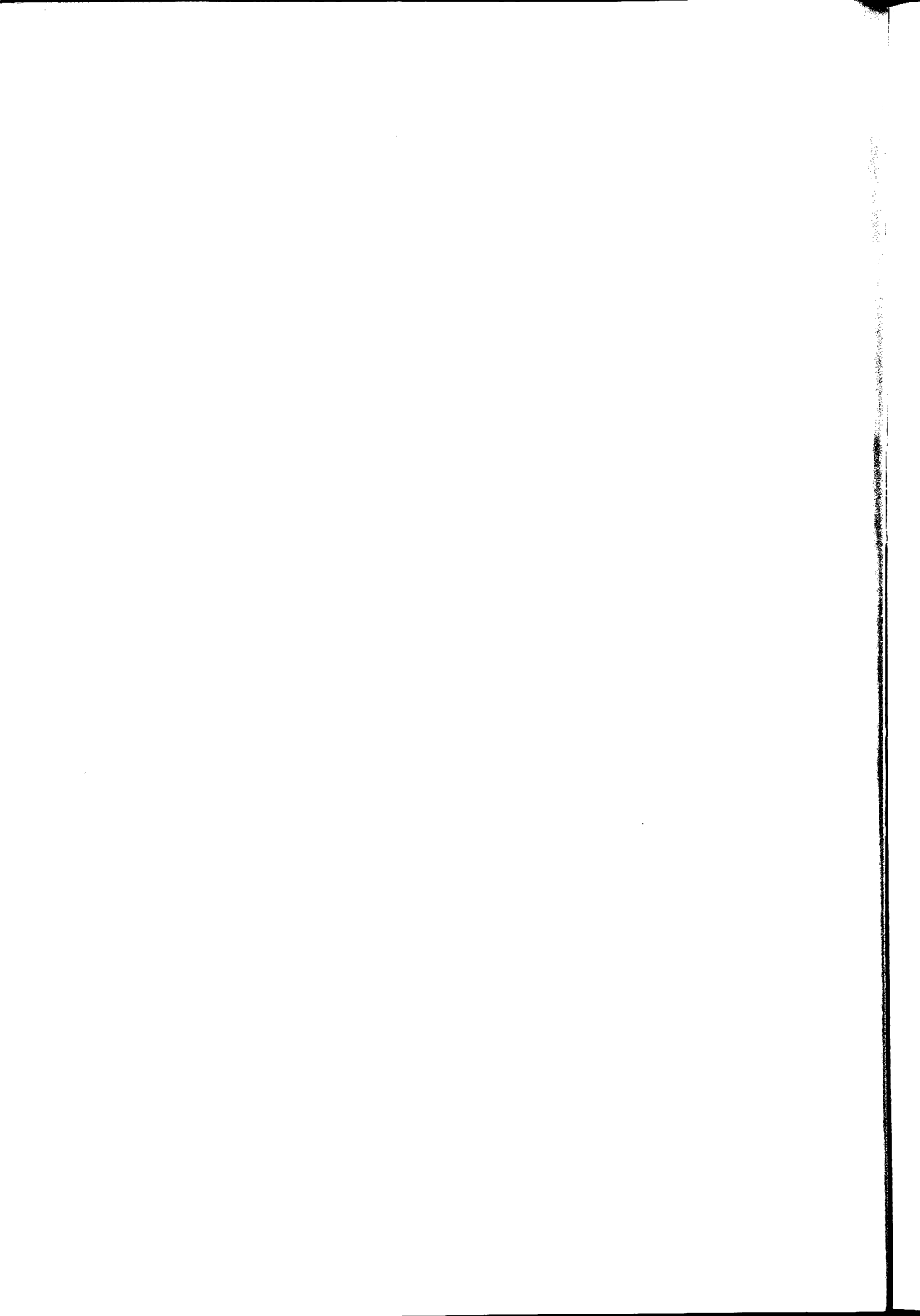
翻譯本書，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譯者花在翻譯上的時間可

能不是很長，可是花在斟酌、推敲、考證、對照、查對思想出處和修改的時間，却在兩倍以上。本書的理論難度，以及作者表述的方式，好像就是要譯者花這些功夫在上面，才足以讓它用現有的方式在中文世界出現一樣。不過要在序言裡用短短的幾句話來介紹這本書的內容，好像又是更難的一件工作。本書作者論證問題的方式，其嚴謹性是少有的。雖然本書作者是用系譜學的方式來說明「文化霸權」的盛衰榮枯，以不著斧痕的方式鋪陳了自己的理論觀點，但是要簡單地說明他如何論證却不容易。似乎只要是引證一兩句話，也就要犯下斷章取義的錯誤。幸好本書已經擺在讀者眼前，它的思想精華就讓讀者自己去細細品題了。不過在這裡，譯者還是要說一句老話：學無止境，對於自己不是很深入的東西，必須虛心求教。不然在這本書裡可能就學不到什麼好的東西，更不用說領略思想精華了。

陳璋津 謹識

一九九四年五月於

台北·木柵



## 導 論

左派的思想今天是站在十字路口。關於過去的這種「顯而易見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預測、關於衝突力量的性質、左派鬥爭的那種意義和目標——都已經因為劈裂構成那些真理的基礎的這些歷史變動突然湧至而受到嚴重地挑戰。其中若干的這些變動，無疑地跟這些敗績和失望是吻合的：從布達佩斯到布拉格和波蘭的政變、從喀布爾 (Kabul) 到共產黨在越南和柬埔寨勝利的這一結果，問號越來越沉重地落在思考社會主義和應該促成社會主義的道路的這整個方式上面。這在以傳統方式來構築的左派知識眼界的這一理論和政治的基礎上，已經重新既是有腐蝕性的又是必然地衝擊著批判性的思考。不過，對它來說還不僅僅如此。整個系列的、構成那些變動基礎的嶄新的現象，已經使得在理論上重新考察的這項工作變得如此緊迫：新的女性主義崛起；種族的、民族的和性別上少數人的抗議運動；人口中處於邊際層的人所從事的反制度設施的生態保護鬥爭；反核運動；處資本主義邊陲地帶的國家中的不定型的社會鬥爭——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社會的衝突性質擴大到更為廣泛的範圍，這為往更加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等的社會前進創造了可能性，不過無非是可能性而已。

這些鬥爭這樣增多起來，與理性的和有組織的社會結構——也就

是說，社會「秩序」——相互比照，首先本身表現為一種社會的「累贅」。許多的聲音，尤其是從自由—保守派的陣營產生出來的聲音，都堅持認為，西方的社會由於平等主義危機的作用，面臨了一次管理活動的危機和解體的威脅。可是，新的形式的社會衝突也把理論的和政治的架構放進危機裡頭，這種理論的和政治的架構是比較接近於我們應該努力在本書的重要部份從事對話的那種架構。這些東西是符合左派的古典言說的，而且也符合在其中構思社會變革的當事人、建構政治空間和解除歷史變革束縛的那些有特權的地方的典型方式。現在處在危機中的東西是整個關於社會主義的概念，這一概念取決於工人階級在本體論上的中心地位，取決於（有大寫字母R開頭的）革命的角色（革命是以這種姿態出現的，它是從一種類型的社會過渡到另外一類型的社會的這種建立基礎的契機），取決於完全統一的和同質的、使得政治的要素變成無意義的集體意志這種虛幻的遠景。當代社會鬥爭的這種多元的和多種多樣的性質，因為那種政治設想，終於瓦解了最後的基礎。這種政治設想充滿著「普遍的」主體，而且以概念的方式圍繞著大的歷史建立在唯一的主體上面。這種政治設想把「社會」看成是可理解的結構，能夠在知識上站在某些階級立場的這一基礎上加以掌握，同時能夠通過具有政治性質的創造行動，作為一種理性的、可以理解的體系加以改造。今天左派正目睹這種雅克賓(Jacobin)設想瓦解的最後一幕。

如此一來，那種豐富和多元性質的當代社會鬥爭已經產生了一種理論的危機。正是在理論運動和政治運動之間的這一兩條路線運動的中間點上面，要找出我們自己的言說的位置。在每一個關鍵的時刻，我們都打算過要防止用印象主義的和社會學的描繪作法（它靠的是忽

視它本身言說活動的情況)來充填這一因為危機而產生出來的理論真空。我們的目標正好相反：是要把焦點放在對這項危機的許多層面來說，乍看起來就好像是不受一般法規限制的濃縮點的這些言說範疇上面，而且要在這種多重折射的種種刻面中說明歷史可能的意義。一切言說的折衷主義或者動搖，在開始的時候都被清除了。一如古典時期開頭的「告示」說過的一樣，在一個人進入新的地帶的時候，一個人就必須仿效著「旅人」的榜樣走，「他們發覺自己迷失在森林中的時候知道，他們不應該四處徘徊，甚至更不應該逗留在一個地方不走，而且要理解到，他們應該盡他們所能繼續筆直地走一個方向，不要為任何一丁點的理由走岔路，即使它是在他們的選擇中初次決定著他們生死的唯一可能的機會。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他們沒有正確地走到他們希望走到的地方，那麼他們至少最後走到某個地方，這個地方或許會比他們留在森林中還要好。」<sup>①</sup>

我們分析的指導線索是在變革文化霸權 (hegemony) 的概念，這種概念過去被認為是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理論說明的一種言說的外觀和基本的波節點。我們主要的結論是認為，在「文化霸權」這一概念的背後，隱藏有某些比**補充**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範疇的一種政治關係還要豐富的東西。實際上，它引進了一種跟那些範疇不能相容的**社會邏輯**。面對著把歷史和社會說成是由圍繞著可以在概念上加以說明的規律構成的這種可知總體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理性主義，文化霸權的邏輯一開始就把自己表現為是一種**補充的**和**偶然的**操作，這種操作是本質的或者「形態學上的」妥當性暫時不被置疑的那種發展典範內部場合的不平衡所要求的。(本書的主要任務之一將是在確定這一偶然性的特殊邏輯)。當這種概念應用的範圍從列寧 (Vladimir Lenin) 到



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逐漸擴大時，偶然性接合的領域也擴充了，而且「歷史必然性」的範疇——它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退到理論的視野下。一如我們在最後兩章要說的，隱含在「文化霸權」概念內部的社會邏輯的這一擴張和規定——以遠超出葛蘭西的方向——將提供我們一個**波節點**，我們從這裡可以思考當代社會鬥爭的特殊性，也可以讓我們站在激進民主的構想這個基礎上來為左派概括新的政治學。

還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通過批判和解構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言說的外觀，來開始討論這項任務。讓我們首先這樣說，並沒有不用媒介，就可以藉以表達「現實」的一種言說和一種範疇的體系。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內部，在以解構的方式來運用當中，我們不認為可以撰述「普遍的歷史」，可以把我們的言說記下來當作是有關知識的一種單純的、直線過程的一個環節。正如同規範性的認識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一樣，同樣的，普遍性的言說的時代也已經結束了。政治的結論跟那些本書闡明的結論一樣，從非常不同的言說形態來說——例如，從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或者從跟社會主義傳統不同的自由主義的言說來說——是很接近的。其中沒有一種有志於成為有關社會的那種真理（或者，像沙特所說的，「我們的時代不可逾越的哲學」）。可是因為這樣，馬克思主義才是藉以變成有可能提出這種新政治概念的那些傳統之一。對我們來說，這種出發點的妥當性是完全建立在這個事實上面，即它組成我們自己的歷史。

在相應地縮減做作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妥當性的範圍中，我們是正在跟這個理論根深蒂固地存在的某種東西決裂：換句話說，就是它那一元論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是想用自己的範疇來掌握大的歷史的本

質或者根本的意義。情況是不是這樣呢？答案只能夠是肯定的。只有我們放棄以「普遍階級」這種本體論上有特權的地位為基礎的任何認識論優勢，才有可能嚴謹地討論馬克思主義範疇妥當性的現有程度。現在我們應該非常清楚地說明，我們目前是身在馬克思主義以後的領域中。不再有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具體說明的主體性和階級的概念，不再有可能堅持它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的這種看法，自然更不再有可能堅持把共產主義看成是一種透明的社會，對抗性已經從這裡消失的這種概念。不過，如果說我們本書的知識構想是後馬克思主義的，那麼它顯然也是馬克思主義以後的。正是通過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構築起來的某種直覺的和言說形式的發展，壓制或者消除某些其他的，我們才構築出了一種文化霸權的概念。這種概念，在我們看來，可以是一種為激進的、自由的和多元的民主而鬥爭的有用工具。在這裡提到葛蘭西之處，儘管部份是批判的，不過也是絕頂重要的。在這本作品中，我們打算重新找出第二國際時代馬克思主義言說活動的某種多樣性和豐富性。它們已經因為史大林（Joseph Stalin）時代和史大林以後時期「馬列主義」潮流那一貧乏的大一統印象，而有被遺忘的傾向，而且在現在被某種當代「反馬克思主義」的形式幾乎完整無缺地再產生出來，即使是舉著對立的招牌。保衛光榮的、同質的和無懈可擊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人，以及這些新哲學式的「反馬克思主義」專家，都沒有瞭解到這種景況；捍衛它們的人和抨擊它們的人同樣都是牢牢地把基礎建立在有關一個學說角色，以及統一性程度的那種素質和原始的觀念上。這些東西在所有它重要的結論方面，都還是屬於史大林主義的設想。相反的，我們自己對這些馬克思主義作品的研究是要努力恢復它們的多元性，掌握許多言說的成果——在相當大

的程度上是異質的和矛盾的——這些多元性和成果構成這些馬克思主義作品的內在結構與資源，同時保證它們作為政治分析的參考點繼續存在下去。超越一種偉大的知識傳統的創舉，永遠都不是在一種崩潰的突發形式中產生的，而是在這種狀況中產生的：同源的河水滔滔奔向四方，但是却跟其他水源流下的支流匯流成河。這正是構成古典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言說得以有助於形成新左派思考的原因：方式是把若干它們的概念留傳下來，改造或者放棄其他的，然後在形成、社會多元性的那些解放了的言說的那種無限交織活動中稀釋它們。

---

①Rene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In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1, edited by E. S. Haldane & G. R.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96.

## 第 1 章

# 文化霸權：概念的系譜學

我們要從追溯「文化霸權」的概念的系譜學 (Genealogy) 開始。應該要強調指出，這不會是關於一種從開始就具有充分肯定性的概念的系譜學。事實上，稍為有點自由地利用一下傅珂 (Michel Foucault) 的表述，我們可以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種關於沉默的考古學」。文化霸權的概念就它特殊的身份來說，不是產生來界定新型的關係的，而是要填補一個已經在歷史的必然性這一鏈條中開了缺口的裂痕。「文化霸權」會間接涉及一個不在場的總體，而且會間接涉及重新組合和重新接合的多種多樣的打算。這種重新組合和重新接合在克服原有的不在場當中，就使文化霸權有可能賦予鬥爭一種意義，使歷史力量具有充份的肯定性。這一概念出現的這些環境將是關於一種斷層 (就地質學的意義來說) 的那些環境，將是關於一種必須充填的裂縫的那些環境，也將是關於必須克服的一種偶然性的環境。「文化霸權」不會是關於一種同一性的這一崇高的揭示，而是一種危機的反應。

即使是文化霸權概念在它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卑微血源中 (在這裡，它是被要求來處理關於政治效果的一個有限的範圍)，它也已經間接涉及一種偶然性的介入，這一介入是過去「正常的」歷史發展的危機或崩亡所要求的。後來，隨著列寧主義出現，它是新型的、使階級

鬥爭能夠在帝國主義時代產生那種偶然性的「具體情況」所需要的政治預測的一個基礎。最後，在葛蘭西看來，這項術語取得了新型的、超出它的策略或者戰略的用處的重要位置：「文化霸權」變成爲瞭解存在於一種具體的社會形態中的那一統一體的重要概念。可是這項術語的每一種意義延伸，都是伴隨著我們能夠臨時稱之爲「偶然性的邏輯」的一種擴張。反過來說，這種從裂痕中產生出來，而且撤退到關於社會、關於「歷史必然性」範疇的解釋視野上的表述，過去曾經是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在這場往前推進的危機內部的另外一種選擇——而且是對它的不同的反應，其中文化霸權的理論是接下來的第二種——形成了我們研究的對象。

## 第一節 羅莎·盧森堡的兩難

讓我們避開任何想退回到「源頭」的誘惑。讓我們單純地穿過時間中的一個階段，試著偵察出文化霸權的邏輯將打算填補的那一空白的存在。這種在多種多樣的方向中構想出來的武斷的開端，將提供給我們如果說不是關於一種興盛榮枯的意識，那麼至少也是關於一種危機的領域。正是在這種「歷史必然性」已經破碎的鏡子的多重的、迂迴曲折的反射中，新的關於社會的邏輯才能夠開始迂迴地潛入，這種新邏輯將設法通過質疑它所說明的這一條件的那種真實性質來自行思考。

在一九〇六年，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出版了《群眾罷工、黨和工會》（*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對這篇作品——它已經存有林林總總的、對我們的

論點重要的含混和關鍵性的領域——進行簡短的分析，會提供給我們一個初步的參考點。羅莎·盧森堡討論一個特殊的主題：群眾罷工作為一項政治工具的有效性和意義。可是對她來說，這包含兩個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十分重要的問題的考察：工人階級的統一性和歐洲革命的途徑。群眾罷工，這個在第一次俄國革命占主導地位的鬥爭形式，是在它特殊的機制和在它對於德國的工人鬥爭有的可能的構想方面被人討論過。羅莎·盧森堡的論點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在關於德國群眾罷工的有效性這一辯論是幾乎專門圍繞在政治罷工上面時，俄國革命的經驗已經說明了群眾罷工的政治面向和經濟面向之間的互動和相互、經常強化的關係。在沙皇國家的這種鎮壓性的環境中，沒有一項僅有部份需求的運動能夠仍然限制在本身的領域之內：它必然被改造成為一種抵抗的例子和象徵，因而就刺激和產生其他的運動。這些運動出現在事先想不到的地方，而且有擴大和以不可預見的方式普及化的傾向，因而它們就超出了任何政治或工會領導人管理與組織的能力。這是羅莎·盧森堡的「自發性」的意義。經濟和政治鬥爭的統一體——這是說，工人階級的那種統一體——是反饋和互動的這種運動的結果。可是這種運動反過來就無非是革命的這一過程。

羅莎·盧森堡說，如果我們從俄國移到德國來，那麼情況就變得非常不同了。占主導地位的潮流是工人的不同範疇當中的、種種運動的不同要求之間的，以及經濟和政治鬥爭之間的分裂。「只有在革命時期急風暴雨的氣氛中，勞資之間的每一場局部的小衝突才有可能發展為普遍的爆炸。在德國，工人同廠主之間最激烈、最殘酷的衝突每年都在發生，每天都在發生，但鬥爭並未超出有關的個別行業或個別城市甚至個別工廠的範圍。……却沒有一次發展成共同的階級行動。即

使它們獨自發展成顯然具有政治色彩的個別的群眾罷工，也還是沒有釀成普遍的鬥爭風暴。」<sup>①</sup>這種孤立和分裂不是一種偶然性的事件：它是一種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性作用，這種作用只有在革命的氣氛中才能夠加以克服。「確實如此，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的分離與相互獨立不過是人為的產物，雖然這也是議會時期的歷史條件決定的產物。從一方面講，在資產階級社會平靜的『正常』進程中，經濟鬥爭是分散進行的，成了一大批各個企業、各個生產部門單獨進行的鬥爭；從另一方面看，政治鬥爭也不是通過群眾本身的直接行動開展的，而是適應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通過代議制的途徑，通過對立法的代表機構施加壓力來進行的。」<sup>②</sup>

在這些條件下，而且假定革命在俄國爆發只能夠通過諸如這個國家比較性的落後、沒有政治自由或者俄國無產階級貧困這些因素，才能夠加以說明——那麼不是西方革命的遠景要**無限期地**延後下去了嗎？在這裡，羅莎·盧森堡的答覆變成猶豫不定，而且比較沒有像所設定的一種具有特性的過程那樣令人信服：換句話說，想減少俄國無產階級和德國無產階級之間的差異這一打算，證明了貧困的範圍和在德國工人階級的各種不同部門中缺乏組織，以及在俄國無產階級最先進部門中存在著相反的現象。可是關於那些當中的什麼東西把德國的落後隱藏住了呢？它們不是會被資本主義的擴張掃除掉的殘餘部門嗎？而且在那種情況中，有什麼可以保證革命形勢的出現呢？答覆**我們的問題**——羅莎·盧森堡在這一脈絡中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提到這個問題——的答案，猝然地而且毫不含糊地在幾頁以後出現在我們眼前：「（社會民主黨）永遠都應走在事物發展的前面，並且努力去加速這種發展。但要做到這一點，它就不應當不管時機是否恰當，不經認

真考慮就發出舉行群眾罷工的口號，而是首先要使最廣泛的無產階級階層懂得革命時期會**不可避免地到來**，認清導致這一時期的內部社會因素和這一時期將帶來的**政治結果**。」<sup>③</sup>因此，「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規律」本身就奠定基礎，成為未來德國革命形勢的保證。每一件事情現在可以看得出來：在德國不再可以取得資產階級的民主變革時（原文照抄），就只能按社會主義的方向來解釋革命形勢到臨的問題；俄國的無產階級——進行反對專制主義的鬥爭，不過是在一種受到世界資本主義成熟性質支配的歷史環境下進行的；這一世界資本主義的成熟性不讓它在資產階級的階段把它本身的鬥爭穩定下來——是歐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且為德國的工人階級指出了它自己的未來。在從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到葛蘭西的歐洲社會主義戰略辯論中如此重要的東方和西方之間差異的這個問題，在這裡是通過丟掉它來加以解決<sup>④</sup>。

讓我們分析一下這項輝煌的結果的各種環節。關於階級統一體的這種結構性的機制，羅莎·盧森堡的立場是清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是必然分裂的，只有通過革命的這一過程才能夠把它的統一體重新組織起來。可是這種革命重新組織的**形式**，是由特殊的機制組成的，它跟任何機械主義的說明毫無關聯。正是在這裡，自發性才產生作用。我們能夠這樣思考，「自發性」的理論完全肯定在假定有所選擇的形勢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這一情況下，不可能**預見到**革命過程的方向。雖然如此，這種說明還是不夠的。因為生死攸關的東西不只是存在於分散的鬥爭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在這些都是可以從分析者或者政治領導者的思考角度看出來的時候——而且也是站在這一複雜性和多樣性基礎上的革命主體的**統一體**的這個組織。這點唯獨向我



們證明，在打算確定羅莎·盧森堡的「自發性」的意義時，我們不僅必須集中在鬥爭形式的多元性上面，而且也必須集中在它們在本身當中建立起來的關係和隨之而產生出來的這些統一的效果上面。而且在這裡，統一的機制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在革命的形勢中，是不可能**確定**每一種孤立的鬥爭的**表面意義**，因為每一種鬥爭都是遠遠超出它本身的真實性質，而且在群眾的意識裡變成爲比較全面性地反對體制的鬥爭中的一個單純的環節。因此，正是在穩定時期工人的階級意識——作爲環繞著他的「歷史利益」構成的全面的意識——是「隱藏著的」和「理論上的東西的」時候，在革命的形勢中它才變成爲「積極的」和「實踐的」。例如，在革命的形勢中，每一種動員的**意義**，可以說，看起來就像分裂：除非從它特殊字義上的要求來看，每一種動員都代表整個革命過程；而且這些整體化的效果在若干鬥爭是由其他的鬥爭來多元決定 (overdetermination) 時是可見的。不過這無非是這一象徵明確的性質，即指意 (the signified) 溢出指符 (the signifier) ⑤。**階級的這種統一體因此是一種象徵的統一體**。無疑的，這是羅莎·盧森堡分析的最高極致。這項分析確立了脫離第二國際的正統理論家（對他們來說，階級的統一體完全是由經濟基礎的規律奠定的）的最大距離。雖然在許多其他的關於這段時期的分析中把作用賦予了偶然性——超出「結構」的理論說明這項環節——但在確定這種偶然性的特殊機制以及承認其實際作用的範圍時，却很少有作品像羅莎·盧森堡的作品那樣⑥。

那麼，在一方面，對於羅莎·盧森堡的分析已經使對抗的地點和鬥爭的形式多重化了——我們從現在開始要把這些稱之爲**主體的立場**——這適合於突破所有工會或者政治領導人能夠控制或者計劃這些鬥

爭的論點；另一方面，它已經提示把象徵的多元決定看成是統一這些鬥爭的具體機制。可是在這裡，問題出現了。因為對於羅莎·盧森堡來說，這種多元決定的過程組成了一個非常嚴密的統一體：**一種階級的統一體**。惟在關於自發性的理論中並沒有東西在邏輯上支持她的結論。相反的，關於自發性的那種邏輯看來似乎意味著產生結果的那類型的統一的主體，應該大部份還是非決定的。在沙皇國家的情況中，如果說關於對抗的地點和多種多樣的鬥爭的多元決定條件是一種鎮壓性的政治環境，那麼為什麼不能超越階級的限制，促成例如部份統一的、基本的規定是人民的或者民主的這一主體的建構呢？甚至於在羅莎·盧森堡的作品裡——儘管作者還是有教條的僵化作風，對她來說，每一個主體都必須是階級的主體——在好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超出了階級的範疇。「一九〇五年，從開春直到盛夏，在遼闊無比的整個俄國，幾乎整個無產階級都起來反對資本家，開展堅持不懈的經濟鬥爭。上自所有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職業如商業職員、銀行職員、技術人員、演員、藝術工作者，下至家庭傭人、下級警官乃至流氓無產者階層，全都捲入了這場鬥爭。同時，這場鬥爭又像洪流一樣，從城市奔向廣闊的農村，甚至衝擊了兵營的鐵門。」⑦

讓我們澄清一下我們這一問題的意義：如果說工人階級的統一體是在革命多元決定過程的**外部**所構成的一些下層結構的論據，那麼關於革命主體的階級性質這個問題將不會產生。其實，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兩者會是在鬥爭本身產生之前構成的階級主體相稱的表現。不過，如果這種統一就是多元決定的這種過程的話，有關政治的主體性和階級的立場之間為何應該有一種必然的重疊，這點就必須提出一項獨立的說明。雖然羅莎·盧森堡並沒有提出這種說明——其實，她甚至於

沒有思考這個問題——但她的思想背景讓我們看清楚這種說明是什麼內容：換句話說，肯定資本主義發展客觀規律的必然性質，這種規律造成中間部門和農民逐漸無產階級化，因此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直接對抗。結果，自發性邏輯的這一革新的作用看起來從一開始就受到嚴格的限制<sup>⑥</sup>。

無疑的，作用是受到如此的限制，因為它們產生作用的領域是非常受到限制。而且在第二個更加重要的意義上，也因為自發性的邏輯和必然性的邏輯並沒有作為兩種獨特的和積極有助益的原則，會合起來說明某種歷史形勢，而是反過來作為對立的邏輯產生作用，所以它們只是彼此通過互相限制它們的作用來彼此相互作用著。讓我們小心地考察它們分歧的地方。自發性的邏輯是象徵的邏輯，因為它恰恰是通過瓦解每一種字面意義的方式來產生作用的。必然性的邏輯是字面上的邏輯：它是通過固定的意義產生作用的。這些固定的意義恰恰是因為它們是必然的，所以確定了一種消除任何偶然變異的意義。不過，在這種情況中，兩種邏輯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邊界的關係，這種邊界能夠往一個方向或另外一個方向擴充，可是就從來不會克服這種不可歸結的、被引進到分析裡頭來的二元論。

實際上，我們在這裡目睹了一種**兩重性的空白**出現。從必然性的範疇來看，邏輯的這種兩重性是跟決定的／非決定的對立結合在一起：這就是說，它只指出這種範疇產生作用的領域。不過同樣的東西也從自發性的觀點產生出來了：「歷史必然性」的領域本身表現為一種限制，限制象徵產生作用。在實際的事實中，**領域就是限制**。如果說，關於這些作用的限制的特殊性不是直接顯而易見的，那麼這是因為有人以為兩種肯定的和不同的解釋原則滙合起來了，每一種原則都在它自己

的領域中有效，而不是像它們之中的每一種都有效一樣：即每一種都是其他種純粹否定的反面。由二元論產生出來的這一雙重的空白就以這種方式變成不可見。可是使一種空白不可見，跟把它填補起來不是同一件事。

在我們考察這種雙重的空白變化的形式之前，我們可以暫時把我們自己放置在它裡頭，玩一下它容許我們玩的唯一一種遊戲：這就是，移一下把這兩種對立的邏輯劃分開來的邊界。如果我們擴展跟歷史必然性對映的範圍，結果就是著名的另外一種選擇：不是資本主義通過它必然的規律走向無產階級化和危機，就是這些必然的規律沒有像預期那樣產生作用。按照羅莎·盧森堡式的言說的那種邏輯，在後面這種情況下，不同的主體立場之間的分裂就不再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人為的產物」，而是變成永遠的現實。這是所有經濟主義的和還原論的概念固有的零和遊戲。相反的，如果說我們把邊界推向對立的方向，推到政治主體的階級性質失去其必然的特性的地方，那麼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光景就完全不是幻想了：它是第三世界的社會鬥爭所具有的多元決定的原始形式，它建立了跟嚴格的階級界線毫無關係的政治一致：它是無情地驅散某種階級接合的必然性質這一幻覺的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它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鬥爭的新形式，在這裡，過去幾十年間我們已經親眼目睹新型的、筆直穿透屬於社會和經濟結構範疇的政治主體性經常地出現。「文化霸權」的概念總是恰好出現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中，它受到分裂的經驗以及不同的鬥爭和主體的立場之間的接合這一不確定性所支配。它總是在一種已經親眼目睹「必然性」的範疇退到社會視野之下的政治一言說的世界中提出一種社會主義的答案。面對著想通過二元論——自由意志／決定論、科學／倫理、個人／集體

性、因果性／目的論——的擴散來處理關於本質主義的一元論這一危機的打算，文化霸權的理論總是把它回應的基礎放在使得一元論／二元論的選擇有可能的這種領域的替換上面。

在丟開羅莎·盧森堡之前還有最後一點。在羅莎·盧森堡的言說中「必然的規律」所產生的關於作用的限制，也在另外一個重要的方向中產生作用：它是作為能夠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可以觀察到的趨勢」那裡取得的政治結論的一種限制。理論的角色不是要以知識的方式來詳細說明關於分裂和分散的這些可以觀察到的傾向，而是要保證這些傾向具有暫時的性質。「理論」和「實踐」之間有分裂，這是一種危機的明顯象徵。這種危機——對於這種危機，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的出現只能代表一個答案——是我們分析的出發點。不過它要求我們把我們自己放到先於這一起點之前的一個地方，以便指出進入危機的這一典範。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一份特別清楚和有系統的文件，即考茨基（Karl Kautsky）在一八九二年評論《愛爾福特綱領》（*Erfurt Gramme*）（德國社會民主黨創新的宣言）的評論文<sup>9</sup>。

## 第二節 危機，零度

《階級鬥爭》（*The Class Struggle*）是一篇典型的考茨基式的作品，它推薦了一種關於理論、歷史和戰略不可分離的統一體<sup>10</sup>。自然，從我們目前的思考角度來看，它看起來是非常的素樸和簡單化。可是我們必須研究一下這種簡單性的種種領域。因為它們可以讓我們既瞭解這種典範的結構性質，又瞭解在世紀交替的時候促成其危機的原因。

以這樣的一種初步的和原來的意義，即考茨基非常明顯地提出的

關於社會結構和它裡頭的對抗的這種越來越**簡單的**理論來說，這種典範是簡單的。資本主義社會向財產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企業的手中這一方向推進：大部份不同社會階層和職業部類的迅速無產階級化，是跟工人階級越來越貧困化結合在一起的。這種貧困化是和是貧困化原因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規律，阻擋了工人階級內部的領域和作用真正的自動化：經濟的鬥爭只能夠有溫和的和不確定的成就，而這**事實上**促使工會附屬於黨的組織。這些只能夠通過取得政治權力來在實際上變更無產階級的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環節和層次也沒有任何相對獨立性的形式。例如，國家是按照最粗俗的工具主義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因此，考茨基式的典範的簡單性首先是在於把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有關結構性差異的這種體系簡單化。

不過考茨基式的典範在其次的和比較不常被提到的意義上（這對我們的分析非常的重要），也是簡單的。在這裡，重點與其說是這種典範把一些相關的結構性差異減少了，還不如說是它通過把每一種結構性的差異附加上一個**單純的意義**，把它理解為總體內部的一個明確位置的這種方式，把它們固定下來了。以第一種意義來說，考茨基的分析完全是經濟主義的和還原論的；不過如果說這是唯一的問題，那麼更正的辦法就是僅僅必須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引進來，而且由於社會這種地形內部層次的多重化，就使分析更加複雜。可是這些多重化的層次或者結構性的環節中的每一種，就像考茨基式的典範中的層次一樣那麼固定和獨特，它們都有一種身份地位。

爲了說明**意義**的這一**唯一的**所在，讓我們考察一下考茨基是怎麼說明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之間的關係的：「有人有時候打算把政治鬥爭跟經濟鬥爭對立起來，而且宣稱無產階級應該特別注意這一種或其他

的一種。其實兩種鬥爭都是不可分的。經濟鬥爭需要政治權利，這些東西是不會從天下掉下來的。在另一方面，保證政治權利和維護政治權利這一最有力的政治鬥爭，歸根到底也是經濟鬥爭。」①羅莎·盧森堡也肯定這兩種鬥爭的統一性，不過她是從**最初的歧異**開始的，統一性是一種**統一起來**(unification)，是沒有任何固定的、先驗的接合形式的這些分離的組成成份多元決定的結果。可是對於考茨基來說，統一性是出發點：工人階級在政治領域是靠經濟的預測來鬥爭的。有可能通過一次純粹的邏輯過渡，從一種鬥爭轉到另外一種鬥爭。在羅莎·盧森堡的情況中，每一種鬥爭都不只有一種意義——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它在第二種象徵的領域中是加倍增加。它的意義也不是固定的：因為它取決於多變的接合。這些接合從她自發性的思考角度來說，（在我們已經標示出來的範圍內）拒絕任何先驗的規定。另外，考茨基通過把每一種社會對抗或組成成份都還原到一個已經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固定下來的特定的結構位置這一辦法，把每一種社會對抗或組成成份的意義都簡化了。在《階級鬥爭》中說明的資本主義史，是由純粹的**內在性關係**組成的。我們能夠從工人階級轉到資本家，從經濟領域轉到政治領域，從製造業轉到壟斷的資本主義，不必片刻脫離屬於封閉的典範內的內在合理性和可知性。無疑的，資本主義是像對一個外在的社會現實一樣產生作用的那樣出現在我們眼前，不過後者由於開始跟前者接觸就完全消失了。資本主義變化著，但這種變化無非是揭示它內生的那些傾向和矛盾。在這裡，必然性的邏輯是不受到任何東西限制的：這正是使《階級鬥爭》成為危機產生前的一篇作品的東西。

最後，簡單性是表現在第三個領域中——這涉及到理論本身的角

色。如果說把這篇早期的考茨基的作品拿來跟其他屬於早期的或者晚期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作品比較，我們會發現它包含一個相當令人驚訝的特質：它不是把本身表現成爲一種介入，以便說明歷史基本的意義，而是把本身表現成爲擺在那裡大家都可以看到的透明經驗系統化和普遍化。就像沒有社會的象形文字要解譯一樣，工人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之間是完全對映的。就階級統一體的構成來說，普雷則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了考茨基作品的這一特殊性：跟從《哲學的貧困》（*Poverty of Philosophy*）的時代以來的馬克思，把工人階級的經濟介入和政治組織這種統一體看成是未完成的過程——這是一種打算要彌補的「自在階級」和「自爲階級」之間的裂縫——相反，考茨基論證好像工人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統一體的形態。「看起來，考茨基相信在一八九〇年無產階級成爲一種階級的這一形態是一個**既成事實**：它已經形成爲一種階級，在未來仍然是如此。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將無事可做，要做的只是達成它的歷史任務，黨只能共襄盛舉。」<sup>12</sup>同樣的，在考茨基提到逐漸無產階級化和貧困化，提到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危機，或提到社會主義必然的到來時，他似乎不是提到分析所顯示的可能性傾向，而是提到經驗上可以觀察得到的、在前兩種情況中的現實，和提到在第三種情況中的短期的過渡時期。儘管必然性在他的言說中是占主導地位的範疇，但它的作用也不是在保證一種超出經驗的意義，而是要使經驗本身得到系統的說明。

那麼，雖然構成這一樂觀主義和簡單性基礎的組成成份的結合，是被提出來作爲階級構成的普遍過程的一部份，可是它只表現德國工人階級那種特殊歷史形態的圓滿成就。首先，德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性是兩次失敗的結果：即一八四九年以後的德國資產階級把自己建



立成爲自由—民主運動的文化霸權力量；以及拉薩爾派（Lassalle）的工團主義者打算把工人階級整合進俾斯麥（Prince Otto von Bismarck）的國家裡。其次，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九六年的大經濟蕭條和伴隨著的影響到全部社會階層的經濟上的不安定，給普遍的關於資本主義即將崩潰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到來的樂觀主義滋養。第三，工人階級的結構複雜性不高：工會剛剛組織起來，在政治上和財政上是附屬於黨；而且在二十年大蕭條的環境下，通過工會活動來改善工人的條件看起來還是非常有限。一八九〇年建立的「德國工會總委員會」（General Commission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s），在地區的工會當局抵制和社會民主黨全面懷疑當中，只有經過千辛萬苦才能夠把它的文化霸權硬加在工人運動的身上<sup>13</sup>。

在這些情況下，工人階級的統一性和獨立性，以及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完全看起來是經驗的事實。這些是解答考茨基的言說得以被別人接受的媒介變數。可是在實際上，這種情況嚴格來說是德國的——或者充其量是典型的、自由派的資產階級是衰弱的某些歐洲國家的——而且確實並不符合具有強有力的自由派（英國）或民主的—雅克賓（Jacobin）傳統（法國），或者倫理和宗教的一致凌駕階級的一致（美國）的國家的那些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可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中，因爲歷史是向社會的對抗越來越簡單化的方向推進，所以德國工人運動的極端獨立和對抗的過程，將取得其他國家的情況必須向它滙合的一種典範的優勢，而且以這種典範爲準，這些國家的情況只是不完全近似於它<sup>14</sup>。

經濟蕭條結束使這種典範開始產生危機。向「有組織的資本主義」過渡，以及繼起的、一直持續到一九一四年的景氣，使得「資本主義

的普遍危機」這一遠景變得不確定。在新的條件下，成功的工會經濟鬥爭的浪潮使得工人階級能夠鞏固他們自己在社會民主黨內的組織力量 and 影響。不過在這個地方，在工會和黨內的政治領導人之間開始浮現一種持續的緊張，因此工人階級的統一性和社會主義的決心變成越來越有問題。在社會的所有領域中，產生了**領域的自主化**——這意味著任何一種統一性都只能夠通過不穩定的和複雜的重新接合的形式來取得。從這種新的思考角度來看，嚴肅的問號出現在看起來合乎邏輯的和簡單的一八九二年考茨基式的典範這一多重的結構環節的系列上。而且當理論和綱領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完全暗示的關係時，政治的危機在理論的危機當中就會是加倍的。一八九八年，馬薩里克(Tomas G. Masaryk)就製造了一種很快就變成流行的說法：「馬克思主義的危機」。

作為從世紀交替一直到大戰止的全部馬克思主義辯論背景的這一危機，看起來已經受到兩種基本的環節支配：即關於社會的不透明性、關於越來越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複雜性和抵制這種新的意識；以及按照古典典範來說的這些應該已經統一起來的社會當事人不同立場之間的分裂<sup>15</sup>。在拉布里奧拉(Antonio Labriola)給拉格德勒(Lagar-delle)的一封信中的著名段落裡，拉布里奧拉從修正主義的這場辯論的起始點開始說明：「確實，在所有辯論的這種傳聞背後，有一個嚴肅的和重要的問題：若干年前強烈的、振奮人心的和言之過早的希望——那些具有過份明確的細節和輪廓的期待——現在意外地碰到最複雜的經濟關係的抵抗，和最錯綜複雜的政治世界的網絡。」<sup>16</sup>

把這點看成為不過是過渡性的危機，會是錯誤的；相反的，馬克思主義在那時期最後失去了它的純真性。在關於它的範疇的一連串典

範是屈服於越來越不是典型的情況這種「結構的壓力」下，變成越來越難把社會關係歸結為那些範疇固有的結構環節。停頓和不連續的激增，開始打破把本身認為是深厚地一元的這種言說的統一體。從那時候起，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已經是要**思考那些不連續性**，和要找出**重新把那些分散的、異質的組成成份組織起來的形式**。不同的結構環節之間的過渡已經失去它們原始的邏輯透明性，而顯現出跟偶然的和辛辛苦苦地建構起來的關係相關的一種不透明性。對於這種典範危機的不同反應，其特殊性在於思考這種相關聯的環節的方式上面——它的重要性增加到它的性質變成爲不顯明的這樣一種程度。這是我們現在必須分析的東西。

### 第三節 第一種對於這場危機的反應：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的形成

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派在它在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George Plekhanov）那裡被建立起來的時候，並不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單純延續。它包含一種非常特殊的轉折，是以把新的角色賦予理論爲其特點。跟把理論用來系統地說明可以觀察的歷史傾向的這種方式——就像在考茨基的一八九二年作品中的情況一樣——相反，理論把自己樹立成爲一項保證，用以保證這些傾向最後會跟馬克思主義的典範提出來的那種社會接合相一致。換句話說，正統派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實踐之間逐漸分裂的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所保證的這種關於下層建築的運動規律，才提供克服這種分裂的地盤，和保證現有傾向的過渡性質以及未來工人階級的革命

重建工作。

在這方面，讓我們考察一下考茨基在他跟工會運動的理論家爭論時所表達的有關黨和工會之間關係的立場<sup>17</sup>。考茨基非常清楚德國工人階級內部走向分裂的強有力傾向：工人貴族的崛起；工會的工人和非工會的工人之間的對立；不同的僱傭階層相對立的利益；資產階級想分化工人階級的這一自覺的政策；存在著服從使其跟社會民主黨脫離關係的這種教會民粹主義的大量天主教工人，等等。他同樣意識到這樣的事實，即越多的**直接的物質利益**占著主導地位，就有越多的分裂傾向浮現出來；因而純粹的工會行動就不能保證工人階級的統一性，也不能保證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傾向<sup>18</sup>。除非工人階級直接的物質利益是從屬於**最後的目標**，即最後的社會主義目標，否則這些東西都得無法鞏固；而這是以經濟鬥爭服從於政治鬥爭，因而工會服從於黨為前提的<sup>19</sup>。可是只有在黨是科學的儲藏室——這是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儲藏室——時，黨才能夠體現這種整體化的要求。工人階級不跟隨社會主義方向走的這一明顯的事實——英國的工會主義是關於這點的一個馳名的例子，而且在這世紀交替的時候我們不能夠再忽視——促使考茨基肯定對於列寧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有這樣一種重要影響的那種知識份子的新特權角色。這種知識份子媒介在它的作用方面是有限制的，因為按照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提法，它唯一的自由是在於意識到必然性。可是它却使得一種接合的關係產生出來，這種接合關係完全不必被迫求助於以一元論的方式來思考的必然性這一鎖鍊。

在階級的一致上撕裂開來的這道裂縫，不同的工人主觀立場之間的這道逐漸加大的分裂，只能夠通過進展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來保

證的這項經濟基礎未來的運動來超越。因此，每一件事情都取決於這種科學預測的能力，和取決於這種預測的必然性質。「必然性」的這個範疇必須以越來具有敵意的方式來加以肯定，這不是偶然。眾所周知，「必然性」是如何被「第二國際」所理解的：它被理解為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Darwinism）這一基礎上的自然的必然性。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時常被說成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拿來取代黑格爾的辯證法的替代品；然而事實是，在正統派的概念裡，黑格爾主義和達爾文主義被結合起來構成一種混合物，它可以滿足戰略上的要求。單獨是達爾文主義不能提供「未來的保證」，因為自然的選擇不是在從開始就預先決定的方向中產生作用的<sup>④</sup>。除非是把黑格爾式的那種目的論加上達爾文主義——達爾文主義跟它是完全矛盾的——才可以把進化的過程說成是未來過渡的保證。

關於由不可避免的規律的行動來保證的階級統一體是未來的統一體的這種概念，在許多層次上都有影響：在屬於不同的主體立場的這類接合上；在處理不能夠被消化到典範裡頭的差異的這種方式上；和分析歷史事件的戰略上。關於第一點，可以看得出來，如果說革命的主體在生產關係的層次上建立了它的階級一致<sup>⑤</sup>，那麼它在其他層次的存在只能夠是外在性的，而且它必須採用「**利益展現**」的形式。政治的領域只能夠是一種上層建築，因為它是當事人（他們在「利益」的形式下經過思考的一致，在其他的層次本身是已經建立起來了）之間的鬥爭領域。這種重要的一致因此是一勞永逸地被固定下來，成為跟種種的、工人階級有關的政治展現和意識形態展現形式的一種不可改變的事實<sup>⑥</sup>。

其次，這種還原論的問題設定（problematic）利用兩種推理——

這兩種推理，我們可以稱之為**從表象來論證**和**從偶然性來論證**——來處理不能夠被吸收到它自己的範疇裡的差異。從表象來論證就是：每一件東西都把本身表現為我們可以歸結為同一的差異。這可以採取兩種形式：不是表象是隱藏的單純手段，就是它是本質顯現的必然形式。

（屬於第一種的例子是：「民族主義是隱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一種屏障」；屬於第二種的例子：「自由主義的國家是資本主義必然的政治形式」。）從偶然性來論證是：不能夠把社會的範疇或部門歸結為某種形式的社會重要的一致，但在那種情況中，與歷史發展的基本路線相對的它的那種邊際性，可以讓我們把它當作是不相關的丟掉。（例如：「因為資本主義造成中間階級和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我們就能夠忽視這些，把我們的戰略集中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上面。」）因此在從偶然性來論證中，一致在歷時性的總體中被重新找出來了：一種無情的連續階段，能夠讓現有的社會現實按照那個社會逼近成熟性的階級，被分割成爲是必然的或偶然的現象。歷史因此是關於一種抽象的連續性的具體化，一種看起來既有過程的意義，又有過程方向這一接近典範的純粹性的近似。

最後，正統的典範作爲關於現在的分析，需要一種**認識**的戰略。在幾乎等於是像馬克思主義認爲的、知道歷史在幾個制約它的重要因素裡不可避免的過程當中，這種關於實際事件的理解，只能意味著證實它是先驗地固定下來的時間連續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因此，它是討論諸如這些東西：Y國在X年代的革命是不是**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或者，在這個或者那個國家當中採取的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應該是什麼樣的形式？

以上分析的三種產生作用的範圍有一個共同的性質：即具體被歸

結為抽象。不同的主體立場被歸結為單獨的立場的表現；差異的多元性不是被歸結，就是被放棄，說它是偶然；關於現在的意義是通過它在先驗的階段連續性當中的位置被顯現出來的。恰恰是因為具體在這方面被歸結為抽象，所以歷史、社會和社會的當事人對於正統派來說，才有一種像它們的統一原則一樣產生作用的本質。而且像這種本質並不是直接可見一樣，所以一定要把社會的表象或表面和構成基礎的現實區分開來，這種構成基礎的現實是每一種具體的存在最後的意義必然要依據的，不管複雜性的層次在媒介體系中是怎麼樣。

可以看得出來，從這種關於資本主義過程的看法中能夠取得戰略的概念。這種戰略的主體自然是工人黨。考茨基強烈地拒絕「群眾黨」這一修正主義的概念，因為在他看來，它包括把其他階級的利益轉送給黨的內部，結果就失去了這項運動的革命特性。可是他所採取的以放棄任何妥協或者聯盟為基礎的激進的立場，是屬於基本上保守的戰略的重要東西<sup>②</sup>。因為他的激進主義是以不需要政治首創精神的一種過程為依據，所以只能造成無所作為和等待。宣傳和組織是黨的兩個基本的——實際上是唯一的——任務。宣傳不是要拿來通過贏得新的部門到社會主義事業這邊來，以配合產生廣泛的「群眾意志」，而是首先要加強工人階級的一致。至於組織，它的擴充並不包含在許多陣線方面比較大規模的政治參與，而是要建立一個工人階級過著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和離群索居的生活的這一安身的地方。運動的這種進步的制度設施化過程非常適合於一種思考角度，以這種思考角度來看，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後危機會從資產階級自己的勞動者那裡產生出來，而工人階級只準備在合適的時候介入。從一八八一年以來，考茨基就說過，「我們的任務不是要組織革命，而是要為這場革命把我們自己組織

起來：不是**要創造**革命，而是要**利用**革命。」<sup>④</sup>

很明顯的，對於考茨基來說，聯盟並不是一種基本的戰略原則。在具體的環境中，各式各樣的聯盟在屬於經驗策略的層次上是可能的；不過在長期來說，正如同革命會有一種純粹的無產階級性質一樣，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也會有一個孤立的立場。考茨基關於其他部門內在矛盾的分析，確實說明不可能跟它們建立長期的民主的和反資本主義的聯盟。在農民的例子中，他打算證明農民是一個分裂的部門，因此工人階級捍衛它的利益就是一種跟經濟發展的一般路線相對立的反動政策。同樣的，在考茨基分析帝國主義時，中間階級在金融資本和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宰制下也是越來越團結。具有特點的地方是，考茨基從來沒有片刻意識到，這種政治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堅持，嚴重地加深了工人的孤立，而且面對著資本家的攻勢，工人階級應該報以反擊，以便把這些中間部門爭取到反資本主義的事業這邊來。這條思考路線却被封死了，因為在他的分析裡，中間部門越來越反動的性質跟客觀的和不可改變的過程是相對映的。同理，工人階級的孤立對於社會主義也不是一種威脅，因為這是由歷史既有的規律來保證的，它在長期將證明所有資產階級的詭計是軟弱無力的。

考茨基是如何思考無產階級的鬥爭的，我們在他關於「消耗戰」的概念中可以找到一個好的例子。這不是談到一種特殊的策略，而是談到從一八六〇年代以來工人階級所從事的整個政治行動。這種消耗戰包括三個方面：(1)工人階級先行建立起來的一致，它越來越暗中腐蝕敵對的力量，不過在鬥爭的過程中並沒有重大地改變；(2)同樣的資產階級先行建立起來的一致，它增加或者減少它宰制的能力，不過無論如何沒有改變它本身的性質；(3)先行固定的發展路線——又是「不



可抗拒的規律」——它賦予消耗戰一個具有方向的傾向。這種戰略曾經被人拿來跟葛蘭西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 比較過<sup>25</sup>，惟在現實裡這兩者却極度不同。陣地戰是以文化霸權這一概念為前提的，一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它跟一個單線的、預先規定的發展這種觀念，尤其跟考茨基的主體這種先行構築起來的性質是不相容的。

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賦予理論的這項作用，使我們面臨一種弔詭。一方面，在該階級「現有的意識」跟「歷史的任務」之間加深的裂痕只能夠通過政治介入從外部來彌合時，它的作用加大了。在另一方面，因為鞏固政治介入的理論被說成是關於一種必然的、機械地決定的意識，因此分析就變成越發是決定論的和經濟主義的，它的程度達到**歷史力量的組合越取決於理論的媒介**。這點在普列漢諾夫那裡比在考茨基那裡更加明顯。資本主義在俄國初期的發展並沒有產生一種資產階級的文明，而是產生俄國現實的意義只能夠通過跟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才能夠說明的這項結果。因此，對於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他們國家的社會現象是超出他們能夠理解的一種作品的象徵，只有在資本主義的西方才能夠完整地 and 明白地解讀。這意味著理論在俄國比在西方更加無比的重要：如果說「歷史的必然規律」不是普遍有效的，那麼罷工、示威、積累的過程這一飛逝的現實不就勢將消失無踪。像費雷洛 (Guglielmo Ferrero) <sup>26</sup> 一樣的一位改良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構成一種前後一貫的和同質的理論領域這樣一種正統派的說法，也會轉變為諷刺。最後，如果說這種學說是折衷的和不規則地起變化的，那麼這也很少影響到整個無產階級制度設施所肯定的一種社會實踐——這一種實踐在修正主義的辯論中，開始建立起它自己的關於外在下性跟理論的那種關係——的實際狀態。不過這不是普列漢諾夫

的立場，因為他面對的現象並不是自發地指向一個明確的方向，而且它的意義取決於它們在一種說明的體系內部深入的狀況。社會的意義越是取決於理論的提法，捍衛正統派就越是變成爲一種政治問題。

記住這些重點，對於在普列漢諾夫那裡比在考茨基那裡給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的原則提供了更多僵化的提法這點就不用驚奇了。例如，眾所周知的，普列漢諾夫炮製了「辯證唯物主義」這一術語。不過他也要對造成基礎跟上層建築（後者被認爲無非是前者必然表現的一種組合）這樣一種嚴格劃分的這種激進的自然主義負責。還有，普列漢諾夫對於經濟基礎的看法並不讓社會力量介入：經濟過程完全是受被想成爲科技的那種生產力制約的<sup>27</sup>。這種僵化的決定論使他能夠把社會說成是具有降低影響力這一作用的各種層次的一種嚴密的層級結構：「(1)生產力的狀況；(2)這些生產力制約的經濟關係；(3)仰賴一定的經濟『基礎』來發展的社會—政治體系；(4)部份受到所取得的經濟條件制約，部份受到在那個基礎上出現的整個社會—政治體系制約的那種社會的人的精神狀況；(5)反映那種精神狀況特性的各種意識形態。」

<sup>28</sup>在《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Socialism and Political Struggle*)和《我們的意見分歧》(*Our Differences*)裡頭，普列漢諾夫提出一種同樣僵化的、關於俄國的革命過程必須經歷的連續階段的說法，因而任何「不平衡的聯合發展」就被他從戰略的領域中剔除了。所有早期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從司徒盧威(Peter Struve)的「合法馬克思主義」，通過作爲重要環節的普列漢諾夫，到列寧的《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都有忘掉要研究特殊性的傾向，他們把特殊性看成無非是重要的現實外在的、顯而易見或者偶然的形態：即每個社會必須經歷的資本主義的抽象發展。

現在讓我們對正統派做最後一個評斷。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理論認為，最後目標和當前的政治實踐之間逐漸的分裂，在某個未來的環節會像**恰好重合的對偶**那樣產生作用而得到解決。可是在這種重新組合的實踐不能完全留到未來的時候，在目前好歹也必須進行對抗走向分裂的這些傾向的這種鬥爭。不過因為這種鬥爭使得不是在那時**自發地**從資本主義規律中產生出來的這些接合的形式有其可能，所以就必須把一種跟機械決定論不同的社會邏輯引進來——這是說，引進會恢復**政治首創精神的自主性**這種空間。這種空間在考茨基那裡雖然很小，但是它是存在的：它包含了需要知識份子的政治媒介的這種外在性的、即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在這裡有一種不能完全通過「客觀的」歷史決定來說明的聯繫。這種空間對於那些盡最大努力來打破無為作風和取得當前的政治效果，以便克服日常的實踐和最後目標之間的這一分裂的傾向來說，一定是比較廣泛的<sup>②</sup>。羅莎·盧森堡的自發論，和比較一般性來說，**新左派** (*Neue Linke*) 的政治戰略，都肯定這點。在正統派內部的這些最富創造性的流派，曾經打算要限制「必然性的邏輯」的作用，可是不可避免的結果都是這樣：他們把他們的言說都放在「必然性的邏輯」（從政治實踐的角度來說，產生確實比較少的作用）和「偶然性的邏輯」（由於不能決定它的特殊性，因此本身不能夠從理論上來加以說明）之間永恆的二元論上面來置喙。

讓我們舉兩個由這些想「破除這場遊戲的障礙」的部份打算所產生出來的關於二元論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在拉布里奧拉的思想裡的關於**形態的預測**這一概念。他說：「（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歷史預見……既不意味著（而且情況還是這樣）按照年代秩序的日期，也不

意味著社會形態前進的圖景，就如同過去和現在典型的舊的和新的啓示與預言一樣。……在批判的共產主義理論裡頭，正是整個社會在過程的環節中，才找出它必然的過程的這一理由，而且在它曲線的明顯地方，它才讓本身顯露出來，同時顯示它的運動規律。《共產黨宣言》首次間接指出來的預測不是按照年代秩序的，即屬於預示的或者像承諾一樣的自然那樣；它是形態上的，依我之見，它就是簡潔地表達每件事情的一個詞語。」<sup>30</sup>拉布里奧拉在這裡是從事兩方面的戰鬥。第一方面的戰鬥是直接針對批判馬克思主義——克羅齊（Benedetto Croce）、金第勒（Giovanni Gentile）<sup>31</sup>——的流派。克羅齊和金第勒是根據事件無組織的性質來說明歷史無法預測，只在歷史家的意識裡來建立統一的秩序。至於拉布里奧拉，他則是強調指出歷史規律的客觀性質。不過，這些歷史規律都是**形態上的**——這是說，它們妥當性的範圍都是被限制在某種基本的傾向之內。其次，拉布里奧拉第二方面的戰鬥是針對著各種形式的、按照歷史生活的表象把一般的傾向轉變成為直接可讀的事實的這種教條主義。現在可以看得出來，所從事的這兩方面戰鬥的方式必然引進一種二元論，這種二元論在拉布里奧拉的思想裡，在把作為敘述的歷史發展和作為形態的歷史發展對立地擺出來當中得到了表現；而且在比較廣泛的方面，在降低恩格斯說明歷史的辯證典範的能力上，得到了表現<sup>32</sup>。更且，這種二分法呈現我們在羅莎·盧森堡那裡發現的同樣的雙重的空白。因為，「敘述的」組成成份不是作為積極有助益的、具有它自己內在必然性的某些東西，被拿來跟「形態上的」組成成份對立起來，而是作為形態上的必然性的偶然的反面，被拿來跟「形態上的」組成成份對立起來。按照巴達洛尼（Nicola Badaloni）的說法，「關於事件的真正揭示（對於拉布

里奧拉來說），只能夠產生錯綜複雜的和不可預見的變化。雖然如此，重要的是應該在剛開始的假設（階級矛盾和它逐漸的簡單化）裡頭來理解這些變化。因而無產階級不是被定位在一個不確定的歷史時期當中，而是被定位在特定的、被資產階級的社會形態這一危機所宰制的歷史時期當中。」<sup>33</sup>換句話說，「形態上的必然性」構成了一個理論一言說的領域，它不只包含它本身的獨特領域，而且也包含它從本身排除出去的東西——偶然性。如果說，「事件」的總和被用概念說成是「偶然性的」，那麼它們就完全不是被概念化了，除非是因為它們缺乏若干存在於跟它們對立起來的那些形態傾向中的屬性。可是，因為社會生活總是比馬克思主義言說中的形態範疇還要複雜——而且這種複雜性是拉布里奧拉的出發點——所以唯一可能的結果是這樣：理論變成爲理解具體的社會過程的一種越來越不相干的工具。

因而爲了避免滑到完全的不可知論裡頭，就有必要在某些地方引進其他說明的範疇。拉布里奧拉在他具體的分析裡頭也做了這項工作。例如，不同的社會範疇不僅僅是按照它們的「偶然性」來概念化，而且也是把每一種範疇都賦予某種它們自己的必然性或者規律性。這些「事實的」結構複合體跟成爲形態學上預測對象的結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第一個可能的答案會是「辯證的」：即堅持把複雜性看成爲媒介體系的一種一元論的思考角度<sup>34</sup>。不過，拉布里奧拉不採用這個答案，因為它會迫使他把必然性的作用擴充到歷史生活的表面上來——即那個他想取代的範圍。但是如果不接受辯證的答案，那麼就不可能在邏輯上從形態的分析過渡到部份整體的獨特規律性。因此，這一過渡具有一個**外在的性質**——這是說，用概念來說明這些法則的性質的工作**不屬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工作。那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不

能是普列漢諾夫所講的「完全的、同質的世界體系」，它只有在封閉的模式裡頭才可以思考。這種必然性／偶然性的二元論，就向內在邏輯和相互關係必須被制約的一種結構的法則性質的多元論開闢了道路。

如果我們考察「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Austro-Marxism)，即我們的「開放的正統派」的第二個例子，就可以把這點看得更加清楚。在這裡，我們發現比拉布里奧拉想使出發點多樣化、想讓理論範疇多重化和想使社會範圍在它們特殊決定因素中自主化的努力更加徹底的和系統的一種努力。鮑威爾 (Otto Bauer) 在他關於麥克斯·阿德勒 (Max Adler) 的訃文中，用下面的說法提到這一學派的起源：「跟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開始，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從唯物主義開始不同，最近的『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有康德 (Immanuel Kant) 和馬赫 (Ernst Mach) 作為他們的出發點。」<sup>55</sup>「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雙重君主制中意識到工人階級統一性的障礙，而且意識到這種統一性取決於經常的政治首創性的這一事實。因此，從不同的列寧主義傳統這一思考角度來說，他們瞭解得非常清楚，什麼叫做「不平衡的聯合發展」。「在奧匈君主國內部，有可以在歐洲找得到的全部經濟形式的例子，包括土耳其……。社會主義宣傳的光芒照耀在處於這些分歧的經濟、政治條件當中的每一個地方。這產生了一個極為多種多樣的圖景……。存在於『國際』內部作為按照年代發展的東西——屬於手工業工人、旅人、製造廠的工人、工廠的工人和農業工人的經歷改變的社會主義，它含有在任何一定的時期都占主導地位的這種運動的政治、社會或者知識層面——都同時在奧地利產生出來了。」<sup>56</sup>

在這種社會和國家形勢的馬賽克中，是不可能把國家的一致思考

成爲「上層建築」，或者把階級的一致看成是下層建築必然的結果。其實，這種統一性完全取決於複雜的政治建構。用鮑威爾的話來說，「正是知識的力量，才維護住統一性。……作爲統一體產物和維護統一體力量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今天無非是工人運動這一統一體的意識形態。」<sup>37</sup>

因此，階級統一體的環節是一種政治統一體的環節。我們可以稱之爲一種社會**聯繫的形態**或者**接合的形式**的那種構成的中心，被移動位置變成上層建築的領域，所以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那種區分變成模糊和有問題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三種主要的理論介入，是非常密切地被聯繫上這種新的戰略思考角度：即打算限制「歷史必然性」的妥當性範圍；要人思考以具有成熟的資本主義特點的社會複雜性爲基礎的這些新的鬥爭陣線；以及努力以非歸結的方式來思考有別於那些階級立場的主體立場的這一特殊性。第一類的介入主要是跟麥克斯·阿德勒在哲學上的重新提法和他特殊的新康德主義的形式有關聯。這種以康德的方式來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作法，產生一些解放的作用出來：它擴充了社會主義的讀者，因爲它主張的正確性能夠按照超越階級界線的普遍性角度提出來；它跟自然主義的社會關係這種概念決裂，而且通過詳細說明像是「先驗的社會」這些概念的辦法，把嚴謹的言說的組成成份引進到社會客體性的結構裡；最後，它可以讓馬克思主義者把下層建築思考成爲這樣的一種領域，即它的形態取決於意識的形式，而不是取決於生產力的這一自然主義的運動。第二種介入也懷疑基礎／上層建築的這種區分。例如<sup>38</sup>，在關於考茨基的《取得政權的道路》（*Road to Power*）的這種討論裡頭，鮑威爾就打算證明，假使在壟斷的和帝國主義階段，政治的、技術—組織的和科

學的變革是越發成爲工業機器的一部份，那麼把經濟思考成爲被一種產生危險的邏輯宰制的同質領域就是多麼的錯誤。在他看來，如果競爭的規律以前是以自然的力量這種方式產生作用，那麼現在它們就必須通過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因此關於國家和經濟之間逐漸連結起來的這一種強調，在一九二〇年代就促成了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這一場辯論。關於資本主義新的形態所產生出來的分裂和對抗所在的這些看法也改變了：這些分裂和對抗的所在現在位置不是只在生產關係裡，而是在許多社會和政治結構的領域裡。因此也一樣，既不是以演進的意義也不是以改良主義的意義來思考的<sup>39</sup>那種日常鬥爭 (*revolutionäre Kleinarbeit*) 的傳播，被賦予新的重要性，同時政治接合的環節也取得了新的意義。(除了別的以外，這也被反映在提出新的黨和知識份子之間關係的方式上<sup>40</sup>。)最後，關於新的主體的地位和接踵而來的跟階級還原論的決裂，提到鮑威爾討論民族問題和倫納(Karl Renner) 討論法權的制度設施這點，就足夠了。

「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關於理論—戰略介入的這種一般性的模式現在應該可以清楚了：因爲自主性的政治介入的實踐效果被擴大了，所以「歷史必然性」的言說就失去它的中肯性質，而退却到社會的視野（在自然神論者的言說裡頭，上帝的存在在現實世界的作用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急速地降低了）。這反過來就需要擴充新的言說的形式，以便填補空下來的領域。可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走到跟二元論決裂的這一點，因而削除「形態上的」必然性這個環節。在世紀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界，只有索列爾 (Georges Sorel) 通過他把「一團混亂」(*mélange*) 和「集團」(*bloc*) 對立起來的辦法，往前踏上這一決定性的一步。下面我們會回來談這一點。



## 第四節 第二種對於這場危機的反應：修正主義

正統派對於「馬克思主義危機」的反應是努力想通過毫不妥協地肯定「理論」的妥當性，和「可以觀察的資本主義傾向」的這一人為或者過渡的性質，來克服「理論」和「可以觀察的資本主義傾向」之間的分裂。因而這樣下結論看起來會非常的簡單：修正主義的反應是對立地並列起來，特別是因為伯恩斯坦本身對於他跟「德國社會民主黨」從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以來已經體現的綱領和實踐並沒有重大的不一致，堅持許多理由，而且他的介入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完成一種**現代化**，讓理論適用於運動的這些具體的實踐。雖然如此，這種結論還是會讓人看不清楚伯恩斯坦介入的重要領域。尤其是它會讓我們陷入把**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等同起來的錯誤<sup>①</sup>。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是改良主義政策真正發言人的工會領導人，對於伯恩斯坦的理論主張興趣不大，在接踵而來的爭論中仍然嚴守中立——當時他們並沒有公開支持正統派<sup>②</sup>。還有，在關於群眾罷工以及對於戰爭的態度的重要政治辯論中<sup>③</sup>，伯恩斯坦的立場不僅僅不同於而且還跟工會和黨的改良主義領導人的立場對立起來。因此，在打算指出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之間精確的差異時，我們必須強調指出，**在改良主義的實踐中重要的是政治的無為作風和工人階級在組織上的限制**。改良主義的領導人打算捍衛該階級的收益和直接利益，因而他容易把該階級看成為被孤立起來的、具有非常明確的一致和範圍的部門。可是一種「修正主義」的理論就不必要這樣；實際上，一種「革命的」理論——在許多情況下——通過把工人階級孤立起來，把現存政治結構的任何問題留

待不確定的未來這個辦法，能夠把同樣的角色履行更漂亮。我們已經談過考茨基革命思想的保守性質。改良主義跟修正主義／正統派的選擇當中的任何一項都不相同，而且是筆直橫切過這兩者。

面對修正主義和正統派的理論家的基本爭論點，因此不是關於改良主義的問題，也不是關於和平的或者暴力的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這一問題——關於這點，「正統派」並沒有明確的和一致的立場。分歧的主要地方在於：跟正統派認為資本主義新階段的這一分裂的和不一樣的性質通過下層建築的變革能夠克服相反，修正主義主張這點可以通過自主的政治介入來達成。政治從經濟基礎獨立出來，是伯恩斯坦的論證真正新穎的地方。其實，它已經指出來<sup>④</sup>，在每一種伯恩斯坦關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背後，都有想要在特定的領域恢復政治首創精神的一種打算。修正主義在它最得意的時候，是代表要跟工人階級在組織上的孤立這點決裂的一項真正的努力。可是確實也是這樣：正像政治是以自主性的層次這種面貌出現一樣，政治向來也都是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對立面的那種「改良主義的」實踐。這是我們必須試著去說明的弔詭。它讓我們注意到伯恩斯坦跟只有在葛蘭西那裡才嚴謹地克服的經濟主義決裂的若干限度。政治的自主性和它的範圍：我們必須考察這兩個環節是如何地被建構起來的。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伯恩斯坦比任何正統派的代表都還要清楚地瞭解到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時期影響資本主義的那些變化。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分析是比較接近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列寧的問題設定，而比較不接近那時正統派的理論說法<sup>⑤</sup>。伯恩斯坦也瞭解到資本主義重新組織的政治效果。這三種主要的變化——企業集中和世襲財產的集中不對稱、中間階層的存在和成長、經濟計劃在防止危機

中的角色——只能夠包括整個改變「德國社會民主黨」迄今以來所根據的這些假設。情況並不是經濟的演變使得中間階級和農民無產階級化，加深社會的兩極化，也不是爆發因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必然造成的革命，就可以期待接下來就會有社會主義的過渡。在這些條件下，社會主義必須改變它的領域和戰略，基本的理論要點是跟妨礙任何政治自主性概念的這一僵化的基礎／上層建築的區分決裂。現在在修正主義的分析中，把重新組織的和克服分裂的要素轉移進去的領域，正是這後一種領域。「科學、藝術、整個系列的社會關係，比起以前來說，今天是更少取決於經濟，或者說，爲了不讓人有誤解的餘地，今天經濟發展所達到的地步讓意識形態（尤其是倫理）的因素有比以前的那種情況更大的獨立活動空間。因爲這樣，所以科技、其他社會傾向的經濟演變之間的因果相互依賴性，總是變成更加間接，而且因爲那樣，前一種的必然性就失去相當多的支配屬於後者的這一形式的力量。」<sup>①6</sup>

正是只有這種跟經濟基礎的支配對立的政治的自主化過程，才在下層建築的傾向如果說放任它們自行其事只會造成分裂的這一背景烘托下，讓政治起了重新組織和重新統一起來的這種作用。在伯恩斯坦關於工人階級統一性和分裂的這一辯證概念裡頭，我們可以把這點看清楚。在經濟上，工人階級總是看起來越來越分裂。現代的無產階級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的那種被剝奪所有權的群眾：「正是在最先進的製造業裡頭，我們才找得到被分化的工人的整個層級結構，在那些團體之間，只存在著適度的一致。」<sup>①7</sup>這種利益的多種多樣化——它在英國的情況最顯明——不完全是像庫諾（Henrich Cunow）所說的，是基爾特的過去生活的殘餘，而是建立民主國家的產物。雖然在政治鎮壓的情況下，在鬥爭中的統一體都是把部門

的利益擺在其次的層次，可是這些利益一旦在自由的環境下就容易再度綻放出來。

那麼，如果這種走向分裂的傾向是被刻劃在現代資本主義的那個結構上，什麼是這種對立環節、走向統一的這種傾向的來源呢？按照伯恩斯坦的說法，這是黨。因此，他提到「一個階級鬥爭機關的必要性，這種機關把整個階級結合在一起，不管這個階級因為不同的就業而有什麼樣的分裂；而且那個機關就是以政黨姿態出現的社會民主黨。在社會民主黨裡頭，經濟團體的特殊利益在顧全那些依賴其勞動所得的、社會地位差的全部人的總的利益下，是被埋藏起來的。」<sup>48</sup>一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在考茨基那裡，黨也代表該階級的普遍環節：不過跟在考茨基的情況中政治的統一體是應該由下層建築的運動取得的那種真正統一體的科學預示不同，在伯恩斯坦那裡，就不能把這種政治接合的環節降格說成是下層建築的運動。這種政治聯繫的特殊性躲掉必然性的鎖鏈；政治這一不可歸結的空間，在考茨基那裡被限制在知識階級的媒介作用中，在這裡則被相當程度地擴充了。

可是在伯恩斯坦把政治的媒介看成為構成階級統一體的東西的這種分析裡頭，幾乎看不出來的那種含糊性都沒有人看出來，一直到使他的整個理論建構失效為止。這種含糊性是這樣：如果工人階級在經濟領域中顯得越來越分化，又如果它的統一性是在政治領域自動地被建立起來的，那麼這種政治的統一體在什麼樣的意義下是一種階級的統一體呢？正統派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因為經濟一致和政治一致之間的非對映關係最後可以通過經濟演變本身解決。在伯恩斯坦的情況中，這種邏輯的結論看起來會是這樣：政治的統一體只有通過克服不同派系的工人的階級限制才能夠建立起來，因此這應該是經濟的主體性和

政治的主體性之間永遠的結構性裂痕。不過這是伯恩斯坦在他的分析中永遠沒有取得的一個結論。一方面他堅持社會民主黨必須是一個所有被壓迫者的黨，而且不僅僅是工人的黨，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把這種統一體想成是這些部門的總和的、「接受工人的觀點，承認它們是領導階級」的黨。一如撰寫他的傳記的作者高伊 (Peter Gay) 所指出的<sup>49</sup>，伯恩斯坦從來沒有越過這一點。結果在他的推理中有一個環節就脫漏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統一起來這一階級的性質，都不是在這兩個領域的任何一個領域中產生出來的，因此這種論證還是懸浮在空泛的半空中。

這種結論或許是太過份了，因為它假定伯恩斯坦的推理是像考茨基的或者是羅莎·盧森堡的一樣，在同一個層次往前推——即假定他是談到一個無可逃避的歷史過程的**必然**主體。不過，事實上是這樣，由於否定那個歷史是由抽象的決定論邏輯所宰制的，所以伯恩斯坦確實就從這個層面改變了這一辯論。在他的概念裡，工人階級的重要地位反過來是似乎是涉及到一種論證的偶然性路線——例如，賦予它那方面的集中和組織，要完成領導的那一角色工人階級就比其他的部門準備得更好。但這樣的問題還存在，即為什麼伯恩斯坦把這些優點——這些優點充其量是場合的優點——說成是**不可逆轉的成就**。在伯恩斯坦的這一名言，即「運動是一切，目標等於零」裡頭，我們也可以找到同樣的含糊性。在傳統上，這點過去被看成是典型的「漸進論」(gradualism) 的口號<sup>50</sup>。不過在若干漸進論的意義方面（這些意義在修正主義的言說內部既產生理論的作用，也產生政治的作用），漸進論不是在**邏輯**上被賦予某種作用的。這種說法唯一必然的含義是這樣：工人階級能夠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取得具體的成果，因此不能把革命

認為是從完全的失去到徹底的解放這一過程的絕對環節。這不必然包含緩慢的、直線發展的和不可逆轉的進程這種漸進主義的概念，雖然事實上伯恩斯坦關於民主進程的論證路線是把它們跟漸進主義的思考角度聯繫起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再度地把那些邏輯上不同的結構環節統一起來的問題提出來。

這使我們要研究伯恩斯坦跟正統派的決定論決裂的具體形式，以及他爲了填補因爲正統派的決定論崩潰而留下來的空間因而佈置的那些概念的類型。在伯恩斯坦懷疑任何一般的機制能否有效地說明歷史的過程時，他的論證呈現一種具有特性的形式：他並沒有批判正統派提出來的這種歷史的因果性，而是打算開創一個主體性的自由作用在歷史有其可能的空間。他接受正統派把客體性和機械的因果性等同起來的作法，只不過打算限制它的作用<sup>①</sup>。他並不否認一部份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質，不過他不同意把它延伸到說創造了一個可以涵蓋整個政治預測領域的封閉體系這一看法上來。針對教條的正統派理性主義的批判，是採取康德的二元論的形式。對於伯恩斯坦來說，對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一個封閉的科學體系這點，有三個特別的反對意見。第一，馬克思主義沒有證明社會主義必然緊跟隨著資本主義的崩潰而來。其次，這也不能用圖解來說明，因爲歷史不是一個單純的客觀過程：意志也在裡頭產生作用。因此，只有把歷史當作是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之間互動的產物，我們才能夠加以說明。第三，在社會主義是一個黨的綱領，因而是建立在倫理的決定上時，社會主義不能完全是科學的——它不能建立在對錯必須大家都接受的這些客觀說法的基礎上。因此，倫理的主體的自主性是伯恩斯坦跟決定論決裂的基礎。

現在——而且這點是關鍵性的——把倫理的主體引進來並沒有消

除我們早先在伯恩斯坦的推理中發現的那些含糊性。倫理的主體的自由決定充其量能夠在歷史上創造一個非決定性的範圍，不過它不能是漸進論的論點的基礎。正是在這裡，新的假設——人類歷史的進步和上升的性質——才介入進來，以便提供一個政治和經濟藉以結合起來，給每個具體的成就都有一個方向感的領域。在伯恩斯坦的言說中，**進化** (*Entwicklung*) ⑫的這一概念起著一個決定性的作用：其實，他的整個架構都是從它那裡取得前後一貫的性質。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統一不是在由理論來說明接合的這一基礎產生出來的，而是通過一種構成它們兩者的基礎，以及由進化規律來支配的具有傾向的運動。對於伯恩斯坦來說，這些規律跟在正統派的體系那裡的規律不完全是相同的東西：它們不只包含對抗的過程，也包括調和的過程。但是在兩者的情況中，它們是被思考成爲先驗地把每一種事件的意義都固定下來的**整體化的環境**。因此，雖然「事實」是從把它們以正統派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本質主義的關聯中被解放出來了，不過它們後來還是在一般的、跟任何可以決定的機制沒有關聯的關於進步的理論中被重新統一起來。跟把階級看成爲先驗的主體的機械主義的客觀主義決裂，是通過關於新的先驗的主體——倫理的主體（它在越來越解脫經濟的必然性的人類身上硬塞上支配地位）——的假定完成的⑬。從這裡是不可能向關於接合和文化霸權的理論推進的。

這說明了在伯恩斯坦那裡，政治的自主化能夠跟接受改良主義的實踐和漸進論的戰略聯繫在一起的原因。因爲如果每一次進展都是不可逆轉的——假定說**進化**這樣子假定——那麼鞏固這種進展就不再取決於一種不穩定的力量的接合，而且也不再成爲一個政治的問題。在另一方面，如果說民主進展的總和取決於偶然的力量的相互關係，那

麼關於每一種正當性的抽象的考察對於堅持其進步性來說，理由都不是充份的。例如，各種力量否定的重新組合可以通過極左派的要求或者它的對立面，即在關鍵的場合缺乏激進的政治首創精神來實現。可是如果民主進展的總和唯獨取決於進步的規律，那麼說明任何鬥爭或者場合的要求的進步性質，就不受它跟其他在任何一定的環節產生作用的力量這之間的關係所左右。工人運動的要求是被認為是正當的和進步的，而且是把它們從它們跟其他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中獨立出來加以判斷，這一事實就剷除了批判工人運動的組合限制的唯一基礎。在這裡，理論上的修正主義和實踐上的修正主義之間要符合有一個前提條件：把政治的首創精神擴大到一些民主的陣線中的作法，永遠不能跟工人階級的無為作法和各階級的合作主義陷入矛盾。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關於國家的修正主義理論，我們就可以把這點看清楚。對於正統派來說，問題是簡單明瞭：國家是階級宰制的工具，社會民主黨只能夠為散播國家本身的意識形態和捍衛、組織工人階級而參加到國家的制度設施裡。這種參與因此是以外在性為其特點。伯恩斯坦是從對立的思考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工人階級逐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社會立法的進步、資本主義的「人道化」，所有這一切都促成工人階級的「國家化」；工人不僅僅是一個無產階級，他也變成為一個公民。結果，按照伯恩斯坦的說法，社會組織的作用在國家裡頭就比那些階級宰制的組織還有更大的影響力；它的民主化把它轉變成為「全民所有的」一個國家。伯恩斯坦對於這個基本的真理再一次比正統派瞭解得更清楚：即工人階級已經是在國家的領域裡頭，而且要想利用國家來維繫純粹的外在關係，這是毫無成效的教條主義。不過，在伯恩斯坦的言說裡，這點馬上變成為一個完全不正當的預測：換句



話說，因為「歷史演變」必然的結果，國家會越來越變成爲民主。

說到這裡，我們現在可以適用一下我們拿來用在羅莎·盧森堡身上的檢驗：在削除限制伯恩斯坦的論證效果的本質主義的先決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是把進步說成是統一的傾向）時，順著伯恩斯坦論證的邏輯路線走。從這項檢驗中，馬上有兩種結論出現。第一，國家內部的民主進展不再是積累性的，開始取決於不能夠預先決定的一種力量的對比。鬥爭的目標不是單純地按期取得收益，而是取得可以讓這些收益得到鞏固的各式各樣的接合力量。而且這些形式都總是可以更換的。在那場戰鬥中，工人階級必須從它確實的位置那裡鬥爭：既在國家內部，也在國家外部。可是——而且這是第二個結論——伯恩斯坦那種銳利的目光有可能產生更大程度的不安。如果工人階級不再只是無產階級，而且也是公民、消費者，擔任國家文化和制度設施機器內部多種職務；還有，如果這種職務的總和不再是由任何「進步的規律」（自然也不由正統派的「必然規律」）統一起來，那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就變成爲自由自在的、不提供會採取一定形式的那種先驗保證的接合。也有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即矛盾的和互相中立的主體的立場會產生出來。在那種情況下，民主的進展會比以前更加地使政治的首創精神在不同的社會領域中擴充成爲必要——正如同修正主義要求的，不過具有這樣的差別，即每一種首創精神的意義終究取決於它跟其他的首創精神之間的關係。思考關於組成成份的分散狀況和對抗之所在，以及思考任何先驗的統一架構外部的它們的接合，那是有點太超出修正主義的領域。雖然是修正主義者首先以最一般的方式來提出這個問題的，但是只有在葛蘭西關於「陣地戰」的概念裡才開始有一個適切的答案。

## 第五節 第三種對於這場危機的反應：革命的辛迪加主義

我們研究修正主義已經讓我們走到這種地方，在這裡，伯恩斯坦就像正統派的流派（包括他的主要敵人羅莎·盧森堡）一樣，很弔詭地面對同樣的兩難境地：經濟基礎在現在是不能夠保證階級的統一性；在另一方面，能夠把目前的統一性建立起來的唯一一塊領域政治，是不能夠有信心地保證統一的主體的階級性質。這種對立我們能夠在革命的辛迪加主義，即構成第三種類型的對於這場「馬克思主義危機」的反應那裡，更加清楚地領悟出來。在索列爾那裡，這種對立是以特別尖銳的線條劃出來的，因為他比伯恩斯坦或者任何正統派的理論家更加意識到這場危機真正的特點，以及爲了以令人滿意的方式來克服它，理論必須付出什麼代價。我們在索列爾那裡，不僅僅找到取代在必然性的鎖鏈中被打斷聯繫的那種關於「偶然性」和「自由」的一塊領域的假設，而且還知道有這樣的一種努力，它想思考那種「偶然性邏輯」，即那塊藉以把整體化效果的領域重建起來的新領域的特殊性。在這種意義下，談到他的演進的幾個重要環節是有教益的<sup>51</sup>。

即使在屬於索列爾的馬克思主義經歷的那段相當正統的早期階段，他的政治興趣來源和支持他的分析的理论假設兩者都證明是有顯著的原創性，同時在相當的程度上比起考茨基的或者普列漢諾夫的那些東西還要深奧。他是絕不墨守統一定社會形式、支配不同形式之間過渡的構成歷史機制基礎的那套固有的思想。事實上，索列爾主要的興趣焦點——因此他經常談到維科（Giovanni Batista Vico）——是讓一個社會能夠保持統一和處在往上攀昇過程中的這類道德的貨

色。既然沒有肯定性的保證，那麼社會的改造就被作為它們可能命運之一的否定性滲透進去了。不僅僅是有這種情況，即一定形式的社會被不同的、注定要取代它的積極的形式對抗著；而且這一社會也面臨著它自己的衰亡和瓦解的可能性，就如古代世界的情況一樣。索列爾在馬克思主義那裡找到的有吸引力的東西，事實上不是關於歷史演進的必然性規律這種理論，而是關於新的當事人——無產階級——這一形態的理論；這種當事人能夠作為會圍繞著自己，把一種更高形式的文明重建起來，取代式微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凝結的力量產生作用。

索列爾思想的這一面向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來了。不過在產生修正主義爭論之前的他的著作中，它是跟接受正統派所假設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這點結合起來的。在這些著作中，索列爾把馬克思主義看成為一種「新的現實的形而上學」。他說，所有現實的科學都是建立在把人為的組成成份引進分析裡頭的「富有表現力的支柱」(expressive support) 這個基礎之上。這點會成為烏托邦的或者神話式的錯誤的來源，不過在工業社會的情況中，有一個圍繞著這種機制的印象的社會領域逐漸地統一起來。馬克思主義的富有表現力的支柱——越來越消除性質的區分的這種勞動的社會性質和「商品」的範疇——不是一種武斷的基礎，因為它是社會關係的塑造和構成典範。社會主義，作為生產資料的集體占有，代表勞動逐漸社會化和同質化必然的極致。這種生產者的典範逐漸增強的支配力量，取決於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這點索列爾在他一生經歷的這個階段並沒有懷疑。但即使如此，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會把社會轉變到更高形式的利益——的當事人，不是由單純的客觀運動構成的。在這裡，索列爾的分析的另一個組成成份介入了：馬克思主義對他來說不僅僅是一種關於社會的科學分析；它也

是統一無產階級，並且給它的鬥爭一個方向感的意識形態。因此，這種「富有表現力的支柱」是以積聚和凝結歷史力量（索列爾將稱之為集團）的組成成份這一姿態出現產生作用的。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同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相比，這種分析在一個關鍵的地方已經轉變了領域：所謂「客觀規律」的這一領域已經失去它成為社會理性基礎的性質，反過來變成為一個階級藉以把本身建立成為一個宰制力量，把它的意志強加在社會其他階級身上的這些形式的總和。可是，在這些規律的妥當性並沒有受到懷疑的時候，跟正統派的距離終究不是相當大。

在從修正主義的辯論出發的索列爾**整個**接受伯恩斯坦和克羅齊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但是目的在於取得非常不同的結論時，就開始分裂了。在索列爾那裡最為顯著的東西，是涵蓋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危機」的結果在內的這種**激進主義**。他不像伯恩斯坦，他壓根兒沒有想用另外的演進觀點來取代正統派的歷史理性主義，文明的形式會瓦解的這一可能性在他的分析裡頭總還是看得到的。**總體**作為打造基礎的理性基礎已經被瓦解了，現在還有的東西是**一團混亂**。在這些環境下，一個人如何能夠思考一種重組過程的可能性呢？索列爾的答案集中在一些社會階級上面，這些階級在客觀的體系裡不再起著結構定位的作用，而是他稱之為「**集團**」的那些重新聚合的集中點。統一體在社會裡的可能性因此是要求助於某些團體把它們的經濟組織概念強加在別人頭上的這一意志。其實索列爾的哲學——受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而尤其受到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響——不是關於未來是不可預見的，要取決於意志的這種行動和意志的哲學。還有，鬥爭中的力量在其上取得它們的統一的那個層次，不是屬於印象或者「語言符號」——預示神話理論——的一種總和的層次。不過，

要把由「政治思想」黏合起來的那些作為歷史力量的階級鞏固起來，取決於它們跟對立力量的衝突。一旦工人階級的一致不再是根據下層基礎統一（在這種層次中，只有一團混亂）的過程，那麼工人階級終究就要仰賴只能在反對資本家階級的鬥爭中才能完成的那種跟資本家階級的分裂。對於索列爾來說，「戰鬥」因此變成爲工人階級一致和尋求就資產階級來說只能造成它自己的衰弱的那個共同領域的條件。這種關於分裂的意識不是一種法律上的意識——索列爾把革命主體性的建構看成爲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裡，無產階級開始意識到一套把它跟階級的敵人對立起來的法權，而且建立起一套新的可以鞏固這些法權的制度設施<sup>⑤</sup>。可是索列爾，一個熱烈地支持德雷法斯（Dreyfus）的人，並沒有看出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內部工人階級立場的多元性之間的一種必然的矛盾：他是民主的又是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虔誠信徒，可是甚至於考察工人階級在經濟上絕不是跟中間部門聯繫在一起時，能夠變成他們在政治上重新組織的集中點的這一可能性。

我們在索列爾的演進中看到一個清楚的模式：像所有跟正統派的無爲作法鬥爭的流派一樣，他不得不把階級統一體的建構環節移到政治層次上來；不過像他跟「歷史必然性」的這一範疇決裂是比在其他的流派中更加徹底一樣，他也感覺到不能不詳細說明關於政治統一體的那個打基礎的結合物。在我們移到他的思想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是跟緊隨著支持德雷法斯者的聯盟勝利之後的這種大徹大悟對映的）時，我們能夠甚至更加清楚地看出這一點。米勒蘭（Millerand）標記的社會主義被整合到體系中；貪污腐敗瀰漫開來；不斷地失去無產階級的一致；而且在索列爾看來，能源是從唯一的、能夠有崇高的、可以重建沒落的資產階級文明這個未來的階級那裡流失了。索列爾這

時變成爲堅決的民主的敵人，把民主看成爲是導致事故的主因，因爲馬克思主義在這世紀交替的時候必須跟主體立場的失散和分裂進行鬥爭。因此不管代價是什麼，都有必要彌補這種分裂，把工人階級重建爲一個統一的主體。一如我們已經知之甚詳的，這使索列爾拒絕政治鬥爭，肯定總罷工的辛迪加主義的神話。「（我們）知道總罷工其實是我已經說過的東西：即藉用以把社會主義整個組織起來的神話，換句話說，是一套印象，它們能夠本能地喚醒所有跟社會主義反對現代社會所從事的這種戰鬥不同表現相符合的這些情感。在無產階級那裡，罷工已經形成他們所具有的那些最高貴的、最深刻的和最動人的情感；總罷工把他們全部人都集合在一幅協調的圖畫裡，而且通過把他們結集在一起的辦法，就賦予他們每一個人它最大的緊張性；總罷工引發他們對於特定衝突的那種痛苦的記憶，用緊張的生活來渲染所有呈現到意識裡的那些組合的細節。因此，我們取得了語言不能非常清楚地提供給我們的關於社會主義的那種直覺——而且我們整個取得這種直覺，瞬間就領悟到它。」<sup>56</sup>

辛迪加主義的「總罷工」，或者在馬克思那裡的「革命」，是一種神話，因爲它是以想在主體立場失散的基礎上建立起無產階級的一致的這一種意識形態凝聚點的方式產生作用的。它是從前有人拋棄政治鬥爭、從前有人認爲壟斷的經濟和帝國主義——被索列爾看成爲是包括一種重新封建化的過程——是加強了走向瓦解的傾向之後還留存下來的一條重新組織的臍帶。在比較一般性的方面，我們在索列爾的這項肯定，即社會有一個「自然」沒落的傾向，走向崇高偉大的傾向是「人爲的」裡頭，看得出這種舊的反自然界生長原則的論點。例如，暴力是能夠讓馬克思所描述的那種對抗鮮活起來的唯一力量。「如果說

資本家階級是生龍活虎的，那麼它就會經常下定那個它要捍衛自己的決心；它的坦率的和一貫地反動的態度，至少就像無產階級的暴力一樣那麼大有助於讓成爲一切社會主義基礎的階級分裂明晰可見。」<sup>57</sup>從這種思考角度來說，是否能夠把總罷工體現出來，意義很小：總罷工的角色是屬於規劃原則，它可以讓無產階級把社會關係的一團混亂思考成爲是圍繞著一條清楚的分界線組織起來的；被削弱成爲一種關於現實的客觀描繪的總體性概念，是被重新引進來作爲一種建立工人意識統一體的神話的組成成份。正如同帕歐拉 (Gregorio de Paola) 指出來的<sup>58</sup>，其人爲的性質是從一開始就被認識到的那種關於「認識的工具」——或者富有表現力的支柱——的概念，已經被擴大到包含虛構了。

那麼，對於索列爾來說，社會分成對分的分裂的這一可能性不是作爲社會結構的資料被賦予的，而是作爲在支配團體衝突的「道德因素」層次上的一種建構被賦予的。在這裡我們面臨了不管什麼時候馬克思主義的流派有意跟經濟主義決裂，在某些其他的層次上建立階級的統一體時，就見得到的那個問題。這種經過政治上或者神話上重建起來的主體，爲什麼必須是一個階級的主體呢？不過跟羅莎·盧森堡或者拉布里奧拉沒有斷然地跟經濟主義決裂，產生了一個無法見到的在他們的言說裡頭出現的雙重空白的情況相反，在索列爾的情況那裡，他反經濟主義的那種徹底性使得這種空白變成明顯可見。索列爾的那種徹底性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因此使得已經放棄以革命的方式來使工人階級復原的這一希望的他的若干信徒，自己去尋找某些其他的、能夠保證對抗資產階級式微這一鬥爭的替代性神話。眾所周知，他們在民族主義那裡找到這一替代性神話。這是部份索列爾的知識遺產有助

於法西斯主義崛起的途徑。因此，在一九一二年他的學生柏爾斯 (Edouard Berth) 就能夠斷言：「其實，兩面性的、既是平行的又是同時的民族主義和辛迪加主義運動，會造成金元王國完全被驅逐，英雄的價值勝過卑鄙的、當前歐洲正在裡頭悶死的資產階級唯物主義，這是必然的。易言之，這種關於對抗貨幣的武力和流血的覺悟——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曾經把它的第一批象徵揭示出來，索列爾在他的《暴力論》(*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和莫拉 (Charles Maurras) 在《如果武裝政變有其可能》(*Si le coup de force est possible*) 裡頭曾經賦予它信號——會以財閥統治完全失敗告終，這是必然的。」

⑨

自然，這只是跟索列爾的分析偏離的可能偏向之一，而且下結論說它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這種結論從歷史上來說將是錯誤的，從分析上來說也是不健全的⑩。從歷史上來說是錯誤的，這是因為索列爾的影響使其本身在一些方向上讓人感受到——例如，在葛蘭西思想的形成中這是關鍵性的。從分析上來說是不健全的，這是因為這種目的論的說明假定，從階級到國家的這一過渡是必然受到索列爾思想的那個結構決定的，而後者最特殊的和原創性的環節，恰恰是在以神話的方式來建構的主體那種無法預先知道的、非先驗的性質。還有，那種無法預先知道不是該理論的弱點，因為它肯定社會的現實本身是不確定的（一團混亂，*mélange*），任何統一的行動都取決於重建的一個集團的實踐。在這個意義下，為什麼神話的重建工作應該不怕向法西斯主義的方向移動，並沒有理論上的道理可言，不過不讓它往另個方向發展，同樣也是沒有理論上的道理可言——例如，索列爾熱烈接納的布爾什維主義。關鍵性的重點——而且這是使索列爾成為第二國際中最



深刻的和最富原創性的理論家的東西——在於，社會當事人的那種一致變成爲無法預先知道，每一種以「神話方式」來固定它的工作都取決於一場鬥爭。當「文化霸權」的概念出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一如我們要看到的，它也是假定一種偶然性的邏輯——裡頭的時候，「文化霸權」的概念從這個觀點來看是更不徹底。無論是列寧或者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都沒有能力懷疑社會當事人要具有階級性質的這一**必要性**。只有在葛蘭西身上，這兩種傳統才在他的關於「歷史性集團」(historical bloc) 的概念中融合在一起。在這裡，從列寧主義那裡衍生出來的那種關於「文化霸權」的概念，以一種新的綜合的方式跟從索列爾那裡衍生出來的關於「集團」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了。

---

①羅莎·盧森堡，〈群眾罷工、黨和工會〉，《盧森堡文選》，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六九。

②同前揭書，頁九五。

③同前揭書，頁八六。

④重要的是要指出來：伯恩斯坦在德國關於群眾罷工的辯論中的這一介入 (*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 und die Politische Lage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提到東西方之間的兩個基本差異——西方市民社會的複雜性質和抵抗，以及俄國國家的衰弱——這是後來葛蘭西的論證的重點。關於這一辯論的概括，請見 Massimo Salvadori, "La socialdemocrazia tedesca e la rivoluzione russa del 1905. Il dibattito sullo sciopero di massa e sulle differenze fra Oriente e Occidente,"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Milan, 1979), pp.547-594.

- ⑤請參考Tzvetan Todorov, *Théories du symbole* (Paris 1977), p. 291. 「我們能夠說，每一次一個單純的指符讓我們理解得比一個指意還多時，都有一次濃縮：或者說得更淺白一點，每一次指意的內容都是比指符更豐富一點。偉大的德國神話學家克拉哲（Creuzer）已經用這種方式來說明象徵了：『存在和形式的不搭配，而且內容比起內容的表述來也過多了。』」
- ⑥雖然羅莎·盧森堡的著作在由**理論**來具體說明群眾罷工的機制方面是處在最高的極致，可是群眾罷工的機制被整個新左派提出來當作是鬥爭的基本形式。例如請見 Antonie Pannekoek, "Marxist Theory and Revolutionary Tactics," in *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 edited by A. Smart, ed., (London: Pluto, 1978), pp. 50-73.
- ⑦羅莎·盧森堡，前揭書，頁五〇。
- ⑧最近一些研究曾經討論過羅莎·盧森堡自發論的這一宿命的或非宿命的性質。可是依我們之見，這些研究是過份地強調了相當次要的問題，諸如機械性的崩潰和階級的有意識的介入。斷言資本主義會機械性地崩潰，是這麼的含混，因此就我們所知，並沒有人支持它。反過來，關鍵性的問題是認識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主體是否不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內部建構它整個一致；而在這方面，羅莎·盧森堡的立場是明確地肯定的。因為這樣，關於社會主義不可避免的說法，就不完全是像杰拉斯（Norman Geras）所說的，向這時代的說法，或者精神需求的產物讓步了（請參考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p.36.），而是這個波節點賦予她整個理論和戰略的結構意義。按照羅莎·盧森堡的說法，在社會主義的出現必須完全**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這一基礎**上來說明的時候，革命的主體就只能夠是工人階級了。關於羅莎·盧森堡教條地支持馬克思的貧困化理論，來當作關於工人階級

的革命規定的基礎這點，請見 G. Badia, "L'analisi dello sviluppo capitalistico in Rosa Luxemburg," in *Annali* (Milan: Feltrinelli Institute, 1973), p. 252.

⑨Karl 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Norton, 1971).

⑩「他（考茨基）整個對抗修正主義的鬥爭目標，是應該保存把一個綱領不要看成是一定的政治需求的複合體——注定在鬥爭特殊的階段中建立起黨的主動權，而且本身隨著時間不同可以修改——而是看成為關於理論和政治的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的這一觀念。在這個觀念裡頭，理論和政治這兩個術語失去它們各別的自主性領域，馬克思主義變成了無產階級不可改變的意識形態。」Leonardo Paggi, "Intellettuali, teoria e partito nel marxismo de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Introduction to Max Adler, *Il socialismo e gli intellettuali* (Bari, 1974).

⑪Karl Kautsky, *op. cit.*, pp. 185-186.

⑫Adam Przeworski,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from Karl Kautsky's *The Class Struggle* to Recent Controversie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No. 7 (1977).

⑬例如在一八九三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科隆大會 (Cologne Congress)，雷金 (Legien) 抗議《前進報》(Vorwärts) 的說法。按照它的說法，「在經濟總是發現工人被深刻地分化著的時候，政權的鬥爭仍然在每一時候都是最重要的，而且形勢越是無望，這種分化就越是尖銳和越有損壞作用。小範圍的鬥爭確實也有它的優勢，但是這些鬥爭對於黨的最後目標來說，重要性會是次要的。」雷金反問說：「黨機關的這些論證對於吸引不同的工人到運動裡來，是否合適呢？我很懷疑。」引自貝汶努梯 (N. Benvenuti) 關於黨和工會之間關係的文件選輯。見N. Benvenuti, *Partito e Sindacati in Germania: 1880-1914* (Milan,

1981), pp. 70-71.

- 14 研究階級統一體問題的這種方式（按照這種方式的說法，跟典範偏離是可以按照取得它完全妥當性的偶然的「障礙」和「阻礙」這一角度，以概念來加以說明的），一直支配著些歷史學的傳統。例如，戴維斯（Mike Davis）在一篇發人深省和非常有意思的文章（Mike Davis, “Why the US Working Class is Different,” in *New Left Review*, No.123, September / October 1980）裡，在證明美國工人階級形態的特殊性時，以概念把這些特殊性說成是會在若干歷史時期最後硬使本身產生的、跟正常模式脫開的那種偏向。
- 15 我們必須說清楚，在我們提到「分裂」或者「分散」時，我們總是談到假定具有業已分散的和分裂的組成成份的這種統一體的一種言說。如果在考察這些「組成成份」時不提到任何言說，那麼把諸如「分散」或者「分裂」的這些術語應用在它們身上，就根本沒有任何的不管怎麼樣的意義。
- 16 Antonio Labriola, *Saggi sul materialismo storico* (Rome, 1968), p. 302.
- 17 關於這個問題的考茨基的主要作品，都被收入到貝汶努梯所主編的選輯中。見 N. Benvenuti, *op. cit.*
- 18 「工會的性質因此不是從一開始就被限制住的。它們可以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但是它們也可以變成階級鬥爭的桎梏。」 N. Benvenuti, *op. cit.*, p. 186.
- 19 「黨力圖……達到一勞永逸地剷除資本主義的剝削的一個最後目標。關於這一最後目標，工會活動，不管它的重要性和絕對必要性如何，都可以很有理由地把它說成是西西弗斯（Sisyphus）的勞動，這不是在無益處的勞動這種意義上說的，而是在永遠不能結束，總是要從頭開始工作的這一意義上說的。從所有這一切可以看到，在強有力的社會民主黨存在和加以考慮的地方，它在確定階級鬥爭的必然路線時就比工會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因而就指出了不直接屬於黨應該指揮的那些個別無產階級組織的方向。這樣，就能夠安全地保障階級鬥爭

必要的統一性。」N. Benvenuti, *op. cit.*, p. 195.

- ②請參考科萊蒂 (Lucio Colletti) 的評論意見，見 Lucio Colletti, *Tramonto dell'ideologia* (Rome, 1980), pp. 173-176. 蒙諾德 (Jacques Monod) 認為，「在打算把他們社會學說的組織放在自然規律的這種基礎上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必須說得更加清楚，而且要比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所做的還要更加謹慎地使用『萬物有靈論的構想』。……黑格爾的在世界發展中支配世界的比較一般規律，都是辯證體系的規律的這一種主張，在一種體系中找到它的位置，這種體系是不承認任何除了精神之外的永恆現實的。……可是保存這種主觀的『規律』本身，可以讓它們支配純物質的世界，這種作法非常明顯的終歸就是從放棄客觀性的主張，推行萬物有靈論的構想。」Jacques Monod, *Le hasard et lanécessité* (Paris, 1970), pp. 46-47.
- ③這跟我們早先的這個主張，即對考茨基來說，直接的物質利益並不構成階級的統一性和一致這點，並不矛盾。在這裡的重點是，作為獨立環節的「科學」的層次，制約了整個工人加入生產過程的含義。因此，科學承認不同的階級部份在它們那個部份中並不完全自覺到的利益。
- ④在利益的明確性和透明性把戰略的問題簡化成為「理性選擇」的理想條件這一形勢中，這顯然把預測的問題簡單化了。德塞陀 (Michel de Certeau) 最近表示：「我把『戰略』，稱作是在意志的主體 (一位經營者、一處企業、一個城市、一所科學的制度設施) 從『環境』中被孤立起來的那個時刻，有可能對於那些力量對比進行的那種預測。……政治的、經濟的和科學的理性都是根據這種戰略的模式建構起來的。跟這個相反，我把『策略』稱作是一種預測，它不能指望屬於它自己的某些東西，因此也不能指望把其他的東西作為一種可見的總體給區分開來的一種界線。」Michel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Vol. 1 (Paris, 1980), pp. 20-21. 按照這種區分，可以看得出來，因為考茨基的主體

的「利益」是明白可見的，所以每一種預測都是具有戰略的性質。

- 23 請參考 E. Matthias, *Kautsky e il kautskismo* (Rome, 1971), *passim*.
- 24 Symmachos (Karl Kautsky), "Verschwörung oder Revolution?" in *Der Sozialdemokrat*, (20 Februar, 1881). 資料引自 H. J. Steinberg, "Il partito e la formazione dell' ortodossia marxista,"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Turin, 1979), p. 190.
- 25 請見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0 (Nov. 1976/Jan. 1977).
- 26 Guglielmo Ferrero, *L'Europa giovane. Studi e viaggi nei paesi del Nord* (Milan, 1897), p.95.
- 27 請參考 Andrew Arato, "L'antinomia del marxismo classico: marxismo e filosofia,"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Turin, 1979), pp. 702-707.
- 28 George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s Company, 1969) p.80.
- 29 必然性的邏輯跟無為作風之間的這種關係，已經為正統派的批評家清楚地認識到了。索列爾確定：「閱讀社會民主黨人的著作，對於他們就他們擁有隨他們支配的未來的那份篤定信心，我們會感到驚訝：他們都知道世界正往不可避免的革命方向走，其中他們也知道一般的結果。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他們自己的理論中有這樣的信念，即他們最後是一事無成。」Georges Sorel, *Saggi di critica del marxismo* (Palermo, 1903), p. 59.
- 30 Antonio Labriola, "In memoria del Manifesto del Comunisti," in *Saggi del materialismo storico*, by Antonio Labriola (Rome, 1968), pp. 34-35.
- 31 關於拉布里奧拉在討論回到馬克思主義那裡的這場辯論中的介入，見 Roberto

Racinaro, *La crisi del marxismo nella revisione de fine secolo* (Bari, 1978), *passim*.

- ⑳請參考Nicola Badaloni, *Il marxismo de Gramsci* (Turin, 1975), pp. 27-28.
- ㉑ *Ibid.*, p. 13.
- ㉒按照巴達洛尼 (Nicola Badaloni) 的說法，這是拉布里奧拉應該仿效的解決方式：「或者他所提出來的選擇是錯誤的，真正的選擇在於深化和發展恩格斯的解說裡頭過份簡單化的歷史形態學。」Nicola Badaloni, *op. cit.*, p. 27. 自然，這樣二元論就已經被超越過了，但是花了消除形態學上不確定的這一領域的代價。這種形態學上的不確定，對於拉布里奧拉的理論構想來說，却是基本的東西。
- ㉓Otto Bauer, "Was ist Austro-Marxismus," in *Arbeiter-Zeitung*, (3 November, 1927). 本文譯文見「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作品選輯：Tom Bottomore and Patrick Goode, *Austro-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5-48.
- ㉔《鬥爭》(*Der Kampf*) 第一期編輯部說明，見Otto Bauer, "Editorial, 1907-8," in Tom Bottomore and Patrick Goode, *op. cit.*, pp. 52-56.
- ㉕ *Ibid.*, p. 55.
- ㉖關於這項討論，和「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一般的政治—知識歷程，見馬拉莫 (Giacomo Marramao) 為他選輯的「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作品選所做的傑出介紹：Giacomo Marramao, *Austro-marxismo e socialismo di sinistra fra le due guerre* (Milan, 1977).
- ㉗「把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這種過程，不再看成是仿倣統一的和同質的邏輯—歷史機制的發展速度，而是看成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變動內生因素多重的和擴散的結果——在理論層次上，這意味著在經驗分析上瓦解馬克思的形態學預測的一項重大的努力，同時，在政治層次上，這意味著揚棄『改

良』和『革命』之間的這一使人迷惑的選擇。可是它決不包含一種進化類型的選擇，好像社會主義是通過同種療法的劑量就可以實現一樣。」Giacomo Marrao, "Tra bolscevismo e socialdemocrazia: Otto Bauer e la cultura politica dell' austro-maxismo,"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3,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Turin, 1980), p. 259.

⑩見 Max Adler, *op. cit.*

⑪「在修正主義是被以一種非批判的方式放在跟改良主義相同的層次上，或者在它完全被看成是從一八九〇年以來黨的社會—改良的作為的這一表現時，改良主義的特殊性就被誤解了。因此，修正主義的問題必然實質上把本身限制在伯恩斯坦個人身上，不能夠擴充到弗瑪爾(Georg von Vollmar)和弗希伯格(Karl Höchberg)那裡。」Hans-Josef Steinberg, *Il socialismo tedesco da Bebel a Kautsky* (Rome, 1979), p. 118.

⑫關於修正主義和工會之間的關係，請見Peter 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London: Octagan, 1962), pp. 137-140.

⑬伯恩斯坦捍衛群眾罷工，把它看成是引起工會領導人彭梅布格(Bömelburg)下列評論的一項防衛武器：「有一次，伯恩斯坦並不知道他應該移往右派多遠，又有一次，他談論著政治性的群眾罷工。這些文人……正在危害工人運動。」引自Peter Gay, *op. cit.*, p.138.

⑭Leonardo Paggi, *op. cit.*, p. 29.

⑮請參考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 62.

⑯Eduard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Schocken, 1978), pp. 15-16.

⑰*Ibid.*, p. 103.



- ④⑧Eduard Bernstein, *Die heutige Sozialdemokratie in Theorie und Praxis*, p. 133. 引自 Peter Gay, *op. cit.*, p. 207.
- ④⑨Peter Gay, *op. cit.*, p. 120.
- ④⑩在前面我們區分過**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現在我們必須在**改良主義**和**漸進論**之間做第二種區分。區分的基本重點是，改良主義是一種政治的和工會**實踐**，而漸進論則是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理論**。修正主義有別於兩者的地方在於，它是根據政治的自主化來對古典馬克思主義所做的一種批判。如果一如我們在這本作品裡論證的，這些術語中的每一種不必然包含其他的術語，而且並沒有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方向中引導它的那些理論和政治作用的領域，那麼這些區分就是重要的。
- ④⑪因此，他接受素樸的和技術決定論的經濟觀念，這歸根到底跟我們在普列漢諾夫那裡發現的是同一個東西。請參考 Lucio Colletti, *op. cit.*, pp. 63ff.
- ④⑫關於伯恩斯坦的進化概念，請見 Vernon L. Lidtke, "Le premesse teoriche del socialismo in Bernstein," in *Annali*, 15th year (Milan: Feltrinelli Institute, 1973), pp. 155-158.
- ④⑬我們批判的意義不應該被誤解。在奠定社會主義的政治時，我們並沒有懷疑倫理判斷的這一需要——考茨基含糊地否定這一點，而且他打算把堅持社會主義降低成爲只是認識到它的歷史必然性，這些都已經受到破壞性的批判。我們的論點是這樣：從倫理判斷的存在那裡接下來的，並不是應該要把這些東西看成是在每一種言說出現的情況外部構成的一種先驗的主體創造的。
- ④⑭在討論索列爾的現代作品中，我們認爲下列作品特別有用：Michele Maggi, *La formazione dell' egemonia in Francia* (Bari, 1977) ; Michel Charzat, *Georges Sorel et la révolution au XXe siècle* (Paris, 1977); Jacques Julliard, *Fernand Pelloutier et les origines du syndicalisme d'action directe* (Paris,

1971); Gregorio de Paola, "Georges Sorel, dalla metafisica al mito,"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Milan, 1979), pp. 662-692; 以及有重大保留的作品：Zeev Sternhell, *Ni droite ni gauche. L'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ance* (Paris, 1983).

55 見 Shlomo Sand, "Lutte de classes et conscience juridique dans la pensée de Sorel," in *Esprit*, No. 3 (March 1983), pp. 20-35.

56 George Sorel,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New York: AMS Press, 1961), p. 127.

57 *Ibid.*, p. 182.

58 Gregorio de Paola, *op. cit.*, p. 688.

59 引自 Zeev Sternhell, *op. cit.*, p. 105.

60 這是使史泰恩黑爾 (Zeev Sternhell) (在這本作品 *Ni droite ni gauche* 裡) 的分析無力的東西，儘管他的資訊豐富。他所講出來的歷史，看起來是圍繞著非常簡單的目的論組織起來的東西。按照這種目的論，能夠把每一種跟唯物主義的或者實證主義的觀點的決裂，都看成是法西斯主義的先驅。



## 第2章

# 文化霸權：辛苦推出的新政治邏輯

在這個地方，有必要澄清在第二國際本質主義的言說中浮現的雙重空白，以及文化霸權的問題設定會對其構成一種政治回應的那種關於發展時期的特殊混亂這之間的關係。讓我們開頭就說明關於雙重空白的那些性質，因為這使我們有可能把雙重空白拿來跟文化霸權的縫合相互比較一下❶。首先，那種空白是以二元論的方式出現的：它打基礎的言說並沒有力圖在社會這一地形的內部決定產生作用的不同程度，而是力圖在包含或者決定每一種地形的結構過程的能力上面設定一個範圍。因此，有諸如這樣的提法：「下層建築不決定任何事情，因為意識或者意志也介入歷史」；或者「一般的理論並沒有說明具體的形勢，因為每一種預測都有形態上的性質」。這種二元論是通過一種作為不確定的這一不確定的假設來建立起來的：不受結構決定的實體，被理解成為結構否定的反面。這是使二元論成為關於邊界的一種關係的東西。可是如果我們仔細地觀察，這種反應並不全然跟結構的決定論決裂：它僅僅多了一條關於它的作用的限制。例如，它很可能既這樣論證，即社會生活有非常大片的領域不受經濟決定論制約，同時也這樣論證，即在經濟決定論的作用產生作用的有限領域，必須按照決定論的典範來理解經濟活動。雖然如此，這種論證還是有一個顯而易見

的問題：要確定某些東西是**絕對**受到制約的，又要確定一條把它跟不確定的東西劃分開來的明確界線，單單確定這種決定的特殊性是不夠的；這種論證也必須斷定它的**必然性質**。因為這樣，被認定的二元論就是一種偽造出來的東西：它的兩極不是在同一個層次上。在確定它的作為必然的特殊性時，這種決定就給不確定的變動限定了範圍。不確定因此被歸結為是這種決定的一種純粹的**補充**②。

**其次**，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一外表上的二元論跟這個事實是相適應的：結構的決定不給在此時此刻能夠從事的、反對各種走向分裂的傾向的這一種鬥爭的政治邏輯提供基礎。可是馬上可以看得出來，能夠讓這種邏輯的特殊性得以思考的唯一領域是從畫面上被抹去了：一如每一種從理論上來看的可決定的特殊性要向下層建築的和產生結果的階級體系這一領域求助一樣，任何其他的邏輯是沉沒到屬於偶然性變化的一般領域裡頭了，或者是要向不受一切理論決定的實體，例如意志或者倫理的決定求助。

**第三**和最後，在第二國際的言說裡，社會當事人的**階級**統一體是仰賴的確是更加薄弱的反映作用的這個基礎：即經濟的分裂是不能夠構成階級統一體的，這要我們向政治的重建求助；不過政治的重建也是不能夠建立社會當事人的**必然的**階級性質的。

## 第一節 聯合發展和關於偶然性的邏輯

讓我們現在把出現在第二國際理論言說中的這整個裂痕，跟文化霸權的概念打算縫合的混亂比較一下。安德森（Perry Anderson）③研究過文化霸權的概念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國際的理論家們是

從那裡取得文化霸權的概念，然後又通過他們傳給葛蘭西——那裡出現的過程，他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得出來：文化霸權的概念填補了按照普列漢諾夫的「階段論」概念來說應該有正常歷史發展的一場危機留下來的空間。因為如此，一件以文化霸權的方式來處理或者政治力量的總和，都是屬於歷史偶然性的領域。在歐洲的社會民主黨那裡，主要的問題是工人階級的立場分散，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些立場當中所假定的統一性處在亂七八糟的狀態。資產階級文明的真正成熟度在工人階級內部反映出它的結構秩序，它毀滅了工人階級的統一性。相反的，在文化霸權的理論中，就像它在俄國的環境裡被提出來的那樣，未充分發展的資產階級文明的這一極限迫使工人階級從它裡頭走出來，接受不屬於它自己的那些任務。那麼問題不再是保證階級的統一性，而是使工人階級的鬥爭在這樣的一種歷史領域裡，即偶然性從資產階級負起它自己任務的這一結構性弱點中產生出來這裡，產生出最大的政治效果來。

讓我們考察一下促成「文化霸權」概念產生出來的這些步驟是如何地組織起來的。在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德（Paul Axelrod）的著作中，「文化霸權」這項術語是被引進來說明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進行它爭取政治自由的「正常鬥爭」，因而迫使工人階級斷然地介入以取得政治自由的這一過程。因此在這項任務的階級性質和執行這項任務的歷史當事人之間，存有一種分裂。這產生了無法預測的空間，它們的領域有相當大的變化——在普列漢諾夫那裡它們是最小，在托洛茨基那裡擴充到最大。可是不管怎樣，這種空間都應該是關鍵重點，各種革命的方向都是從這裡分割出來的。俄國革命——即像葛蘭西所說的，「反對《資本論》」的革命——必須通過把爭取文化霸權的鬥爭

的這一無法預測性質的空間擴充到最大的辦法，來證明它的戰略。因此，**內在的必然**（跟「正常」發展中的該階級的任務對映）和**外在的偶然**（跟在一定的環節必須承擔任務的社會當事人的階級性質不同的這些任務的總和）之間的對立產生出來了。

在正統派的典範中的這些歷史的混亂和那些我們在西歐的情況中發現的混亂之間，有重大的差異。在兩者的情況中，混亂都產生**替換**（displacement）；不過跟在西歐這包括同一個階級內部從經濟到政治的這些層次的替換相反，在俄國這種替換程度是更大，因為它發生在不同階級之間。在西歐——以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為例，在這裡多重性質的民族形勢是表現為關於**階段**的替換——我們面對著屬於同時性的典範的這些結構環節的脫節。因此關於脫節的這一思考就不能像在俄國社會民主黨那裡一樣，採取一種敘事體的形式。最後，跟在其他的情況中典範的混亂和危機是一種負面的現象相反，在俄國它變成一種正面的現象：資產階級的任務和資產階級執行它們的能力之間的不一致，是由無產階級來奪取政權的墊腳石。同理，歐洲形式的混亂能夠純粹通過提到必須加以克服的那些負面的範疇——無常和偶然——來用概念加以說明；不過在俄國的情況中，因為這種混亂本身表現為一種有積極助益的、能夠容許工人階級前進——使本身滲透到歷史裡頭的某種方式——的場合，就變成了有必要描繪工人階級和它必須在一定環節中承擔的這些外在任務之間的新型關係。這種反常的關係，是被稱之為「文化霸權」。

現在我們必須考察一下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言說中的這種文化霸權關係的特殊性。其實，在這裡「文化霸權」指的是一種受兩種非常不同的關係的緊張性所宰制的**空間**，而不只是一種關係：(一)是接受文

化霸權的任務和它「本來的」階級當事人的關係；(二)是接受文化霸權的任務和以文化霸權來執行任務的這一階級的關係。如果在不精確的概念形式下這兩種關係的共存足以賦予「文化霸權」這種術語一個參考的空間，那麼關於它們的邏輯接合的這一種精確的規定，對於把「文化霸權」轉變成爲一種理論範疇，就是**必須而且不可或缺的東西**。可是在這種情況中，我們僅僅必須注意考察一下這兩種關係，以便看出它們不是以邏輯的方式在任何一個地方接合起來的。

首先，在反對專制主義的鬥爭中，沒有任何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分析間接指出如果說資產階級的任務是由無產階級來承擔，那麼資產階級的任務就將不再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的一致是在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對於正統派來說，正是在這種基本結構的內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才產生出來。這種基本的結構把本身編織成一套故事一樣——我們可以稱之爲**第一套故事**——假定基本結構的運動是矛盾的，而且它有消滅自己的傾向。在編寫這套故事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是情節，而被完美地派定的角色是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現在歷史的明晰性因爲一種反常出現而模糊了：即資產階級不能實現它的作用，必須由其他的角色來接替。我們可以把這種角色的替換稱之爲**第二套故事**——以托洛茨基的說法來說，就是不斷革命。這兩套故事之間的結構關係是什麼呢？簡單地通過戰略的辯論來理解就夠了，就是說，讓我們相信它們的接合是在以第一套故事占主導地位爲其標誌的理論領域中產生的。有三種考察足以證明這點。(1)角色出場的秩序不因爲第二套故事而改變：即如果資產階級不能夠履行「它的」任務，這些任務必然要交給無產階級——但是這種轉交的必要性，只有在我們把在第一套故事的層次中構築的整個演進架構



當作是理所當然的，才會變得顯而易見。(2)這些任務的階級性質不因爲它們是由一個階級或者其他的階級來承擔而改變——民主的任務還是留給資產階級，即使在它們的歷史當事人是工人階級時也是一樣。(3)社會當事人的那種真正的一致在第一套故事裡是受到他們的結構地位制約的。因此，兩套故事之間有一種不一樣的關係：文化霸權的關係**補充**了階級關係。用屬於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一套區分法，我們可以說文化霸權的關係總是關於**說話** (*parole*) 的基本知識，而階級關係則是關於**語言** (*langue*) 的基本知識。

關於文化霸權的任務以及把它付諸實現的這些當事人的意識和一致，就像上面說明的，是完全被包含在關係(一)裡頭。因此，關係(二)的兩種組成部份之間的關係只能是一種**外在性**的關係。那麼，一種外在性的關係就能夠在兩種方面的情況下來考察：作爲關於**外在性**的一種關係和作爲外在性的一種**關係**。第一種方面沒有出現困難：如果說屬於它的組成部份的一致完全是在這種關係的外部構成的話，那麼這種關係就是一種外在性的關係。至於產生關聯的環節，爲了這種關係可以是一種嚴格的外在性關係，就必須有不應該可以歸因於外在性關係的那種概念的特殊性。(否則這種特殊性就會變成結構上可以限定的環節。而且因爲這需要有一種關於它與構成階級本身的其他結構環節接合起來的這些形式的特殊理論，所以這種階級的一致就不可避免地被修正過來了。) 易言之，外在性的關係只能夠被思考爲**純粹的偶然性**。這說明被建立在第二國際的言說裡的這一偽裝的二元論，同理是如何在關於文化霸權的理論中被重新生產出來的理由。關係(一)和關係(二)不能通過概念加以接合，完全是因爲後者不管如何都沒有明確的概念特殊性，而且也被歸結爲本身在外部構成的這些當事人之間關係的一種

隨偶然改變的領域。不過我們能夠這樣說，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從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德到列寧和托洛茨基，有一個明確的和越來越複雜的文化霸權理論！確實是這樣，不過它不是我們論證的對象。因為這種明確性和複雜性涉及到使階級之間的文化霸權關係成為可能的那些形勢的類型，也涉及到在一定場合活動的社會團體當中的各式各樣的關係。不過，關於文化霸權聯繫本身的特殊性從來沒有人討論過，或者說得明確一點，有一種巧妙的魔術使它讓人看不見。

爲了瞭解這種魔術是如何產生出來的，我們不應該把焦點放在那些研究上面，因爲它的「正常的」發展形式宰制了歷史的過程，而且文化霸權的環節占據了一個明顯不重要的位置。（這是普列漢諾夫的情況，普列漢諾夫把工人階級的介入看成是壓迫資產階級去完成它自己的任務的一種手段。）比較相關的是其他的那些研究，因爲這種文化霸權的任務轉移構成了革命真正的實質，所以要文化霸權聯繫的特殊性弄成讓人看不出來是比較上較爲困難。在這種意義下，托洛茨基的作品就具有堪爲楷模的明晰性，因爲它們非常強調跟西歐資本主義過程相反的那種俄國發展的特殊性。一如眾所周知的，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前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sup>①</sup>，托洛茨基提出可以從事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這種工人階級政府的可能性，它跟孟什維克關於沙皇政府崩潰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論觀點對立，也跟布爾什維克的可以把工農政府的改革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模式上的這一工農政府的觀點對立。在俄國歷史發展的那些特殊性中，即資產階級衰弱和都市文明；國家作爲一種變成從各階級獨立出來的軍事官僚的機器不均衡的成長；從這種「落後的特權」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先進形式附着著；俄國無產階級毫無經驗，由於缺乏在一個複雜的市民社會來試煉它；

等等刻劃出了這種可能性。在資產階級來得太遲以致於不能負起反對專制主義鬥爭的這些歷史任務時，無產階級變成爲完成這些任務的主要當事人。階段論典範中的這種混亂，和因而產生的文化霸權轉移的這項接替，是托洛茨基革命理論的真正主軸。

看來過去革命的那種可能性圍繞著文化霸權的關係轉時，是沒有賦予文化霸權的關係一個比較重要的中心地位。可是我們應該更加仔細地研究一下在托洛茨基的言說裡這種中心地位所具有的形式。他的分析在兩個基本論點的地方碰到看來是抵制著嚴格的階級還原論——這是說，一種（或多種）關係的必然性質——的那種社會關係的特殊性，而且他在兩個論點的地方從可以制約這種特殊性的理論推展中退却下來。第一個論點有關資產階級結構上的軟弱和國家在俄國社會歷史形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面對著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學家波克洛夫斯基（M. N. Pokrovsky）——他是從一個非常粗俗的經濟主義觀點出發來堅持強調，要賦予國家這種重要性，就要把國家從它的階級基礎那裡分離開來——提出來的理論挑戰，托洛茨基沒有利用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國家相對獨立性這一理論分析來答覆，反而求助於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長青的這種說法：「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的思想是被夾在他安置來取代活生生的歷史力量的這些刻板的社會範疇的老虎鉗中。……沒有『與眾不同的特質』，就沒有歷史，就只有一種冒充的唯物主義幾何學。不研究經濟發展活生生的、變動的事物，那麼注意一些外在的徵象，把它們套用到一些現成的陳腔濫調中也就夠了。」

⑤ 通過使國家獨立於社會階級之外來構成的「與眾不同的特質」，從而就被放到從一開始就被嚴格地限制作用的一個領域中：我們現在是正在研究這樣的環境，它屬於一個著名的事實體系，而且能夠被整合到

一種情節裡——因而被整合到托洛茨基所分析的那個占主導的故事情況裡——不過我們不能從概念上來理解它。

如果說所有的社會決定因素都是同樣這樣處理，那麼「與眾不同的特質」就必然是消極的，因為托洛茨基這時將必須——在俄國特殊性的相同層次——敘述經濟藉以設法要歸根到底決定一切其他社會關係的這一過程。可是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雖然有關於這些「特殊性」的這種敘述，不過被認為是每一種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都有的這些特質，都沒經過一種敘述的處理。經濟歸根到底決定歷史的過程，對於托洛茨基來說，是被建立在像波克洛夫斯基的那種超歷史層次上，而且是以像教條一樣的那種方式建立起來的東西。一種「本質」的秩序免不了要面對一種「環境」的秩序，而且兩者都是在相同的社會當事人內部重新被生產出來的。在它們內部應該服從歷史變化的東西，被歸結為使得它們偏離正常典範的全部特點——俄國資產階級軟弱、無產階級毫無經驗等等。可是這些「與眾不同的特質」無論如何都沒有在暗中破壞這種典範的妥當性：在社會當事人把跟它有關聯的那種他們的基本一致明確地表示出來，同時這些「與眾不同的特質」把本身完全表現成為對於達成在「本質」的層次預先確定的那些階級目標在經驗上有優勢或劣勢這一範圍內，這種典範繼續產生它的作用。

這點明確地顯示在第二種基本的、托洛茨基的分析觸及到階級還原論概念那些範圍的論點裡：即關於文化霸權的分析中。一如我們早先看到的——而且也能夠把這點適用到托洛茨基的分析上——一種國家任務的「自然的」階級當事人和把這一任務付諸實踐的具體當事人之間是有分裂存在的。不過我們也看到，對於從事這項任務的當事人來說，一項任務的階級性質是不會被這種分裂改變的。因此，當事人

不能夠認同被從事的這項任務；它跟那項任務之間的關係還是停留在按照情況預測的層次——即使在這點包括屬於劃時代方面的這些「情況」的時候。這項任務的分裂是一種不影響它的性質的經驗現象：當事人跟這項任務的關係也是經驗的，同時在當事人的一致的「內在」和「外在」之間產生出永恆的分裂。我們在托洛茨基那裡從來沒有發現這樣的想法，即群眾民主的和反專制的一致，構成不同的階級能夠接合起來的一種特殊的階級立場，還有在這樣構成一種特殊的階級立場的時候，他們改變了他們自己的性質。還沒有實現的民主任務，僅僅是工人階級要向前推進完成其嚴謹的階級目標的一個墊腳石。這樣一來，條件就不但要為有系統地用魔法驅除的這種文化霸權聯繫的特殊性（假定它的實際或者按照情況分析的特點，避開了任何概念的構思）創造出來，而且也要為要讓人再看到它浮現出來而創造出來。實際上，把文化霸權的關係放到關於調整和重新組織的一套**故事**裡，放到不能夠被劃歸到重複原則項下的一種連續過程裡，看起來就是賦予在概念上瞬間即逝的存在一種**意義**。因此，把俄國的特殊性呈現出來的那種歷史故事的形式，起著一種含糊不清的作用：一方面，雖然歷史故事的形式把俄國的特殊性限制在按照情況分析的領域，但是在另一方面能夠思考俄國的特殊性的這一事實（即使在一種故事最無力的形式這種情況下），卻又給俄國的特殊性一個組織的原則，一個可靠的**言說上的存在**。惟這是一種非常短暫的存在，因為關於文化霸權的長篇論述很快地就下這樣的結論：不管是對托洛茨基來說或著對於列寧來說都一樣，並沒有特殊性可以保證蘇維埃國家的生存，除非歐洲能夠爆發一次社會主義的革命，除非先進工業國家勝利的工人階級最後支援俄國的革命家。在這裡，俄國階段混亂的「反常性質」跟西方的

「正常」發展連接上了；我們曾經稱之為「第二套故事」的東西，是被重新整合到「第一套故事」裡：「文化霸權」很快地找到了它的「範圍」。

## 第二節 「階級聯盟」：民主和威權主義之間

以非當事人的階級一致這一方式出現的這種文化霸權聯繫的概念，自然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專利品，它也是整個列寧主義傳統的特點。對於列寧主義來說，文化霸權包含在一個**階級聯盟**內部的**政治領導**。文化霸權聯繫的政治性質是基本的，實際上意味著把聯繫建立起來的那個領域是跟把社會當事人組織起來的那個領域不同。在生產關係的領域是階級組成的特殊領域的時候，階級在政治領域中的存在只能夠被瞭解為一種**利益的展現**。通過代表它們的黨，它們在一個階級的領導下，在一個對抗共同敵人的聯盟中統一起來。可是這種按照情況分析的統一體，並不影響到組成這種聯盟的各階級的一致，因為它們的一致是圍繞著最後嚴格說來是矛盾（「同床異夢」）的那些「利益」被組織起來的。在「利益」的形式下經過理性地思考的社會當事人的一致，和跟被展現出來的東西有關的那種展現手段的透徹性，是兩個可以讓文化霸權聯繫的外在性被建立起來的條件。這個外在性實質上是共產黨黨員通常發現他自己所處的那些弔詭的形勢。他雖然時常身在為民主自由鬥爭的先鋒隊裡，可是他還是不能認同民主自由，因為一旦「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完成後他會是第一個放棄民主自由的人。

在這個地方，重要的是注意一下在列寧主義的言說中從文化霸權的中心位置產生出來的那種含糊性和矛盾。在一方面，這種概念無疑

地是跟列寧主義傳統比較權威的和否定的傾向結合起來的，因為它以領導部門和那些被領導的部門之間的明顯劃分為出發點。（這種劃分在考茨基正統派的革命戰略裡是明顯不存在的，在那種革命戰略裡，政治領導人和社會基礎之間完全地合拍，沒有給文化霸權的重新組織留下任何必然性。）不過，在另一方面，這種文化霸權的關係可以產生一種政治的概念，這種政治概念有可能是比任何在第二國際傳統內部找得到的東西還要民主。在階級的經濟主義那裡會跟不同階段符合的任務和需求，我們現在看到是在相同的歷史場合裡共存。這導致有人要因為對抗和分裂地點的多元性而接受當前政治的妥當安排，所以革命的正当性就不再專門集中在工人階級的身上。假使把「群眾」從占主導地位的部門劃分開來的分界線不是跟階級的剝削並列存在，那麼一種結構的混亂就會因此出現在「群眾」和「階級」之間。聯合和不平衡的發展，變成爲首次能夠讓馬克思主義更加複雜地提出它關於社會鬥爭性質的概念的那種領域。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說明這種弔詭：即在群眾鬥爭的民主範圍正被擴大的那個時候，一種比以前更加有先鋒隊想法和反民主的概念，却在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堅持自己的權利呢？非常簡單，由這個事實來說明：把馬克思主義賦予工人階級的那種本體論上的特權，從這個社會基礎轉移到群眾運動的政治領導人身上。在列寧主義的概念裡，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並不是通過把階級一致跟在政治上通過文化霸權的實踐重新組織起來的多重的民主要求混淆在一起的方式，來改變它們的階級一致；反過來，它們是把這些要求看成爲是階段，看成爲是在追求它們自己的階級目標時必然的但不過是過渡的步驟。在這些情況下，「先鋒隊」和「群眾」之間的關係就只是一種主要是外在的和

操縱的性質。因此，到民主的要求變成越來越分歧，群眾鬥爭的領域變成越來越複雜的這個地步時，一直跟「工人階級的客觀利益」一致的一種先鋒隊，就必然越來越把它自己的一致和它力圖領導的那些部門的一致這之間的裂痕擴大。那種關於群眾運動民主有生力量的擴張，按嚴格的階級概念來說，就引發了越來越具威權作風的政治實踐。當群眾鬥爭的民主化取決於溢出階級邊界的那些分裂所在的激增時，政治的威權主義就在爲了紮下**階級**的文化霸權這一必然性的根基，而把領導人和群眾運動內部的被領導人之間的區分建立起來的那個時刻出現了。如果這種區分是在爲整個運動所共享的那些目標而鬥爭當中以比較實際地把自己組織起來的能力爲基礎，那麼結果就不必然是威權的。不過一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實際上是被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提出來的：有一個部門**認識**歷史的基本運動，因此認識到了把整個群眾統一起來的那些要求的臨時性質。被歸屬於工人階級的那個中心地位，就不是一種實際的而是一種**本體論**上的中心地位，這種中心地位同時也是一種**認識論**上的特權所在：無產階級——或者說得明確一點，它的黨——作爲「普遍」階級，是科學的貯存所。在這方面，階級的一致跟群眾的一致之間的分裂變成是永久性的。這種威權主義轉向的**可能性**，在某些方面從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產生的初期，這是說從一個範圍有限制的活動者——工人階級——被提昇到「普遍階級」的地位上的這時候，就已經存在了。如果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往這種威權作風的方向推進，那麼這是因爲對於他們來說，工人階級的政治中心地位必須跟其他社會階層的無產階級化一致，這樣就不會給**階級**和**群眾**之間的分裂留有餘地。然而所有那些對於使威權主義轉向變成不可避免是必要的東西，在**按照古典的角度來說**工人階級的政



治中心地位被高舉為一種原則的這時候，只是應該被思考成爲一種比工人階級範圍更大的群眾性活動的那種奪權行動。

讓我們把我們論證中的幾個環節扣在一起。爲什麼文化霸權的概念所包含的兩種關係——被賦予的文化霸權任務和要執行文化霸權任務的階級之間的關係，以及被賦予的文化霸權任務和是它「自然的」當事人的這一階級之間的關係——之間的緊張性，從來都沒有在有效的概念接合中得到解決，這點已經變得比較清楚一點了。在經濟主義的階段論這種領域——唯一能夠把工人階級組織成爲一種「普遍階級」的領域——上維繫工人階級統一體和一致的條件是這樣：被賦予的文化霸權任務不會改變執行文化霸權的這一階級的一致，而是跟它維繫一種單純的外在的和事實的關係。還有，肯定這種關係的外在性質的唯一一種方式是扣緊被賦予的文化霸權任務和它「自然的」階級當事人之間的聯繫。因此，關於文化霸權關係的這一領域在本質上是實用主義言說的領域。所有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介紹到馬克思主義裡的那些術語上的發明，都是屬於軍事上的詞彙（策略上的聯盟、戰略路線、前進幾步和後退幾步）：沒有任何一個詞彙涉及到葛蘭西後來用他的歷史性集團、完整的國家等等概念來說明的關於社會關係的那種建構。

那麼，文化霸權概念所包含的這兩種關係之間的這一緊張性，就跟我們已經在文化霸權的民主的和威權的實踐之間找出來的那種含糊性沒有分別了。執行文化霸權的階級和民主任務或者需求之間的關係，只有在民主的這項任務被聯結到一個不同的階級，和被聯結進化論的典範內部的一個必然階段上面，才具有一種外在的、操縱的性質。相反的，民主的有生力量只有在這種聯繫被打破、只有容許領導人和在群眾內部的被領導者之間僵化的劃分浮現出來的狀況消失後，才有可

能得到發展。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提出可以在文化霸權的民主的或者威權的實踐裡頭克服原有含混性的那些條件。

**民主的實踐** 一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文化霸權重組的領域帶有民主擴張和深化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的有生力量。沒有文化霸權，社會主義的實踐只能夠把焦點集中在工人階級的需求和利益之上。不過在階段的混亂迫使工人階級在**群眾**的領域行動的這個範圍內，工人階級就必須放棄它階級的居住地，把它自己改造成為接合多種多樣的對抗和超出它本身的那些需求的人。從每一種我們所說過東西來看，可以看得出來，群眾的民主實踐的深化——它迴避先鋒隊的操縱和階級的文化霸權與民主任務之間關係的外在特性的描繪——只有在我們承認這些任務不具有必然的階級性質，以及以透徹的方式來放棄階段論時，才能夠達成。有必要跟這種把民主的任務和一個資產階級的階段聯結起來的觀點決裂——只有這時，妨礙社會主義和民主之間永久接合的障礙才得以消除。這一來就有四種基本的結果產生。第一，關於階級的那種一致是被他們自己接受下來的那些文化霸權的任務轉變了：內在和外在那種僵硬的分界線不復存在。第二，因為群眾的民主需求失去它們必然的階級性質，所以文化霸權的領域就不再包含有以階級當中的零和競賽為基礎的那種最大化的效果；「階級聯盟」的觀念可以看出來也是不夠的，因為文化霸權是以建構社會當事人的那種一致為前提的，而不僅僅是預先建構的當事人當中「利益」的理性對映。第三，假定所謂的「展現」修改了被展現出來的那種東西的性質，就不能夠再把政治的領域思考成「利益的展現」。（實際上，以透明性出現的展現那種觀念變成站不住腳。在這裡實際上產生問題的是基礎／上層建築的模式本身。）最後，在社會當事人的一致不再成為專門通過

它們在生產關係中的涉入來建構，而且變成一些主體立場之間的一種不穩定接合的這個範圍內，被隱約地挑戰著的東西就是社會當事人和階級之間的一致。

**威權的實踐** 在這裡情況是相反的。每一種需求或者任務的階級性質都必須事先固定。有資產階級—民主的需求、小資產階級的需求等等，而它們相對的進展都是通過政治的預測加以確定的，這種政治預測則是按照階段和變化的不平衡聯合產生出來的階段和變化這種傳統模式來分析每一種場合。可以看得出來，工人階級執行的文化霸權任務和它的階級一致之間，有一種完全的劃分。政治的軍事概念支配著整個戰略的預測。但是因為真正的工人階級自然是決不完全認同於它的「歷史利益」，所以在該階級的實際狀況和展現它「真正的一致」的政治層次之間的分裂就變成永遠了。從列寧的《怎麼辦》到在共產國際支配下的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為止，這條分界線變成越來越固定，而且被反映到共產主義政治逐漸威權作風的轉向中。重要的是要澄清什麼東西使這種轉向成為不可避免。我們並沒有要力圖在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傾向裡頭否認政治媒介的必要性；甚至於更沒有要把它跟站在該階級自發的社會主義傾向這一神話的基礎上，強調工人階級作用的一種看法對立起來。可是關鍵性的東西在於如何瞭解這種政治聯繫的性質；列寧主義明顯地並沒有打算要通過鬥爭，來建立一種不是由任何歷史的必然性規律來預先決定的群眾的一致。相反的，它堅持有一種只容易受到啓蒙的先鋒隊——它對於工人階級的態度因此純粹是教育的——影響的階級的「自為」。威權政治的根源就在於科學和政治的這種交織。因此在把黨看成為該階級的代表——不再是真實的階級的代表，而是受到它的「歷史利益」建構的那一實體的代表——時，

不再有任何的問題。跟文化霸權的民主實踐越來越質疑代表過程的透明性相反，這種威權的實踐已經為把展現的關係變成爲基本的政治機制奠定了基礎。一旦每一種政治關係都被認爲是一種展現的關係時，接下來的替代作法就從階級轉移到黨（無產階級客觀利益的展現）身上，和從黨轉移到蘇維埃國家（共產主義運動世界利益的展現）上面。階級鬥爭的戰爭概念因此終結於一種末世學的史詩中。

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階級統一體轉移到政治領域的根源，要回溯到第二國際的正統派那裡。在列寧主義那裡像在考茨基思想那裡一樣，政治環節的構成性質要把重要的作用歸屬於上層建築，因爲賦予黨的特權不是「上下地位」的特權，而是「認識論上的特權」：在建構社會關係時它不是根據政治層次上的效能，而是根據一定的階級思考角度所享有的科學壟斷權。這種壟斷權在理論的層次保證克服資本主義可見的傾向和它基本的演進之間的這一分裂。考茨基的思想和列寧主義之間的區分在於，對於前者來說，分裂是純粹暫時的和屬於階級的分裂，克服它的過程繫於資本主義積累的內生傾向；而對於列寧主義來說，這種分裂是「階級」和「群眾」之間結構混亂的領域，它永遠限定帝國主義時代政治鬥爭的條件。

最後一點是關鍵：當文化霸權的任務被人跟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那些條件網綁在一起時，文化霸權的任務對於共產主義的戰略來說就變成越來越重要了。對於列寧來說，世界經濟不是單純的經濟事實，而是一種政治現實：它是一個帝國主義的鏈環。決裂的地方不出現在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觀點來看的最進步的那些聯繫上，而是出現在最大多數的矛盾已經積累起來，和最大多數的傾向與對抗——以正統派的觀點來看，屬於分歧的階段——融合成爲一種決

裂的統一體的那些聯繫上<sup>⑥</sup>。不過，這意味著革命的過程只能作為關於不同的組成成份的一種政治接合來理解：沒有不屬於階級內部單純的對抗的一種社會複雜性，就沒有革命；易言之，沒有文化霸權就沒有革命。當我們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碰到舊的團結逐漸瓦解，社會關係普遍的政治化時，政治接合的這種環節就越來越變成基本的東西。列寧非常明瞭向新的、深刻地轉變階級鬥爭歷史範圍的資產階級群眾政治——他把它稱之為勞合一喬治主義 (Llogd Georgism)<sup>⑦</sup>——發展的這一過渡。改變可以容許的、甚至於可以思考的那種社會和政治一致的一些不受懷疑的接合，其可能性使得古典階段論邏輯範疇的明晰性變得不清楚。托洛茨基希望取得這樣的結論：聯合的和不平衡的發展是屬於我們時代的歷史條件。這只能意味著文化霸權任務不停地擴張——它跟領域縮小得像一頭野驢的皮膚那樣的純粹的階級任務是對立的。不過如果沒有不包含一種組成成份「非正統」的結合的歷史過程，那麼什麼是正常的發展呢？

共產黨的言說本身，變成越來越受到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新歷史領域每一種政治首創精神取得的那種文化霸權角色所宰制。可是結果它就容易以矛盾的方式在我們所稱的文化霸權民主的實踐和威權的實踐之間搖擺。在一九二〇年代，經濟主義的階段論在每一個地方都盛行著，而且當革命的遠景退却時，階級的路線就一直往比較僵化的方向發展。因為歐洲的革命是被人純粹按照工人階級的中心地位這種角度來思考，因為共產黨展現著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所以這些黨唯一的作用便是要維繫跟社會民主黨的整合傾向對立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因此在「相對穩定」時期，就必然要用甚至於更加不妥協的態度來加強這道階級的防線。此後，一九二四年推出的口號是共產黨的布

爾什維克化。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用下面的話來說明這個口號：「布爾什維克化意思就是為無產階級的文化霸權鬥爭的堅強意志，它意味著極度憎恨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內的反革命領導人、中派主義和中派主義份子、半中派和反戰份子、所有關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失誤……。布爾什維克化是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它是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列寧主義思想的題辭。」<sup>⑧</sup>在惡化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地接下來有更新革命的過程時，政治的分期就是經濟的單純反映了：在穩定時期給共產黨留下的唯一任務，就是圍繞著整個階級思想和「分裂觀念」的一致來積累力量，這整個階級思想和「分裂觀念」的一致在危機來臨時，會打開通往新的革命首創精神的道路。（「統一陣線」是被人以有特色的方式重新說成爲自下而上的聯合陣線，而且也是被人重新說成爲揭發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機會。）在這些情況下，控制其他社會和政治力量的手腕就不能不取得優勢。

跟這種還原論和控制的概念決裂——或者決裂的早期階段，就像它從來沒有在共產主義的傳統中被克服一樣——是跟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經驗和反殖民地革命的周期聯繫在一起的。在第一種情況中，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的危機和右派的激進一大眾的意識形態出現，向把民主的法權和自由看成本來就是「資產階級的」這一概念挑戰；同時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創造了一種人民的和民主的群眾主體性，它有可能被人跟社會主義的一致混淆在一起。按照我們早先的分析來看，把被賦予的文化霸權任務跟它「自然的」階級當事人統一起來的那種聯繫開始瓦解了，而且它變成有可能把這種任務跟執行文化霸權的階級的一致混淆在一起。以這種新的思考角度來看，文化霸權則被瞭解成是圍繞著一個新階級的核心，來對國家進行民主的重建。這種傾向後來

被全國抵抗納粹占領的種種經驗強化了。不過共產黨政策的改變是從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開始的。在這次的大會上，「階級對抗階級」的第三時期路線被正式放棄了，首次引進人民陣線的政策<sup>⑨</sup>。在隱約地保留把文化霸權看成是完全外在的階級聯合的這一觀念的同時，新的戰略是把民主看成為非通往由任何一個社會部門來進行排外的合併這條路的共同基礎。在這些情況下，變成越來越難以在執行文化霸權任務和階級的一致之間維繫一種嚴格的劃分。有一些提法——從毛澤東的「新民主」到陶里亞蒂 (Palmiro Togliatti) 的「進步的民主」和「工人階級的國家任務」——有意把本身放在很難在馬克思主義的媒介變數內部用理論來說明的那種領域上，因為「人民」和「民主」在群眾鬥爭的層次上是有形的現實，但不是可以被劃歸到一個嚴格的階級屬性上。在世界的邊陲地帶發生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類似的現象：從中國到越南或古巴，人民群眾的一致是其他的一致，比起階級的一致範圍更加廣泛。我們看到從列寧主義傳統的那一段早期階段開始本身就含沙射影的這種「群眾」和「階級」之間的結構性分裂，在這裡產生了它的全部作用。

在這方面，共產黨的言說碰到了一組關鍵性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來說明出現在跟階級不同的那種群眾領域上的多元化對抗呢？一旦文化霸權的力量在它自己的一致中結合了群眾的民主需求，它如何能夠保有嚴格的無產階級性質呢？對第一個問題的主要回應就是要補充一套言說的戰略，這樣在階級之間建立起來的關係在形式上仍留在階級的領域上時，才能夠超越它們特殊的階級性質。例如，考察一下在共產黨的言說中關於列舉的用法。列舉從來都不是一種無害的作法：

它包含重要的關於意義的替換。共產黨的列舉都用在建立占主導地位部門和人民部門之間對抗的這種二分法的空間；而且關於它們兩者的一致，都是站在列舉它們基本的階級部門這個基礎上建構起來的。例如，在人民部門這一方面將包括：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派系等等。可是這種列舉並不僅僅肯定某種階級或者階級派系在人民那一端各別的和照事實那樣的**存在**；它也力陳它們共同對抗占主導地位那一端時的**同等**。同等的關係不是對象內部的一致關係。同等從來都不是重複的，就像它在某些對象當中建立的可以替代的東西只對於一定結構環境中的一定的立場有效一樣。在這個意義下，同等取代從對象本身到對象出現或者存在的環境都有可能的那種一致。可是這意味著，在同等的關係中，關於對象的一致分裂了：一方面，它維繫它自己的「按事實來看」的意義；另一方面它把環境中的立場（對環境中的立場來說，它是一種可以替代的組成成份）象徵化了。這正是在共產黨的列舉中產生的東西：從一種嚴格的階級的觀點來說，如果每一個人都有分化的甚至於對抗性的利益，那麼在人民那一端的部門當中不管怎麼樣都沒有**一致**。但是在人民那一端跟占主導地位那一端對立起來的這一環境中，在人民那一端建立起來的同等關係，就構成了一種「人民」的、不可以歸結為階級的立場的那種言說立場。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言說那裡，沒有同等的列舉。對於考茨基來說，每一個階級部門都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內部占有一個特別不同的立場；馬克思主義言說構成的性質之一過去確實就是把「人民」消解成爲無組織的和**不嚴密**的範疇，把每種對立濃縮成爲照本身字意完全表露無遺、沒有任何同等範圍的那種階級的對抗。至於「聯合和不平衡的發展」這一言說，我們已經看到，階段的混亂和文



化霸權的重新組織完全被認為是階級當中比較複雜的運動，它實際上的角色給關於例外情況的故事而不是關於特殊性的概念說明留有餘地。在羅莎·盧森堡那裡，我們更清楚地領悟到破壞了每一種具體鬥爭表面上的意義，而跟象徵的意義相同的那種分裂；不過像我們看到的一樣，她把必然的階級性質加在因而產生的社會當事人身上的作法，就給同等的這種擴充的邏輯加上一個僵化的限制。只有在人民陣線時期的列舉作法中，「人民」——十九世紀的政治和社會鬥爭重要的當事人——才首先膽怯地在馬克思主義的言說活動中再跑出來。

從我們已經說過的東西那裡可以看得出來，在共產黨的言說中「人民」作為政治的當事人出現的這一情況，過去是具有使階級的一致分裂，從而構成新型的兩極分化的那種同等的關係。那麼這種過程完全是在文化霸權的實踐領域內部產生的。共產黨的列舉不是肯定事實的情況，而是具有一種執行的性質。各部門總和的這種統一體不是一堆資料：它是要在政治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構想。因此，把這種總和以文化霸權的方式整合起來的作法，不包含一種單純的場合或者環節上的協議；它必須建立一種結構上的、跟階級關係不同的新關係。這證明要描繪文化霸權的關係「階級聯盟」的概念是不恰當的，正如同單純地把磚塊列入記錄就是說明了一棟建築物是不恰當一樣。雖然如此，可是如果有本身的內在邏輯存在，同等的關係只通過把它的術語作附帶地替換的方式，也還是不能顯示它的存在；它必然產生一個關係本身以象徵的方式來具體化的一般的同等物。正是在我們正在考察的政治情況這個地方，民族陣線或者人民民主的象徵才浮現出來，構成跟那些階級的立場不同的主體的立場；那麼文化霸權的關係就明確地失去了它事實上的和插曲性的性質，反之變成每種政治言說形態的一個

穩定的部份。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關於矛盾的分析——儘管它們在政治上的價值幾近等於零——確實才有把社會鬥爭的領域說成爲遍佈矛盾（不是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回溯跟階級的原則扯在一起的）的這一巨大的價值。

其他面對共產黨言說的系列問題，跟如何維繫執行文化霸權的部門的這一階級一致的問題有關。以最一般性的方式提出來，這個問題是這樣：如果在這種新的概念中，文化霸權的關係改變了執行文化霸權的部門的這種一致，而且如果在帝國主義時代中社會鬥爭的這一情況，使得這些事情在受到重新組合的實踐所宰制的一種越來越複雜領域裡產生出來，那麼接下來不是執行文化霸權的主體的這一階級的一致就產生問題了嗎？一直到什麼地方我們才能夠繼續談到作爲各式各樣主體立場的這一接合原則的一種階級核心呢？在這裡可能有兩種答案——或者說得明確一點，兩種取得一個答案的方式。而且歸根到底它們是取決於兩種我們早先說明的關於文化霸權的概念，即民主的和威權的文化霸權概念。就它們其中的使大部份的共產主義傳統具有特點的一種來說，答案可以在關於展現模式的這種令人作嘔的引申裡找到。每一種情況都是另外一種情況的展現，一直到取得認定把意義賦予了整個系列的那個最後的階級核心爲止。這種答案明顯地否認所有政治關係難以理解和不透明的性質，這些政治關係是一種簡單明瞭的、被建構的角色超越他們自己——階級——來從事他們的鬥爭的階段。還有，以這種方式展現出來的階級只能是「自爲」階級，即體現在黨的「科學」世界觀上面的那一決定性的思考角度；這就是說，在本體論上的有特權的當事人。這樣，一切關於展現的實踐的具體問題都完全被剷除了。其他的答案接受把社會當事人埋在裡頭的這些關係

結構上的多種多樣性質，用**接合**的原則來取代**展現**的原則。這些當事人之間的統一性在這時不是共同的基本本質的表現，而是政治建構和鬥爭的結果。如果作為執行文化霸權的當事人的工人階級設法以自己為中心把若干民主的要求和鬥爭接合起來，那麼這不是由於任何先驗的結構上的特權，而是由於階級這部份的一種政治上的首創精神。因此，執行文化霸權的主體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是階級的主體，即在階級立場的基礎上，若干文化霸權的形態**實際上**是接合起來的；可是在那種情況中，我們是在研究具體的工人，而不是在研究由它們的「歷史利益」建構起來的那種圓滿實現。在第三國際的世界中，只有一位思想家，在這位思想家身上，把政治和文化霸權看成是接合的這一觀念——連同所有它的含糊性和限制——得到一種理論上成熟的表現。自然我們講的是葛蘭西。

### 第三節 葛蘭西的分界線

葛蘭西思想的特殊性通常是以兩種不同的、顯然矛盾的方式被提出來。在一種說明中，葛蘭西是一位傑出的義大利理論家，他的概念創新是跟義大利落後的特殊情況有關：想要把統一的民族國家建立起來的民族復興運動的構想沒有實現；工業的北方和農業的南方地區之間長久來的地域分裂；因為梵蒂岡的問題，沒有把天主教的群眾整合到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裡；資本主義的不足和矛盾的發展；等等。一言蔽之，葛蘭西是一位原創性的關於「不平衡發展的」理論家和政治謀略家，但是他的概念却跟先進的資本主義的情況很少有關係。第二種說明、分歧的解讀法則把他說成是西方革命的理論家<sup>⑩</sup>，他的戰略

概念是根據先進的工業文明的複雜性質，和它們的社會與政治關係的不透明性質。解釋他的人當中有一位走到這麼遠，以致於把他看成是關於緊跟著一九二九年世界危機而來的那種資本主義重建，和關於由群眾鬥爭在政治和經濟逐漸交織在一起的這一環境內部取得的那種複雜性的理論家<sup>①</sup>。其實，葛蘭西的理論創新是在於一個比較一般的層次上，因此這兩者的解讀都是可能的——同時也是部份妥當的。在提供明顯地超越列寧主義關於「階級聯盟」這一範疇的關於文化霸權聯繫的理論說明時，葛蘭西比任何其他他那時代的理論家都還要更加擴大政治重建和文化霸權的領域。在先進的工業國家和資本主義邊陲國家兩者當中，當政治鬥爭的條件越來越遠離正統派的階段論所想像的那種時，葛蘭西的範疇同樣適用於這兩種情況中。因此應該把它們的關聯性放在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的層次上面，而不能把它們跟特殊的地理環境扯在一起。

不過出發點是一種嚴格的列寧主義的研究取向。在一九二六年的、第一篇葛蘭西使用文化霸權概念的文章〈南方問題札記〉(Notes on the Southern Question)裡，他說：「在無產階級成功地創造一種能夠讓它把絕大多數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人口動員起來的聯盟體系這個範圍內，無產階級能夠變成爲領導的和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在義大利，在那裡有的現實的階級關係裡頭，這意味著達到了它成功地取得了廣泛的農民群眾同意的地步。」<sup>②</sup>這種領導角色的先決條件在於，工人階級不應該還仍然被限制在狹隘地捍衛它的團體利益這上面，而是應該開始做其他部門的那些利益的保護者。可是這種邏輯還只是關於先行建構起來的那些部門利益的邏輯，它完全跟階級聯盟的觀點是一致的。就像在列寧那裡一樣，領導只是政治的領導而不是「道德

的和知識的」領導。

正是在這種從「政治」層面到「知識的和道德的」層面的運動中，才產生走向超越「階級聯盟」的一種文化霸權概念的決定性過渡。因為跟政治的領導只能夠站在利益在場合上的符合（在這裡頭，參與的各部門還保有它們各自的一致）這種基礎上相反，道德的和知識的領導需要一些部門共有的一整套「思想」和「價值」思想——或者用我們自己的術語來說，需要若干橫跨一些階級部門的主體的立場。知識的和道德的領導按照葛蘭西的說法來說，構成了一種比較高的綜合、一種「集體意志」，它通過意識形態，就變成了結合一個「歷史性集團」的有機黏合劑。所有這一切，就列寧主義的思考角度來說，都是具有取代效果的新概念：關於文化霸權那種有聯繫的特殊性不再被隱藏起來，而是相反的，變成爲完全可見的和可以從理論加以說明的。用概念的方式來說明一些團體當中新的一連串關係的這種分析，把在經濟主義的革命和相關聯架構內部的那些團體結構上的位置遮蔽住。同時，意識形態是被說成爲把這些關係建構起來的明確領域。

因此，每一件東西都取決於如何思考意識形態<sup>⑩</sup>。在這裡，就古典的問題設定來說，葛蘭西帶來兩種新的和基本的替換。第一種是他關於意識形態物質性的概念。意識形態不是被拿來跟「思想的體系」或者跟社會當事人的「錯誤意識」等同起來；反過來，它是一種有機的和有關聯的整體，它體現在把圍繞著一些基本接合原則的歷史性集團結合起來的那些制度設施和機器裡。這排除了以「上層建築的」方式來解讀意識形態的可能性。其實，通過把歷史性集團和意識形態看成是有機的黏合劑這一概念，新的整體化的範疇帶我們走出老舊的基礎/上層建築的區分。但這是不夠的，因爲還是能夠把道德的和知識的

領導理解為通過執行文化霸權的階級來對整個附屬的部門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在那種情況中，就不會有橫跨過階級的主體立場，因為任何看起來這樣橫跨過階級的主體立場，其實還是占主導地位的階級配置的裝置，而且它們在其他部門的存在只能被理解成是錯誤意識的現象。正是在這種關鍵性的地方，葛蘭西把他第三種和最重要的替換引進來：即跟還原論的意識形態問題設定決裂。對於葛蘭西來說，政治的主體——嚴格說來——不是階級，而是複雜的「集體意志」；同樣的，通過執行文化霸權的階級來接合的意識形態的組成成份，並不具有一個必然的階級屬性。關於第一點，葛蘭西的立場可看得出來：集體的意志是對分散的和分裂的歷史力量進行政治—意識形態接合的成果。

「從這點我們可以推斷出『文化層面』的重要性，即使在實際（集體）的活動裡頭。一種歷史性的行動只能夠通過『集體的人』來執行，而這是以取得藉以把具有異質的目的的多種多樣的意志，站在平等的和共同的世界觀的基礎上，用一種單純的目標結合起來的那種『文化—社會的』統一體為其前提的。」<sup>①</sup>沒有任何一種東西比起列寧主義的階級聯盟的觀念離開這種「集體的人」、「用一種單純的目標結合起來」還更遠。關於第二點，同樣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對於葛蘭西來說，這種有機的意識形態並沒有體現一種純粹的階級的和封閉的世界觀；反過來，它是通過把組成成份接合起來構成的，這些組成成份就本身來考察，並不具有任何必然的階級屬性。在這點上，讓我們考察一下下列重要的段落：「重要的是這一種意識形態複合體遭受到新歷史階段的第一種展現所進行的批判。這種批判使得分化過程和舊的意識形態通常具有的相關比重的變化有其可能。以前是次要的和附屬的，或者甚至於是偶然的東西，現在被當作是主要的——變成是新的意識形態的

和理論複合體的核心。舊的集體意志將瓦解成爲它矛盾的組成成份，因爲附屬的集體意志在社會中發展起來了。」<sup>15</sup>「但是在另一方面，應該如何形成被提出來作爲獨立的意識的這種理論意識呢？每一個人要組成這種獨立的意識，應該如何選擇和結合這種組成成份呢？是不是被硬塞在身上的每一種組成成份都必須先行放棄呢？是必須要放棄這種組成成份，因爲它是被硬塞在身上的，不過不是它本身；這就是說，有必要賦予這一既有的團體特有的一種新的形式。」<sup>16</sup>

因此，我們能夠看看把葛蘭西從那個時期的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提出來的其他反經濟主義立場區別開來的那個重點。例如，盧卡奇（Georg Lukács）和科西（Karl Korsch）兩人也重新調配古典時期劃歸屬於上層建築的那個領域；不過他們是在把革命主體跟工人階級等同起來的階級還原論的思考角度這些變數內部來做這件工作，這樣在接合的意義上，文化霸權嚴格說來就是不能想像的。確實是葛蘭西把後面的這種概念引進來，才完全徹底改變了第二國際二元論出現的形勢，以及它在第三國際的言說中擴大再提出來的形勢。一方面，歷史偶然性的領域比在任何以前的言說中都還透徹地深入到社會關係裡：社會的各個部份已經失去那些把它們轉變成爲屬於階段論典範的各個環節的基本聯繫；而且它們自己的**意義**，也取決於成功不是通過任何歷史規律來保證的那個文化霸權的接合。按照我們早先的分析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不同的「組成成份」或者「任務」除了它們跟把它們用文化霸權方式統合起來的力量這之間的一致外，不再有任何的一致。在另一方面，這些不穩定的接合形式開始得到名份，可以在理論上思考，同時也被整合到社會當事人的那種一致裡。這說明了葛蘭西賦予「民族—人民」和賦予諸如「完全的國家」這種概念提法的

重要性，因為占主導地位的部門通過文化霸權的實踐，把它的那個性質和一致改變過了。對於葛蘭西來說，一個階級並沒有接管國家政權，而是它變成了國家。

適合我們稱之為文化霸權民主實踐的所有形勢，看起來在這裡出現了。雖然如此，這整個建構還是取決於一個歸根到底前後不一貫的、完全不能夠克服古典馬克思主義二元論的概念。對於葛蘭西來說，即使不同的社會組成成份還是有完全相關的認同一致——通過接合的實踐取得的——因此，在每一種文化霸權的形態裡必須總是有一套單獨的統一原則，而且這只能是一個基本的階級。因而兩種關於社會體系的原則——統一原則的獨特所在和它必然的階級性質——不是文化霸權鬥爭偶然的結果，而是產生每一種鬥爭的必然的結構性架構。階級的文化霸權不是鬥爭全部的實際結果，但具有最後的本體論上的基礎。經濟基礎並不會保證工人階級最後的勝利，因為這取決於它進行文化霸權領導的能力。可是，工人階級在文化霸權方面的失敗，接下來只會是資產階級重建文化霸權，因此歸根到底政治鬥爭還是階級當中的零和競賽。這是一直出現在葛蘭西思想裡頭的內在的本質主義核心，它給文化霸權的解構邏輯一個限制。不過主張文化霸權必須總是跟基本的經濟階級對映，並不僅僅是重新肯定經濟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也是斷定，在經濟構成社會進行文化霸權重整能力的一種不可逾越的限制這一範圍內，經濟空間的建構邏輯本身就**不是**文化霸權的邏輯。在這裡，把經濟看成是由必然的規律統一起來同質空間的這種自然主義偏見，再度拼命展露頭臉。

這種基本的含混性，在葛蘭西關於「陣地戰」的概念裡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我們已經注意到軍事性的比喻在古典馬克思主義言說中的



作用，同時可以不誇張地說，從考茨基到列寧為止，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概念都是依賴一種有很大部份要歸因於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那種設想<sup>17</sup>。主要的結果是產生可以稱之為**分離**的作用——因為如果我們瞭解到跟其他社會力量的關係是一種軍事的關係的話，那麼我們就總是能維繫我們自己各別的一致。從考茨基的「持久戰」（war of attrition）到布爾什維克化的大型運動和「階級對抗階級」的極端黷武思想為止，建立嚴格的分界線就被認為是政治的真正條件——「政治」完全被想成是**階級**鬥爭的一個領域。相反的，對於葛蘭西來說，「陣地戰」包括漸漸地瓦解文化，和建立另外圍繞著新的階級核心的文化。因此，敵人的身份絕不是從一開始就固定住的，而是經常在過程中改變的。可以看得出來，這跟以嚴格的意思來說的「陣地戰」毫無關係，在嚴格的意思的「陣地戰」那裡，敵對的力量不是常常不斷地轉到自己這方來的。其實，這種軍事的比喻在這裡是以相反的方向來譬喻的：如果在列寧主義那裡，有一種把政治的軍事化作法，那麼在葛蘭西那裡就有一種把戰爭非軍事化的作法<sup>18</sup>。雖然如此，這種向非軍事的政治概念所做的過渡在這個地方確實還是有一種限制：即認為新的文化霸權的**階級**核心——而且自然也是舊的文化霸權的階級核心——在整個過程中還是經常繼續存在的。在這種意義下，在對抗中**就**有一種關聯性的成份，而且在鬥爭中關於兩軍的這種譬喻，還是繼續保有它一部份的效用。

因此，葛蘭西的思想看起來就圍繞著關於工人階級身份（它最後使工人階級產生一種矛盾的立場）的那種基本的含糊性打轉。在一方面，工人階級政治上的中心地位有一種歷史的、偶然的性質：這種性質需要這個階級從它自己那裡走出來，通過把自己跟多元性的鬥爭和

民主的需求接合起來的方式，來改變它自己的一致。在另一方面，這種接合的角色看起來是由經濟基礎賦予的——因此，這種中心地位看起來就有一種必然的性質。我們免不了會有這種感覺，即從拉布里奧拉風格的那種形態學上的和本質主義的概念到激進的歷史概念的那種過渡<sup>①</sup>，還沒有前後一貫地完成。

總之，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葛蘭西的思想和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中的各式各樣的古典流派，那麼葛蘭西文化霸權概念的那種非常稀奇古怪的性質就非常明顯可見。在大戰後，考茨基<sup>②</sup>提出利用布爾什維克的經驗作反面教材的一種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主概念，來說明——以他的觀點——如果在像俄國的那種落後條件中打算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就不可避免會產生專政作風的原因。可是他提出來的另外一種選擇是要等待，一直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神秘規律把社會的對抗簡單化為止：這時「群眾」和「階級」之間的混亂消失的這一形勢就存在了，連帶的領導人和被領導者之間任何可能的分裂也消失了。相反的，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把社會的複雜性作為政治鬥爭的真正情況接受下來，而且——通過它，在三方面把列寧主義的「階級聯盟」理論替換過來——為跟多種多樣的歷史主體相容的那種政治的民主實踐奠定了基礎<sup>③</sup>。

至於伯恩斯坦，葛蘭西跟他一樣肯定政治的第一性，也接受無法歸結為階級屬性的那些鬥爭和民主需求的多種多樣性質。可是葛蘭西不像伯恩斯坦，對伯恩斯坦來說，這些各自的鬥爭和需求只在劃時代的層次上，通過一般發展規律的介入，才統一起來。葛蘭西沒有給進化的原則留下餘地。鬥爭是從進行鬥爭的文化霸權的接合取得其意義的，而且它們的發展性質——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也不是預

先取得保證的。因此，歷史不被認為是民主改革的一種漸占優勢的光譜，而被認為是文化霸權的形成或者歷史性集團的一種不連續的系列。按照我們前面取得的這種劃分的角度來看，葛蘭西或許跟伯恩斯坦一樣，有伯恩斯坦的那種「修正主義」，但確實不是他的那種「漸進主義」。

關於索列爾，情況是比較複雜一點。無疑的，在索列爾的「集團」和「神話」概念裡，索列爾比葛蘭西更加徹底地跟關於歷史的基本形態學這種本質主義的觀點決裂。在這方面，葛蘭西關於歷史性集團的概念表現出落後一步。可是同時，葛蘭西的思考角度標誌著比索列爾明顯地前進一步，因為他作為接合的那種文化霸權的理論需要民主多元化的思想，而索列爾的神話完全注定要再產生這個階級的統一體。關於這種神話的連串看法，是努力想保障社會內部徹底的分界線，而且從來不是想要通過文化霸權重新整合的過程來建構新的完全的国家。關於「陣地戰」的思想，過去倒是完全跟索列爾的思考角度不相容的。

#### 第四節 社會民主黨：從停滯到「計劃觀念」

走向文化霸權政治的這種轉向打算要填補的這一政治的和理論的空白，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民主黨的實踐中也能夠看到。在它們的情況中，這個運動嚴格的階級任務和新的政治任務之間的混亂，呈現一種具有特點的形式：即這兩者之間存有一種矛盾，一方面是工人運動提出有範圍限制的連串需求和提議，另一方面是因為戰後危機而被扔進權力漩渦中的社會民主黨，面臨著多種多樣的和複雜的政治問題。這種關於「不平衡和聯合」發展的新的和特殊的形式，只能

夠在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生產力連續往前發展（有個但書規定：只有在「客觀條件」成熟時，才能夠取得政權）上的社會力量中產生麻痹的政治效果。社會民主黨的這種狹義的階級精神狀態，在這裡會產生所有它負面的結果出來。這在社會民主黨想把從戰後危機產生出來的廣泛的民主需求和對抗以文化霸權的辦法整合起來的有限能力中，是明顯可見的。「從世紀交替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在革命黨庇護下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因此是工會主義單純的議會工具。它真正的活動被限制在工會問題上面，即它對於工資和工時問題、社會保險、關稅問題，以及至多是普選權的改革的建設性行動。對於軍國主義的鬥爭和防止戰亂（但事實上是重要的），對黨的重要工作來說是『附帶的。』」

⑫ 這種精神狀態勢必支配著在戰後和經濟大蕭條之間的整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例如在德國，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來，大部份由社會主義的人民委員會通過的大部份法令規章，幾乎都只是談到工會的需求和普選制度的改革；沒有要勇敢面對基本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的任何打算。這種狹隘的階級精神狀態也反映在那些社會民主黨主政的社會完全缺乏關於徹底民主化的政策上面。這種階級的精神狀態——無關乎改良的或革命的——關閉了走向把一個新的人民的文化霸權集團內部多種多樣的民主需求和對抗接合起來的集體意志建構起來的道路。不管任何什麼樣的改革，都沒有讓軍隊或官僚體系接受。至於外交政策，社會民主黨政府——尤其是參加內閣的、受其他政治力量支配的社會黨部長——把他們自己限制在追隨占主導地位的潮流，沒有提出任何政治的選擇途徑。

在嚴格的經濟領域內，社會民主黨戰後占主導地位的政策是國有化政策（被稱之為「社會化」）。鮑威爾在《社會主義之路》（*Der Weg*

zum Sozialismus) ②提出跟企業的民主管理結合起來一種漸進的、系列的國有化作法。國有化的計劃出現在一些其他的國家裡，而且在像德國、英國和瑞士的若干國家裡，是成立委員會來研究社會化的計劃。可是這項活動沒有任何成果可言。「雖然社會民主黨人在好些國家組成政府或加入政府中，但是社會化首次企圖的全部成果等於零：除一九三六年法國軍事工業之外，整個兩次大戰期間西歐沒有一個公司由社會民主黨的政府進行國有化。」④在社會化的可恥落敗之後，社會民主黨一直到經濟大蕭條為止，都沒有任何其他絲毫的經濟計劃。

這次落敗有種種的原因，不過能夠把它們全部歸結為兩項因素。首先，沒有執行文化霸權的計劃：在放棄任何要把廣大的民主鬥爭陣線接合起來的打算，反過來完全志在代表工人的利益後，社會民主黨發現自己無力改變國家機器的社會和政治的邏輯。在這方面，明顯地出現一種選擇：不是要參與資產階級的內閣，以便取得有利於工人階級部門最大多數的社會法案，就是要變成反對派，從而使自己加倍無能。成為社會民主黨典型的那種屬於工會利益的壓力團體性質，幾乎總是硬往第一種選擇施壓力。

可是在任何結構上的變化方面讓社會民主黨癱瘓的，還有第二種原因：而且這是第二國際經濟主義觀點的延續，這種觀點是認為，經濟建構了由必然性的規律支配的同質空間，不受有自覺的規劃影響。史特姆塔爾(A. Sturmthal)以非常敏銳的洞察力評論如下：「奇怪得很，還在米勒(Herman Müller)和其他右派的領導人身上活躍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傳統，頑強地支持**自由放任**。是馬克思主義信條一部份的『資本主義是不能改良的』的這種信念，在社會黨活動初期設定要把社會黨跟所有一切大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隔開來。資本主義被

認定是要服從它自己的規律的；只有社會主義的革命……才可以排除舊制度的這一罪惡的社會後果。這種理論顯而易見的含意在於相信革命方法而不是相信民主方法，不過甚至於在社會主義運動接受民主的時候，它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它原先理論中的這種基本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政府必須按照這種看法在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架構內部來管理。……因此，米勒得到在其他方面深深地不信任他的這些激進份子的支持。」<sup>25</sup>

正是經濟的大蕭條才迫使這種思考角度改變，同時賦予重新說明社會民主黨政治的這種作法一種新的基礎。一九三〇年代的「計劃觀念」是這種新的態度的首次表現。在提出新福利國家的經濟選擇時，凱因斯主義 (Keynesianism) 提供的方法可以賦予工人的利益一個普遍的地位，因為高工資的政策通過擴大全體需求的辦法，對於經濟的成長變成爲一種刺激<sup>26</sup>。

可是計劃觀念在它如日中天的時候——在它於其主要支持者德曼 (Henri de Man) 的著作中被提出來的時候<sup>27</sup>——還遠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規劃：它是一種想按照完全新的、反經濟主義的觀點，把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重新改造過的企圖。所有我們看到在危機中出現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和還原論觀點的組成成份，都出現在德曼那裡：如根據經濟「利益」的基礎，對這種主體性的理性主義概念進行批判——他是嚴謹地研究精神分析的首批社會主義者之一；對階級還原論的批判；比工人階級的範圍還要廣泛的群眾集團的必要性；需要把社會主義提出來作爲一項**國家**的選擇，作爲站在新的基礎上對國家進行的有機的重建；需要——以索列爾的意義來看的——可以把集體的社會主義意志分歧的組成成份結合起來的一種神話。因此，這種「計

劃」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主義的工具；它是重建一個有可能對抗資產階級社會的沒落和抵制法西斯主義成長的歷史性集團的那個真正的主軸。（德曼個人在一九三八年以後所採取的親法西斯主義的立場，和德亞特Marcel Déat的社會黨人在法國的類似演變，不應該讓我們忘掉，計劃觀念在大戰和經濟大蕭條後的這種業已改變的社會氣候中，作為真正想重新為社會主義取得政治主動性的一項努力這種意義。它的許多論點變成爲一九四五年後社會民主黨的共同遺產——尤其是它的經濟—技術層面；而它比較激進的和更新的政治看法，基本上有被丟在一旁的傾向。）

在這方面，回想一下時時被提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使人傷心的關於社會民主黨政治局限的那種含糊性<sup>④</sup>，是有教益的。左派支持計劃觀念的人，他們的構想是要建立一種混合的經濟，在這種經濟裡，資本主義的部門會逐漸地消失；因此，它實際上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條道路。可是對於比較科技官僚的變種來說，這種觀點只是想確立一個可以更正——尤其是通過信用的控制——資本主義過程中固有的不平衡的那種國家干預的範圍。關於這種選擇的項目非常清楚地說明，左派的和右派的選擇兩者都跟**經濟政策**有關係；在另一方面，激進的民主化和建立新的集體意志的構想，不是沒有地位就是占著一個無足輕重的地位。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正是社會民主運動的這一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才阻擋了任何想進行文化霸權接合的企圖。在一九四五年以後——隨著福利國家的創立——這種階級觀念就相當鬆動了，自然不是在加深民主過程方面，而且完全是因爲不同部門的利益不再按照明確劃分的階級路線來界定的這種凱因斯主義式的國家擴張。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民主黨在一定的國家形式**內部**變成了一種政

治一經濟選擇，而且沒有有別於那種形式的一種激進的選擇。（在這裡，我們明顯地不是提到「革命的」選擇，包括以暴力方式推翻現有的國家，而是提到在國家和市民社會內部，就占主導地位的文化霸權形式的背景，容許進行「陣地戰」的那種關於種種對抗的深化和接合。）因為沒有一種執行文化霸權的選擇，所以社會民主黨把自己的範圍縮小到把一方面跟工會有的不受法規節制的實際關係，另一方面多多少少是左派的科技官僚政策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無論如何都使每件事情要取決於在國家層次上完成的解決方案。這是這樣的一種荒謬觀念的根源，按照這種觀念來看，一個綱領「左的」程度是要由一些它提議要國有化的公司來評估的。

## 第五節 本質主義最後的據點：經濟

我們早先的分析可以從兩種不同的思考角度來考察，這兩種不同的思考角度嚴格說來都是互相補充的。從第一種觀點來看，我們呈現出來的景象是關於會使正統派的典範瓦解的一種分裂和破裂的過程。不過這種典範所占有的空間還不是空的：從第二種觀點來看，我們能夠把相同的過程看成是文化霸權新的接合和重建邏輯的出現與擴充。可是我們認為，這種擴充碰到一個限制。不管是把工人階級看成是階級聯盟中的政治領導人（列寧），或者是把工人階級看成是一個歷史性集團的接合核心（葛蘭西）都行，工人階級的基本一致還是在跟文化霸權的實踐產生作用的領域不同的一個領域被建構起來的。因此，有一道沒有任何一個戰略的一文化霸權的概念設法跨過的門檻。如果經濟主義典範的妥當性是在某種場合中被維繫著——雖然是決定性的，



不過是最後，因為它是歷史的理性基礎——那麼它是按照一種必然性，這樣就能夠把文化霸權的接合只想成是單純的偶然。這一最後的、給所有的歷史過程一種有傾向的意識的理性基礎，在關於社會的地形中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即它是身在經濟的層次上。

可是這種經濟層次要起建構文化霸權實踐主體的這種作用，是必須滿足三種非常精確的條件。**第一**，它的運動規律必須嚴格說來是內在生成的，排除所有從政治的或者其他外在的介入那裡產生的不確定性——否則，這種建構的作用將不會只專門涉及到經濟。**其次**，在經濟層次上建構起來的這些社會當事人的統一體和同質性，一定得從這一層次的那些運動規律裡產生出來（任何立場的分裂和分散，需要屬於處在被排除的經濟外部的那種重建的場合）。**第三**，這些當事人在生產關係裡的立場，必定賦予他們「歷史的利益」，所以這些當事人在其他社會層次中的存在——通過「展現」的機制或者「接合」的機制——最後必定是根據經濟利益來說明的。因此，後者不是被限制在一定的社會領域裡，它是關於社會的全部思考角度之所繫。

即使是那些千辛萬苦努力要克服經濟主義和還原論的馬克思主義流派，也堅持我們剛剛才說過的那種關於建構經濟空間的本質主義概念。因此，馬克思主義內部經濟主義的流派和反經濟主義的流派之間的辯論，必然也要被降低為份量次要的問題，這種份量本來應該是在歷史過程的決定因素中附屬於上層建築的。可是對於概念有極端「上層建築看法的人」，都還是保有自然主義的經濟觀點——即使在這種觀點打算限制經濟作用的領域時。在這章餘下的部份，我們要詳細研究一下正統派本質主義的這一最後據點。在提到若干當代的辯論時，我們打算證明經濟的空間本身是被建構成爲一個政治空間的，而且在這

種空間裡，像在任何其他的社會「層次」一樣，我們描繪成爲文化霸權的那些實踐，是充份地產生作用的。可是在我們進行這項工作前，有必要區分兩種非常不同的、經常在批判經濟時被搞混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涉及到經濟空間的本質和組成；第二個問題（**不管如何它都跟第一種問題無關**）有關於經濟空間在其本身外部的社會過程這一決定因素中相對的份量。第一種問題是關鍵性的問題，它構成與本質主義的典範徹底決裂的基礎。第二種問題因爲我們打算在本書中澄清的一些理由，所以不能在一般的關於社會的理論說明層次上加以確定。（斷言**在一定場合中，在所有社會層面上發生的事情都是完全受到在經濟層次上發生的事情制約的，在邏輯上——嚴格地說——跟對於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所做的反經濟主義的答覆並不是矛盾的。**）

我們的三個關於由經濟層面來最後構成文化霸權主體的條件，是跟三個基本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論點對映的：即關於經濟運動規律內生性質的條件，跟生產力中立性質的這種論點是對映的；經濟層次上的社會當事人的統一性條件，跟工人階級逐漸同質化和貧困化這種論點是對映的；以及生產關係應該是超越經濟範圍的「歷史利益」的**所在的**這一條件，跟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裡有基本的利益這種論點是對映的。我們現在打算證明這三個論點是不對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設使「生產力過去的發展使社會主義有其可能，而且它們未來的發展也使社會主義成爲必要」<sup>29</sup>，那麼生產力的發展在歷史走向社會主義的演進中就起著主要的作用。它們是歷史的任務就是要占有和集體管理高度社會化與先進的生產力、人數愈來愈多和被剝削的無產階級這一形態的來源。目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成爲這些生產力發展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因此，資產階級和無

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基本的經濟矛盾的社會與政治表現，這種基本的經濟矛盾是把生產力發展的一般規律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發展規律結合起來的。按照這種看法，如果說歷史具有一種意識和理性的基礎，那麼這是由於生產力發展的這一般的規律。因而，我們可以把經濟理解成爲在不以人的行動爲轉移的客觀現象上產生作用的一種社會機制。

那麼爲了可以讓生產力發展的這種一般的規律充份具有妥當性，就必須使在生產力裡頭介入的一切組成成份都服從生產力的制約。要保證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就必須依賴一種幻想：把勞動力想成是一種商品。波勒斯（Samuel Bowles）和金第斯（Herbert Gintis）已經證明，這種幻想如何使馬克思主義看不見作爲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一種組成成份的那整個系列的勞動力的特點。勞動力跟其他生產必要的組成成份不同，因爲資本家必須做遠比單純地購買勞動力還要多的事情；他也必須使勞動力能夠生產勞動。可是這一重要的方面沒有被納入到把勞動力看成是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是勞動）的概念裡。因爲如果說勞動力只是一種像其他東西一樣的商品，那它的使用價值顯然從購買它的那時候起就能夠讓它自動產生作用。「把勞動說成是勞動力對資方來說的使用價值，就模糊了**體現在能夠進行社會實踐的人身上的生產力輸入**，跟所有那些餘下的輸入（對它們來說，資方的占有本身就足以保證它們的生產勞務被『消費』掉）之間的這種非常根本的區別。」  
⑩大部份的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都只能夠被理解爲從被資本家購買的勞動力那裡抽取勞動的這種必然性的產物。如果沒有理解資本家要在勞動過程的那個核心中行使他的宰制，那麼就無法瞭解生產力的演變。自然這會令人懷疑到把生產力的發展看成是自然的、自發地進展

的現象的這整套看法。因此，我們能夠這樣來看：經濟主義的這兩種組成成份——把勞動力看成是商品，和把生產力的發展看成是中立的過程——是互相補充的。關於勞動過程的研究長久來都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受到輕視，這一點都不奇怪。

正是布雷夫曼（Harry B. Braverman）的《勞動和壟斷資本》（*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sup>③</sup>的出版，最後才開啓了這場辯論。它捍衛這樣的論點，即資本主義底下的科技指導原則是把概念跟執行分隔開來的，這產生甚至於更加退化的和「喪失技術」的勞動。泰勒主義在這場資本家宰制工人和控制勞動過程的鬥爭中是關鍵環節。布雷夫曼主張，正是資本積累的規律，才支持資方的需求，來從直接的生產者那裡勉強取得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可是他沒有提出真正的說明，來解釋為什麼這是通過無止境地破壞工人的技術，把他們降低為單純的執行者的這一努力來表現的。尤其，他把這種宰制的邏輯說成是一種萬能的力量——顯然無拘無束地產生作用——好像資方可用的經濟力量是不允許工人階級來抵制和影響發展的過程似的。在這裡，舊的關於把勞動力看成是商品、完全受制於資本的邏輯的那種觀念，繼續產生著它的作用。

跟布雷夫曼的論證相反，關於把勞動力看成是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是勞動）的這一觀念的批判，能夠讓我們理解資方控制勞動過程的這種需求。事實是這樣：一旦勞動力被購買下來，就必須從勞動力那裡抽取最大可能限度的勞動。因此，勞動過程沒有一系列的宰制關係是不能夠存在的。因此也一樣，大概在壟斷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勞動的資本主義組織就必須既是一門關於生產的技術，也必須是一門關於宰制的技術。這方面在許多的作品中都強調過，像是馬吉林（Stephen

Marglin) 和史東 (Katherine Stone) 的作品<sup>⑫</sup>。他們主張，勞動的分散和專業化，不管怎樣都跟被認定的效用這種需要無關，反而是跟資方需要對勞動過程行使它的宰制這種影響有關。因為工人是有能力進行社會實踐，所以他能夠抵制強硬加上去的控制機制，迫使資本家利用不同的技術。因此，沒有決定勞動過程的演進這種資本的純粹邏輯；勞動過程不完全是資方行使它宰制的地方，而是鬥爭的基地。

許多最近在西歐和美國從事的研究，已經從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力量對比以及工人的抵制這種觀點來分析勞動過程的演進。這些揭示了「生產的政治學」的存在，而且向這樣的觀念提出挑戰，即資本主義的發展唯獨是競爭規律和積累的要求所產生出來的結果。愛德華 (Richard Edwards) 在《競奪的場域》(Contested Terrain)<sup>⑬</sup>裡，區分三種主要的控制方式：以警戒為基礎的單純控制；跟如在裝配線上看得到的那種一樣的、讓工人服從於機械的律動對映的這種技術的控制；以及最後，官僚體制的控制——本身是通過統治階級的權力這種制度化設施顯現出來的——就官僚體制的控制來說，一如在以前的情況中一樣，控制不再是取決於勞動過程的實際結構，而是取決於它的社會結構。他強調，工人的抵制說明了資方需要以新的方式來實驗。同樣的，高德瑪 (Jean-Paul Gaudemar) 把法國情況中的四環科技的宰制孤立出來：「『顯示全貌』的一環；(在工廠內外)擴大懲戒的一環；建立在兩面的過程這種基礎上的一環，它包括在一個以機械化為模式的勞動過程內部接受紀律，這是我提議稱之為機械的紀律這種環節的一環；最後，是關於契約的紀律的一環，在這一環裡頭，接受紀律是以形式上的和真正的部份授權的方式來進行的。」<sup>⑭</sup>就宰制來說，義大利六〇年代的操控潮流證明，絕不把它的邏輯硬性加在工人階級頭上

的這種資方的發展，是如何地服從工人階級的鬥爭的。例如，特隆替 (Mario Tronti) ⑤指出，工人階級的鬥爭已經迫使資方修正它的內部組織和宰制方式——因為通過在工作日硬性加上一個限制的方法，他們已經迫使資本從絕對剩餘價值走向相對剩餘價值。這促使潘齊耶里 (Raniero Panzieri) 支持這樣的論點，即生產是一種「政治的機制」，有必要分析「科技和以在階級當中建立一種力量對比的這種方式出現的這一勞動組織」⑥。跟這些作品共通的思想是這樣，假定勞動過程變化的組織形式不能夠單獨按照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之間的差異來理解，那麼資本主義控制的特殊歷史形式就必須作為整個社會關係的一部份來加以研究。還有，比較歷史分析顯示不同的國家當中的重要差異。例如，英國工會的力量使得英國有可能遭遇到比其他地方還有大的抵制變遷的力量。

按照這些方式來理解的工人鬥爭，顯然不能夠通過資本主義內生的邏輯來說明，因為它們的那種動力是不能被劃歸到勞動力這一「商品」形式的項下。可是如果資本的邏輯和工人抵制的邏輯之間的這種分裂影響到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組織，那麼它也必然影響到生產力擴充的性質和律動。因此，生產力是中立的和能夠把它們的發展看成是自然的與直線發展的這種論點，就完全沒有根據了。這點也把能夠藉以把經濟理解為自主的和自我調整的世界的這種唯一的根據除掉了。因此，並沒有滿足在建構社會當事人當中賦予經濟範圍獨有的特權的第一種條件。

這種結論應該已經讓我們懷疑到同樣也不能夠滿足第二種條件，因為經濟幾乎不能建構通過經濟本身並不具有的那種單獨的邏輯來統一的主體。雖然如此，重要的是要探討那種多種多樣的分散的這種「工

人階級」主體的多種立場。首先，在馬克思那裡關於工人階級的那種概念，涵蓋著跟它們自己的運動規律有關的兩種獨特的關係：通過勞動力的售賣建立起來的工資關係——這把工人轉變成爲無產階級；和從工人在勞動過程的地位中產生出來的工資關係——這使他成爲一名體力勞動者。這種劃分，支持了布拉瓦伊 (Michael Burawoy) ①7 在關於生產的關係和在生產中的關係之間所做的這一意味深長的區分。如果對於馬克思來說，這種區分不是明顯可見的，那麼這不僅僅是因爲這兩組關係在他當下的歷史經驗中都有契合的傾向；而且也因爲（把勞動力看成是單純的商品）他有從在勞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關係那裡取消所有的自主性和關聯的傾向。不過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兩種關係都以不同的方式發展著，這使得把工人階級統一起來的一種普通的「工人階級」稱呼成爲問題：跟在先進的資本主義裡頭已經變成普遍化的工資形式相反，產業工人這一階級在數量上和重要性方面已經減少了。這種不對稱性是已經宰制最近關於工人階級範圍的辯論的這種含混性的根源。

一旦關於貧困化的這種理論作爲建構工人階級統一體的特殊機制已經證明是站不住腳了，就有兩種新的嘗試被提出來，它們爲這樣的統一體找尋一個經濟的基礎：一種是圍繞在「使之喪失技術」的這種現象上面 (布雷夫曼)，而另一種是努力要證明比較有限的、可以構成「真正」工人階級這種工人的核心 (普朗札斯 Nicos Poulantzas)。布雷夫曼從分析泰勒主義開始出發，這樣論證：因爲概念與執行之間的劃分產生出來的勞動者的地位降低，在無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級這種類別內部產生出了比以往更加廣泛的工人階層——不管他們有沒有被商品生產部門雇用 ①8。按照他的看法，馬克思所預見的無產階級化

因此是在實現的過程中，它的勞動條件不斷的低落下去會迫使工人階級把自己組織起來，在政治上從事反對這種體系的鬥爭。可是很少有從事北美工人階級的研究有布雷夫曼這種同質化的論點。相反的，一般的傾向都想堅持工人階級的分化和分裂。例如，愛德華·高登(David M. Gordon)和賴希(Michael Reich) ⑳的作品證明，在勞動的過程中跟種族主義和性別觀念結合起來的控制方式，如何創造一種體現在工人階級分化上面的勞動市場的分割㉑。在西歐相似的作品㉒，也使社會結構逐漸單純化的這種論點失效，而且它肯定當前一般的傾向是走向經濟這兩部門之間的兩極化：即高工資的和受到保護的一般部門，與沒有技術或者沒有安全保障的半熟練工人的一種周邊部門。如果說我們加上一個部門，即數目一直成長、結構上失業的人這一部門，那麼就變成很清楚，同質化的這種論點確實是保不住的。還有，使之喪失技術並沒有顯現布雷夫曼賦予它的那種一般的性質：雖然它在若干的部門逐漸增多，可是也還有產生新的技術的一種平行的過程。

更且，要產生一個兩重的勞動力市場，就必須使其跟不同的、對抗工人抵制的資本主義戰略聯繫起來，而且不能把它看成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單純的作用。例如，安德紐·弗利德曼(Andrew Friedman)就證明過，在英國的情況中，資本家如何按照不同團體的工人抵制他們當局的能力，來採用種種的戰略㉓。在一定的國家內部和在同一個公司的內部，必須在中心的工人和邊陲的工人之間做個區分，這些工人是屬於不同的勞動市場的，他們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反映他們不一樣的抵抗能力。婦女和移民一般都是處在不受保護的市場。可是安德紐·弗利德曼不把這種分割看成爲要分化工人階級的這一陰謀的成果，而是看成爲工會本身在裡頭起作用的這種力量對比的結果。在



工人階級內部的這些分化，因此是比許多希望去讓它分化的人有更深刻的根源；而且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工人自己實踐的成果。它們是政治的分化，而不完全是經濟的分化。

今天我們不可能談論到工人階級的同質性，也不可能不加置疑地把它追溯到存在於資本主義積累邏輯中的一種機制。爲了堅持這種觀念，即工人的一致是圍繞著從身在生產關係裡頭的一個階級推衍出來的這些共同利益，我們早先提到的第二種傾向因而打算利用更加有限制的定義，把**真正**工人階級的所在找出來。它完全接受分裂的現實，而且也把統一起來的一致歸屬於分裂出來的碎片的一部份。在這方面，考察一下把萊特（Erik Olin Wright）跟普朗札斯對立起來的這場辯論是有益處的<sup>⑬</sup>。按照普朗札斯的說法，生產性的勞動是指出工人階級的範圍的標準<sup>⑭</sup>，而且非生產性的僱傭勞動者也構成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被包括在這類裡的這些部門的異質性，對於普朗札斯來說不會產生特別的問題。因爲在他看來，階級不能只在經濟的層面加以界定，而且因爲舊的和新的小資產階級都占據了同樣的、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關的意識形態位置，所以他覺得把他們分類劃歸同一個階級的類別是非常正確的。這種研究角度已經被萊特批評了，萊特不僅不接受普朗札斯對於生產性勞動的定義，還不接受能把這樣的一種標準用來說明工人階級範圍的這種觀念。他的論證是這樣，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區分，無論如何都不意味著非生產性的工人有不同的階級利益，而且也不關心社會主義。他說，「對於兩種社會分工內部的立場來說，被按照經濟標準的基礎放在不同的階級上面，意味著它們有在經濟層面上的基本不同的階級利益。」<sup>⑮</sup>他提出來的解決方案是在「含混的」階級立場和「不含混的」階級立場之間做一種區

分。後者描繪出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特性<sup>15</sup>。跟這三種不含混的立場一塊，萊特把他稱之為「矛盾的階級所在」、處在兩種不含混的立場之間的這種半中央的東西區別出來。在經濟標準是矛盾的地方，意識形態的鬥爭和政治的鬥爭在界定階級的利益時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自然，這種像戴歐金尼斯 (Diogenes) 一樣尋找「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理由是政治性的：目標是要規定工人的那個範疇；工人的經濟利益把工人跟社會主義的思考角度直接聯繫起來，他們因此注定要領導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可是關於這些從有限制的工人階級定義出發的研究角度，它的問題是，它們還是以「客觀的利益」這種概念為基礎——它是一種沒有任何理論基礎的概念，而且包括同樣一種利益的、被分析者劃歸給某類的社會當事人的武斷屬性。按照古典的看法來看，階級的統一體是圍繞著利益來建構的，不過它不是一堆社會結構的論據；它是一個跟生產力的發展連繫在一起的貧困化和無產階級化造成的統一過程。布雷夫曼通過伏案工作做出來的同質化，屬於同樣的一種說明的層次。在這些客觀的利益是取決於科學的知識可以接觸到的一種理性的和必然的歷史運動這一限度來說，這些客觀的利益是歷史利益。不能夠做的事情就是放棄歷史末世學的概念，和保留在前者的範圍內才有意義的「客觀利益」的觀念。普朗札斯和萊特兩人看起來都是假定，工人階級的分裂是不同的社會當事人當中的立場的分裂。兩者都沒有重視古典馬克思主義知之甚詳的比較實質的現實：換句話說，就是在社會當事人本身內部存在的立場的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這些立場所缺乏的最後的理性的一致。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之間的緊張性——以及關於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化」的理論分析，或者伯恩斯

坦說的，通過民主的過程，工人不再是一名無產階級，而是變成了一名公民等等——意味著工人階級是受到多種軟弱無力地整合的、時常矛盾的主體立場宰制的。在這裡，另外的選擇是顯而易見的：不是一個人會有關於歷史的理論，按照這一理論，在無產階級千福國來臨的時候，這種矛盾的多元性會被剷除掉，而且絕對統一的工人階級本身會變得清楚可見——在這種情況中，它的「客觀的利益」是從一開始就被決定了：就是一個人會放棄這種理論，而且跟這種理論一起，也會在確定整個當事人的「客觀的利益」時，放棄任何不受規約限制的、某些凌駕其他立場上的主體立場這一基礎——在這種情況中，這後一種觀念變得沒有意義。以我們的看法來說，爲了在社會對抗的規定中前進，就有必要分析多種多樣的和時常矛盾的立場的多元性，拋棄完全統一起來和同質的當事人這一觀念，例如古典言說中的「工人階級」。搜尋「真正的」工人階級和它的範圍是一個錯誤的習題，本身也缺乏任何理論的或政治的關聯性。

顯而易見的，這不是意味著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而是意味著這種非常不同的說法，即社會主義的基本利益是不能夠在邏輯上從經濟過程一定的立場那裡推斷出來的。這種相對的觀點——即這種聯繫是在阻止資本家吸取經濟上的剩餘時由工人的利益提供的——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是正確的，即我們進一步地假定：(1)工人是一種經濟人，他打算把經濟的剩餘增加到正像資本家那樣的最大的限度；或者(2)他是自發地合作的存在物，他志在對於他的勞動產物進行社會分配。可是即使在這時候，這些完全不是貌似合理的假設，沒有任何一種可以支持必不可少的證明，因爲在生產關係中的立場和生產者的精神狀態之間，並沒有任何邏輯上的關聯。工人對於某種形式的

宰制所進行的抵制，將取決於他們在社會關係的總和內部所占據的地位，而不僅僅取決於在那些生產中的立場。在這方面，顯而易見的是，也沒有滿足我們最後的、完全由經濟領域建構的這些文化霸權當事人的兩種條件——即他們應該完全在那個領域被建構為主體，以及他們應該被賦予從他們的階級立場推斷出來的「歷史利益」。

## 第六節 正視結果

讓我們取得一點結論。情況不是：經濟領域是服從內生規律的一種自我調整的空間；也不是在那裡存有能夠在一個最後的階級核心那裡固定下來的社會當事人的構成原則；更不是階級的立場是歷史利益的必然所在。從這個觀點來看，含義很快就跑出來了。從考茨基以來，馬克思主義就認識到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傾向不能自發地產生出來，而是取決於知識份子的政治媒介。可是這種媒介沒有被思考成爲**接合**——這是說，思考成爲來自不同的組成成份的**政治建構**。它有一種認識論的基礎：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在工人階級身上**解讀**出它的客觀命運。在葛蘭西那裡，政治最後是被思考成爲接合，而且通過他關於歷史性集團的概念，一種深刻的和激進的複雜性就被引進到關於社會的理論說明裡。不過即使對於葛蘭西來說，執行文化霸權的這一主體的一致，其最後的核心也還是在它接合的空間外部那裡被建構起來的：文化霸權的邏輯並不顯露所有它對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的解構作用。可是就階級主體的那種統一性和同質性已經分裂成爲一些靠不住地整合起來的立場（它是一旦生產力的中立性質這種論點被拋棄後，就不能求助於任何關於未來統一行動的必然論點的東西）來說，我們

目睹古典還原論的這一最後據點垮了。文化霸權的邏輯作為接合的和偶然性的邏輯，已經到了要決定執行文化霸權的主體的那種一致的地步。一些表現出來成為我們以下分析的許多出發點的結果，從這裡跑出來了。

1. 不固定性已經變成每一種社會一致的條件。在首次關於文化霸權的理論說明中，一如我們所見，每一種社會組成成份的固定性都是來自於被賦予的文化霸權任務和被認定是它自然的當事人的這個階級之間不可分解的聯繫；然而在任務與已經執行完文化霸權的這個階級之間的結合，却完全是根據事實的或是偶然的。不過，在任務已經不再是跟一個階級有任何**必然**的聯繫這個範圍內，階級的一致就是唯獨通過它在文化霸權形態內部的接合來賦予它。那麼它的一致就已經變成純粹理性的了。而且當這套關係本身不再是被固定下來和穩定的了時——因而使得文化霸權的實踐成為可能——每一種社會一致的意識看起來就經常是姍姍來遲。「最後」縫合的時刻永遠都不會到來。不過，說完這點，不僅僅是必然性的那個範疇垮了，而且也不再有可能按照純粹的偶然性來說明文化霸權的關係，因為可以讓我們瞭解必然／偶然對立的那個空間已經瓦解了。文化霸權的聯繫能夠通過單純的故事排練從理論上來掌握的這種觀念，證明曾經是個幻想。這種聯繫必須反過來按照新的理論範疇來說明。這些新的理論範疇的身份地位，在它們打算理解從來沒有設法要使之跟本身等同起來的一種關係的範圍內，成為一個問題。

2. 讓我們簡單地談談社會的這種不固定性在其中產生它的作用的這些領域。第一種領域是屬於政治主體性的領域。我們已經看到，在羅莎·盧森堡那裡，聯繫不同的對抗和關於分裂的政治論點的象徵領

域，是新的社會力量的母體——這個象徵領域，葛蘭西是稱之為「集體意志」。這種以象徵來建構社會的邏輯，在形態學上的邏輯的層次上，在堅持經濟主義的歷史概念時遇到了明確的限制。可是一旦這點已經解除了，受到多種多樣形式的社會抗爭束縛的階級，它越過藩籬就能夠自由自在地產生作用。（**自由自在地**，這是說，除掉鬥爭與需要任何先驗的性質——顯然不是在**每一種**接合在一定的場合中都是可能的這一意義上。）不過，如果情況是這樣，就有三種重要的結果可以從我們的分析中取得。**第一種結果**涉及社會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當事人之間的聯繫。我們已經證明，在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生產關係中的社會當事人的立場之間並沒有邏輯上的和必然的關係；它們之間的接合是外在的，不是從任何彼此聯繫起來的**自然的**運動中產生出來的。換句話說，必須把它們的接合看作是文化霸權的關係。可見，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工人鬥爭的方向不是始終如一地往前發展的：**正如同就任何其他**的社會鬥爭來說一樣，它取決於它在一定的執行文化霸權的環境內部接合的形式。同理，能夠把各式各樣的其他的分裂點和民主的對抗點，**站**在一個與工人的需求**一致**的同樣的立足點上，接合到一個社會主義的「集體意志」中。反資本主義鬥爭的這種「有特權的主體」的時代——以本體論的意義來說，而不是以實際的意義來說——已經明確地被揚棄了。**第二種結果**涉及到「新的社會運動」的性質。這些「新的社會運動」在過去十年曾經被討論得非常多。在這裡，有兩個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流派是跟我們的理論立場矛盾的。第一種是研究在一個有特權的社會主義變革主體這一問題設定內部的這些運動的性質和有效性：因此，它們不是被認為是就工人階級（正統派觀點中的基本主體）來說的那種邊際的或邊緣的運動，就是被認為是革命的運動，是

代替已經被整合進體系中的工人階級的（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不過每一件到現在為止我們所說過的事情都指出，發動一次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並沒有有特權的地方；這繫於從一些不同的地方出發辛苦地建構起來的一種「集體意志」。因此，在討論新的社會運動時我們也不能夠同意另外占主導地位的、預先肯定它們的進步性質的流派。關於局部的共同體運動、保護生態鬥爭、性別上少數人的運動的政治意義，不是從一開始就是既定的：它在關鍵性的地方是取決於它跟其他的鬥爭和需求所做的文化霸權的接合。**第三種結果**涉及到思考不同主體立場內部關係的方式。我們的分析有意把這些不同的主體立場分解開來。可是如果說，在這方面決定進行這種分散的作法，那麼我們會只是設法肯定新的固定的形式：即新的各式各樣分散的主體立場的形式。如果它們本身不是被固定下來，那麼可以看得出來，關於分散的一種邏輯完全不能夠肯定關於不同的鬥爭和需求的這種劃分，而且接合正好不能被看成是關於不同的和完全被建構起來的組成成份的這種聯繫。正是在這裡，「多元決定」這個概念的激進化才賦予我們解開社會接合這一特殊邏輯的鑰匙。

3. 不過關於我們的分析的這項邏輯，看起來是意味著應該質疑關於「文化霸權」的那一觀念。這種範疇出現的言說領域和妥當性，原來都被限制在關於一種分裂的理論領域。在本質的層次被建構起來的階級，面臨了迫使它接受跟它自己性質不合的這些任務的歷史偶然性。不過我們已經看到，一方面這種分裂不能夠維持到這兩方面之間的區分消失；而且另外一方面，在有民主方向的進展這個限度內，執行過的文化霸權任務却改變了執行文化霸權主體的一致。這是不是意味著「文化霸權」完全是一種過渡的概念、一個處在本質主義的言說瓦解

中的環節，而且不能夠讓本質主義的言說存活下去？在下兩章我們打算證明，這不是一個合適的答案，而且文化霸權概念中固有的緊張性，也存在於每一種政治實踐和（嚴格說）每一種社會實踐中。

①我們會頻繁地使用的「縫合」這種概念，是從精神分析那裡取來的。它明顯的提法，有人認為是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發明的(Jacques-Alain Miller, "Suture Elements of the Logics of the Signifier," in *Screen*, Vol. 18, No. 4, Winter 1977/1978, pp. 24-34.)，雖然它是在整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論中隱約產生著作用。它是被用來指稱以主體的言說這一鏈環為基礎的這種主體的生產；這就是說，以防止象徵作為完全存在的這種鎖合產生的主體和他物——象徵——之間的非對映為基礎。(因此，無意識的組織作為利刃，伎主體和他物之間的連接／區分產生著作用。)「縫合把主體跟關於它的言說這一鏈環的關係說出來：我們會看到，它把那裡說成是正缺乏著的、以替身的形式出現的組成成份。因為在那裡缺乏著的時候，它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存在。通過延伸——一般的缺乏跟屬於一種組成成份的這種結構的關係——因為它意味著產生什麼的立場，所以就是縫合。」(Jacques-Alain Miller, *op. cit.*, pp. 25-26.) 可是缺乏的這一環節只是一種方面。在第二個方面，縫合意味著充實。正如同黑斯(Stephen Heath)指出來的，「縫合不只是把缺乏的結構說出來，而且也把主體可得到的東西，即某種縫合，說出來。……因此，……不用奇怪，……拉康自己使用『縫合』這個術語……，賦予它一種『虛假的同一』的意義，把它說成是『鏡象和象徵的作用』。……攸關的東西可以看得出來，『我』是一種區分，但是把所有同樣的東西都連接起來。替身是結構的缺乏，但是同時還是凝聚、



充實的可能性。」(Stephen Heath, "Notes on Suture," in *Screen*, Vol. 18, No. 4, Winter 1977/1978, pp. 55-56.) 正是這種雙重的作用，才是我們在把縫合的這一概念引申到政治領域時，我們打算要強調的。文化霸權的實踐是縫合，因為它們產生作用的領域是由社會的不確定性、由每一種指符根本的不固定性決定的。這種原本的缺乏確實是這些文化霸權的實踐打算充實的東西。一種完全縫合的社會會是一個這樣的社會，在這裡，這種充實會取得它最後的結果，因此會設法把本身跟封閉的象徵體系的透明性等同起來。這樣的一種社會的縫合，一如我們所見，是不可能的。

- ② 這是在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談到「補充的邏輯」的這一意義上。自然，如果這項「決定」的特殊性和必然性之間的聯繫被打破了，那麼關於「不確定性」的這種補充就消失了。我們已經看到過，這是索列爾的神話所發生的東西。可是，在那種情況中，使得這一二元論出現有其可能的唯一領域也消失了。
- ③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0 (Nov. 1976/Jan. 1977), pp. 15ff.
- ④ 關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論點最初的提法，請見 A. Brossat, *Aux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 la pensée politique du jeune Trotsky* (Paris, 1974); and Michael Löwy, *The Politics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 ⑤ Leon D. Trotsky, *1905*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1), pp. 333, 339.
- ⑥ 「奇蹟在自然界和歷史上都是沒有的，但是歷史上任何一次急劇的轉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內，都會提供如此豐富的內容，都會使鬥爭形式的配合和鬥爭雙方力量的對比出現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況，以致在一般人看來，許多事情都彷彿是奇蹟。……革命勝利所以那樣徹底，只是因為在當時那種異常奇特的歷史形勢下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潮流，兩種完全異樣的階級利益，兩種完全相反

的政治社會傾向**匯合起來了**，並且是十分『合諧地』匯合起來了。」列寧，〈遠方來信。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九、一五。

- ⑦「政治民主制的機構也是循著這方向運轉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不能沒有選舉：沒有群眾是行不通的，而在印刷發達和議會制盛行的時代，要讓群眾跟自己走，就必須有一套廣泛施展、系統推行、周密佈置的手法，來阿諛奉承、漫天撒謊、招搖撞騙、玩弄流行的時髦字眼、信口答應工人實行種種改良和辦種種好事，——只要他們肯放棄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我把這套手法叫做勞合一喬治主義，因為英國的大臣勞合一喬治是在一個擁有『資產階級工人政黨』的典型國家裡玩弄這套手法的一位最高超最狡猾的代表。勞合一喬治是一個第一流的資產階級生意人和滑頭政客，是一個頗有聲譽的演說家，他善於向馴良的工人聽眾面前亂吹一通，甚至講一些最最革命的詞句，他善於向馴良的工人大施恩惠，如許諾實行社會改良（保險等等），他出色地為資產階級服務，並且正是在工人中間替資產階級服務，正是在無產階級中間傳播資產階級影響，即在一個最有必要而最難於在精神上征服群眾的地方傳播這種影響。」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八一～八二。

- ⑧Gregory Zinoviev, *Pyatyi vsemirnyi Kongress Ko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17 iuniya-8 iuliya 1924 g.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I.* (Moscow-Leningrad, 1925). 資料引自 M. Hájek, "La bolscevizzazione dei partiti comunisti,"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3,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Turin, 1980), p.468.

- ⑨請參考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p. 138ff.

- ⑩請特別參考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Gramsci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0).
- ⑪Biagio de Giovanni, "Lenin and Gramsci: State, Politics and Party,"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p. 259-288.關於喬萬尼 (Biagio de Giovanni) 這一概念的批判, 請見莫菲 (Chantal Mouffe) 在這卷中的導論。
- ⑫Antonio Gramsci, "Notes on the Southern Question," in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26*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443.
- ⑬關於在葛蘭西那裡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請見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p. 168-204. 以及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the Integral State in Gramsci: Towards a New Concept of Politics," in *Silver Linings: Some Strategies for the Eighties*, by G. Bridges and R. Brunt (London, 1981) .
- ⑭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al Carcere*, vol. 2 (Turin, 1975), p. 349.
- ⑮*Ibid.*, p.1058.
- ⑯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al Carcere*, vol. 3 (Turin, 1975), p.1875.
- ⑰請見收在*Clausewitz en el pensamiento marxista* (Mexico, 1979) 裡的論文, 尤其是安科那(Clemente Ancona)的作品。見Clemente Ancona, "La influencia de *De la Guerra* de Clausewitz en el pensamiento marxista de Marx a Lenin," in *Clausewitz en el pensamiento marxista* (Mexico, 1979), pp. 7-38. 可是這些論文更多是談到戰爭和政治的關係, 而不是軍事觀念的政治比喻作法。
- ⑱以一種字面的意義來說, 它包括武裝對抗本身。從毛澤東以來, 「人民戰爭」就被視為是組織群眾「集體意志」的一種過程, 在那裡, 軍事方面是附屬於政治

方面。因此，「陣地戰」超越了武裝鬥爭／和平鬥爭的這一選擇。

- ⑮阿圖塞錯誤地把葛蘭西的「絕對的歷史主義」看成是跟二〇年代其他的「左派思想」形式是同樣的東西，諸如盧卡奇和科西的作品。在其他地方，我們已經說過（請見Ernesto Laclau, "Togliatti and Politics," in *Politics and Power*, No. 2, London 1980, pp. 251-258.），這種看成是同樣的東西是由於一項誤解，因為葛蘭西稱之為「絕對的歷史主義」的東西，恰恰是被任何本質主義和先驗的目的論徹底拒絕。因此它是跟「錯誤意識」的觀念不相容的。在這方面，葛蘭西介入的特殊性，請見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op. cit.*
- ⑯關於考茨基在戰後所採行的立場的一種適當的研究，尤其是關於十月革命，能在下列作品中找得到，見A. Bergounioux and B. Manin, *La social-démocratie ou le compromis* (Paris, 1979), pp.73-104.
- ⑰正是因為如此，沙瓦多利 (Massimo Salvadori) 所從事的對於義大利共產黨理論家所做的批判 (Massimo Salvadori, "Gramsci and the PCI: Two Conceptions of Hegemony,"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p.237-258.)，才是那麼不令人信服。按照這種批判，歐共主義 (Eurocommunism) 不能夠正當地把葛蘭西的傳統說成是它民主戰略的來源，因為葛蘭西的思想一直是把基本的意義賦予決裂的環節和奪權。因此，葛蘭西會構成適合西歐條件的列寧主義的最高階段。無疑的，對於葛蘭西來說，「陣地戰」只是「運動戰」的序曲而已；但是在葛蘭西那裡談論「結構性的列寧主義」是不對的。如果改良／革命、和平／暴力道路的這一選擇是唯一相關的區分，那麼這才是正確的；不過，一如我們已經看到過的，整個葛蘭西的思想是往放棄這種選擇的意義和消除這種選擇的絕對性質這方向移動的。在比較重要的方面裡，既不是葛蘭西的政治主體性的概念，也不是以概念來說明文化霸權聯繫的它的方式，是跟列寧主義的「階級

聯盟」理論相容的。

- ⑳ A. Sturmfal, *The Tragedy of European Labour, 1918-1939* (London, 1944), p.23.
- ㉑ Vienna 1919.
- ㉒ Adam Przeworski, "Social Democracy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New Left Review*, No. 122 (July-August, 1980) , p. 48.
- ㉓ A. Sturmfal, *op. cit.*, pp. 39-40.
- ㉔ Adam Przeworski, *op. cit.*, p. 52.
- ㉕ 尤其請參考 *Au-delà du marxisme* (1927) 和 *L'Idée socialiste* (1933).
- ㉖ 例如請參考 A. Bergounioux and B. Manin, *op. cit.*, pp. 118-120.
- ㉗ Gerald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06.
- ㉘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12, No.4 (1974), p.8. 這種觀念卡斯托里阿迪斯 (Cornelius Castoriadis) 在一九六一年的一篇論文中已經批判過。見 Cornelius Castoriadis,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sous le capitalisme moderne," in *Capitalisme moderne et révolution*, Vol. I, by Cornelius Castoriadis (Paris, 1979).
- ㉙ Harry B. Brave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 ㉚ Stephen Marglin, "What do Bosses Do?"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6, No.2 (1974); Katherine Stone, "The Origins of Job Structure in the Steel Industry,"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6, No.2 (1974).

- ③Richard Edwards,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 ④Jean P. de Gaudemar, *L'ordre et la production. Naissance et formes de la discipline d'usine* (Paris, 1982), p.24.
- ⑤Mario Tronti, *Ouvriers et capital* (Paris, 1977), p. 106.
- ⑥Raniero Panzieri.科利亞特 (Benjamin Coriat) 所引用的論點。見Benjamin Coriat, "L'operaismo italiano," in *Dialectiques*, No. 30 (?), p. 96.
- ⑦Michael Burawoy, "Terrains of Contest: Factory and State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 *Socialist Review*, No. 58 (?).
- ⑧Harry B. Braverman, *op. cit.*, passim.
- ⑨David Gordon,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⑩他們把跟三種不同的工人階級部門對映的三種勞動市場的存在區分開來。第一種包括專業型的大部份職業。它是中間部門的領域，它們享有穩定的、有晉陞可能性和相當高的薪資的可能性這一就業狀況。這些特點也能夠在第一種之下的市場中找得到，不同的是這部門的工人——「傳統」的工人階級，以及第三級部門的半熟練工人——只具有在該企業需要的特殊技術，而且他們的工作是重複性的、受機器的節奏支配。第三，我們碰到了帶有不具備技術的工人的「附屬市場」，這些工人沒有晉陞的可能性，沒有就業保障，工資也低。這些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組織，輪換快，黑人和婦女的比率非常的高。
- ⑪例如請見 M. Paci, *Mercato del Lavoro e classi sociali in Italia: Ricerche sulla composizione del proletariato* (Bologna, 1973).關於工業社會比較一般的思考角度，請見Suzanne Berger and Michael Piore,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⑫ Andrew L. Friedman, *Industry & Labour. 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7).
- ⑬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Erik O. Wright,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 ⑭ 關於「生產性的勞動」這一概念，在普朗札斯那裡是比在馬克思那裡還有更多的限制。因為普朗札斯把它說成是「只要直接把充當剝削關係基礎的物質組成成份再生產出來，就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它是通過生產增加物質財富的使用價值，直接捲入物質生產的勞動。」Nicos Poulantzas, *op. cit.*, p. 216.
- ⑮ Erik O. Wright, *op. cit.*, p. 48.
- ⑯ 屬於無產階級的標準是：(1)不控制有形的生產工具；(2)不控制投資和積累的過程；(3)不控制其他人的勞動力。相反的，資產階級是通過它對這三項行使控制來界定的，而小資產階級則控制投資、積累的過程和有形的生產工具——他不對其他人的勞動力行使控制。

### 第3章

## 超越社會的肯定性：對抗性和文化霸權

我們現在必須在理論上建構文化霸權的概念。我們的分析到現在為止提供給我們的東西，比起可以開始從事工作的確實的言說所在來說是有些東西多一點和有些東西少一點。有些東西多一點，這是因為文化霸權的空間不完全是局部的「沒有想到的」空間：它毋寧是一種這樣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頭，忽然出現一整套關於社會的、以可以理解的概念活動（它把社會的不同環節歸結為一種封閉的典範的內心活動）為基礎的概念。有些東西少一點，這是因為浮現文化霸權關係的這些分歧的外觀，並沒有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新的概念所需要填補的理論空白。相反的，它們當中的有些看起來是成為這一概念消散的現象：因為每一種社會一致的這一有關聯的性質都意味著各層面的分化、接合者和被接合者之間的不平衡不見了。這是文化霸權的聯繫賴以建立起來的基礎。要建構一個文化霸權的概念，因此不是包括在一個相關的環境內部進行單純思辨的努力，而是包括在一個更加複雜的、需要在相互矛盾的言說外觀當中協議的戰略運動。

從到現在為止說過的每一件東西裡可以看得出來，文化霸權的概念是以受到接合的這一範疇宰制的理論領域為前提的；因而被接合起來的組成成份我們能夠分別地加以指出來。（後面我們會考察是如何地



可能詳細說明不以被接合起來的整體為轉移的那種「組成成份」。) 總之, 如果接合是一種實踐, 而不是一定的有聯繫的複合體的名稱, 那麼它必然意味著有某種形式的那種實踐接合或者重組的組成成份分別存在。在我們希望分析的這一種理論說明中, 接合的實踐在其上產生作用的這種組成成份, 原來就是被說成爲一堆散亂的結構或有機整體的碎片。在十八世紀, 德國的浪漫派一代把分散的和分化的經驗看成是它理論反省的出發點。從十七世紀以來, 把宇宙看成是人在裡頭占有一個明確的和一定的地位的一種有意義體系的看法崩潰了——這種看法被一種自己說明的關於主體的概念取代了, 這種概念把主體說成是跟世界其餘的東西維繫著外在關係的一個實體 (韋伯Max Weber 的世界的覺醒) ——產生了努力尋找失去的統一體、努力尋找讓分裂得以克服的新綜合的這種「狂飆運動」的浪漫派一代。把人看成是完整整體的表現的看法, 有意跟一切的、從十七世紀以來由理性主義建立起來的二元論——肉體／靈魂、理性／感覺、思想／意識——決裂

❶。眾所周知, 浪漫派把這種分離的經驗看成是嚴格地跟功能的分化以及社會劃分成各階級的區分、跟建立與社會生活其他領域的這些外在性關係的官僚國家逐漸增多的複雜性聯繫在一起的。

設使被重新接合起來的組成成份被說成是一種業已失去的統一性的這些分裂的**碎片**, 那麼可以看得出來, 任何重建就有跟希臘文化特有的**自然有機**的統一體對立的那種**人爲**的性質。荷爾德林(Friedrick Hölderlin) 說, 「我們的經驗有兩種理想: 一種是最偉大的單純性境界, 在這裡我們的需要是彼此協調一致的, 是跟我們的力量和每一件我們有相關的東西協調一致的。它**恰好是通過自然的組織**, 不用我們做任何動作。另一個是最高超修養的境界, 在這裡, 這種協調一致會

在無限多種多樣化的和被強化的需要與力量之間，通過我們能夠賦予我們自己的那個組織產生出來。」<sup>②</sup>那麼，每一件事情都是取決於我們如何來思考我們能夠賦予我們自己的、賦予這些組成成份一個新的統一體形式的這一「組織」：不是這一組織是偶然的，因而不是屬於分裂的碎片本身的，就是這些分裂的碎片和這個組織是超越它們的一種必然的環節。可以看得出來，只有第一種「組織」能夠被看成是一種**接合**；嚴格地說，第二種「組織」是一種**媒介**。不過一樣明顯可見的是，在哲學的言說中，這一種和另一種之間的距離過去被說成是含混的模糊不清領域的時候比較多，而被說成是清晰的分界線的時候比較少。

從我們目前的思考角度來看，這是黑格爾的思想在它研究統一體和分裂的辯證法時存有的含混性。他的作品既是德國浪漫主義的最高階段，又是對於社會的首次現代的——這是說，在啓蒙運動之後——反省。它不是從烏托邦的角度出發的一種社會批判，也不是讓被接受下來當作是確定的和現有的那種體系有其可能的這些機制的描繪和理論說明；說得明確一點，黑格爾的反省是從跟合理性和可知性的難懂的形式（它是唯有談到使分劃回到統一的一種理性的狡詐，才可以察覺到的）形成對比的那種社會的晦澀性質出發的。因此，黑格爾顯然是被放在兩種時代的分界線上。在第一種意義上，他代表理性主義的最高頂點：這是有意在沒有二元論的情況下，在理性領域內部涵蓋整個差異世界的環節。因此，歷史和社會具有理性和可知的結構。可是，在第二種意義上，這種綜合包含所有它瓦解的種子，因為歷史的合理性只有在把矛盾引進理性的領域的代價下才能夠被肯定。所以這就足以證明，要黑格爾的言說變成爲非常不同的東西：一系列的偶然和不是邏輯的過渡，要求經常違犯它本身主張的方法——如同在十九世紀

由特蘭德倫堡 (A. Trendelenburg) 已經證明的③——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正是在這裡，黑格爾的現代性 (modernity) 才在於：對他來說，同一性本身從來都不是肯定的和已定的，而是被建構成為過渡、聯繫和差異。可是，如果黑格爾的邏輯聯繫變成爲偶然的過渡，那麼它們之間的關聯就不能固定爲構成基礎的或者縫合的整體的這些環節。這意味著它們是一些接合。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這種含混性的範圍被顯現在關於「辯證法」這一概念的矛盾用法裡。一方面，不管什麼時候曾有打算要躲開關於停滯的一種邏輯——這是說，打算要思考接合——時，就不加鑑別地引用辯證法。(例如請細看一下毛澤東的辯證法的形象化觀念：他對於辯證過渡的邏輯性質非常不理解，使他能夠以一種辯證的偽裝，在政治言說的層次把接合的邏輯引進來。) 在另一方面，「辯證法」在那些比較重的比重是放在先驗地過渡的必然性質上，而不是放在變動不拘的接合這種不連續環節的情況中，產生了一個終結的作用。如果說像特蘭德倫堡已經指出來的那樣，這些含混性和不精確性是存在於……黑格爾那裡了，我們就不應該因爲這些含混性和不精確性太過於指責馬克思主義者。

那麼，由「辯證法」言說的用法所構成的含混性這種領域，就是必須要解決的第一件事。爲了把我們自己穩固地放進接合的領域裡，我們就必須從放棄把「社會」看成是它的部份過程的建構整體這一概念出發。因此，我們必須把社會的廣濶空間看成是現有的東西的構成基礎，或者「否定的本質」，而且把種種不同的「社會體系」看成是不妥當的，因而最後不能使有差別的領域共冶於一爐。照這樣看來，社會多種多樣的形式就不能通過媒介的體系加以理解，也不能把「社會體系」理解成爲基本的原則。「社會」並沒有特有的縫合空間，因爲社

會本身缺乏本質。在這裡有三點評論是重要的。第一，這兩個概念意味著關於社會的不同邏輯：在「媒介」的情況中，我們是在討論著一種邏輯過渡的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客體之間的關係是被看成為順著概念之間的一種關係；在第二種意義上，我們是在討論著我們必須決定其性質的一些偶然性關係。其次，在批評把社會看成是由必然性的規律統一起來的總和這一概念時，我們不能單單說出組成成份當中這些關係的非必然的性質，因為我們這時還要保留組成成份本身的一致這種必然的性質。否定對這些社會關係所做的任何本質主義的研究的一種概念，也必須說明每一種一致不穩定的性質，和說明在任何最後的真實性質中不可能把一些「組成成份」的意義固定下來。第三，只有在跟主張組成成份的統一性的言說對立起來時，組成成份的總和才看起來是分裂的和分散的。在任何言說的結構外部，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是不可能談到分裂，甚至於也不可能說明組成成份的。可是，一個言說的結構不是一個純粹「認識的」或者「思辨的」實體；它是一種構成和組織社會關係的**接合的實踐**。我們因此能夠談到先進工業社會的一種逐漸增加的複雜性和分裂——**以根本的樣式來說**，不是在它們是比早先的社會更加複雜的意義上；而是在它們是圍繞著一個基本的不對稱而被建構起來的意義上。這是一種不對稱，它存在於差異逐漸激增——「社會的」意義的一種累贅——跟任何打算把那些差異固定下來當作是穩定的接合結構一些環節的言說所遇到的難題之間。

因此，我們必須從分析**接合**的範疇開始，這種接合的範疇會把詳細說明文化霸權概念的我們的那個出發點賦予我們。這種範疇的理論建構需要我們採取兩個步驟：要確定能夠說明成爲接合關係一部份的那些組成成份；而且要決定組成這種接合的相關環節的特殊性。雖然

能夠從一些不同的地方把這項任務提出來，不過我們還是喜歡兜一個圈子再開始談。我們首先要詳細分析這樣的一些理論的言說，在那些理論的言說裡，存在著一些我們要詳加說明的概念，但在那些理論的言說裡，這些概念的發展還是受到本質主義言說的基本範疇所限制。在這個意義上，讓我們考察一下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學派的演變：通過以可以把它的基本概念駁倒的方式來使若干它的論點激進化的辦法，我們打算要建立可以讓我們建構一個合適的「接合」概念的那個基礎。

## 第一節 社會形態和多元決定

阿圖塞從這裡來開始他的理論行程，他打算徹底地把他當作是「複雜結構的整體」的社會概念跟黑格爾的總體性概念區分開來。這種黑格爾的總體性可能非常複雜，但是它的複雜性總是一個單純的自我表現過程中的許多環節的複雜性。「黑格爾的總體性是理念的這一異化了的發展；因此，嚴格地說，它是在所有它的表現裡頭，甚至於在為它的復甦做準備的異化裡頭一直存在著的這一簡單本源的現象、自我表現。」<sup>④</sup>這一通過在本質的自我表現中把差異跟必然的媒介等同起來的辦法，來把現實歸結為概念的概念，是跟阿圖塞的複雜性非常不同的體系。阿圖塞的複雜性是在多元決定的過程中固有的複雜性。假定有後來從這一關鍵性的阿圖塞概念造成的毫不加區分地和不精確的用法，那麼即有必要說明它原來的意義和它被要求在馬克思主義的言說中產生的那些理論效果。來自於精神分析學的這一概念和它的擴大引伸，都遠不只是具有一種膚淺的譬喻性質。在這方面，阿圖塞是非常

清楚的：「我沒有發明這個概念。一如我所指出的，它是從兩種現有的學科那裡借來的：特別是，從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在這些學科中，它具有客觀的辯證『含義』，而且——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學中——我們以形式上的方式足以把它跟內容聯繫起來。這內容在這裡指的是借用的東西，不是指獨斷的東西。」<sup>⑥</sup>對於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來說，多元決定不是普通的「滙合」或「融合」的過程——它充其量是一個由跟物理世界類比而建立起來的譬喻，它跟任何形式的多重因果性是相容的；相反的，它是一種非常精密的、需要一種象徵領域和多元的意義的滙合形式。多元決定的這一概念是在象徵的領域裡被建構起來的，在象徵領域的外頭沒有任何意義。因而，阿圖塞的每一件事存在於社會裡的東西都是多元決定的這一說法最深刻的、最可能的意義，是斷言：社會把本身建構成爲一種象徵的體系。社會關係的象徵——即多元決定——性質因此意味著，它們缺乏使其成爲內在規律必然環節的一種最後的真實性質。沒有一方面是本質另一方面是現象的這兩面，因爲不可能把一種最後正確的意義固定下來，要是固定最後正確的意義，象徵面會是意指從屬的和衍生的那一面。社會和社會的動因沒有任何的本質，而且它們的規律性完全是由相對的和不穩定的、伴隨著某種體系的建立的這些固定形式組成的。這項分析看起來是打開了這樣的可能性，它可以詳細說明一種將從社會關係的多元性質出發的新的接合概念。不過並沒有這樣。多元決定的概念有從阿圖塞的言說中消失的傾向，而且漸漸到尾端就促使新的本質主義的變種上台。這種從〈論唯物辯證法〉（*On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開始的過程，在《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裡達到最高頂點。

如果多元決定的概念不能夠在馬克思主義的言說內部產生整個它

解構的效果來，那麼這是因為從一開始就有打算要讓它跟阿圖塞言說中的另個重要的環節相容，這另個重要的環節嚴格說，是跟第一個重要的環節，換句話說，經濟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相互矛盾的。讓我們考察一下這個概念的含義。如果這最後的決定作用是對於**每一種社會**都是正確的一種真理，那麼這種決定和使它有可能的條件之間的關係，就不是通過偶然的歷史接合發展出來的，而會構成一種先驗的必然性。重要的是要注意一下，所討論的這個問題不是經濟應該有它存在的條件。這是一種同義反覆，因為如果說某種東西是存在著，那麼這是因為現有的條件使它的存在有其可能。問題是，如果對於**每一種社會來說**，「經濟」是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那它就必須不以任何特定類型的社會為轉移來說明；而且經濟存在的條件也必定要脫離任何具體的社會關係來說明。不過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存在的條件的唯一現實會是保證經濟的存在和決定作用的現實——易言之，它們會是經濟本身的內在環節。差異則不會是構成某某的東西⑥。

可是還有重要的東西。假如說並無沒有被多元決定的現實，那麼阿圖塞就是從肯定必定不能夠把抽象具體化的這一點出發了。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以讚許的方式引述了毛澤東關於矛盾的分析，和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的導言中不接受像是「生產」（生產只有按照社會關係的具體體系來看，才有意義）這類的抽象的作法。可是阿圖塞陷入到他所批評的那種缺陷中：即有一種產生具體效果的抽象普遍客體，「經濟」（此時此地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而且有另外一種同樣抽象的客體（存在的條件），它的形式隨著歷史的不同而不同，不過它是由先前已經建立起來的、保證經濟再生產的重要作用統一起來；最後，在經濟和它的中心地位一律都是任何可能的社會安排時，這種可能性就

開始提供一個關於社會的**定義**。在這裡，這種分析已經回到原位了。如果經濟是一個能夠歸根到底決定任何形式的社會的客體，那麼這意味著至少就關於這一層次來說，我們面臨了單純的決定，而不是多元決定。如果社會有一個決定它運動規律的終審，那麼被多元決定的層次和這一終審之間的關係就必須按照由後者簡單的、片面的決定這一**角度來思考**。我們能夠從這點推斷，多元決定的領域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它是跟主要的決定作用對立起來的偶然變數領域。而且如果社會確實有一個終審和主要的決定作用，那差異就不是構成某某的東西，社會就是在理性主義典範的縫合空間中被統一起來了。因此，我們面臨了完全相同的、我們發現從十九世紀末就在馬克思主義的言說領域裡被人再提出來的那種二元論。

這是阿圖塞的理性主義除去接合的作法 (disarticulation) 要開始的地方。重要的是要注意，出發點前後不一致的二元論會被遺傳到那些非常不同的、將主導解散原有架構的形式裡。實際上，有兩種可能性產生：一種是想闡明所有的多元決定的概念含義，證明不可能有像是「歸根到底經濟起決定作用」的這一種概念，同時肯定每一種一致不穩定的和相對的性質。第二種可能性是想說明在社會總體的**組成成份**內部被假定的這一種必然性聯繫的**邏輯前後不一致性**，因而要通過不同的途徑來證明這一客體即「社會」不可能作為以理性統一起來總體。實際上接下來走的路線是後者。結果，在接受理性主義的分析假設的地方產生了對最初的理性主義的批判，同時否定了理性主義的社會概念的可能性。這種解構逐步升級的結果是這樣，接合的概念變成嚴格說來不能夠想像的東西。正是這條思想路線的批判，才提供我們一個不同的基礎，來建構我們的接合概念。



想打破阿圖塞理性主義典範的不同環節內部的邏輯關聯這一企圖，是由巴里巴爾 (Étienne Balibar) ⑦ 以一種自我批評起頭的，它在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某些流派中被推展到它最後邏輯上的必然結果 ⑧。巴里巴爾的自我批評包括介紹《解讀〈資本論〉》的論證中各種論點的裂縫——這是一些裂縫，在這些裂縫裡頭，邏輯的過渡業已證明是具有謬誤的性質。可是他用這種辦法來填補這些裂縫，即讓被認定是影響從抽象到具體這一過渡的實體多樣化。因此，關於從一種生產方式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這一理解，就使階級鬥爭（它的不平衡性質阻止它被歸結到簡單的生產方式這一簡單的邏輯上去）領域的擴大成爲必要。它是這樣論證：再生產需要不能被歸結爲那種邏輯的上層建築的過程；一個場合的不同方面的不平衡性必須按照一種聯合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因爲各種參與的組成成份的抽象統一體都瓦解了。可是，可以看得出來，這些分析只有在一個擴大的範圍方面成功地把最初提法的難題再提出來而已。這些渠等的鬥爭必定成爲這種過渡過程的原因的階級，實際上是什麼呢？如果它們是圍繞著由生產關係決定的利益來構成的社會當事人，那麼它們行動的合理性和它們政治預測的形式都能夠由生產方式的邏輯來決定了。相反的，如果這點並沒有詳盡無遺地說明這些階級的一致，那麼它們的一致是在什麼地方被建構起來的呢？同樣的，如果我們從開始也知道，它們都是上層建築，它們都有在社會的地形內部指定給它們的一個位置，那麼知道上層建築在再生產過程中介入這點，也沒有讓我們走得非常遠。我們能夠在興達斯 (Barry Hindess) 和希爾斯特 (Paul Q. Hirst) 的作品中看到沿著這條解構的路線往前推進的那一步，在這裡「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和「結構因果關係」的一些概念，都受到犀利的批判。在確定了生產

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對映非必然的性質之後，他們下結論說，作為馬克思主義言說的一種正當對象的這種生產方式的概念必須丟棄。一旦放棄了任何整體化的思考角度，存在於具體社會形態中的這種接合，就按照下面的方式被提出來了：「社會形態不是由一種組織的原則、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結構因果關係或任何什麼東西支配的一個整體。應該把它看成是由明確的一套跟經濟、政治和文化形式結合起來、它們的存在條件在其中是受到保障的生產關係組成的。不過那些要得到保障的存在條件並沒有必然性，必須結合起來的那些關係和形式也沒有必然的社會形態的結構。至於階級……如果它們被看成是經濟的階級，看成是占據一定的占有生產工具的位置或者跟生產工具脫離的位置的一些經濟當事人的範疇，那麼它們也不能被看成是政治力量或者意識形態的形式，或者是由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的形式來體現出的。」

## 9

在這裡引薦給我們的是一種社會形態的概念，它說明了古典馬克思主義言說的某些對象——生產關係、生產力等等——而且也按照「保證存在的條件」的方式，重新以概念的方式說明那些對象之間的接合。我們打算證明：(1)說明對象的這項標準是不合邏輯的；(2)按照互相「保證它們存在的條件」的辦法來以概念的方式說明它們內部的關係，這點並沒有讓人取得任何接合的概念。

關於第一點，庫特勒 (Antony Cutler) 等人以無可非議的這一說法作為開始——除非我們陷入教條主義的理性主義企圖，想在概念的層次決定社會形態再生產的一般機制，否則——我們不可能從以某種概念的方式來說明的關係，取得那些條件要滿足的必然性，或者要被它們採用的那些特定的形式。不過接下來的是完全不合邏輯的斷言：

換句話說，一定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能夠脫離保證它們存在條件的具體形式來加以說明。讓我們專心地考察這個問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存在條件——例如，保證私有財產的法權條件——在如果這些條件沒有得到滿足，去肯定那些生產關係存在的可能性就是矛盾的這一限度來說，是存在的**邏輯**條件。下面這點也是一種**邏輯**的結論，即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概念裡沒有任何一件東西是意味著它們應該保證它們自己的存在條件。其實，在同樣的把前者建構成爲一種對象的言說層次上，可以看得出來後者會**從外在方面**得到保證的。不過恰恰是因爲這點，假使生產／存在條件這一有區別的關係是有關生產關係的抽象概念的這種言說內部的一種**邏輯**區分（它並沒有多方經營成爲多種多樣的具體例子），那麼有人說在每一種情況中這些生產關係是如何得到保證的並沒有人知道，那是不恰當的。因此，如果有人說，在英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存在條件是得到這些或者那些制度設施的保證，那麼一種雙重的不合**邏輯**的言說替換就產生了作用。一方面，是斷言某種具體的言說和制度設施的實踐保證了屬於另外的言說體系的抽象實體——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存在條件；另外一方面，如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這一抽象的術語被來指稱英國的生產關係，那麼顯然在某種言說中說明的一個對象是被用來當作一個**名稱**，以便像參照系一樣指出由其他的言說和實踐——那些東西構成了英國生產關係的總和——來構成的對象。可是在這種情況中，當這些東西不僅僅是「一般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且也是多重的實踐和言說的所在時，就不再有任何生產關係跟它們存在條件的外在性質，能夠預先加以確定的領域了。還有，在說明對象內部區分的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一個**邏輯**標準上時，有問題的地方就在於這種標準的那個恰當性。如

果像庫特勒等人說的，概念之間的一種**關係**確實不意味著以那些概念說明的對象之間的一種關係，那麼情況也就不是能夠從概念之間的劃分來取得對象之間的**劃分**。庫特勒等人堅持對象的特殊一致和劃分，不過僅僅是通過在某一個言說中說明其中一個對象，和在不同的言說中說明另一個對象的這一辦法。

讓我們現在繼續前進到我們的第二個問題。能否把被稱之為「保證存在的條件」的這一聯繫理解為各種組成成份的一種接合呢？不管一個人有怎麼樣的一個關於接合關係的概念，接合必須包括不同立場的體系；而且設使這一體系構成了一個**形態**，那麼關於被包含進來的組成成份的一致相關聯或者不相關聯的這一問題必然產生。是不是有可能認為，這種「保證存在的條件」構成了對於提出由這相關的環節所產生的問題來說的一個合適的分析領域？顯然不可能。要保證存在的**條件**就是要滿足對象存在的邏輯要件，不過這並不構成兩種對象之間的**存在關係**。（例如，某種法律形式能夠促成某種生產關係存在的條件，即使後者實際上並不存在。）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考察一個對象和保證其存在條件的一個層次或者一些層次之間存在的關係，那麼顯然那些關係不能根據這些層次保證了對象的存在條件而從概念上加以說明，這完全是因為這種保證不能構成一個**關係**。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思考接合關係的這種特殊性，就有必要移到不同的領域去。

希爾斯特和伍利（Penney Wooley）力辯，「他（阿圖塞）把社會關係看成是**總體**，看成是由一個單獨的決定原則支配的整體。這個整體必須跟本身是一致的，而且必須使它範圍內的所有動因和關係接受它的作用。在另一方面，我們却把社會關係看成是制度設施的整體、形形色色的組織，以及實踐和動因，它們並不遵照任何單獨的動因原

則或者前後一致的邏輯的，它們會是而且確實也是在形式上不同，同時它們彼此都不是必不可少的。」<sup>10</sup>這段話暴露出所有由純粹邏輯式推理解構方式來提出來的問題。總體的觀念在這裡由於涉及到把被認定的總體組成成份統一起來聯繫非本質的性質，因而沒有被接受。在這點上，我們沒有不同意。但是一旦像是「制度設施」、「形形色色的組織」或者「動因」等等的組成成份已經被詳加說明了，那馬上就有問題產生了。如果這些集合體——跟總體形成對比——被看成是用理論來說明社會的這些合乎邏輯的對象，那麼我們是不是一定會有這樣的結論：即它們當中的每一種的內在組成成份內部的關係都是基本的和必要的呢？如果答案是，那我們很明顯地是從總體的本質主義走向組成成份的本質主義；除了上帝的角色不再是要在組成成份當中建立和諧，而只是要保證它們的獨立性之外，我們不過是用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來取代斯賓諾莎而已。相反的，如果那些內在的組成成份內部的關係既不是根本的也不是必要的，那麼除了必須說明以純粹否定的方式來描繪的那些關係的性質外，我們就不能不說明這些「合乎邏輯的」對象的內在組成成份內部的這些非必然的關係為何不能存在於這些合乎邏輯的對象本身內部。萬一這證明是可能的，那麼就能夠把某種總體的概念引進來。除了有這點不同外，即它將不再包含有一個可以把「社會」統一起來的基本原則，它只是在一個變動的相關聯的複合體內部整體化作用的總和。不過如果我們僅僅是在另一種「本質的關係或者沒有聯繫的一致」內部移動，那麼，所有的社會分析將專注在追求那種無限久遠之前的、不能夠變成爲任何以後的分裂的邏輯原子的海市蜃樓。

問題是這整個關於組成成份和對象內部的劃分的辯論，已經避開

了先驗的和基本的問題：即產生這種劃分的**領域**。這樣，一種非常古典的選擇就偷偷地溜進了分析裡頭：不是對象被劃分開來成為概念上抽象的組成成份——在這種情況中，我們是在討論一種邏輯上的劃分；或者它們被劃分開來成為經驗上的一定對象——在這種情況中，是不可能規避「經驗」的範疇的。因此，因為沒有說明對象內部的統一或者劃分產生的那個領域，我們就再度退回到興達斯和希爾斯特的流派死命要避免的那種「理性主義或者經驗主義」的選擇中。其實這種不能令人滿足的形勢是從一開始（即從這個時候，是時阿圖塞的理性主義批判採用了在「總體」的不同組成成份內部被認定的那種邏輯聯繫的一種方式）就預先決定了的。因為只有被分解的「組成成份」在概念上被提出來說明和加以固定，這是說，如果把完整的和明確的一致賦予它們，才能夠完成一種邏輯的解構。那剩下來的唯一一條道路，就是在邏輯上粉碎社會，連同對於「具體情況」的那種理論上的不可知論的描繪作法。

可是在原有的阿圖塞的提法裡，預示了一個非常不同的理論企圖：即跟正統派的本質主義決裂；這件工作不是通過從邏輯上瓦解它的範疇——以及因而產生的、把劃分開來的組成成份的一致**固定下來**的作法——而是通過批判每一種固定性，通過肯定每一種一致不完全的、任意變動的和政治上協議的性質。這是屬於多元決定的邏輯。就它來說，每一種一致的意義都是多元決定的，因為所有的真實性質看起來都是在構成上被顛覆過和超越過；在那裡絕對沒有本質主義的**總體化**，或者還是對象內部的本質主義的**劃分**，因此某種對象在其他對象裡存在就防止了任何它們的一致被固定下來。看起來被接合起來的那些對象，並不是像在發條裝置的機制中的零件一樣，除非因為某些對

象在其他對象裡存在阻止了關於任何它們的一致的縫合工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史的考察，顯示了非常不同於「科學」社會主義的素樸實證論所描繪的一種景觀：它絕非這樣的一種理性主義的遊戲，因為：完全圍繞著利益被建構起來的社會當事人，從事著由明顯的媒介變數說明的一種鬥爭；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階級在把本身建構成爲一種歷史的主體時的那些難題：它的地位狀態是分散和分裂的；社會和政治重新整合的一些方式出現了——「歷史性集團」、「集體意志」、「群眾」、「人民部門」——這些東西明確表示了跟它們相符的新對象和新邏輯。因此，我們是身在由其他的實體來對某些實體進行多元決定的領域中，而且也是身在把任何形式的典範的固定性下放到基本的理論地平線這個形勢中。這是現在我們必須試著確定的這種關於接合的特定邏輯。

## 第二節 接合和言說

在目前討論的這一背景中，我們想把在組成成份內部建立一種關係的任何實踐稱之爲**接合**，因此組成成份的一致因爲這種接合的實踐就被修改過了。從接合的實踐產生的那個被建構起來的總體，我們將稱之爲**言說**。在不同的立場看起來是在一種言說中被接合起來的這個範圍內，我們會把這些不同的立場稱之爲**環節**。相反的，我們會把不是經過言說接合起來的任何差異稱之爲組成成份。爲了能夠讓人正確地理解，這些區別需要有三項主要的說明清單：關於言說形態的那種具有特性的一致性；關於言說的領域和延伸；關於言說形態所顯示的變動性或者封閉性。

(一)一種言說的形態既不是在它的組成成份的邏輯一致性裡頭，也不是在先驗主體的先驗性中，或者在按照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的方式賦予意義的主體裡，或者在一種經驗的統一性裡得到統一的。我們賦予言說形態的這種一致的形態，是——含有我們後面要指出來的這些差異——接近傅珂 (Michel Foucault) 提出來說明「言說的形態」概念的東西：即分散中的規則性。在《知識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裡，傅珂不接受四種關於言說形態的統一原則的假設——談到相同的對象、產生陳述的共同文體、概念不變，和談到共同的論點。他反過來，在分散是受到形態的規則、受到分散的陳述存在的複雜條件支配的這一範圍內，使分散本身成為統一性的原則<sup>①</sup>。在這方面談一下是有必要的。一種受到規則支配的分散，可以從兩種對稱地對立起來的思考角度來觀察。首先，是作為一種分散：這需要確定就其而論能夠把一些組成成份認為是分散的那種參照系。(在傅珂的例子中，只有談到圍繞著共同的對象、文體、概念和論點來構成的那種不在場的統一體，才能夠明顯地談到分散。)但是這種言說的形態也能夠從分散的規則性這一思考角度來加以觀察，和在那種意義上，把它思考成為不同的立場的總和。這種總和不是任何自身之外的基本原則的表現——例如，它不能通過詮釋學的解讀方式來領悟，也不能通過結構主義的組合方式來領悟——但是它構成了一種形態，在某些外在性的環境中，它作為一種總體能夠被我們**指出來**。設使我們主要的關懷是在於接合的實踐上面，那麼正是第二個方面才是特別讓我們感興趣的。

那麼在一個被接合了的、每一個組成成份都占有一個不同的位置——用我們的措詞來說，每一個**組成成份**都已經被歸結為那個總體的



一個**環節**——的言說總體裡頭，所有的一致都是有關聯的，而且所有的關係都有一個必然的性質。例如，奔汶尼斯特 (E. Benveniste) 提到索緒爾的價值原理說道：「說價值是『相對』的，意思是說它們是彼此有關聯的。那麼，這不恰恰是它們的**必然性**的證據嗎？……不管誰說到體系，就是說到超越和說明其各個組成成份的這個結構中的各部份的安排和順應。每種東西在它裡頭都是這麼**必然**，所以整體的更改和細部的更改都是彼此相互制約的。價值的相對性質最足以證明，它們在總是處在受到威脅、總是處在復原的這種體系的同步性中彼此是密切相互依賴的。重點是在於所有的價值都是對立的價值，只有通過它們的差異才能夠加以說明……。如果語言是有別於沒有規律的觀念的偶然組合和隨意發出的聲音的這種東西，那麼這是因為必然性就像在所有的結構中一樣，是它的結構中固有的。」<sup>⑫</sup>因此，必然性不是從基本可知的原則中取得的，而是從結構立場的一種體系的規則性中取得的。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任何一種關係會是偶然的或者外在的，因為它的組成成份的一致這時候可以在這一關係本身的外部加以說明。不過這無非是肯定在以這種方式構成的一種言說一結構的形態裡，接合的實踐是不可能的：後者包括在**組成成份**上產生作用，同時在這裡，我們將僅面對著一個封閉了的和完全被建構起來的總體的一些**環節**，在那種總體裡頭，每一個環節都是從一開始就被劃歸在重複的原則的項下。一如我們會看到的，如果偶然性和接合是有可能的，那麼這是因為沒有任何言說的形態是一種縫合的總體，而且各種組成成份成為環節的這種轉變也從來都沒有完成過。

(二)我們的分析不接受言說的實踐和非言說的實踐之間的區分。它肯定：(1)在每一種言說出現的情況外部沒有任何一種對象是既與的這

一範圍內，每一種對象都是作為一種言說的對象被建構起來的；以及(2)通常被稱為社會實踐的語言學層面和社會實踐的行為層面之間的任何區分，不是一種不正確的區分，就是應該找到它作為意義的社會生產（它是在一些言說總體的形式下被建構起來的）內部的一種劃分的位置。例如，強調言說的實踐和非言說的實踐之間的一種區分<sup>15</sup>——以我們之見，不一致——的傅珂，有意確定建立起言說形態分散狀態規則性的這一有關聯的總體。不過他只能夠按照言說的實踐來做到這點：

「(必須把醫院裡的醫學看成)是在醫學的言說中的一些性質截然不同的組成成份之間的一種關係的既成體制，它們當中某些是關於醫生的地位，其他的是關於醫生藉以發言的制度設施和技術的場所，再其他的就是關於他們作為領悟、觀察、陳述、教學等等的主體的立場。我們能夠說，不同的組成成份（它們當中有的是新的，而其他的則已經是存在的）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受到醫院的言說影響的：正是作為一種實踐的這個東西，才在他們所有人之間建立起一種不是『真正』既有的或者先驗地被建構出來的關係體系；而且如果有一種統一性，如果它所利用的或者賦予一個位置的那些詳細說明的方式不完全是通過一系列的歷史偶然性並列出來，那是因為它經常地利用這組關係。」<sup>16</sup>

在這裡有兩點必須強調。第一，如果所謂的非言說的複合體——制度設施、技術、生產性組織等等——是經過分析了，那我們將只會找到對象內部不同立場的多少複雜的形式，這些形式不是從建構它們的那種體系外部的必然性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只能夠把它們看成是言說的接合。其次，傅珂關於醫院言說的接合性質的那種論證的邏輯，意味著被接合起來的組成成份的那種一致必定至少是部份被那個接合更改過：這是說，分散的範疇只有部份容許我們思考規則性的這一特殊性。

已經分散開來的那些實體的身份地位是在某些組成成份和環節之間的中間地帶被建構起來的<sup>15</sup>。

我們在這裡不能像我們理解的那樣來討論言說理論的所有複雜性質，但是我們至少應該指出下面的基本重點，以避免比較普遍的誤解。

(1)每一個對象都是被建構為言說的對象的這一事實，是**完全**跟有沒有一個思想之外的世界，或者現實主義／唯心主義的對立**無關**的。地震或者一塊磚塊掉落下來，在它發生在此時此地的這個意義上，是一件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確實存在的事件。可是它們作為對象的那個特殊性是不是按照「自然的現象」或者「上帝天譴的表現」被建構起來的，則取決於言說領域的建構行動。被忽略掉的東西並不是這些對象是在思想的外部存在著，而是這種相當不同的斷言：即它們能把自已建構為不屬於任何言說出現條件範圍的對象。

(2)以前偏見的根源在於有關言說的**精神**性質的一種假設。跟這點相反，我們要肯定每一種言說結構的**物質**性質。要主張相反的東西，就是要接受在任何言說介入的外部建構起來的客觀領域和由純粹的思想表述組成的言說之間的這一非常古典的劃分。確實這是當代思潮的幾種流派試著要打破的劃分<sup>16</sup>。關於言談行動的理論，例如，已經突出言談行動的語言表現的性質。在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那裡，語言的遊戲在不可分解的總體內部既包括語言，也包括跟語言相互聯繫在一起的行動。「甲是用建材蓋屋：有大塊石料、柱子、厚板子和橫樑。乙必須遞石料，而且必須按照甲需要它們的順序。為這個目的，他們使用了由『大塊石料』、『柱子』、『厚板子』、『橫樑』這些詞語組成的一種語言。甲把它們大聲講出來；乙就把他已經知道在某某的一種傳喚時要遞過去的這一石料遞過去。」<sup>17</sup>有這樣的結論是免不

了的：「我也要把由語言和語言編織成的行動，稱之為『語言遊戲』。」

⑩顯然對象的那個物質的屬性是維根斯坦稱之為語言遊戲（它是我們已經稱之為言說的一個例子）的一部份。構成不同的立場，因而跟某種語言學組成成份有一種有關聯的一致東西，不是關於建材或者厚板子的思想，而是建材或者厚板子本身。（就我們所知，跟「建材」這一思想的關聯，並不足以建造任何的建物。）語言的組成成份和非語言的組成成份不完全是並列的，但是構成了一個不同的和建構起來的立場體系——這是說，一種言說。因此，不同的立場包括關於非常分歧的物質組成成份的一種分散狀況⑪。

或許會被這樣說，在這種情況中，言說的統一體是一種設想有目的的統一體；但是並不是如此。客觀世界是在有關聯的連續性中被建構起來的，這一連續性不必然有一種最終的意義，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它實際上完全不需要任何意義：有某種規則性來確定不同的立場，讓我們能夠談到一種言說的形態，也就夠了。從這點可以得出兩種重要的結論。第一點是，言說的物質性質是不能夠在經驗或者建造東西的主體的意識中被統一起來；相反的，不同的主體立場在言說形態的內部看起來是分散的。第二個結論是，作為一種差異體系的固定／混亂的這種接合的實踐，不能夠由純粹的語言現象來組成；反過來必須貫穿多種多樣的制度設施、儀式和實踐的那整個物質厚度，通過它們才能夠把言說的形態建立起來。承認這個複雜性和它的言說的性質，就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說明領域開始迎風走上一條朦朧不明的道路。它特有的形式是（從葛蘭西到阿圖塞）進一步地肯定意識形態的物質性質，因為這些意識形態不是思想的單純體系，而是體現在制度設施、儀式等等上面的。可是對於全面地從理論上揭示這種直觀的洞察變成

一種障礙的是，它無論如何都是求助於意識形態的這一領域；這是說，求助於其一致是在「上層建築」的這種概念下被思考的形態。它是一種與它的物質性的分散狀態相對的一種先驗的統一體，因此它不是需要向一個階級的統一作用（葛蘭西）請求援助，就是需要向再生產的這一邏輯具有作用的必要條件（阿圖塞）請求援助。可是一旦這種本質主義的假設被拋棄了，接合的範疇就取得了不同的理論身份地位：接合現在是一種言說的實踐，這種言說的實踐不具有先於或者處於被接合起來的組成成份分散狀態外部的組織地位。

(3)最後，我們必須考察我們已經讓言說範疇具有的那個中心地位的意義和生產能力。通過這個中心地位，我們在相當程度上擴大了客體性的領域，而且被創造出來的這些條件讓我們能夠思考由於先前幾章的分析而被放在我們面前的那許多的關係。讓我們假定我們打算站在自然科學的言說建構起來的這類客體性的基礎上分析社會關係。這馬上既給可以在那種言說內部建構起來的這些對象設定嚴格的範圍，而且也給能夠在它們當中建立起來的這些關係設定嚴格的範圍。某種關係和某種對象都被預先排除了。例如，譬喻作為這兩種實體之間的一種客體關係就不可能存在。不過這排除了以概念的方式來說明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對象內部廣泛關係的可能性。例如我們說成是「共產黨的列舉」的東西，是根據被劃分成為兩種對抗陣營的社會空間內部不同的階級部門當中的一種**同等**關係。不過這種同等是以類比原則在完全不同的內容內部產生作用為其前提的——而且除了一種譬喻上的轉換，它還是什麼呢？重要的是要看到，這種通過共產黨的列舉來構成的同等，並不是在言說外部構成的一種真實運動的言說表述；相反的，這種列舉的言說是有助於塑造和組成社會關係的一種真正的力

量。有些事情同樣跟一種像是「矛盾」的這類觀念一起發生——我們以下會再談這點。如果我們從自然主義的典範這種思考角度來考察社會關係，那麼矛盾就被排除掉了。可是如果我們把社會關係看成是由言說來建構的，矛盾就變成有可能了。因為，跟關於「真實的客體」的這種古典觀念排除矛盾相反，矛盾的關係能夠存在於言說的兩個對象之間。跟這種言說的／言說之外的二分法決裂的重要結果是放棄思想／現實的對立，因而主要擴大了那些能夠說明社會關係的範疇領域。類義、轉喻、譬喻都不是能夠把次要意義加在社會關係基本的、構成的真實性質上面的一些思想的形式；反過來說，它們都是把社會在裡頭建構起來的那種基本領域本身的一部份。拒絕思想／現實的二分法，必然是跟重新思考和說明直到現在為止已經被認為是排除了這一個或那一個的這些範疇一道的。

(三)那麼，轉到我們已經稱之為「言說」的這一有關聯的總體的過渡，如果這種有關聯的和差異的言說總體邏輯毫無限制地的蔓延下去，就幾乎不能夠解決我們最初的問題了。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會面臨純粹的必然性關係，而且一如我們早先指出來的，任何的接合將不可能被這樣地設定，即每一種「組成成份」在**定義上**都是「環節」。可是這種結論本身可以硬是提出來，只有在我們承認這種有關聯的邏輯可以被貫徹到它最後的結果裡去，沒有任何外在的東西的限制<sup>⑩</sup>。相反的，如果我們承認一個言說的總體從來都不存在於完全是**現有的**和**有界線**的肯定性中，那麼這種有關聯的邏輯就是不完全的，就會被偶然性貫穿。從「組成成份」到「環節」的這項過渡，從來都不曾完全實現過。因此，使得這種接合的實踐成為可能的一個無人島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中，就沒有任何完全得到保護，使它免受讓它變形，不讓它變成完

全地縫合的這種社會一致。這些一致和這些關係都失去了它們必然的性質。這些關係作為有組織的結構總和，不能夠吸收這些一致；但是在這些一致是完全有關聯時，就只有這樣的一種說法了，即並沒有任何完全能夠建構起來的一致。

情況是這樣，那麼所有有關固定性的言說就變成了譬喻的了：在實際的事實中，真實性質就是第一種譬喻。

在這裡，我們到達了我們論證的一個關鍵所在。每一種總體不完全的性質作為一種分析的領域，必然讓我們走到放棄作為已經縫合的、自己明定的總體的這一「社會」的前提。「社會」不是言說的一個妥當的對象。沒有任何固定——因而建構——整個差異領域的單純的基本原則。這一不能夠解決的內在性／外在性的緊張是任何社會實踐的條件：必然性只能夠作為偶然性領域部份的限制而存在。正是在這個領域（在這裡既不可能有完全的內在性，也不可能完全的外在性）裡，社會才被建構起來。不能把社會概括為含有一個有差異的固定體系的那種內在性，同理，純粹的外在性也是不可能的。為了彼此都成為完全是外部的，實體就本身而言即必須成為完全是內在的東西：這是說，必須具有完全建構成、不被任何的外在暗中破壞的一致。不過這恰恰是我們剛剛已經拒絕的東西。**從來都不設法成為完全固定了的一致這一領域，是多元決定的領域。**

因此，絕對的固定性和絕對的不固定性都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要從不固定性開始，考察一下這兩個連續的環節。我們已經把「言說」說成是一種含有差異的實體的體系——這是說，一種含有環節的體系。可是我們剛剛已經看到，這種體系只有作為暗中破壞體系的那種「意義的一種累贅」的部份限制，才能存在。這種「累贅」存在於每一種

言說的形勢中，它是建構每一種社會實踐必要的領域。我們要把它稱之為言說活動的領域。這個術語指出它跟每一種具體的言說發生關係的方式：它同時也確定每一種對象必要的言說的性質，和任何既有的言說都不可能完成一個最後的縫合。在這方面，我們的分析跟一些當代的、曾經堅持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最後意義的——從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到維根斯坦——思想流派接上了頭。例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從結構概念史裡頭的一種徹底決裂開始出發，這一決裂是發生在拋棄核心——以其多重形式出現的先驗的指意（the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文化的內涵、實體、目的因、能力、本質、真理等等——和連同它一起，拋棄把構成差異湧現出來的基礎的意義固定下來的可能性這個環節。在這方面，德希達把這種言說的概念以跟我們作品的概念契合的意義加以普及化。「有必要既思考在結構的構成中以某種方式支配著渴望一個核心的這種欲念的規律，又思考安排替換和取代屬於這種核心存在——但是它是作為從來都不是它自己、總是已經從它本身被放逐到它自己的替換品那裡的一種核心的存在——的這一規律的那種指出意義的過程。替換品不是為任何以某種方式在它之前存在的東西把自己替換下來，因此有必要開始這樣思考：即過去並沒有核心；不能以目前存在的形式來思考核心；核心沒有自然的場所；它不是一種被固定下來的地點，而是一種作用，一種這樣的無限多的替代記號產生作用的不是所在的所在。這是語言侵犯普遍的問題設定的環節，這是在沒有核心或者本源時，每一種東西都變成是言說——如果我們能夠同意這個詞語——這是說，一個核心的指意、本源或者先驗的指意從來都絕對沒有出現在差異體系外部的一種體系——的環節。先驗的指意這一不在場，無限擴充了指出意義的作用的



這種領域和這種作用。」②

讓我們推進到我們的第二個領域。不能有歸根到底一成不變的意義，意味著必須有部份一成不變的地方——否則，就不可能有差異那樣湧現出來。甚至爲了產生差異，爲了破壞意義，還必須要有意義。如果社會不設法在可知的和制度設施化了的社會形式中把自己固定下來，不管怎樣這個社會也只能夠作爲要建構那個不可能的對象的一項努力存在下去。任何的言說都是作爲打算宰制言說活動的領域、遏止差異湧現出來、建構一個核心的這種企圖被建構起來的。我們要把這種不受一般規則限制的部份一成不變的言說所在，說成是波節點 (nodal points)。(拉康 Jacques Lacan 通過他的波節點 *points de capiton* 的概念，這是說，不受一般規則限制的、把一個指出意義的鏈環的意義固定下來的這種指符的概念，堅持了這些部份的一成不變。指出意義的鏈環的這種生產力的限制，建立了使得預測有其可能的這些立場——不能夠產生任何一成不變的意義的一種言說，是關於精神病的言說。)

索緒爾的語言分析把它看成是沒有肯定關係的一種關於差異的體系；核心的概念是關於價值的概念，按照這種概念，一個術語的意義完全是相對的，它只受它跟所有其他術語對立的這一情況支配。可是這點向我們證明，引荐給我們的是關於一種封閉體系的這些可能性條件：只有在它裡頭，才有可能以這種方式來固定每一種組成成份的意義。在語言的模式是被引荐到人文科學的一般領域中時，正是這種組織活動的作用才占主導地位，所以結構主義變成了一種新的本質主義的形式：研究構成屬於任何可能變數固有規律的基本結構。對於結構主義的批判包括跟這種完全建構起來的結構空間決裂；不過在它也不

接受任何再退回到界線是（像一個專門術語一樣）由它跟對象的關係來劃定的這些統一體的概念時，產生出來的概念就是不能夠照這種方式把本身建構起來跟一種相對的空間有關聯的——它是跟一種領域有關聯的，這種領域受到希望有總是最後不在場的一種結構的欲望所宰制。記號是分裂的名稱，是指意和指符之間不可能縫合的名稱<sup>②</sup>。

我們現在擁有一切必要的分析的組成成份，來說明接合的概念。因為所有的一致都是有關聯的——即使關係的體系也不能達到被固定下來作為一種穩定的差異體系這一境地——因為一樣的，所有的言說都是被蓋過言說的這種言說活動的領域暗中破壞了，所以從「組成成份」到「環節」的過渡從來都沒有完成過。「組成成份」的身份具有不能夠完全被接合到言說鏈環上的這種浮動指符的身份。而且這種浮動的性質最後滲進每一種言說的（即，社會的）一致裡。但是如果我們接受一切言說的一成不變這一未完成的性質，同時肯定每一種一致有關聯的性質，那麼指符這一含混即它不固定在任何指意上面的性質，就只有在有指意貫穿的情況下才能夠存在。它不是指意的貧困，而是相反的，它是不把一種言說結構接合起來的意義的分歧。那就是把每一種社會一致的這一多元決定的、象徵的領域建立起來的東西。社會從來都不設法跟自己等同起來，因為每一個波節點都是在蓋過它的一種交織活動內部被建構起來的。因此，接合的實踐存在於部份地固定意義的這些波節點的建構中；而且這種一成不變的部份的性質來源自社會的變動不居，這個社會反過來成為因為言說活動這一領域無限性的關係而產生的每種言說經常蓋過的一種產物。

因此，每一種社會實踐——在一個它的領域當中——都是接合的實踐。在它不是自己明定的總體的這一內在的環節時，它就不能完全

是已經取得的某些東西的表現，它就不能**完全**歸屬於重複的這一原則的項下；說得明確一點，它總是存在於關於新的差異的建構中。社會在「社會」是不可能的這一度內是接合的。我們在早先說過，對於社會來說，必然性只作為限制偶然性的這一部份的努力存在著。這意味著我們不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的關係，看成是兩個彼此是有限制的和彼此是外部的領域之間的關係——例如，像在拉布里奧拉的形態屬性那裡——因為偶然性只在必然性的內部存在。這種偶然性在必然性中的存在，是我們早先稱之為**暗中破壞**的東西，它本身也顯現為扭曲和懷疑每一種必然性真實的性質的象徵作用、譬喻和弔詭。因此，必然性不能在一種基本原則、一種基礎的形式下存在，只能作為一項確確實實地把有關聯的體系的這種差異固定下來的努力。社會的必然性是完全有關聯的一致本身的必然性——像在關於價值的語言原則裡一樣<sup>23</sup>——不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分析判斷的必然性。在這個意義上，「必然性」完全等於一種「縫合空間中的有差異的立場的體系」。

這種研究接合問題的方式，看起來是包含了所有必然的組成成份，它可以解決文化霸權的邏輯使我們面對著的那種明顯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每一種社會一致這種變動不居的和不完全的性質，可以讓它對不同的歷史一言說的形態進行接合——這是說，讓它對索列爾和葛蘭西意義上的「集團」進行接合；在另一方面，接合的力量的那個一致，是在言說活動的一般領域中被建構起來的——這消除了跟任何先驗的或者原有的主體的聯繫。可是在提出我們的文化霸權概念之前，我們需要研究一下兩個更進一步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我們的分析裡頭的「主體」範疇的明確地位；第二個問題關於**對抗**的概念，它的重

要性來源自這樣的事實，即在它的一個基本領域裡，進行文化霸權接合的實踐其特殊性是由它跟其他具有對抗性性質的接合實踐對抗而取得的。

### 第三節 「主體」的範疇

關於這種範疇的討論需要我們把兩個非常不同的問題區別開來，這是在最近的辯論中時常被混淆的問題：即關於主體範疇的言說的性質或者在言說產生之前的性質這個問題；和關於不同的主體立場內部的關係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已經取得比較一貫的注意力，而且造成大家逐漸懷疑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賦予「人的個體」的那種「構成的」角色。這種批判本質上影響了三種概念上的戰略：把主體看成是理性的和本身自明的一個當事人的這種觀點；關於其立場總和的這個被認定的統一體和同質性；以及把主體看成是社會關係的本源和基礎的這種概念（以嚴格意義來說的關於構成活動的問題）。我們不需要詳細地談到這種批判主要的領域，因為它的古典階段——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已經為人足夠熟知。晚近，傅珂業已證明關於「有限性的分析」的這一緊張性，即屬於他已經稱之為「人的時代」的那個特性，如何被分解成爲一批對立——經驗／先驗、我思／意外、脫離／回到本源。這批對立，在「人」這個範疇被認爲是統一的主體這一範圍內，是不能夠超越的<sup>24</sup>。其他的分析已經指出，跟一直悄悄地進入到努力要完成跟其決裂的那個概念裡的這一「有創造力的主體」範疇決裂，有那些困難<sup>25</sup>。

關於這種選擇和它不同的構成成份，我們的立場是清楚的。不管我們什麼時候在這本作品中使用「主體」這個範疇，我們都是以言說結構內部的「主體立場」這一意義來使用的。因此，主體不能是社會關係的本源——甚至於在有限的意義上，也不是被賦予讓一種經驗成爲可能的那些力量——因爲一切的「經驗」都取決於有關可能性的那些明確的言說條件<sup>26</sup>。可是這只是回答我們第一個問題的一項答案，它決不預示可以提供第二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所有主體立場的言說性質結果是不管能夠在它們當中存在的這類關係。在每一種主體的立場都是一種言說的立場時，它就帶有每一種言說的變動性質；因而各式各樣的立場在一種有差異的封閉體系中都完全不能被固定下來。我們能夠看出這些非常不同的問題被搞混的原因來。因爲關於每一種主體立場言說性質的肯定，都是跟拒絕把主體看成是本源的、建立總體的這一觀念的作法聯繫起來的，所以必定占優勢的分析環節就是跟其他的立場有關的某種立場的分散、反整體化或者耗散的環節。它們當中的每種接合的環節或者關係，都破除了有關分散的譬喻的這些認識上的作用，而且造成人們懷疑可以偷偷摸摸地把作爲被統一的和統一的本質的這個主體範疇，重新引進來的一種重新整體化的作法。從這裡，要把主體立場的那種**分散**轉變成爲它們內部的一種有效的**劃分**，僅有一步之遙。可是把分散轉變成劃分顯然造成了所有我們早先指出來的那些分析上的問題——特別是那些在以組成成份的本質主義來取代總體的本質主義裡頭存在的問題。如果每一種主體的立場都是言說的立場，那麼分析就不能夠省略掉由其他的立場來對某些立場進行多元決定的這些形式——即我們已經看到的，在任何言說的差異中固有的所有必然性的偶然性質。

讓我們考察一下最近造成大量討論的例子：即跟顯然抽象的範疇（尤其是「人」）的地位有關的例子；和跟女性主義的「主體」有關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居於整個最近人道主義辯論的中心。如果「人」⑳的這一地位是本質的地位，那它跟其他人類的性質有關的它的那個位置，就會被按照從抽象出發到具體的一種邏輯的尺度來描繪。這將為一切按照「異化」和「誤認」來分析具體情況的熟悉把戲開路。但是如果相反的，「人」是一種言說上建構起來的主體立場，那麼它被認定的那個抽象性質就決不會讓它跟其他主體立場接合的形式提前產生出來。（這種範圍在這裡是無限的，而且它向任何「人道主義」的想像挑戰。例如，眾所周知，在殖民地國家裡「人權」和「歐洲價值」之間的同等，是一種以言說的形式來建構人們接受帝國主義宰制的經常有效的方式。）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在攻擊阿圖塞時所造成的混淆㉑，正是建立在這一點上。在提到「人道主義」時，湯普森認為如果人道主義的價值是否定本質的地位，那麼它們就被除掉了所有歷史的妥當性。不過實際上重要的是，要試著證明「人」是如何在現代時期被生產出來的，「人」的主體——這是說毫無區別地持有的一致的人——在某些宗教的言說中如何出現的，是如何被體現在法律的實踐中，又如何地在其他的領域中被分別地建構著。理解這種分散狀況有助於我們掌握「人道主義」價值本身的脆弱性、由於跟其他的價值同等地接合起來把它們加以濫用的那種可能性，以及它們對於某種人口的範疇——例如，有產階級或者男性人口——所產生的約束。不認為「人」具有本質的地位——大概是天堂賦予的一項禮物——這種分析就能夠向我們證明它出現的歷史條件和它當前易受批判的原因，因此使我們在捍衛人的價值時就能夠更有效地鬥爭，沒有幻想。

可是同樣明顯的是，如果「人的一致」不僅僅包含分散的立場的總和，而且也包含在它們裡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多元決定，那麼這項分析就不能完全停留在分散的環節上。「人」是基本的波節點，從這一波節點自十八世紀以來曾經有可能把一些社會實踐開始進行「人道化」。堅持曾經把「人」產生出來的那些立場的分散狀況，只構成第一個環節；在第二個階段，有必要證明在這些立場內部被建立起來的那些多元決定和整體化的關係。具有言說差異的這個體系的不固定性或者變動，是使得類推和互相滲透的這些作用成爲可能的東西。

關於女性主義的「主體」，有些類似的東西也要談一下。對於女性主義所進行的本質主義的批判，過去特別是通過英國的《男人／女人》（*m/f*）雜誌來進行的：一些重要的研究已經拒絕先行建構起來的這種「婦女壓迫」範疇的觀念——不管它的原因是在於家庭、生產方式或者其他的地方——同時打算研究「藉以把婦女這種範疇生產出來的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制度設施和實踐」<sup>29</sup>。一旦它否認有一個關於婦女壓迫的單獨機制，就給女性主義的政治打開了一個廣袤的行動領域。這時，個人就能夠理解對任何建構性別差異的壓迫形式進行揭露性鬥爭的這種重要性了，不管這種壓迫形式是屬於法律層次、家庭層次、社會政策層次，或者是經常藉以把「女人」的這一範疇生產出來的這些多重文化的形式。因此，我們是在主體立場的分散這種領域上面。可是這項研究的困難是從對於分散環節所做的片面的強調產生出來的——這麼片面，所以我們只剩下有一批異質的、通過彼此沒有關係的實踐建構起來的性別差異。那麼在質疑原始的、在社會實踐中後天地表現出來的性別區分這一觀念時，也必須承認，在多種多樣的性別差異內部的多元決定產生了關於性別區分的一種組織的效果<sup>30</sup>。每

一種性別（不管它們是什麼樣的多種多樣和異質性）差異的建構，一律都把女人建構為附屬於男人的一端。正是因為如此，才有可能提到一種性別／性（sex/gender）的體系<sup>①</sup>。社會實踐的、把女人作為一種範疇生產出來的制度設施和言說的這個總和，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互相補充加強的，而是相互產生作用的。這不是意味著女人的從屬有一個單純的原因。我們的看法是，一旦女性最後包含了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性的一種女人的性別，那麼這一「印象的意義表示」在多種多樣的社會實踐中就產生了具體的作用。因此，「從屬」作為一種一般的範疇，說明構成「女人的性質」的那種意義的總和，跟自主性與多種多樣的、建構具體的從屬形式的不平衡發展之間，有一種密切的相互關聯。這些後者不是一種不變的女人本質的表現；可是在她們的建構中，在一定社會裡被聯繫上女人的情況的那種象徵，就起著一個原始的作用。這些多種多樣的具體的從屬形式，反過來因為有助於維繫這種象徵和有助於這種象徵的再生產，就產生了反作用<sup>②</sup>。因此，不用否認說在多種的建構「女人的性質」的形式中，具有一個共同的、強有力地按照性別的區分產生多元決定作用的組成成份，就有可能批判構成性別區分的關於男人和女人之間原始對抗的那種觀念。

讓我們現在往前推進考察一下在馬克思主義傳統內部被採用的那種關於社會的和政治的主體的規定。出發點和常見的主要目的是明顯可見的：主體是社會階級，它們的統一性是圍繞著那些由它們在生產關係的地位所制約的利益建構起來的。可是比堅持這種泛泛的論點還要重要的是，要研究一下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關於主體立場的典型形式）曾經回答主體立場的分化和分散的那些明確的方式。第一種答案——最重要的答案——是通過指涉的東西，由不合邏輯的



段落組成的。例如，它包括這樣一種斷言：工人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是通過具體的社會當事人——對它們兩者產生作用的工人階級——統一起來的。這種推理——不僅僅在馬克思主義裡頭，而且也在整個社會科學裡頭都是常見的——是建立在一種謬誤的基礎上面：「工人階級」這一表述是以兩種不同的方式來使用的，即要說明生產關係中的一種特定的主體立場，以及要給占有那個主體立場的當事人名稱。這種因而產生的含混性，就讓邏輯上不合邏輯的結論不經意地說出由這些當事人占有的其他立場也是「工人階級的立場」。（它們顯然是第二種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但不必然是第一種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關於每一種社會當事人的意識的這種統一性和明顯性的隱含假設，有助於鞏固這種含混性——因此有助於混淆。

可是這種含混只有在一個人打算肯定經驗上一定的立場內部的統一性時才產生作用；在一個人打算說明——一如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最經常有的情況一樣——跟其他的立場（這是說，屬於「虛假的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的這些特有的分裂）有關的某些立場的這種異質性時，就不產生作用了。一如我們所見，在這種情況中，階級的統一體被認為是未來的統一體；那種統一體把本身顯現出來的方式，是通過展現的範疇，即真正的工人和它們的、要求通過先鋒隊的黨來代表的客觀利益之間的分裂。那麼，每一種展現關係就是建立在一種幻想上面：即在某種層次上某種東西（它嚴格說來是不存有這種關係的）有的存在關係。但是因為它同時也是一種幻想和組成實際的社會關係的一項原則，所以展現就成為結果不是從開始時就預先決定的一場遊戲的領域。在可能性的光譜的一端，我們解除了展現的這一幻想的性質，所以展現的手段和領域跟被展現的東西比起來，就整個明朗

起來；在另外一端，我們在展現和被展現之間完全含混不清：幻想就變成了嚴格的字面意義上的幻想了。重要的是要注意一下，在這兩個極端都具有可能性的明確條件時，却沒有任何一端構成一個不可能的情況：能夠讓一個代表服從監督的這些條件，因此變成爲幻想的東西就是關於展現的那個不真實的性質；而反過來，完全缺乏監督則會使這種展現變成爲完全不真實。馬克思主義關於先鋒隊的概念證明這種獨特性：即黨所代表的不是具體的當事人，而是它的歷史利益，因爲代表人和被代表的人都是通過同一種言說和在同一層面來建構的，所以並沒有幻想。可是這種重複的關係，只是以它極端的方式存在於極小的、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宗派裡，自然沒有任何無產階級曾經理解到它有一個先鋒隊。在每一場具有某種意義的政治鬥爭裡，相反的却千辛萬苦地努力，想要贏得具體的社會當事人對於他們那些被認定的「歷史利益」表示忠誠。如果組成被代表的人和代表人的一種言說的同義反覆被拋棄了，那麼就有必要斷定，被代表人和代表人都是在不同的層次被建構起來的。這時第一個誘惑就是要使各層面的劃分成爲整體，要從它的虛幻性質推論出不可能有這種展現關係。因此，過去有人說過：「否定經濟主義就是不接受關於階級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統一體的這一古典的概念。這就是想主張，不能把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看成是關於經濟階級的鬥爭。沒有中間的道路。……階級『利益』不是由經濟賦予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它們是在政治實踐內部產生出來的，而且它們是因爲一定的政治實踐方式的作用而被確定下來的。政治實踐確實並不承認階級利益，然後代表它們：它組織了它所代表的那些利益。」<sup>⑬</sup>

可是這種斷言只在政治實踐是一個完全有界限的領域（它跟經濟

的界線，我們能夠以**比較幾何圖形的方式**來劃出來——這是說，如果我們在原則上把任何經濟對政治的多元決定或反過來，任何政治對經濟的多元決定排除掉）時，才能站得住腳。不過我們知道，這種劃分只能夠在本質主義的概念中以先驗的方式建立起來，這種本質主義的概念是從一種概念的劃分中，在組成成份內部把真正的劃分推論出來，把關於一種一致的概念說明轉變成為完全地和絕對地有區分的言說立場。可是，如果我們承認每一種一致的多元決定性質，那麼情況就改變了。**有一種不同的路線**，這種路線——雖然我們不知道是否它是中間的路線——無論如何都是一種第三條路線。「把當事人贏取到他們的鬥爭利益這邊來」，很單純，是一種接合的實踐，它建構一種言說，在那裡，一個團體——產業工人——的具體需求被認為是走向全體（包括克服資本主義）解放的幾步。無疑地，對於這些要被以這種方式接合起來的需求來說，沒有基本的必然性。可是對於要以另外的方式接合起來的它們來說，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設使這種接合的關係不是一種必然性的關係，那一樣也沒有基本的必然性。關於「歷史的利益」的這種言說所做的，就是要把某些需求以**文化霸權的方式實現**。在這方面，庫特勒等人是完全對的：政治實踐組織了它所代表的那些利益。可是如果我們仔細地考察一下，我們會注意到，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劃分絕不是被鞏固下來的，而是以此方式**被剷除了**的。因為，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解讀直接的經濟鬥爭，是以言說的方式來接合政治和經濟，因而是除掉在這兩造之間存在的外在性。這種選擇是很清楚的：不是政治和經濟之間的劃分是在先驗地保證它的言說之外的層面產生，就是那種劃分是言說實踐的結果，而且不可能先驗地使它免掉每一種把它們的統一性組織起來的言說。如果立場的分散是任何接合實踐的一

種條件，那就不是正因為如此，分散才必然應該採取社會當事人的經濟一致和政治一致之間的這種劃分的方式。假使經濟一致和政治一致被縫合起來，那任何展現關係的條件會明顯地消失：我們已經回到同義反覆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中，代表人和被代表的人都是屬於一個單純有關聯的一致的環節。讓我們反過來承認，既不是當事人的政治一致也不是當事人的經濟一致是體現為一個統一起來的言說的不同環節，而且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含有緊張性的不穩定統一體。我們已經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這些術語中的每一種被阻止它們穩定地接合起來的一詞多義暗中破壞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是**和**不是**表現在政治中，反之亦同；這種關係不是字面差異的關係，而是這兩種術語之間不穩定的類推。那麼，通過譬喻的轉變，這種存在的方式就是展現的 *fictio iuris* (幻想) 打算要思考的方式。展現因此不是被建構成為一種明確的關係；而是被建構成為一種不穩定的搖擺領域，一如我們所知，它最後不是由於代表人和被代表的人之間的每一種聯繫打破而使幻想如實地表現出來，就是由於它們合併作為一個單純的一致的環節，而使各自的一致消失。

所有這一切都向我們證明，主體這一範疇的特殊性既不能夠通過把「主體立場」的分散絕對化，也不能通過把圍繞著「先驗主體」的這些「主體立場」同樣武斷地統一起來的方式來建構起來。主體的範疇是被同樣含混的、不完全的和一詞多義的、多元決定賦予每一種言說的一致的這種性質所貫穿。因為這樣，關於言說總體的這個鎖合環節（它不是在那個總體的「客觀」層次上被賦予的），在「賦予意義的主體」這一層次就不能夠被建立起來，因為屬於當事人的這一主體性是被同樣的、在當事人是其中一部份的那個言說總體任何其他地方上

顯現的不穩定和缺乏縫合所滲透。「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全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是希望完整（它是永遠被延宕下來）的這一願望對稱的表現。由於這種最後的縫合恰恰缺乏，主體立場的這種分散就不能構成爲一種解決的方案：設使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種最後設法把自己鞏固起來，作爲一種獨立的立場，那麼在它們內部就有把不可能存在的總體這一視野重新引進來的一種多元決定的遊戲。正是這場遊戲，才使得文化霸權的接合成爲可能。

#### 第四節 對抗和客體性

鎖合的不可能（即「社會」的不可能），到這個程度上已經被說成是每一種一致（它本身顯現爲差異的連續運動）的不穩定性質。可是我們現在必須問一下我們自己：沒有這樣的一些「經驗」，這樣的一些言說的形式嗎？即在它們裡頭，被顯現的東西不再是「先驗的指意」一直被延宕下來，而是這一延宕的空洞無用、最後不可能有任何穩定的差異，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的「客體性」。答案是是的。關於一切客體性限制的這種「經驗」，確實具有一種明確的言說存在的形式，而且這就是對抗（*antagonism*）。

對抗在歷史性的和社會學的作品中過去都會被廣泛地研究過。從馬克思主義到種種形式的「衝突理論」，關於對抗在社會中如何產生出來和爲何產生出來，都曾有過全面的說明。可是這種理論上的分歧確實顯出一個共同的性質：即討論幾乎都是專門集中在描述對抗和它們原始的起因。僅有很少很少數的嘗試曾經想要說明我們問題的核心：什麼是一種對抗的關係？對象當中的什麼樣的關係是它需要用來作爲

條件的？讓我們從很少數曾經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當中的一種討論來開始說明：換句話說，就是由科萊蒂 (Lucio Colletti) 對社會對抗的特殊性，以及對「現實的對立」(real opposition) 和「矛盾」這些範疇能夠用來說明那種特殊性的說法所進行的分析開始<sup>31</sup>。

科萊蒂從康德對於現實的對立 (*realrepuganz*) 和邏輯矛盾之間的區分開始出發。第一種符合矛盾的原則，跟「A—B」的這一公式是對應的：它的項目中的每一項都有它自己的肯定性，不以它跟其他項的關係為轉移。第二種是矛盾的範疇，跟「A—非A」的這一公式是對應的：每一項跟其他項的關係詳盡地說明了兩者的現實。矛盾在命題的領域裡發生：它在邏輯—概念的層次上才有可能陷入矛盾。相反的，第一種對立發生在現實客體的領域中，因為沒有任何一種**現實的客體**是通過它跟其他客體的對立來詳細表明它的同一性的；它有它自己的一個現實，不以那種對立為轉移<sup>32</sup>。然後科萊蒂斷定說，跟作為把現實歸結為概念的一位唯心主義的哲學家、能把矛盾引進現實的黑格爾相反，這是跟像馬克思主義那樣的唯物主義哲學相互矛盾的，馬克思主義是從關於現實的那個精神之外的性質出發的。按照這個看法，馬克思主義因為把對抗看成是矛盾因而陷入了可悲的混亂中。科萊蒂的綱領是想重新按照現實的對立來說明前者。

讓我們注意一下，科萊蒂是從一種唯一的選擇出發的：**不是**某些東西是現實的對立，**就是**它是一種矛盾。這是從下列事實推論出來的：他的世界為僅有的兩類實體，即現實的客體和概念留有餘地；而且所有他分析的出發點和永遠的假設都是思想和現實之間的劃分。一如我們想要證明的，從那裡接下來就有一些結果出現，這些結果毀壞了「現實的對立」和「矛盾」這兩者作為能夠說明對抗這些範疇的這張證明

書。第一，可以看得出來，對抗不能是**現實**的對立。在兩部交通工具之間的一次衝撞中並沒有對抗：它是一個服從有事實根據的物理規律的物質的事實。把同樣的原則應用到社會領域中，將等於說：在階級鬥爭中對抗的東西是物理的行動，警察通過這種行動襲擊一位工人的鬥士，或者在議會中的一個團體的叫囂通過這種行動阻止了一群對立的份子說話。在這裡，「對立」是一個曾經以譬喻的方式被引申到社會世界（或者反之亦同）的一種物理世界的概念；可是顯而易見的，沒有一個地方是這樣僞稱，有一個意義的共同核心，它足以說明隱含在這兩種情況中的這類關係。爲了要提到社會世界，如果我們用「敵對的力量」來取代「對立的力量」，甚至會更加清楚——因爲在這種情況中，轉到物理世界的這一譬喻上的轉換，至少在荷馬以後的世界中，並沒有發生過。有人可能會反對說，不是對立的這種**物理**性質，才唯獨算得上它**邏輯之外**的性質。但是如何能夠把一種關於社會對抗的特殊性理論，放在跟兩種社會力量之間的衝突以及兩個石頭的碰撞所共有的邏輯矛盾單純地對立起來的這一基礎上，我們甚至是更看不出來<sup>36</sup>。

還有，像埃德格萊（Roy Edgley）<sup>37</sup>和埃爾斯特（Jon Elster）<sup>38</sup>指出的，在這個問題中有兩種不同的主張是被混淆在一起：(1)現實是矛盾的，和(2)矛盾存在於現實中。關於第一種，無疑的這種說法是自拆台腳。波柏（Karl R. Popper）對於辯證法著名的批判<sup>39</sup>，從這種觀點來看是無法反駁的。可是第二種主張是無可否認的：它是一個這樣的事實，即在現實中有一些只能夠按照邏輯的矛盾來說明的情況。命題也是現實的一部份，而且在矛盾的命題於經驗上是存在著的範圍內，可以看得出來，矛盾是**存在於現實中**。有人論證，而且也因爲一

批社會實踐——符號、信仰等等——能夠採用一種命題的結構，就沒有理由說它們為什麼不應該產生矛盾的命題。（可是在這方面，埃德格萊陷入了這種明顯的謬誤中，即認為矛盾命題這一可能的現實存在證明辯證法的正確性。辯證法是一種關於現實基本的矛盾性質的學說，不是關於矛盾在現實中的經驗存在的學說。）

因此看起來矛盾的範疇在現實內部有一個已經取得保證的地方，而且它從現實提供了可以說明社會對抗的這個基礎。不過馬上反省就足以讓我們確信，情況不是如此。我們所有的人都是一些互相矛盾的信仰體系，但並沒有對抗從這些矛盾中產生出來。因此，矛盾不必然意味著對抗性的關係<sup>⑩</sup>。可是如果我們把作為範疇來說明對抗性的「現實的對立」和「矛盾」兩者排除掉，看起來會是這樣：後者的特殊性就不能被人理解了。在社會學的或者歷史的作品中關於對抗的有用的說明，肯定了這種印象：它們說明了使得對抗成為可能的一些條件，但不是對抗本身。（這種說明是通過諸如「這引發了一陣反應」，或者「在這種情況中，X或Z發現它本身被迫作出反應」來進行的。換句話說，從說明到訴諸我們的常識或者經驗來圓融作品的意義，有一段突然的跳躍：這是說，說明是被打斷了。）

讓我們試著來解開這種打斷的意義。首先，我們必須問我們自己，是否無法把對抗比作現實的對立或者比作矛盾這點，並非就是無法把它比作某種這些種類的關係所具有的東西。其實，它們確實具有某些東西，而且這些情況是屬於——在第二種情況中的概念上的客體之間的，和在第一種情況中的現實的客體之間的——客體關係的事實。不過在這兩種情況中，正是客體已經是的某些東西，才使得這種關係可知。這就是說，在兩種情況中我們都跟完整的一致有關聯。在矛盾的



情況中，正是因為A**完全是**A，所以不成爲A就是一種矛盾——因而是一種不可能。在現實的對立這一情況中，正是因為A也**完全是**A，所以它跟B的關係才產生了一種客觀上可以決定的作用。不過在對抗的情況中，我們是面對著不同的情況：「他者」的存在讓我無法完全地成爲我自己。這種關係不是從完全的總體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它們的組成不可能中產生出來的。他者的存在不是一種邏輯上的不可能：它存在著；所以它不是一種矛盾。但是它也不是可以歸類爲一種在因果的鏈環中有事實根據的不同環節，因爲在那種情況中，這種關係將是由每一種力量是什麼來賦予的，將不會有關於這種存在物的否定。

（正是因爲一種物理力量是一種物理力量，所以另外的相同的和起抵銷作用的力量才造成停頓；相反的，正是因爲一位農民**不能夠**是一位農民，所以一種對抗才跟他把他從他的土地上趕走時一起存在。）在有一種對抗的範圍內，我不能成爲我自己的完整存在。不過它也不是使我跟這樣一種存在對抗起來的這種力量：它的客觀存在是我的不存在的一種象徵，而且這樣一來，它是被防止它被固定下來成爲完整的肯定性的一種多元的意義充塞著。現實的對立是事物內部的一種**客體**關係——這是說，可以決定的、可以說明的；矛盾是概念內部同樣可以說明的關係；對抗構成了被顯現爲部份的和不穩定的**客體化**的每一種客體性的範圍。如果語言是一種有差異的體系，那麼對抗就是缺乏這種差異：在這個意義上，它是把本身的位置放到語言的範圍裡頭，而且只能夠作爲它的破壞——這是說，作爲一種譬喻——而存在。我們因此能夠瞭解到，社會學的和歷史學的敘事爲什麼必須把本身打斷，超越它們自己的範疇來請示「經驗」，以填補它們的裂縫：因爲每一種語言和每一個社會都是以壓制無法穿透它們的這種意識的方式來建構

起來的。對抗避開了通過語言來被瞭解的這一可能性，因此語言只有作為打算把對抗所暗中破壞的東西固定起來的一種企圖，才能夠存在。

絕不是屬於一種客體關係的那種對抗，是一種這樣的關係，在它裡頭，每一種客體性的範圍都是被顯示出來的——這是說，在維根斯坦通常說，不能夠被說出來的那種能夠被顯現出來的東西的這一意義下。可是一如我們已經證明的，如果社會只作為建構社會的一部份努力才存在著——這是說，作為一個有差異的客體的和封閉的體系——那對抗作為最後不可能縫合的一種證明，就是關於社會的這一限制的「經驗」。嚴格地說，對抗不是社會內在的東西而是外在的東西；或者說得明確一點，它們構成了社會的範圍，即表明後者無法完整地把它本身組織起來。這種說法看起來或許奇怪，不過這只是在我們偷偷地把某些必須小心地從我們的理論思考角度中剔除的假設引進來時才這樣。尤其是，兩個這類的假設會使我們有關對抗的理論所在的論點弄含糊。第一種是把「社會」跟生活在一定領域內部物理上存在的當事人的總和等同起來。如果這種標準為人所接受，那麼可以看得出來，對抗是在那些當事人內部發生的，而不是在他們外頭發生的。不過從當事人的這一「經驗上的」共同存在，不見得必然接下來就是他們內部的關係應該是按照客體的和可知的模式來構成。（把「社會」跟指涉的東西等同起來，代價會是把社會任何合理的可以指明的內容架空。）可是承認了「社會」是一個可知的和客體的總和，如果我們把那個被看成是一個經驗總體的社會基本原則的性質賦予那個理性總體，就會引進另外跟我們的分析不相容的假設。因為這時第二種假設的任何方面將不再是不能被再合併成為第一種假設的一個環節。在那種情況中，像每一件其他的東西一樣，對抗將必須是社會的肯定的內在環節，而

且我們也會回到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詐那裡去。可是如果我們把我們關於社會的概念看成為不是已經被縫合的空間，看成為所有的肯定性都是譬喻的和可以推翻的一個領域，那麼就無法把屬於客體立場的否定可以說明它的一個基本的肯定性——不管它是原因或者任何其他的形態。對抗作為一定體系的否定，非常單純，是那個體系的限制，而不是比較廣泛的總體的環節，跟這個環節相比，對抗的兩極會構成不同的——即客體的——部份層次。（請不要誤解：使得對抗成為可能的那些條件，我們可以把它們說成是肯定性，但是不能把對抗本身歸結為肯定性。）

我們必須從兩個不同的觀點來考察有關社會限制的這種「經驗」。一方面，作為一種失敗的經驗。如果主體作為被放進一種象徵體系中的一個部份的和譬喻的整合，是通過語言建構起來的，那麼任何對於該體系的質疑，將必定形成一種一致的危機。但是，在另一方面，這種失敗的經驗不是接近不同的本體論體系、接近超越差異的某些東西的門徑，這完全是因為……並沒有超越。社會的這種限制不能作為把兩種領域劃分開來的界線來加以研究——因為以超越界線的某些東西的觀念為條件的這種界線的觀念，要必須是客體的和肯定的——這是說，必須是一種新的差異。社會的這種限制是在社會本身內部作為暗中破壞社會、暗中破壞它想組成完整的存在的這一志向的某些東西，而被設定的。社會從來沒有完整地設法要成為社會，因為在社會裡的每種東西都是被它的範圍、被阻止它把它本身組織成為一個客體的現實的東西所貫穿。我們現在必須考察藉以把這種暗中破壞以言說的方式建構起來的方式。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需要我們確定對抗的存在本身所呈現的形式。

## 第五節 同等和差異

這種暗中破壞是怎麼發生的呢？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完整存在的情況就是有一種已經封閉起來的空間的存在，在這種封閉的空間那裡，每一種有差異的立場都是被固定下來作為一種特殊的和不可取代的環節。所以，暗中破壞那種空間、防止鎖合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分解每一種立場的特殊性。正是在這方面，我們早先關於同等關係的評論才取得所有它們的相關性。讓我們舉一個例子。在殖民地的國家裡，占主導地位的權力這一存在，是通過服飾、語言、膚色、習俗的差異這些多種多樣的內容日益顯現出來的。因為這些內容的每一種從它們跟殖民地人民有的共同差異來看，都同等於其他種，所以它就失去了它屬於不同環節的條件，取得了一種組成成份的浮動性質。因此，同等產生了暗中破壞第一種意義的第二種意義，即使第二種意義是寄生在第一種意義上：差異在它們被用來表述某種同樣構成所有它們的那種東西的這個範圍內，彼此就消除了。問題是要確定一下存在於各種同等的關係裡的那種「同樣的某種東西」的內容。如果通過一連串的同等，所有它的項目有差異的客觀決定因素都已經失掉了，那麼一致就是只有通過成為它們全部基礎的肯定的規定，或者通過它們對於外部的東西的共同指涉，才能夠取得。這些可能性中的第一種被排除了：共同的肯定的規定是以一種直接的方式來表述的，不需要同等的關係。可是共同的外在的指涉不能是某種肯定的東西，因為在那種情況中，這兩端之間的關係也能夠以直接的和肯定的方式建構起來，而且這將不可能完全地取消全部同等關係所含有的差異。例如，在馬克

思對於同等關係所做的分析中，情況就是如此。以價值實體方式出現的勞動的這種**非物質性**，是通過**物質上**多種多樣的商品內部的同等表達出來的。可是商品的物質性和價值的非物質性彼此不是同等的。正是因為這樣，所有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的區分才會被按照差異因而按照肯定的立場的角度來思考。可是如果一個客體**所有的**有差異的特質已經變成同等了，它就不可能表述任何關於那個客體的**肯定的東西**；這只能夠意味著，通過同等，某些東西是表述了這一客體**所不是的東西**。因此，把**所有**跟被殖民者對立起來的殖民者的肯定規定合併起來的同等關係，都不能創造一個含有兩者之間肯定的差異立場的體系，這完全是因為它把所有的肯定性消除了：殖民者在言說上被建構成是反對被殖民者的人。易言之，這種一致結果變成純粹是否定的。正是因為一種否定的一致不能夠以直接的方式——這就是說，肯定的——來表述，所以它只能夠以間接的方式，通過它的不同環節之間的一種同等來表述。因此，含混性就滲進了每一種同等的關係裡：被同等起來的兩項必定是不同的——否則就只有一個單純的一致。另外一方面，同等只是通過把那些項目的不同性質暗中破壞掉的行動，才能夠存在。正是這個所在，才是我們早先說過的偶然性通過阻止必然性完全地把本身建構起來的方式，把必然性暗中破壞掉的地方。這種差異體系的非建構性活動——或者偶然性——是**顯現**在同等介入的那個不固定性上面。這種不固定性的**最後的性質**、所有差異的**最後**不穩定性，因此將在整個同等的關係（在這裡，所有它的各項有差異的肯定性都被消除了）中把本身表現出來。這恰恰是關於對抗、關於因此把本身確定為社會的限制的這種對抗的提法。我們應該注意一下，在這個提法裡，情況並不是被界定成爲肯定性的一端跟否定的一端對抗起來：因為屬

於一端**所有**那些差異的規定，由於它們跟其他一端的否定一同等關係，已經瓦解了，所以它們當中的每一種規定才專門顯示它們所不是的東西。

讓我們再次地強調：要成爲某種東西，就總是不成爲某種其他的東西（成爲A意味著不成爲B）。這種陳腐的東西不是我們正在維護的，因爲它是被放在完全受到矛盾原則所宰制的**邏輯**領域裡：**不成爲某種東西，就是完全成爲某種其他的東西的這一邏輯的結果**；成爲的這種肯定性宰制了這整個言說。我們所肯定的東西是某種不同的東西：**即某些言說的形式，通過同等，消除了所有客體的肯定性，賦予否定性本身一個真正的存在**。現實的這種不可能的性質——否定性——已經取得了一種存在的形式。當社會被否定性——這是說，對抗——滲透進去時，它就不能取得透明的、完整存在的身份，而且含有社會一致的那個客體性就永遠被暗中破壞掉。從這裡開始往前走，客體性和否定性之間的這種不可能的關係就已經變成了社會的構成物。但是這種關係的不可能性還在於：正是因爲這樣，所以一定不能把它各項的共存看成是一種邊界的客體關係，而一定要看成是對於它們的內容所進行的相互破壞。

最後這一點是重要的：如果否定性和客體性只是由於它們相互破壞才存在，那這意味著既不是完全同等的條件，也不是那些完全有差異的客體性的條件以前完全取得過。完全同等的情況是這樣的情況：言說的空間應該嚴格地劃分成爲兩個陣營。對抗不承認**中間物**。很容易看出原因在那裡。因爲如果我們把跟某些東西有關的而不是跟它所對立的東西有關的連串同等區分開來，那它的各項只能夠全然以否定的方式來說明。我們會在一個關係體系中，給它裁定一個特殊的位置：

這是說，我們會賦予它一個新的客體性。暗中破壞差異的這個邏輯在這裡並沒有找到一個限制。可是正如同差異的邏輯從來都不設法組織完全地縫合起來的空間一樣，同等的邏輯也從來沒有完成這個目標。通過同等的壓縮，從來沒有瓦解過社會當事人的立場那個有差異的性質。如果社會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這讓我們能夠提出下面的結論：如果社會本身因為從來都不能夠把自己組織成爲一種客體的領域，所以本身不是透明的，那對抗也不是完全透明的，因為它不全面地設法瓦解社會的這種客體性。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往前走，從關於同等和差異這兩個對立邏輯的觀點，來考察政治空間的建構。讓我們舉某種正好相反的情況的例子，在這些情況中，其中一個情況或其他的情況是占著主導的地位。我們在千福國運動中能夠找到一個關於同等的邏輯的極端例子。在這裡，世界由於一種並列的同等，分裂成爲兩個陣營：農民的文化表現出這個運動的一致，都市的文化體現著罪惡。第二種是第一種的否定的反面。已經取得了一個最大限度的劃分：在同等的體系中除了跟其他體系中的組成成份有的那些對立關係外，沒有任何一個組成成份發生關係。只有兩個社會。而且在相信千福國的暴動發生時，對於城市所做的攻擊是兇猛的、完整的和不加區別的：城市那裡並沒有能夠在一個同等的鏈環（在這一鏈環中，每一個人和每一種它的組成成份都象徵著罪惡）內部建立差異的言說。（唯一的選擇是大量地移民到另一個地區，以便建立完全跟這個世界的腐化隔絕開來的神都。）

現在讓我們考察相對的例子：十九世紀迪斯累利 (Disraeli) 的政治。迪斯累利作爲小說家，是從他的兩種國家——這是說，社會變成貧困和富有這兩個極端的明確分化——的概念開始出發的。對於這點，

我們必須補充同樣的「舊式政權」和「人民」之間的歐洲政治空間的明確分化。(在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聯合影響下，十九世紀的前半葉是一個同等直截了當的連鎖的時代。)這是迪斯累利想要變革的形勢，而且他的第一個目標是要克服社會空間並列的分化——這是說，要克服建構社會的不可能性。他的提法是明確的：「一個國家」。因為這樣，就有必要跟組成人民革命主體性、從共和主義延伸到多種多樣的社會和政治需求總和的這一同等的體系決裂。這種決裂的方法是：把需求分別地合併，即把需要從它們在人民這一環的連串同等中分離出來，把它們轉變成為體系內部的客體差異——這是說，把它們轉變成為「肯定性」，因而把對抗的這一邊界移到社會的邊緣。這種把純粹的差異空間組織起來的方式，會是一條有傾向的路線，它後來隨著福利國家的發展得到擴充和肯定。能夠以可知的和有秩序的社會架構來理解社會的總和，這是實證主義的幻想的重要環節。

因此，我們看到同等的邏輯是把政治空間簡單化的一種邏輯，而差異的邏輯則是把它擴充和增加它的複雜性的一種邏輯。從語言學舉一個比較的例子，我們能夠說，差異的邏輯有把語言這一語段的一端、能夠產生一種結合的關係因而能夠彼此產生連續性關係的這些立場的數量加以擴充的傾向；而同等的邏輯則把詞形變化的一端——這是說能夠彼此替換的這些組成成份——加以擴充，從而把能夠加以結合起來的這些立場的數量減少了。

直到現在，在我們提到對抗時，我們都是以單數來談它，為的是要簡化我們的論證。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對抗不必然在一點上出現：在差異體系中的任何立場，在它被忽略掉的這一範圍內，都能夠變成對抗的所在。因此，社會中有多種多樣的可能的對抗，它們當中的許



多是彼此對立著的。重要的問題是，同等連串的數目按照對抗所牽扯到的而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它們會以矛盾的方式來影響和滲透進主體本身的一致裡。這產生了下面的結論：社會關係越不穩定，任何一定的差異體系就越不能成功，對抗點就增加的越多。這種增加會使任何中心地位的組織更加困難，結果會更難建立統一起來連串同等。

（這大概是葛蘭西在「有機的危機」這一術語下所描述的形勢。）

因此，看起來是這樣：在分析成爲對抗的這一基礎的政治空間時，可以把我們的問題歸結爲決定斷裂點和它們可能的接合方式的這個問題。可是在這裡，我們進入到了一個危險的領域裡，在這裡我們的推理稍爲轉移一下，就會產生完全錯誤的結論。因此我們應該從一種印象主義的描繪開始出發，接著試著確定一下那種描繪的圖景妥當性的條件。看起來是這樣，在先進的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世界邊緣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差異性質可以加以確定：在前者那裡，對抗點的增加可以使民主鬥爭多重化，不過設使它們有多種多樣，那麼這些鬥爭就不容易構成一種「人民」，這是說，彼此產生同等，和把政治空間分化成爲兩個對抗性的領域。相反的，在第三世界的國家那裡，帝國主義的擴張和殘暴的、集中化的宰制形式占著主導地位，這從一開始就容易賦予群眾鬥爭一個中心，一個單獨的和明確地表明出來的敵人。在這裡，政治空間成爲兩個領域的這種分化，是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的，可是多種多樣的民主鬥爭就比較減少了。我們應該使用**人民的主體立場**這一術語，來談論在把政治空間分化成爲兩個對抗性的陣營的這一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立場：和使用**民主的主體立場**這一術語，來談論明確地劃定界線、不是以那種方式來分化社會的這一對抗之所在。

那麼，這種描述性的區分就使我們面對著一個嚴重的難題。因爲

如果民主的鬥爭並沒有把政治的空間分化成爲兩個陣營，成爲兩個同等並列的系列，那麼可見民主的對抗在跟其他的組成成份有聯繫的體系中就占有一個明確的位置；在它們內部一個肯定關係的體系就被建立起來了；同時減少了否定性附加在對抗上面的負荷。從這裡，離開肯定這些論點只有一步之遙，即民主鬥爭——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同性戀運動等等——是次要的鬥爭，而且爲古典意義上的「奪權」而鬥爭是唯一真正激進的鬥爭，因爲它是以恰恰是這種政治空間分成兩個陣營的分化爲前提的。可是難題從這個事實產生出來了：「政治空間」的觀念在我們的分析裡並沒有被賦予精確的定義，所以它是曾經被偷偷摸摸地弄成符合經驗上既有的社會形態。自然這是一個不合邏輯的證明爲一致的作法。任何民主的鬥爭都是在立場總和的內部、由多重的實踐（它們並沒有詳盡無遺地說明形成它們一部份的那些當事人涉及到的和經驗上的現實）形成的相對縫合的政治空間內部產生出來的。假定要建構可以讓這種空間分化成爲兩個陣營的一種總體，是需要某些內在性的界線，那麼這種空間相對的鎖合對於在言說上建構對抗就是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社會運動的自主性就不只是某種鬥爭要毫無妨礙地發展起來的一個要件了：它只是對抗本身得以產生一個要件。女性主義鬥爭的政治空間是在創造不同形式的婦女從屬的這一實踐和言說總和內部建構起來的；反種族主義鬥爭的空間是在構成種族歧視的多元決定的實踐總和內部建構起來的。可是存在於每一個這些相對獨立的空間內部的對抗，都把它們分化成爲兩個陣營。這說明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社會鬥爭不是直接針對著在它們自己的空間內部建構成的對象，而是針對著單純的經驗指涉——例如，作爲生物學上的指涉的男人或白人——時，它們就發現自己有困難。因爲，這些鬥爭

忽略了其他民主的對抗在裡頭出現的這種政治空間的特殊性。例如，舉一個把作為生物學現實的男人說成是敵人的一種言說為例。在有必要發展像為言論的自由而鬥爭，或者針對影響男人和女人的經濟權力之壟斷而鬥爭的這種對抗時，這種言說會變成怎麼樣呢？就那些空間變成為彼此獨立的這一領域來說，它有一部份是通過已經把各式各樣的從屬制度化的這些言說的形態建構起來的，有一部份是鬥爭本身的成果。

一旦我們把可以讓民主鬥爭激進的對抗性質變成可以說明的理論領域建構起來時，「人民」陣營的這一特殊性還有什麼東西呢？不是「政治空間」和作為經驗指涉的「社會」之間的不對映，消除了「人民」和「民主」之間唯一有區別的標準嗎？答案是：人民的政治空間出現在那些形勢中，在那裡通過一連串的民主同等，一種政治邏輯**就容易**把政治空間和作為經驗指涉的「社會」之間的裂縫彌合起來。以這種方式來看，人民的鬥爭只在占主導地位的團體和共同體其餘部份之間極為外在的關係這種情況中產生。在我們以前提到的千福國的情況中，核心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在農民的共同體和占主導地位的都市共同體之間，實際上沒有任何一種組成成份是共有的；同時在這個意義上，**所有**都市文化的特質都是反共同體的象徵。如果我們轉向西歐人民空間的擴張和組成的圈子，我們注意一下，所有的這些情況都跟權力的外在性和外在化的現象符合。法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初期階段是出現在百年戰爭的時候，這是說，出現在政治空間分化當中，這種分化是從像是外國政權存在的這麼一種東西那裡造成的。通過像聖女貞德 (Joan of Arc) 這麼一號平民人物的行動所進行的這種**國家**空間的象徵建構，在西歐是「人民」作為歷史的當事人出現的前幾個階段當中

的一個階段。在舊式政權和法國大革命的情況中，人民的邊界已經變成了內在的邊界，它的條件就是跟全國其餘的人對立的那些貴族和君主的劃分與寄生。可是通過我們已經指出來的那種過程，在十九世紀以來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裡，民主立場的多重化和「不平衡的發展」已經漸漸地讓圍繞著人民這一端的他們那個單純的、自動的統一體力量減弱。部份是因為民主的鬥爭非常成功，所以它們越來越不容易作為「人民的鬥爭」被統一起來。在成熟的資本主義裡的政治鬥爭的條件，跟十九世紀明確的「邊界政治」的模式離得越來越遠，有採用我們打算在下章要分析的一種新模式的傾向。在一勞永逸地取得的參照架構裡頭，製造「邊界效果」——它是跟對抗有關的那一否定性擴張的條件——因此不再是以明顯的和一定的劃分為基礎。生產這種架構、組織那些必須以對抗的方式彼此對抗著的一致，現在變成爲首要的政治問題。這無限地擴張了接合實踐的領域，把任何的邊界都轉變成了基本上是易於經常替換的含混的和不穩定的東西。到了這個地方，我們就有了可以確定文化霸權概念的特殊性的所有必要的理論組成成份了。

## 第六節 文化霸權

我們現在必須研究一下，如何把我們的不同的理論範疇聯繫起來，以便生產「文化霸權」的概念。文化霸權出現的一般領域是接合實踐的領域，這是說，一個「組成成份」不是體現成爲「環節」的領域。在有關聯的一致、其中每一種環節的意義都是絕對被固定住的封閉體系中，沒有給文化霸權的實踐提供任何地方。排除任何浮動指符的完

全成功的差異體系，不會讓任何的接合有其可能；重複的原則會宰制體系內部的每一種實踐，在那裡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搞文化霸權。這是因為文化霸權是以社會不完全的、任意的性質為前提，所以文化霸權只能夠在接合的實踐所宰制的領域產生。

可是這點馬上產生這樣一個問題：誰是接合的主體？我們已經看過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給這個問題提出來的答案：從列寧到葛蘭西，這個答案是主張——帶有我們早先分析過的所有細微差別和差異——文化霸權的力量最後的核心在於一個基本的階級。執行文化霸權的力量和接受文化霸權的力量之間的差異，被提出來當作是組成它們各自的層面之間的一種本體論上的差異。文化霸權的關係是建立在先於句法關係的那些形態範疇之上的句法關係。但是可以看得出來，這不能是我們的答案，因為恰恰是各層面的那個差異，才是所有我們先前的分析打算過要解決的東西。實際上，我們是再度面對著內在性／外在性的選擇，和兩個同樣本質主義的、如果我們把它接受下來當作是獨特的東西的話，就必須面對的解決方式。作為任何接合實踐主體的文化霸權主體，必然部份是它所接合的東西的那個外部的東西——否則，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接合。可是在另一方面，不能把這些外在性看成是兩種不同的本體論層面之間存在的外在性。結果看起來，這種解決方式是重新把我們的言說和言說活動的一般領域之間的區分引進來了：在那種情況中，執行文化霸權的力量和接受文化霸權的組成成份總和，兩者都是在同一個層面——言說的一般領域——把本身組織起來，而這一外在性會是跟不同的言說形態對映的東西。無疑的，情況是如此，但是必須進一步說明，這種外在性不能跟兩個完全被建構起來的言說形態對映起來。因為說明言說形態的東西是分散中的規則

性，如果那種外在性是兩個形態之間關係的一種有規則的特性，那麼它會變成爲新的差異，這兩個形態嚴格說就不會彼此是外在的。（因此，任何接合會再度消失。）因而如果以接合的實踐爲前提的這種外在性是被放在言說活動的一般領域，那它就不能是跟兩個完全被建構起來的差異對映的東西。因此它必須是在位於某種言說形態內部的主體立場，跟沒有明確的言說接合的「組成成份」之間存在的外在性。正是這種含混性，才使得作爲一種實踐（它設置一個波節點，這一波節點在有組織的差異體系內部把社會的意義部份地固定下來）的接合有其可能。

我們現在必須考察接合實踐的一般領域內部的那種文化霸權實踐的特殊性。讓我們從我們不說成是文化霸權的接合的兩種形勢出發。在一個極端中，作爲一個例子，我們能夠按照有效性或者合理性的標準，談到整個官僚體系的管理職能的重建。在這裡存有任何接合實踐的重要組成成份：一個有組織的、從分解的和分散的組成成份出發的差異——因此是環節——體系的建構。可是同時在這裡，我們不能談到文化霸權。理由是，要談到文化霸權，單單是接合的環節是不夠的。這種接合也一定要通過跟對抗性的接合實踐對抗起來的方式產生出來——換句話說，文化霸權一定要出現在由於對抗因而危機交錯的一種領域中，所以它是以同等和邊界效果的現象爲其前提的。可是反過來，不是每一種對抗都可以推定文化霸權的實踐是存在的。例如在千福國思想的情況中，我們就有最爲純粹的一種對抗，可是因爲沒有對於浮動的組成成份所做的接合，所以還是沒有文化霸權：兩個共同體之間的距離是從一開始就直接給定的和取得的東西，它並沒有以任何接合的建構爲其前提。一連串的同等不會建構共同體的空間：說得明確一點，它們是在先前存在的共同體的空間中產生作用。因此，進行文化

霸權接合的兩種條件是對抗性的力量存在，和把它們劃分開來的那些邊界不穩定。只有在範圍廣泛的這些浮動的組成成份出現，以及具有把它們跟對立的陣營接合起來的那種可能性——這意味著經常重新說明後者——才是組成可以讓我們說明作為執行文化霸權的一種實踐領域的東西。沒有同等，沒有邊界，就不可能嚴格地提到文化霸權。

在這方面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可以怎麼樣來填補葛蘭西分析的基本概念，雖然這不必然以讓我們超越葛蘭西的方向來使它們激進化。有關聯的體系普遍地式微限定了一定的社會空間或政治空間的一致，結果浮動的組成成份增多起來的這一種場合，是我們要仿效葛蘭西稱之為**有機的危機**的一個場合。它不是從單獨的一個地方跑出來的，它是環境多元決定的產物；而且它本身不僅僅是在對抗增多起來時顯現出來，而且也在社會一致一般的危機中顯現出來。通過波節點的設置和把**有傾向性**的有關聯的一致組織起來的辦法，相對地把一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空間統一起來，這就是葛蘭西所謂的**歷史性集團**。把不同歷史性集團的不同組成成份聯結起來的這種聯繫——不是任何形式的歷史先驗的統一體，而是分散中的規則性——是跟我們關於言說形態的概念一致的。在我們從藉以把歷史性集團組織起來的對抗性領域這一觀點，來考察歷史性集團的這一範圍內，我們會把歷史性集團稱之為**文化霸權的形態**。

最後，因為文化霸權的形態包含著邊界的現象，所以關於**障地戰**的這一概念就顯現出了它完整的意義。通過這個概念，葛蘭西帶來兩個重要的理論影響。第一種是肯定不可能有社會的任何鎖合：因為邊界是社會固有的，所以不可能把作為一種經驗指涉的社會形態劃歸到可知的社會形式項目下。每一個「社會」都通過把本身分化開來的方

式，這是說，通過把暗中破壞它的任何意義的累贅排除在它身外的方式，組織它自己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形式。可是在另一方面，因為那種邊界隨著在「陣地戰」中的變動而有不同，所以在對抗中那些行動者的一致也有改變，因而不可能在他們裡頭找到最後的、不是由任何業已縫合的總體提供給我們的波節點。在前面我們說過，關於陣地戰的這一概念產生了一個使戰爭非軍事化的作法；它實際上產生了更多的東西：它把激進的含混性引進了防止它被固定在任何先驗的指意中的這個社會裡頭。不過這是關於陣地戰的這一概念顯示它的範圍的地方。陣地戰是以社會被分化成爲兩個陣營爲先決條件，而且把文化霸權的接合說成是一種有關把它們劃分開來的這一邊界移動的邏輯。不管怎樣，顯而易見的，這種假定是不合邏輯的：即兩個陣營的存在，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是文化霸權接合的一種作用，而不是它先驗的條件——因爲，如果是這樣，文化霸權接合產生作用的領域本身就不是那一接合的產物。葛蘭西的陣地戰是以我們早先說成是人民的一致特有的這類政治空間的分化爲條件的。它勝過十九世紀關於「人民」(people) 的概念的地方在於，對葛蘭西來說，這種人民的一致不再是單純既定的某種東西，而是必須把它組織起來——因此它是文化霸權接合的邏輯；可是從這種舊的概念還有這樣的觀念留傳下來：這樣的組織總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作用的，即把以二分法劃分開來的政治空間內部的邊界加以擴充。這是葛蘭西的觀點變成無法讓人接受的地方。一如我們早先指出來的，這些政治空間增多起來以及它們接合的複雜性和困難，都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重要特點。因此我們要從葛蘭西的觀點保留接合的邏輯和關於邊界效果的這種政治中心地位，可是我們要除去這樣的一種假設，即一種單純的政治空間是要使那些



現象產生出來的**必要的**架構。因此，我們要提到在那裡意味著多元化政治空間的那些**民主鬥爭**，並且提到在那裡某種言說**傾向於**在兩種對立的領域中**建構**一種單純的政治空間分化的那些**人民鬥爭**。可是可以看得出來，基本的概念是「民主鬥爭」的概念，而且人民鬥爭則完全是從民主鬥爭內部多重化的同等作用產生出來的這些特殊的場合。

從以上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已經脫離開這兩個葛蘭西思想的基本層面了：(1)他堅持，執行文化霸權的主體一定要在基本的階級這一層面來組織；和(2)他主張，除了由有機的危機構成的間歇期外，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是圍繞著一個單獨執行文化霸權的中心來構成的。一如我們早先指出的，這些東西是在葛蘭西思想中還有的最後兩種本質主義的組成成份。不過因為放棄它們，我們現在就必須面對兩個對葛蘭西來說沒產生出來的相連串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層面的劃分，即像任何的接合關係一樣，是文化霸權設定的外在要素。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對於葛蘭西來說不產生任何問題，因為「集體意志」最後的階級核心在他的分析中不是文化霸權接合的結果。不過一旦這種最後核心的本體論特權已經被瓦解了，這些東西如何堅持呢？在成功的文化霸權的情況中，如果接合的實踐曾經設法建構關於差異的結構體系，即有關聯的一致，那麼文化霸權力量的這一外在的性質也沒有消失。它不是變成了歷史性集團內部的一個新的差異了嗎？答案無疑地必然是肯定的。差異體系曾經在裡頭如此被焊接在一起的形勢，會意味著文化霸權政治形式的完結。在那種情況中，就有從屬或者權力的關係，而不是（嚴格地說）文化霸權的關係。因為，連同層面劃分的消失、外在性這一要素的消失，接合實踐的領域也已經消失了。執行文化霸權的政治領域只有在社會

變動的、不具有已經縫合的性質增加時，才得以擴展。在中古的農民共同體中，提供給不同的接合的這種領域是減小，因此就沒有接合的文化霸權形式：在共同體發現本身受到威脅時，只有一種從封閉的差異體系內部的重複實踐到直截了當的、絕對的平等的出其不意地過渡。正是因為如此，文化霸權的政治形式在現代的初期才變成占主導地位。這時不同的社會領域的再生產產生在永遠變動的、經常需要建構新的差異體系的條件中。因此，接合實踐的這個領域被無限地擴大了。因而純粹把差異固定下來的條件和可能性縮減了；每一種社會一致都變成多種多樣的接合實踐（它們當中的許多是對抗性的）會合的地方。在這些環境下，就不可能取得一個完全的、把被接合的人和接合的人之間的裂縫完全彌合的內在化。但是重要的是強調，兩者都不可能讓接合力量的一致還是獨特的和沒有改變的。兩者都是受制於暗中破壞和重新界定的常態過渥。在很大程度上情況是如此，甚至於沒有任何一個同等的體系能免於被轉變成為新的差異的這一危險：眾所周知，許多團體跟體系的正面對立是如何地不再變成它外部的東西，而完全變成是該體系內部的一種矛盾又是固有的所在——這是說，另外一種差異。在反對的力量把該形態的基本接合體系接受下來，當作它所否定的東西，但是否定的所在是由形態本身的內在變數限定時，一種文化霸權的形態也包含反對著它的東西。所以剷除文化霸權政治形式的那些條件的理論規定也說明了現代這種形式經常擴大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文化霸權中心的單一性質。一旦我們不接受會把文化霸權描繪成為社會的**中心**，因此描繪成它的本質的這種本體論層面，顯然就不可能堅持文化霸權波節點的單一性質這種觀念。文化霸權，非常簡單，是一種**政治關係**，（如果我們希望這麼說的話）一種

政治的**形式**；不過不是一個社會地形內部的可以規定的所在。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中，會有多種多樣的文化霸權的波節點。顯然，它們之中的某些會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多元決定：它們會形成一些社會關係的凝聚點，因此變成多種多樣的總體化作用的焦點。可是因為社會是一種不可歸結為任何基本的統一原則的一種無限，所以一個社會中心的這種單純的觀念完全沒有意義。一旦文化霸權概念的身份地位和社會特有的多元性已經按照這些方式來重新說明，那麼我們就必須就存在於它們之間的關係形式自己研究一下。社會這種不可歸結的多元性時常被認為是領域的自主化過程和鬥爭的形式。這就需要我們簡略地分析跟「自主性」這一概念有關的若干問題。近年來，曾經有過相當多的辯論，例如有關「國家的相對獨立性」<sup>①</sup>的概念，可是它絕大部份是按照已經使它走入死胡同的方式來提出來的。一般來說，這些企圖是打算說明「國家的相對獨立性」是在接受一種業已縫合的社會這一假設的架構中被製造出來的——例如，通過經濟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所以（不管是國家或者任何其他實體的）相對獨立性的這個問題就變成無法解決。因為，不是由基本的社會規定建構的結構上的架構既說明了的自主性的限制，也說明了自主性實體的性質——在無論那一種情況中，實體都是體系另外的結構上的規定，「自主性」的概念都是多餘的；就是自主性的實體不是由該體系制約的，在無論那一種情況中，也必須說明它是在哪裡被建構起來的，而且也必須拋棄一種業已縫合的社會這種前提。恰恰是希望把這種前提跟與它不一致的自主性的概念結合起來的願望，才壞了大部份當代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辯論——尤其是普朗札斯的作品。可是如果我們放棄社會最後鎖合的這種假設，就有必要從不涉及任何最後的統一性基礎的一種多元的政

治的和社會的空間開始出發。多元性不是被說明的現象，而是分析的出發點。可是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如果每一種這些空間的一致都總是不穩定的，那麼就不可能單純地肯定自主性和分散之間的對等。結果既非全部的自主性也非全部的從屬，是似乎有道理的答案。這明白地指出來，問題不能在差異的穩定體系領域中來解決；自主性和從屬兩者——以及它們不同程度的相對性——都是只在接合實踐的領域中才取得它們意義的一些概念，而且在這些接合的實踐都是在危機交錯的政治領域中產生作用的這個範圍內，它們也都是只在文化霸權實踐的領域中才取得它們的意義的一些概念。接合的實踐不僅僅是在一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空間內部發生的，而且也是在它們之間發生的。整個國家的自主性——暫時假定：我們能把它作為一個統一體來談它——取決於一種政治空間的建構，這種政治空間只能夠是文化霸權接合的產物。而且對於存在於國家不同的部門和機器內部的統一性和自主性的程度，我們也能夠這樣說。這是說，某些領域的自主化不是任何東西必然的結構作用，而毋寧是精密的、建構該自主性的接合實踐的產物。跟文化霸權毫不矛盾的自主性，是文化霸權建構的一種形式。

對於其他重要的、近年來從自主性概念製造出來的用法，我們也能夠這樣說：自主性是跟通過新的社會運動的擴張所取得多元論聯繫起來的。在這裡我們是處在相同的形勢中。如果變成自主的主體或者社會力量的一致，是一勞永逸地被建構起來，那麼問題就只能夠按照自主性的方式來提出來。可是如果這些一致取決於某些明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存在條件，那麼自主性本身就只能夠按照比較廣泛的文化霸權鬥爭的方式來捍衛和擴充。例如，女性主義或者生態保護的政治主體，在某種程度上像任何其他社會一致一樣，是浮動的指符，而且

認為它們是一勞永逸地得到保證，認為已經把它們出現的言說的條件建構起來的領域是無法暗中破壞的，這都是一種危險的幻想。將最終威脅到某種運動自主性的這個文化霸權的問題，因此是一種以有害的方式來提出來的問題。嚴格地說，只有社會運動是一元的、彼此不相聯繫時，這種矛盾性才會存在；但是如果每一種運動的一致都永遠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取得，那麼在它外部發生什麼事情，就不能是無關緊要。在某種環境中，英國白種工人的階級政治主體性是由種族主義或者反種族主義的態度來多元決定的，這個事實對於移民進來的工人的鬥爭，顯然是重要的。這將會對於工會運動的某些實踐產生影響，反過來對於許多國家政策的層面會有影響，而最後反彈回來對於移民進來的工人本身的政治一致產生作用。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來，因為白種工人工會的戰鬥精神和種族主義或者反種族主義之間的接合不是一開始就被確定下來的，所以有一種文化霸權的鬥爭；不過由反種族主義的運動來從事的這種鬥爭的形式，部份會是通過某種活動和組織形式的自主化，部份會是通過跟其他力量聯盟的體系，部份會是通過把不同的運動內容當中的同等體系組織起來。因為，超出範圍，不在諸如反種族主義、反性別歧視和反資本主義的這些內容（任其發展，不必然會有湊合在一起的傾向）內部組織穩定的多元決定形式，就沒有任何一件東西能夠鞏固反種族主義的鬥爭。自主性再度跟文化霸權不是對立的，而是比較廣泛的文化霸權運作的一個內在的環節。（很顯然的，這種運作不必然是通過「黨」的形式，也不必然是通過一個單獨的制度設施形式，更不必然是通過任何其他形式的先驗安排。）

如果文化霸權是一種政治關係，不是地形上的概念，那麼可以看得出來，它也不能被看成是從一個不受規約限制的地方發射出來的那

些作用的擴散。在這個意義下，我們能夠說文化霸權基本上是轉喻：它的作用總是從產生自替換的作用的那種意義累贅那裡出現的。（例如，工會或者宗教組織在一個共同體中或許具有超出傳統的實踐賦予它們的、而且受到對立的力量挑戰的與抵制的那種組織的作用。）這種混亂的環節對於任何文化霸權的實踐來說是重要的：在階級的一致存在於一致文化霸權任務的外部這種形式下，我們從這種概念在俄國社會民主黨那裡那樣出現已經看到了；我們的結論是，沒有任何的社會一致曾經完全地取得過的——這是把接合的文化霸權環節的中心地位全部份量賦予接合的文化霸權環節的一個事實。因此，這種中心地位的條件是消除內在和外在外之間、偶然和必然之間的明確分界線。不過這產生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沒有任何的文化霸權邏輯能夠說明社會的總體，同時構成它的中心，因為在那種情況下，新的縫合已經產生出來了，文化霸權的那個概念也已經把自己消滅掉了。因此，社會的變動性是每一個文化霸權實踐的先決條件。那麼，這必然產生第二個結論：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文化霸權的形態不能夠求助於一個單獨的社會力量的特殊邏輯。每一種歷史性集團——或者文化霸權的形態——都是通過分散的規則建構起來的，而且這種分散包括非常分歧的組成成份的一種增加：這些組成成份就是，部份地說明有關聯的一致的那些差異體系；在對立的所在本身變成固定的，而且這樣一來構成了一種新的差異的範圍內，把後者暗中破壞掉但是能夠以漸進的方式恢復過來的一連串同等；集中在權力或抵制權力的不同形式上的多元決定形式；等等。重要的地方在於：每一種權力的形式都是通過同等和差異的這種對立的邏輯，以實用主義的方式和社會固有的方式來建構的；權力從來都不是**基本的**。因此，權力的問題不能是按照尋找

構成文化霸權形態的中心（設使在定義上這種中心總是規避我們）的這一階級或者這一占主導地位部門的方式來提出來。但是作為一種選擇提出來，不管是選多元論或者是選在社會內部權力完全分散，還是同樣不對。因為這會讓分析看不到波節點的存在，看不到存在於每一種具體的社會形態中的權力的部份集中。正是這個地方，許多古典分析的概念——「中心」、「權力」、「自主性」等等——如果它們的地位被重新確定下來的話，才能夠被重新引進來：所有的這些概念都是偶然的**社會邏輯**，這些社會邏輯就以這種方式，在明確的場合的和有關聯的、它們總是被其他的——時常是矛盾的——邏輯所限制的環境中取得它們的意義；但是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在界定一種反過來不能加以破壞的空間或者結構環節的這一意義上有絕對的妥當性。因此，在使任何那些概念絕對化的基礎上，不能夠取得一種關於社會的理論。如果社會不是通過任何單純統一的和**肯定的**邏輯縫合起來的，那麼我們對它的理解就不能提供那種邏輯。一種打算確定社會的「本質」的「科學」研究，實際上會是烏托邦思想的極致。

在我們結束前還有一個重點。在前面的論證中，我們提到作為一種經驗指涉的「社會形態」，和作為被接合起來的差異總體的「文化霸權的形態」。因此，同一種術語——「形態」——是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來使用著，我們一定要設法消除因而產生出來的含混性。比較一般形式的問題可以以如下的方式提出來：如果說經驗上既定的當事人的總和（在社會形態的情況中）或者言說環節的總和（在文化霸權形態的情況中），是被涵蓋在形態這個觀念所包含的總體裡，那是因為通過那個總體，就跟它們有別的某種東西來說，才有可能把它們給區別開來。因此，正是在它自己的領域這一基礎上，一種形態才作為一個

總體被建構出來。如果我們在文化霸權形態的情況中提出建構這些領域的問題來，那麼我們就必須把兩種層次區分開來：即跟每一種「形態」的可能性這些抽象條件有關的層次，和跟文化霸權的邏輯引進到它裡頭的這種特殊的差異有關的層次。讓我們從作為相對穩定的差異體系的這個形態的內在空間開始出發。可以看得出來，差異的邏輯不足以建構領域，因為如果它單獨是占主導地位的，在它們之前擺著的就只能夠是其他的差異，而且這些差異的規則性就把它們轉變成了形態本身的一部份。如果我們還是留在差異的領域內，那麼我們就還是留在不能夠思考任何邊界，結果瓦解了「形態」這一概念的無限的領域內。這是說，在差異這種有系統的總和，就**超出**它們的某些東西來說，能夠作為**總體**剪裁下來的範圍內，領域才能夠存在，而且正是只有通過這種剪裁，總體才把本身建構成為形態。如果從已經說過的東西來看，可以看得出來，那種超出不能夠存在於某種肯定的東西裡——存在新的差異中——因此唯一的肯定性是，它將存在於某種否定的東西裡。可是我們已經知道，同等的邏輯是把否定性引進到社會領域裡的東西。這意味著，一種形態只有通過把領域轉變成為邊界，通過把超出這一範圍的東西建構成為它**所不是**東西的那一連串的同等組織起來的辦法，才能夠設法把**本身的意義表明出來**（這是說，把本身以這種方式組織起來）。正是唯有通過否定性、分化和對抗，一種形態才能夠把本身組織成為一個總體化的層次。

可是同等的邏輯只是每一種形態的存在最抽象的和一般的情況。爲了要能夠提到文化霸權的形態，我們就必須把另外的、由我們以前的分析提供的條件引進來：換句話說，就是不停地重新說明社會的和政治的空間，以及不停地重新說明建構社會分化的領域那些常有的替



換過程(這是當代社會固有的)。只有在這些條件下，通過同等的邏輯形成的總體才取得一種文化霸權的性質。可是這會看起來意味著，在這種不穩定容易使得社會的內在邊界變成不穩定的範圍內，形態的範疇本身受到了威脅。而這正好是發生的事情：如果每一種邊界都消失了，那這就不僅是意味著這一形態是比較難以認識的了。因為總體不是一堆資料，而是一種建構，在組成它的一連串同等有一種斷裂時，這種總體就做出了遠超出隱藏它本身的某些東西：它瓦解了。

從這點可見，在用來指稱一種指涉物時，「社會形態」這個術語沒有意義。社會的當事人作為一種指涉物並沒有組成任何的形態。如果「社會形態」這個術語在一種明顯中立的方式中，例如打算指稱生活在一定的領域中的社會當事人，那麼關於那一領域的範圍這個問題馬上就呈現出來了。而在這裡就有必要確定政治的疆界——這是說，確定在跟當事人單純的指涉實體不同的層次上建構起來的形態。在這裡，有兩種選擇：不是政治領域是被看成為一堆單純的外在資料——在這種情況中，像是「法國的社會形態」或者「英國的社會形態」這些術語，幾乎就是指稱「法蘭西」和「英格蘭」，而且「形態」這一術語明顯地是多餘；不然就是當事人被重新整合進建構他們的種種的形態裡——而且在那種情況中，是沒有理由說明這些東西應該跟國家的邊界是一致的。某種接合實踐會使他們跟形態領域本身是一致的。可是在任何一種情況中，這都有一種任意的、將取決於多重的、形成一定空間的，而且同時在它內部產生作用的文化霸權接合的過程。

整個這一章，我們已經在我們論證的幾個地方，打算證明給否定性和對抗性一個基本和形成基礎的性質，以及保證接合的和文化霸權的實踐存在的這種社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現在我們必須再度繼

續進行前兩章中我們的政治論證路線，同時證明社會的不確定性和結果有的這種接合的邏輯，如何能夠讓我們把文化霸權和民主之間關係的這一問題以新的方式提出來。

- 
- ① Charles Taylor,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3 and, In general, Chapter 1.
  - ② Friedrich Hölderlin, "Hyperion Fragment," in *Hegel*, by Charles Tayl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5.
  - ③ A. Trendelenburg,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Hildesheim, 1964).
  - ④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 203. 本段出處全文非如此。——中文版譯者。
  - ⑤ *Ibid*, p. 206. (footnote)
  - ⑥ 一如能夠看到的一樣，我們的批判跟英國的興達斯和希爾斯特學派的批判在若干地方是一致的。可是我們跟他們的研究確實是有若干基本不同的地方。我們在本文的後面會談到這點。
  - ⑦ Étienne Balibar, "Sur la dialectique historique.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 in *Cinq études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Paris, 1984).
  - ⑧ Barry Hindess and Paul Hirst,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Barry Hindess and Paul 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7); Antony Cutler, Barry Hindess, Paul Hirst and A. Hussein,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2 Vols.

⑨ Antony Cutler, Barry Hindess, Paul Hirst and A. Hussein,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Vol. 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p. 222.

⑩ Paul Hirst and Penney Wooley, *Social Relations and Human Attributes* (London: Tavistock, 1982), p. 134.

⑪ Michel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1972), pp. 31-39.

⑫ 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p. 47-48.

⑬ 在一篇關於傅珂考古學方法的範圍的有見識的研究裡，布朗 (B. Brown) 和柯辛 (M. Cousins) (“The Linguistic Fault: The Case of Foucault’s Archaeolog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9, No. 3, August 1980) 說：「(傅珂) 並沒有把現象劃歸為存在的兩類：言說和非言說。對他來說，問題總是特定言說形態的一致。落在特定言說形態之外的東西，只是落在它之外而已。因此，並沒有加入一般存在形式的隊伍，即非言說裡。」就可能「把現象劃歸為存在的兩類」，這就是說，關於可以在一個總體內部來建立區域劃分來說，這點無疑是正確的。可是這並沒有消除有關思考這種言說形式的這一問題。接受非言說的實體，不僅僅具有地形上的關聯性；它也改變了言說的概念。

⑭ Michel Foucault, *op. cit.*, pp. 53-54. 德雷法斯 (Hubert L. Dreyfus) 和拉比諾 (Paul Rabinow) 在他們討論傅珂的書裡，瞭解到這段內容潛在的重要性，可是很快地拒絕，支持以「非言說」的身份出現的制度設施這一概念。見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2), pp. 65-66.

- ⑮在這裡，嚴格地來說包含著的東西就是「形態」的那個概念。這個問題可以以它最一般的形式，照下面這樣提出來：如果使形態具有特性的東西，就是分散中的規則性，那麼如何有可能確定那種形態的領域呢？讓我們這樣假定：有一種存在於這一形態之外的言說的實體或者差異，但它在這種外在性中絕對是規則的。如果生死攸關的這個唯一的標準是分散，那麼如何可能確定那種差異的「外在性」呢？在那種情況下，第一個要加以決定的問題便必須是，是否這一領域的規定取決於把本身添加到考古學事實之上的「形態」這個概念。如果我們接受第一種可能性，那麼我們就只引進跟那些一開始就已經在方法論上排除掉的實體——「作品」、「傳統」等等——同一類的實體。如果我們接受第二種可能性，那麼可以看得出來，在考古學的資料本身內部，必定存在著某些邏輯，它產生了能夠把領域構築起來，因而把形態構築起來的總體作用。一如我們要在本文中進一步論證的，這是由同等的邏輯實現的作用。
- 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從現象學出發，把現有的現象學的構想看成是打算克服「自在」和「自為」之間的二元論，並且建立一種可以克服被像是沙特 (Jean-Paul Sartre) 的那種哲學認為是不可克服的對立領域的一種企圖。因此，現象被看成是這樣的一種地方，在這裡「物質」和「精神」之間的聯繫被建立起來了，感性認識是比我思更為基本的始基層次。存在於每一種現象學裡的關於意義這一概念的領域，因為它是以「體驗過的東西」的這一不可歸結性為基礎，所以必然不會讓我們忘掉，在若干關於它的提法裡——尤其在梅洛－龐蒂的作品中——我們發現若干最為激進的企圖，它打算跟存在於每一種二元論形式中的本質主義決裂。
- ⑰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The MacMillan, 1983), p. 3.

18 *Ibid.*, p. 5.

19 對於認為這種言說第一性的觀點，將會使「唯物主義」成為問題的某種馬克思主義的反對意見，我們只提議通過馬克思的作品看一看。尤其是《資本論》（*Capital*）：不僅僅是在勞動過程起頭的地方關於蜜蜂和工匠的這一著名的段落，而且也是關於價值形式的全部分析，在那裡，商品生產過程——資本主義積累的基礎——的那個邏輯，被說成是嚴格地只通過在物質上有區分的客體內部建立一種同等的關係的方式，來把自己硬加在其他東西身上。從第一頁起——在評論巴爾本（Nicholas Barbon）的主張的時候——就這樣說：「『物都有內在的長處（這是巴爾本用來表示使用價值的專門用語），這種長處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如磁石吸鐵的長處就是如此。』磁石吸鐵的屬性只是在通過它發現了磁極性以後才成為有用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四八，註③。

20 利用這種「外在的東西」，我們不是要重新引進外在的言說這一範疇。這種外在的東西是由其他的言說組成的。正是這種外在的東西的言說性質，才產生了每一種言說易受攻擊的條件，因為沒有任何最後保護它的東西，來對抗從其外部產生作用的其他言說的接合扭曲它的差異體系，並使它的差異體系不穩定。

21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280.

22 一些最近的作品已經把關於不可能縫合，因而最後每種有關聯的體系內部是可知的這種概念，擴充到傳統說成是純結構的邏輯（即語言）的一種模式那種體系上。例如，高達特（Francois Gadet）和皮喬克（Michel Pêcheux）對於索緒爾曾經這樣指出來：「關於把詩作為一種特殊作用的所在，從全部語言孤立出來的這些理論，索緒爾的作品……使得詩成為每一種語言固有的一種無意中講出來的東西：索緒爾已經確定下來的東西，不是薩圖爾努斯詩體（Saturnian

verse)的性質，更不是詩的性質，而是語言本身的性質。」Francois Gadet and Michel Pêcheux, *La langue introuvable* (Paris, 1981), p. 57. 請參考Francois Gadet, "La double faille," in *Actes du Colloque de Sociolinguistique de Rouen* (1978); C. Normand, "L'arbitraire du signe comme phénomène de déplacement," in *Dialectiques*, No. 1-2 (1972); J. C. Milner, *L'amour de la langue* (Paris, 1978).

- ⑳請參考我們以前關於奔汶尼斯特對於索緒爾的批判所說過的話。
- ㉑請參考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Tavistock, 1970).
- ㉒關於這點，請參考 Ben Brewster, "Fetishism in *Capital and Reading Capital*,"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5, No. 3 (1976) 和 Paul Q. Hirst, "Althusser and Theory of Ideolog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5, No. 4 (1976).
- ㉓請參考 Ben Brewster, *op. cit.*; Paul Q. Hirst, *op. cit.*
- ㉔從「人」的這一用法到同時提到「人類」和「人類中的男性成員」的這種含混性，是我們打算證明的言說含混性的徵狀。
- ㉕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可是我們不應該跳到這樣的結論裡：湯普森完全誤解了阿圖塞。這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加複雜，因為如果湯普森通過把以人的本質的假定為基礎的「人道主義」，和以否定後者為基礎的「人道主義」對立起來的辦法，提出一個錯誤的選擇，那麼同樣正確的是，阿圖塞對人道主義的研究也很少給任何其他跟意識形態的領域有關聯的東西留有餘地。因為，如果歷史有一個生產方式的連續過程所賦予的一個可以理解的結構，而且如果它是可以接近「科學」實踐的這種結構，那麼這只能跟「人道主義」作為某種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一種雖然沒有被看成是錯誤的意識，可是在本體論上也是跟生產方式的邏輯所建

立起來的社會再生產機制不同，同時從屬於社會再生產機制的層面——所建構起來的東西的這樣一種觀念一起發生。從這兩種本質主義——圍繞著「人」和「生產方式」建構起來的——產生出來的死胡同走出來的出路，是解除建立表象／現實的區分的那些層面的劃分。在那種情況裡，人道主義的言說就具有既非先驗地不受束縛的也非從屬於其他言說的身份地位。

②9 *m/f*, No. 1 (1978), editorial note.

③0 請參考 Chantal Mouffe, "The Sex/Gender System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in *Rethinking Ideology: A Marxist Debate*, edited by Sakari Hänenen and Leena Paldan (Berlin: Argument-Verlag, 1983). 對女性主義的政治從這種觀點做歷史介紹的，可以在下列作品中找到：Sally Alexander, "Woman, 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History Workshop*, No. 17 (Spring 1984). 關於性的政治比較一般的問題，請見 Jeffrey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1981).

③1 這種概念已經由下列作品闡明了：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by Rayna R. Reiter, e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p. 157-210.

③2 這方面《男人／女人》雜誌的編輯並沒有完全忽略。例如亞當斯 (P. Adams) 和明森 (J. Minson) 就說過：「有某些形式的『適用各方面』的責任，它涵蓋多重的社會關係——即在多重的評估中負一般『責任』(反面的一端是『不負責任』)的人。但是不管這種適用各方面的責任看起來是多麼分散，它仍舊還是要滿足一定的社會條件，而且必須把『適用各方面』的責任構想成爲是一堆異質的身份地位。」 P. Adams and J. Minson, "The 'Subject' of Feminism," in *m/f*, No. 2 (1978), p. 53.

33 Antony Cutler, Barry Hindess, Paul Hirst and A. Hussein, *op. cit.*, Vol. I.

34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 in *New Left Review*, No. 93 (September/ October 1975), pp. 3-29; and Lucio Colletti, *Tramonto dell'ideologia* (Rome, 1980), pp. 87-161.

35 康德以下列的四項原則概括了現實對立在跟矛盾的差異中所具有的那些特點。

「首先，彼此對立的那些規定，一定要在同一個主體中找出來：如果在實際上我們提議一個規定是在一件東西裡頭，而另個規定不管它是什麼，是在另件東西裡頭，那麼現實的對立就跑不出來。其次，在現實的對立中，對立起來的規定從來就不是其他的一個矛盾的反面，因為在那種情況中，這種對比是邏輯性質的對比，而且一如我們早先看到的，這種對比也是不可能的。第三，一種規定以往是不能夠否定跟另個規定提出來的不同的任何東西，因為在後者那裡，不會有任何不管怎麼樣的對立。第四，如果在對立中它們沒有任何一個可以是否定的，那麼就像在後者的情況中一樣，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會提出被另一個取消掉的某些東西。正是因為這樣，在每一種現實的對立中，兩者的屬性都必須是肯定的，不過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即在它們於同一個主體內部的結合中，邏輯的必然結果是彼此相互取消對方的。這樣一來，在那些被認為每一個都是另一個的否定的東西的情況中，在它們於同一個主體中結合起來時，結果等於零。」Immanuel Kant, "Il concreto delle quantità negative," in *Scritti precritici* (Bari, 1953), pp. 268-269.

36 有趣的是指出，凱爾森 (Hans Kelsen) 在跟麥克斯·阿德勒 (Max Adler) 論爭時，他十分清楚地理解到在說明屬於社會世界的對抗性時，需要走出獨特的現實對立／矛盾這一選擇。關於這點，對凱爾森立場的概括，請參考 R. Racinaro, "Hans Kelsen e il dibattito su democrazia e parlamentarismo negli anni Venti-Trenta," in *Socialismo e Stato. Una ricerca sulla teoria*



*politica del marxismo*, by R. Racinaro (Bari, 1978), Introduction to Hans Kelsen, pp. cxxii-cxxv.

- ③7 Roy Edgley, "Dialectic: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lletti," in *Critique*, No. 7, (1977).
- ③8 Jon Elster, *Logic and Societ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le Worlds* (Chichester: Books on Demand, 1978).
- ③9 Karl R. Popper, "What is Dialectic?"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by Karl R. Popper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69), pp. 312-335.
- ④0 在這方面，我們的意見跟本書其中一個作者在早期的作品中所表達的不同，在那本書裡，對抗性的這一概念是被劃歸到矛盾的概念中。見 Ernesto Laclau, "Populist Rupture and Discourse," in *Screen Education* (Spring 1980). 在重新思考我們早先的立場時，艾波拉 (Emilio De Ipola) 在一些談話中提出來的批判性的評論，已經證明是最有用的。
- ④1 關於在不同的當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說明中，研究國家相對獨立性這個問題的許多方式，請見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2).

## 第4章

# 文化霸權和激進的民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羅森堡（Arthur Rosenberg）在紐約流放途中總結他對法國大革命以來的當代歐洲史的反省<sup>①</sup>。這些結束他作為富於戰鬥精神的知識份子生涯的反省，是集中在一種基本的論點上面：社會主義和民主的關係，或者說得好聽一點，打算在兩者之間建立有機形式的統一性的企圖失敗。這種雙重的失敗——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失敗——在他看來是受到徹底決裂所宰制的一種持續疏離的過程。起初被視為一種人民行動領域的「民主」，是宰制著一七八九和一八四八年之間歐洲生活的那種歷史對立的偉大主人公。正是「人民」（在平民 *plebs* 的意義下，而不是在群氓 *populus* 的意義下），這一毫無組織的和被分化開來的群眾，才宰制著一七八九和一八四八年的街壘、英國憲章派的鼓動和義大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與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的動員。後來接下來是一八五〇年代長期的反動構成的重大斷裂；而在這時期結束，人民的抗暴再度崛起時，這些主人公已經變了。未來的主人公是工會或者初生期的社會民主黨（先是在德國和英國，繼而是在歐洲其他國家），它們在本世紀前三十年用越來越緊密的方式來鞏固它們自己。

這種斷裂過去時常被說成是被宰制的部門走向更高的政治合理性

的一種階段的過渡：在本世紀的上半葉，「民主」的這種無定形的性質、它在社會的經濟基礎上缺乏基礎，使得它基本上脆弱和不穩定，無法讓它本身在對現有的體系展開鬥爭時，建立成爲一種堅固的和永久的塹壕。僅有隨著無定形的「人民」瓦解，和用工人階級這一堅固的社會基礎來取代，人民運動才取得成熟性，讓它們能夠對占主導地位的階級進行長期的鬥爭。雖然如此，但是這種走向更高的、由工業化造成的社會成熟性階段，和走向更高的政治效率，其中「人民」不守法的暴亂將由階級政治的合理性和團結來取代的神秘過渡，對於在西班牙吃緊、希特勒 (Adolf Hitler) 正準備向奧地利吞併領土和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正侵略衣索匹亞 (Ethiopia) 的時候撰寫其大作的羅森堡來說，看來只能夠是一種拙劣的笑話。對於羅森堡來說，沿著階級路線這樣靠攏，相反的，成爲歐洲工人運動最大的歷史罪孽。工人無法把「人民」組織成爲一種歷史的當事人，對他來說是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缺陷，也是讓他能夠闡明整個從一八六〇年開始的曲折政治過程的這一阿里阿德涅 (Ariadne) 的線團。把已經統一起來的人民這一端組織起來，絕不是變成越來越簡單，而是越來越困難。因爲資本主義社會逐漸複雜和制度設施化——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的塹壕和防禦工事」——造成應該在觀念上已經「在人民內部」統一起來的那些部門的各階級合作和劃分。這種社會逐漸複雜的過程，在一七八九和一八四八年之間已經很顯明：

「在一七八九年，民主的任務是由以統一的方式來領導從屬的農民對抗領主貴族的鬥爭，和貧苦的市民對抗資本家的鬥爭所組成的。在這時候，這件工作是比在一八四八年的時候要容易做。其實，在這兩個時期之間，儘管產業無產階級大部份還是在小規模的產業中工作，

但是它們在重要性方面已經有如此大程度的增長，以致於每一種政治問題都昇高成爲無產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對抗……。這要求民主黨方面要有一種特殊的策略技巧，以便達成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之間的利益結合。如果想避免讓一群自耕農對眾多的小佃農和勞動者產生影響，就需要絕對現實主義的、再者複雜的策略。因此，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過後五十年的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已經變成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人在知識上却越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②

自然，組織反體系的人民這一端逐漸有的困難，在一八四八年之後才增加。實際上，羅森堡是努力想把他自己的方向擺在一個新的領域上。這種新的領域是受到他只有一知半解的徹底轉變所宰制的：即政治形式的式微（就這些政治形式來說，社會分成兩個對抗陣營的這種分化，是一種先於所有文化霸權建構的原始的和不可變動的事實材料③）和向新的、具有政治空間基本的不穩定特點的形勢過渡（在這種形勢裡頭，參加鬥爭的各方力量的那種一致都會被經常改變，同時要有一種不停地重新說明的過程）。易言之，羅森堡是以既有遠見又是遲疑的方式，來向我們說明文化霸權的政治形式普遍化的過程——一旦接合的實踐已經成功地決定了社會分化的那一原則，這種文化霸權的政治形式就把本身硬推出來作爲每一種集體一致出現的條件——同時向我們證明，「階級鬥爭」應該以自動的和先驗的方式，在這種原則的基礎上把本身組織起來的那種強烈願望，是一無是處。

嚴格地說來，人民／舊式政權的對立是最後的階段，在這階段中，社會的兩種形式之間的對抗性領域已把本身以明確的、經驗上特定的分界線形式表現出來（有已經註明的保留條件）。從這時候開始，內在

和外之在之間的分界線，即對抗性被按照兩種同等的對立體系的方式從那裡建構出來的這條分化的界線，變成越來越脆弱和含糊，而且它的建構結果成為政治的關鍵問題。這就是說，從這時候起，沒有文化霸權就沒有政治。這讓我們瞭解到馬克思的介入那種特殊性：他的反省是在一種階段中產生的，在這種階段中，按照人民／舊式政權這種二分法的方式所做的政治空間的分化，看起來已經窮盡了它的生產能力，而且無論如何不能夠組成一個能夠掌握處在工業社會的那個社會特有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的政治眼光。這時，馬克思力圖按照新原則的基礎來思考社會分化的這個基本的事實，即階級之間的對抗。可是這種新的原則從一開始就被一種徹底的不足暗中破壞了，這種不足是從這樣的事實產生出來的：階級對立不能夠把社會機體的整體分化成為兩個對抗性的陣營，也不能夠**自動地**把它本身作為一種政治領域的分界線重新生產出來。正是因為如此，肯定階級鬥爭作為政治分化的基本原則這件事，總是必須配置一些跟它完全地適用於未來有關的補充性假設：即歷史—社會學的假設——它是會造成把現實的政治鬥爭跟作為在生產關係層次建構起來的當事人的那些階級之間的鬥爭搞成一塊的社會結構簡單化的作法：關於當事人的意識的假設——即從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過渡。總之，重要的是，由馬克思主義引介到社會分化的政治原則裡來的這項改變，跟過去一樣堅持著雅克賓黨人設想的一種基本成份：**斷言有一個斷裂的基本環節，斷言有把政治建構起來的一種獨特的空間。**不過在我們已經被賦予一套關於能夠導致未來的這一過程的社會學假設的同時，當這種分化成為兩個陣營的既是社會的又是政治的分化跟未來是聯繫起來時，這種暫時性的特點就會改變。

本章我們要捍衛這樣的論點，即正是雅克賓黨人的和馬克思主義

的政治設想之間的延續性這一環節，才是必須通過激進民主的構想提出質疑。不接受有不受限制的斷裂點，和不接受鬥爭滙流成爲統一起來的一種政治空間，以及相反的，接受社會的多元性和不確定性，似乎對我們來說是兩種重要的基礎，從這些基礎出發，就能夠提出一種新的政治設想，它是徹底自由的，而且在它的目標方面是比古典的左派有的還要有更加無限遠大的抱負。首先，這需要說明它出現的歷史領域，它也就是我們要稱之爲「民主的革命」的這種領域。

## 第一節 民主的革命

我們所提出來的理論問題設定，不僅排除了把社會衝突集中在先驗的有特權的當事人身上的作法，還涉及到人類學性質的任何普遍原則或者根基，這種人類學性質的任何普遍原則或者根基在它把不同的主體立場統一起來的時候，也會賦予不可避免地要抗拒種種形式的從屬的一種性質。因此，在向權力展開的不同鬥爭中，沒有任何當然的或者自然的東西，所以有必要在每一種情況中說明它們出現的原因，和它們會採用的不同的調節。對抗從屬的鬥爭不能是從屬本身這一形勢的產物。雖然我們利用傅珂的說法能夠肯定，不管什麼地方有權力，什麼地方就有抵抗，但是也必須承認，抵抗的形式會是非常不同的。只有在某些情況中，這些抵抗的形式才會具有政治的性質，因而變成直接針對剷除從屬關係本身的一些鬥爭。如果整個幾世紀期間有過婦女對抗男性的宰制的多重抵抗形式，那麼這也只有在某些條件和特殊的形式下，要求平等（首先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其次是其他範圍的平等）的女性主義的運動才能夠出現。可以看得出來，當我們在這裡提

到這些鬥爭的「政治」性質的時候，我們並沒有按照被放到黨和國家層次上的這些需求的有限意義來這樣說。我們所提到的東西是一種行動，它的目標是改造在一種從屬關係中建構主體的社會關係。例如，某些當代的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傾向於不以任何方式通過黨或者國家，來改造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關係。自然，我們不力圖否認某些實踐是需要以政治的嚴格意義來說的那種政治的介入。我們希望指出來的是，作為社會關係的創造、再生產和改造的一種實踐的這種政治，不能把它擺在一定的社會層次上面，因為政治的問題是社會制度設施的問題，這是說，是在因為對抗而危機交錯的一種領域中說明社會關係和把社會關係接合起來的問題。

我們的中心問題是要指出直接針對不平等展開鬥爭，和向從屬關係進行挑戰的一種集體行動出現的那些言說的條件。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我們的任務是要指出這樣的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中，從屬關係變成了壓迫的關係，從而使本身變成為一種對抗的所在。我們在這裡開始討論由許多術語上的、最後以確定「從屬」、「壓迫」和「宰制」之間的同義性而告終的轉變所構成的領域。使這種同義性有其可能的基礎，顯然是「人的性質」的和統一起來的主體的人類學假設：如果我們能夠先驗地確定主體的這一本質，那麼每一種自動地否認它的從屬關係就變成了一種壓迫的關係。可是如果我們不接受這種本質主義的思考角度，那麼我們就需要把「從屬」從「壓迫」中區別開來，說明從屬變成為壓迫的這些明確的條件。我們會通過一種從屬的關係來理解，在從屬的關係裡頭，當事人是從屬於別人——例如，跟受僱者有關的雇主，或者在某種家庭組織的形式下，跟男人有關的婦女等等——的決定。我們會反過來，把壓迫的關係說成是已經把本身轉變成

爲對抗場所的那些從屬關係。最後，我們會把**宰制的關係**說成是那些從屬關係的形態，它們從它們之外的社會當事人思考角度來看，或者按照它們之外的社會當事人的判斷來說，被認爲是不正當的，因而或許是或者或許不符合實際上存在於一定社會形態中的壓迫關係。因此，問題是要說明壓迫關係是如何地從從屬關係中被建構出來的。可以看得出來，爲什麼本身被認爲是從屬的那些關係不能是對抗性的關係：一種從屬的關係只建立一套社會當事人之間的不同立場，而且我們已經知道，把每一種社會一致建構成爲**肯定性**的差異體系，不僅不能是對抗性的，而且還產生消除所有對抗性的理想條件——我們會碰上一個已經縫合了的、每一種同等都被排除掉的社會空間。只有到從屬的主體立場這一肯定的差異性質被暗中破壞掉的程度，對抗才能夠出現。「農奴」、「奴隸」等等，本身不能指出一種對抗的立場；只有按照不同的言說形態的角度，諸如「每一個人固有的權利」，才能夠暗中破壞這些範疇的不同肯定性，同時把從屬建構成爲壓迫。這意味著，沒有言說的、能夠藉以把從屬的言說打斷的這一「外在」的存在，就沒有壓迫的關係④。在這種意義下，同等的邏輯就取代了某些言說對於其他言說的作用。如果，一如有關直到十七世紀爲止的婦女的情況，把婦女建構成爲主體的言說總和完完全全地把她們固定在從屬的立場上，那麼女性主義作爲努力對抗婦女從屬的一種運動就不能夠出現。我們的論點是，只有從民主的言說變成爲可以用來把不同的抵抗形式接合上從屬的這時候起，使對不同類型的不平等進行鬥爭成爲可能的這些條件才會存在。在婦女的情況中，我們可以把伍史東克萊夫（Mary Woolstonecraft）在英國所起的作用，引來作爲一個例子。她在一七九二年出版的作品《維護婦女的權利》（*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曾通過在它裡頭製造的關於民主的言說的用法，來確定女性主義的誕生，民主的言說因此從公民之間政治平等的領域被轉移到性別之間的平等領域。

可是爲了以這種方式來動員，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原則首先就必須把自己硬推出來，作爲社會設想的新的母體；或者用我們的術語來說，組成政治建構中的基本波節點。關於西方社會的政治設想的這種關鍵性變化，是兩百年前發生的事，我們能夠按照這些角度來說明：同等的邏輯被轉變成爲社會生產的基本工具。正是要指出這種變化來，（取自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表述）我們才談到「民主的革命」。接著我們要指出屬於階層制的和不平等類型的一種社會結束了，這種社會是受神學—政治的邏輯統治的，在這種邏輯裡頭，社會體系在神的旨意中有它的基礎。這種社會機體被看成是每個人在裡頭看起來都是被固定在不同的立場上的一個整體。因爲只要這種全體主義的社會制度設施模式是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就無非是把同一種從屬的主體再生產出來的階層制關係的重複。民主革命初期階段中的這種基本的要素，能夠在法國大革命中找得到，因爲像富雷特(François Furet)已經指出的，它肯定了在社會設想中引進真正新東西的那種屬於它的人民的絕對權力。按照富雷特的說法，真正的不連續座落之所在正是在那裡：即在新的正當性的設置中、在民主的文化的發明中：「法國大革命不是一種過渡，它是一種起源，一種起源的幽靈。它獨特的地方就是把它歷史利益組織起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經變成普遍的正是這種『獨特的』組成成份：民主的首次經驗。」<sup>⑤</sup>如果像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過的，「正是法國大革命而不是美國大革命，才使得世界激動起來」<sup>⑥</sup>，那麼這是因爲它是把本身建立在除了人民之

外沒有別的正當性之上的第一次大革命。它因此正式引進了列福特 (Claude Lefort) 已經證明是新的社會制度設施模式的東西。這種跟舊式政權的、以《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爲象徵的決裂，提供了這些言說的條件，它們使得人們有可能把不同的不平等的形式說成是不正當的和違反自然的，因而使其等於是種種壓迫的形式。在這裡有屬於民主的言說的那種深刻的破壞力量，它可以讓平等和自由傳播到比較廣泛的領域中，因而作爲一種騷動的動因，對對抗從屬的不同鬥爭形式產生作用。十九世紀的許多工人鬥爭，以言說的方式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這種鬥爭基礎上建構他們的需求。例如在英國憲章運動的情況中，瓊斯 (Gareth Stedman Jones) 的研究<sup>7</sup> 已經揭示受到法國大革命深刻影響的英國激進主義思想在建構該運動和決定它的目標時的那種重要角色。(因此也是揭示要求普選權的那一重要角色，在這種角色方面，把憲章運動說成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角色的現象，一種新工業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表現的那些說明，很少描述。)

從在那兒受到影響的對於政治不平等所做的批判，通過不同的社會主義言說，就轉換走向對經濟不平等展開批判，這種轉換就讓人對於其他的從屬形式和新的權利的要求產生懷疑。因此，應該把社會主義的要求看成是這種民主革命固有的一種要素，而且只有在後來建立同等邏輯的這一基礎上才可以理解。同時這種輻射作用以逐漸多種多樣的方向增加。在女性主義的情況中，它是有關取得門徑的一個問題，對婦女來說首先是取得接近政治權利的門徑；後來是取得接近經濟權利的門徑；而且就當代的女性主義來說，是取得在性活動的領域接近平等的門徑。像托克維爾指出的：「是不能夠相信平等不會最後像傳播到其他領域那樣地傳播到政治的世界中。是不能夠把人看成他們本身

內部在某一地方都永遠不平等，而在其他地方都平等；而在某一時候他們却將在各方面都達到平等。」<sup>③</sup>

總之，是不能夠把從屬關係組織成爲建立在壓迫關係的基礎之上的一種封閉的差異體系——這種不能夠，意味著讓人從屬的人和從屬者彼此之間的一致這種**客觀性**，而不是由於他們的立場，他們才被併入該體系裡。在這方面考察一下工人鬥爭這一對抗性的有生力量所經驗到的這些轉變，是有教益的。無疑的，在十九世紀是**有激進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但是它們不是無產階級的鬥爭——如果就「無產階級」來說，我們所理解的是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所生產出來的這類工人，而不是資格和生活方式都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現成體制所威脅的手工業工人的話。這些「反動的激進派」——用卡亨（Craig Calhoun）的措辭來說——他們質疑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這些鬥爭強有力的對抗性性質，可以由這個事實來說明：這些鬥爭表達出了對於破壞手工業工人的一致和整個跟他們聯繫在一起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形式所做的抵抗。從這導致了整個拒絕資本主義正忙於移植的新的生產關係；在社會組織的兩個體系之間存在的這種完整的客觀性，產生了社會空間分成爲兩個陣營的這種分化，這種分化，一如我們所知，是每一種對抗性的條件。卡亨在批判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中，已經使人信服地證明，在那裡把一群異質的社會團體在「工人階級」這個標籤項下結集起來，是沒有充分地認出「舊的」工人和「新的」工人之間在他們的目標和他們動員形式方面的深刻差異。按照卡亨的說法，「前者是在強有力的共同體這個基礎上戰鬥，但是跟經濟變化的優勢力量是對立的。後者是在薄弱的社會基礎上戰鬥，但是是在生存在乍現出來的工業體系內部。這

種差異強有力地妨礙著持續發展的一種觀念，而且對於工人階級的激進化越來越有影響。」<sup>⑨</sup>

在英國正是趨近於十九世紀中葉，而在歐洲其他地方正是趨近於本世紀末的這時候，才出現一種能夠被嚴格地認為是資本主義產物的工人運動；不過這種工人運動有越來越不懷疑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本身——這些關係這時已經牢牢地移入了——的這一傾向，而且集中在爭取生產中的這些關係變革的鬥爭上。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會稱之為「改良主義的」，和認為跟以前的社會鬥爭相比是往後退一步的那些鬥爭，實際上比較符合產業無產階級動員所採用的模式，而不符合比較激進的早先鬥爭所採用的模式。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從屬關係，因此某種程度上在統一的言說空間中是被合併成為合乎邏輯的不同的立場。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工人徹底動員的另個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德國和義大利的工人委員會——我們看到，他們在他們的基礎上也有多元決定的一些環境：大戰後社會秩序的崩潰、工廠的軍事化、泰勒化開始出現、有技術的工人在生產中的角色轉變。所有的這些條件，不是跟把屬於差異邏輯的這一執行文化霸權的能力降低的有機危機有聯繫，就是跟質疑傳統形式的工人一致的這些變革有聯繫。例如，我們不應該忘記有技術的工人在這些鬥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是一般人都承認的，不過却以不同的方式來說明的<sup>⑩</sup>。）對有些人來說，它是關於捍衛技術，來對抗已經存在的泰勒化危險的一個問題。對於其他的人來說，正是這些工人在大戰期間取得的這種經驗，才使他們思考自己組織生產過程的可能性，因而迫使他們跟他們的雇主對抗。可是在任何一種情況中，都是捍衛工人已經取得的某些一致（他們的技術或者他們在生產中的組織作用），才使他們反

抗。因此，我們能夠與我們上面提到過的「激進的反動派」建立一種類比，因為他們也正捍衛著一種受到威脅的一致。

不過以純粹的「階段論」的意義來理解權力的這種客觀性，好像在被超越的過程裡頭屬於一個階段的這個事實，在一種鬥爭中是激進思想的必要條件，這會是錯誤的；如果情況是這樣，那麼這些激進思想就只是捍衛性的鬥爭的特點而已。如果我們上述提到的這些「弄錯時代的」鬥爭，把成為每一種對抗條件的這種權力客觀性說明得很清楚，那某些社會變革反過來站在以言說的方式來建構的這種基礎上，也就能把激進的主體性的新形式組織成為直到那時候止都還沒有受到質疑的一種外在強制——因而成為種種壓迫——的從屬關係。這是民主的設想特有的同等替換產生作用的地方。關於激進鬥爭的這種比喻的表現，照過去以來的形勢來看是非常不現實的。它有很大部份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年新資本主義的輕鬆愉快感推論出來的，這顯然給體系這一方的進化論的吸納作法提供了一種無限的能力，同時說明朝向都把每種對抗性的有生力量瓦解掉的同質社會發展的一條直線趨勢，而且每一種集體的一致都是固定在差異的體系中。相反的，我們打算證明這種擴張過程的複雜性和時常矛盾的方面，因為在福利國家如日中天的時期滿足廣泛社會需求的這一行為，絕不能保證時常揭露整套從屬關係武斷性質的那種占主導地位的文化霸權形態無限的整合起來。因此，使平等主義的同等這一新的擴充有其可能的這個領域已經被開創出來了，從而以新的方向擴充了民主革命。正是在這個領域中，才產生出這些新的、在最近的辯論中時常在「新的社會運動」這一名稱下被結集在一起的政治一致的形式。因此我們應該研究一下這些運動的民主有生力量和這些運動的含混性，以及它們出現的這種

歷史環境。

## 第二節 民主的革命和新的對抗

不同的主體立場之間的同等替換——它是對抗出現的一個條件——因此可以在兩種基本的變種中把本身表現出來。首先，它可以是關於已經存在的從屬關係的一個問題，這種從屬關係由於民主設想的一種替換，被重新接合成為壓迫的關係。再次拿女性主義的這個例子來說，正是因為婦女作為婦女，被否定掉民主的意識形態在原則上承認提供給所有公民的一種權利，所以在建構從屬的女性主體時就出現了一道對抗性可以產生出來的裂縫。它也是跟要求政治權利的少數民族有關的情況。可是這種對抗性在其他的環境中也會出現——例如，在取得的權利是被質疑的時候，或者不會在從屬的形式下被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在某些社會變革的影響下開始如此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中，正是因為它被帶有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實踐和言說忽略了，所以一個主體的立場才變成為一種對抗的場合。可是在每一種可以讓抵抗的形式採取集體鬥爭的性質的情況中，是外在性言說的這一存在才阻礙了作為差異的這種從屬穩定化。

「新的社會運動」這個不能令人滿意的術語，結集了一系列的高度分歧的鬥爭：都市的、生態保護的、反威權的、反制度設施的、女性主義的、反種族的、種族的、地域的或者性別上少數人的鬥爭。所有這些鬥爭的公分母就是它們跟被認為是「階級」鬥爭的那些工人鬥爭的區分。堅持後一觀念這個有問題的性質，即它把一系列在生產關係層次上非常不同的鬥爭混合在一起，那是無意義的：因為它們是從

「新的對抗性」中保留出來的，爲的是要非常清楚地顯示根據「階級」這個有特權的身份地位建立起來的一種言說的持續性。那麼關於這些新的社會運動使我們有興趣的地方，不是武斷地把它們結集成一個跟階級的範疇對立起來的範疇這種觀念，而是它們在接合那種迅速擴散的社會衝突時所起的**奇特**作用，這種社會衝突擴散到越來越多的、成爲今日先進工業社會特點的多數關係中了。這是我們力圖要通過上面提出來的理論問題設定來分析的東西，它使得我們要把這些運動看成是民主革命向整個新的系列的社會關係所做的一種擴展。至於它們的奇特性，那是由於它們質疑新的從屬形式才賦予它們的。我們應該把連續性／不連續性這種關係的兩種層面區分開來。連續性這一層面基本上包括這樣的事實：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爲西方社會的「常識」，爲那種向托克維爾稱爲「條件的均等」的階層制原則所進行的越來越嚴重挑戰奠定了基礎。正是這種平等主義設想的持久性，才讓我們在十九世紀針對舊式政權遺留下來的不平等所進行的鬥爭和目前的社會運動之間建立一種連續性。可是從第二種觀點來看，我們能夠提到不連續性，是因爲相當大部份的新的政治主體，都是通過他們跟最近一些從屬形式的對抗性關係加以組織起來的，那些從屬形式則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移植和擴展，以及國家的逐漸介入產生出來的。正是這些新的從屬關係和在它們內部建立起來的對抗性，是我們現在要著手解決的。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重新組織這種背景中，發生在社會關係層次的一系列變化和新的文化霸權的形態才得以鞏固。後者明確地表明了**在勞動過程層次上的變化、國家的形式和可以在現有的社會交往形式產生深刻變革的文化擴散的這些占主導地位的方式**。如果

我們從經濟的觀點考察這個問題，那麼關鍵性的變化就是阿格里塔 (Michel Aglietta) 曾經稱之為從廣泛到深入的積累體系過渡的這個東西。後者的特點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散播到整個社會關係裡，後者並且從屬於為利潤生產的這一邏輯。按照阿格里塔的說法，這種過渡的基本環節是引進福特主義 (Fordism)。他把福特主義說成是「生產過程和消費方式的一種接合的原則」<sup>①</sup>。更加特別的是，它是圍繞著半自動化生產線組織起來勞動過程，和具有個人渴望得到為私人消費而大量生產的商品這一特點的消費方式這之間的接合。本世紀初開始和從一九四〇年代以來逐步昇高的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滲透，是要把社會改造成為一個龐大的市場，在這種市場裡頭，把新的「需要」不停地創造出來，而且把越來越多的人勞動產品轉變成為商品。這種社會生活的「商品化」破壞了以前的社會關係，用資本主義積累的邏輯藉以滲透到數目越來越多的領域裡的商品關係來取代它們。今天，不僅是作為勞動力的售賣者，個人才從屬於資本家，而且也是通過他或她結合進多重的其他社會關係裡，如文化、餘暇時間、生病、教育、性，甚至於死亡。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個人的或者集體的生活，是躲掉資本主義的關係的。

可是這種「消費社會」並沒有像貝爾 (Daniel Bell) 所宣稱的那樣造成意識形態的完結，也沒有像馬庫色所害怕的那樣讓單向度的人產生出來。相反的，許多新的鬥爭已經表明要抵抗這些新的從屬形式，和從新社會的內在深處內部來抵抗這種從屬。因此，正是自然資源的浪費、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以及這種生產觀念的後果，才產生生態保護運動。卡斯泰爾 (Manuel Castells) 稱之為「都市的」<sup>②</sup>那些其他的鬥爭，體現出了抵抗資本主義占領社會空間的不同形式。伴隨著經



濟成長的普遍都市化、把一般人民階層的人遷移到都市的邊陲地帶，或者把他們放逐到沒落的市中心，以及普遍缺乏集體的商品及服務，已經引起一連串的、影響到工作以外的整個社會生活組織的新問題。因此對抗和鬥爭可以從那裡產生出來的這些多重的社會關係：住處、消費、種種的服務業，全部都可以構成對抗不平等的鬥爭和要求新權利的領域。

這些新的需求必然也在凱因斯的福利國家（這種組織結構，已經是戰後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的事實）這一環境內部被提出來。無疑的，它是一種含混的和複雜的現象，因為一方面如果爲了要履行一連串新資本主義的積累制度所要求的職能，是需要這種新型的國家，那麼它也是波勒斯和金第斯（Herbert Gintis）稱之爲「世界大戰後的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調和」<sup>10</sup>這種東西的產物，因而是對抗資本主義所產生出來的社會關係變遷的這些鬥爭的產物。例如，正是破壞了共同體或者家庭類型（讓我們不要忘掉，它是以婦女從屬爲基礎的）傳統休戚相關的網絡，才迫使國家爲病患、失業者、老年人等等介入到種種的「社會服務業」裡。其他的地方，在工人鬥爭的壓力下，國家已經介入來保證新的勞工政策（最低工資、工作天的長度、意外和失業保險，以及社會福利工資）。如果我們同意科利亞特（Benjamin Coriat）的這種說法<sup>11</sup>，即由於集體契約的執行，和經過談判取得的把提高工資跟提高生產力結合在一起的協議，這種公家的計劃介入到勞動力的再生產中，以便讓勞動力服從資本家的需要，那麼情況還是這樣：這些東西都是已經給工人帶來真正重要好處的收穫。

不過國家在甚至於更廣泛的社會再生產層次上所做的這種介入，伴隨著的是它的作風逐漸官僚化，這種作風結果隨著商品化構成了不

平等和衝突的基本來源之一。在所有國家已經介入的領域裡，社會關係在許許多多新對抗的基礎上政治化。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擴充和新的官僚國家形式的擴張產生出來的這種社會關係的雙重轉變，在所有先進工業國家的不同組合裡都可以找得到。它們的作用一般都是相互補充的，雖然不是總是如此。例如，歐費(Claus Offe)已經指出來，跟社會福利工資聯繫起來的那些國家所提供的服務，是如何的能夠具有在「反商品化」的方向中產生的那些作用<sup>15</sup>。這後面的現象反過來影響到資本家積累的利益，它的程度到了利潤來源的活動範圍能夠是由公共部門來提供的地步。對於歐費來說，這種跟從種種的給付（它可以讓工人存活下來，不用被迫以任何的代價來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產生出來的「非無產階級化」聯繫在一起的現象，是資本主義經濟裡頭現有危機的重要因素。可是在這裡跟我們有關的關鍵性的東西是，要追蹤構成新的對抗基礎的這種官僚化的後果。重要的事實是，社會關係裡課徵在個人身上的多重形式的警戒和管理責任，以前都被認為是私人的領域構成的一部份。「公共的」和「私人的」之間的這種分界線的轉變，有含糊的作用。一方面，它有助於揭示社會關係的政治性質（廣義的說），而且這些東西總是各式各樣制度設施產物的這一事實，把它們的形式和意義賦予它們；在另一方面，假定國家介入具有官僚性質，那麼有關「公共空間」的這種創造就不是以真正民主化的形式來進行的，而是通過課徵在個人身上的新的從屬形式。正是在這裡，我們才必須尋找許許多多鬥爭產生出來對抗國家權力的官僚形式的那個領域。可是這不應該讓我們看不見許許多多指出對立方向的、賦予福利國家它特有的含混性的其他方面：即被稱之為「積極的自由」這種新型權利出現，同樣已經深刻地轉變占主導地位的常識，把正當性

賦予整個系列的對於經濟平等的要求，而且堅決要求新的社會權利。諸如皮汶（Frances F. Piven）和克羅華（Richard A. Cloward）所研究的美國「社會福利權利運動」<sup>16</sup>那類的一些運動，是一旦國家對於公民福利的責任得到承認，就對國家這樣需索無度的一個例子。正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這個觀念本身，才隨著社會國家被改造，因為「社會權利」現在是被賦予公民。結果，「正義」、「自由」、「公平」和「平等」這些範疇已經被重新說明過，而且自由—民主的言說也已經因為權利領域的這種擴張而被深刻地修飾過。

沒有一方面把社會衝突領域目前的這種擴張情況和因而出現的新政治主體這兩者放在社會關係商品化和官僚化的環境中，另一方面把——從為平等而鬥爭的這種發展造成的——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重新提出來，我們就不能理解這兩者。因為這樣，我們提到過，不應該把對抗這樣增加出來和質疑從屬關係看成是加深民主革命的一種要素。說明戰後時期文化霸權形態的這些社會關係變動的第三種重要的層面，過去也促成過民主的革命：換句話說，新的文化形式跟大眾傳播媒體的擴張聯繫在一起了。這些媒體可以使新的、會深刻地動搖傳統一致的大眾文化成為可能。在這裡這些作用又是含混的，因為跟一體化和一致化這些無可否定的作用一道，這種以傳播媒體為基礎的文化，也包含著暗中破壞不平等的那些有力的組成成份：在消費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言說，也把消費社會說成是社會的進步和民主的提昇，程度到了它讓絕大多數人接近範圍越來越廣泛的商品這個地步。那麼在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說得一點都沒錯：「跟物比起來，」我們是「脫離平等越來越遠了」<sup>17</sup>的這時候，成為傳播媒體行動不可避免的結果的那種平等和文化的民主化盛行的表象，就能夠讓人向以舊

有的身份形式為基礎的特權提出質疑。像消費者那樣，數目比以前還多的團體以它們的資格被建構成為平等的團體，所以它們就被迫拒絕繼續存在的那些現實的不平等。這種「民主的消費者文化」無疑地促成一些新的鬥爭出現，這些新的鬥爭在拒絕舊的從屬形式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就像在美國關於爭取民權的黑人運動的那種鬥爭的例子一樣。青年人的現象是特別有意思的，而且對於他們應該構成爲對抗性出現的一個新的主軸這點，沒有理由可以感到奇怪。爲了要創造新的必然性，他們越來越被建構爲消費者的一種特殊範疇，這促使他們去尋求社會不允許賦予他們的財力自主性。相反的，經濟危機和失業確實使他們的形勢艱難。如果我們拿家庭細胞的瓦解和它逐漸縮減成只具有消費的純粹職能，也拿缺乏整合這些「新的主體」（他們已經受到普遍對於統治集團的疑慮所影響）的社會形式來補充上這點，我們很容易地就瞭解到青年人的造反在工業社會中所採用的一些不同的形式。

這些「新的對抗」是抵抗社會生活商品化、官僚化和社會生活本身越來越同質化的這些形式的表現，這個事實說明爲什麼它們時常通過擴散黨派意識來彰顯它們自己，而且體現成爲對於自主性本身的要求。也正是因爲如此，有一股可以辨識的潮流，它是朝向評估「差異」和創造容易讓「文化」標準（衣服、音樂、語言、地域傳統等等）具有不受規約限制的一些新的一致這個方向發展。在關於民主設想——平等和自由——的這兩種偉大的論點這一範圍內，正是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關於平等的論點，要求自主性的這些要求才把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賦予自由。因爲這樣，許多有關抵抗的這些形式才不是以集體鬥爭的形式來顯示，而是通過一種越來越受到肯定的個人主義。（自然，左派還沒有準備好來考慮這些鬥爭，因爲即使到今天，左派也有輕率地

把它們說成是「自由派的」鬥爭的傾向。因此有這樣的危險，也就是說它們會被一種右派的，即捍衛特權的言說接合起來。）可是對抗性藉以體現（這取決於建構對抗性的這些連串的同等）的政治方向不管是怎麼，和不管是什麼，**這種對抗性的形式本身**在所有的情況中都是相同的。這就是說，在一批組成成份或價值（這些組成成份或價值，把本身與之對立的那些其他的組成成份或價值排除出去或者把它們體現出來）之間的同等這個基礎上，對抗性總是存在於社會一致——多元決定的主體立場——的建構中。我們再度發現我們本身面對著社會空間的分化。

這些「新的社會運動」在時間上屬於最後的，而且無疑也是目前階段中最積極的一種運動，就是和平運動。據我看來，它完全屬於我們已經提出來的理論架構。隨著湯普森所稱的「極端主義的邏輯」的這種擴張，越來越多人感覺到所有的權利中最基本的，即生活的權利，已經受到質疑了。另外，用途不是由國家來控制的那些外國核子武器在許多國家裡頭佈署，產生了新的需求，這些需求起源於國民有權利在政治領域行使的那種民主管理原則向國防領域擴張。關於防衛政策的言說——即傳統上屬於有限的軍事和政治精英所包圍住的禁區——從而因為本質上本身容納進去的這項民主的管理原則，而被暗中破壞了。

我們到現在為止捍衛的中心思想是：應該從社會關係的改造這種雙重的思考角度來理解這些新的鬥爭——和諸如婦女或種族上少數人的那些鬥爭此類的一些舊式鬥爭的激進作法——這樣的一種思考角度具有戰後時期新的文化霸權形態的特點，而且具有轉換成爲圍繞著自由—民主言說組織起來的、屬於平等主義設想的社會生活新領域這些

作用的特點。正是這一點，才提供了質疑不同的從屬關係和要求新的權利的必要架構。民主的設想在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冒出來的新的需求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譴責「無節制的民主」和「平等主義」浪潮的美國新保守派理解得非常清楚，在他們的看法裡，這些東西都使西方的政治體系超載。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他於一九七五年給「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的報告中說，在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為爭取更多的平等和參與而進行的鬥爭，已經激起了使社會「無法治理的」「民主波濤」。他下結論說，「民主理想的力量給民主的管理活動提出了一個問題。」<sup>18</sup>數目越來越多的爭取真正平等的需求，按照新保守派的看法，已經使社會走到「平等主義危險處境」的邊緣。正是在那裡，他們看到了依他們之見是平等思想已經經歷過的這一雙重變革的苗頭：它已經從機會平等轉換成爲最後大家都得到一樣的東西的平等，和從個人之間的平等轉換成團體之間的平等。貝爾認爲，這種「新的平等主義」，讓目標並非是最後大家都得到一樣的東西的平等而是「公正的能人政治」<sup>19</sup>的這種真正的平等理想，陷於危險的境地。那麼目前的危機就被視爲是「價值危機」的產物，就被視爲是「對抗者的文化」發展以及「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結果。

到現在爲止我們已經把新的對抗性和政治主體的出現，說成是跟民主革命的擴張和普遍化聯繫在一起的。實際上，我們也能夠把它看成爲是我們時常在我們的整個分析中碰到的種種政治作用的其他領域的延長。尤其是，這些對抗增多起來，使我們能夠以新的視野來考察社會鬥爭「統一的」主體分裂的這個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上個世紀末在它首次發生危機時刻發現它本身面對著的東西。一切關於重新

組織工人階級統一體的這些策略的鬥爭，正確地來考察，無非都是承認——確實是不情願地——社會多元性、所有的政治一致未曾縫合的性質的第一種舉動。如果我們**著重地** (*sous rature*) 解讀羅莎·盧森堡、拉布里奧拉和考茨基本人的作品，我們會看到多元性這一不可吸收的環節，是以一種或另外的一種方式出現在他們的言說中，破壞他們範疇的凝聚力。可以看得出來，這種多樣性不必然是分裂的否定環節，或者一如第二國際的理論家所以爲的那樣，是從資本主義的邏輯造成的人爲分化的反映，而是使得深化民主的革命**有其可能**的那個領域。一如我們要看到的，這種加深甚至於是在含混性和每一種接合的與重建的實踐中必須面對著的難題裡，都顯現出來了。把關於主體的那個範疇都說成是統一的、明白可見的和業經縫合的實體，就給承認在不同的主體立場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那些對抗的特殊性，因而也是加深多元的和民主的概念的這種可能性，開關了一條通路。對於統一起來的主體這一範疇所做的批判，和承認每一種主體在其內部組織起來的那種言說的分散狀況，因此就包含了遠超出關於一般理論立場的說明的某些東西：它們是思考多元性的**必要條件**，從這種多元性，對抗性就在社會中產生出來，因為民主革命已經跨過某道門檻了。這給我們一塊理論領域，在這塊領域的基礎上，關於**激進的和多元的民主**這一觀念——從這裡開始，它會是我們論證的中心——就找到第一批使它得以被理解的條件。僅僅在大家都承認，不能夠把主體立場引回到肯定的和統一的成爲基礎的原則——只有在這時候，多元主義才能夠被認爲是激進的。多元主義是**激進的**，是只有在這樣的範圍內才是可能的，即：每一個這種一致的多元性，都在它們本身內部找到它自己的妥當性原則，沒有必要在明白的或者構成基礎的肯定基礎上，找

尋關於它們所有的意義的層級，以及它們正當性的來源和保證。而且這種激進的多元性是**民主的**，也是在這種範圍內才是可能的，即：它每一項的自動組織的活動，都是替換平等主義設想的成果。因此，激進的和多元民主的構想，在**一種基本的意義上**，無非是站在同等的一平等主義邏輯這種普遍化的基礎之上，為各領域最大限度的自主化而鬥爭。

這種研究讓我們能夠重新把工人鬥爭本身切割成合乎規格尺寸，而且適當地處理在**整個**跟「新的政治主體」的鬥爭對照之下性質被扭曲的工人鬥爭本身。一旦工人階級作為「普遍階級」的概念被人拒絕，就變成有可能認識到被武斷地結集在「工人鬥爭」這種標籤下的這個領域裡頭發生的這些對抗的多元性，以及絕大多數對抗對於加深民主過程所具有的無可估計的重要性。工人鬥爭過去發生過許多次，而且在國家的角色、屬於不同種類的工人的工會實踐、工廠內外的對抗，以及現有的文化霸權的均衡點等方面，作為一種改造的作用採取非常多種多樣的形式。發生在一九六〇年代末的法國和義大利的所謂「新的工人鬥爭」，提供給我們一個極好的例子。它們充份地證明，工廠內部的鬥爭形式比起單純的生產關係的鬥爭形式取決於言說環境的程度還要大。學生運動的標語和鬥爭的明顯影響；跟老一代工人的文化完全不同的年輕工人所起的重要作用；法國的移民和義大利南方人的重要性——所有這一切，都向我們表明，工人所捲入的其他的社會關係，將決定他們在工廠內部所反應的方式，因而不能夠以魔術的方式把這些關係的多元性抹去，來組成**單純的**工人階級。那麼也不能把工人的需求歸結為一種單獨的對抗性，說它的性質在本體上是跟其他社會的和政治的主體的性質不同。



到目前為止我們提到過對抗性的多元性質，它們把東西集中在一起和受到多元決定的作用，都是在我們已經稱之為「民主革命」的這一架構內部為人所注意的。在這個地方，還是有必要說清楚，民主革命完全是這樣的一種領域，在這種領域上面有一種為平等主義的設想所支持的替換邏輯產生著作用，可是它沒有預先決定這種設想會產生作用的方向。如果這種方向是被預先決定的，那麼我們就應該已經建構了一種新的目的論了——我們就會身在跟伯恩斯坦的進化相同的領域上。但是在那種情況中，文化霸權的實踐就完全沒有餘地了。為什麼它不是這樣，以及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目的論可以說明社會的接合，原因就是民主革命這一言說的羅盤替一方面像右派的多元論和極權主義，另一方面像激進的民主那麼多種多樣的邏輯，開闢了道路。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建構能夠讓我們把我們本身定在後者的方向上的這種文化霸權的接合，那麼我們就必須在所有它們激進的異質性裡頭，理解在民主本身的領域中打開的這些可能性的範圍。

無可置疑的，新的對抗性和「新權利」增多起來，造成了戰後時期文化霸權形態的危機。可是藉以克服危機的這一形式絕不是被預先決定的，因為將藉以說明權利的方式和對抗從屬的鬥爭所要採取的形式，都不是已經明確地確定下來的。我們在這裡面臨了一種真正的多義性。例如，女性主義或者生態學都是以多重形式的方式存在著的，它們取決於藉以把對抗在言說上組織起來的方式。因此，我們有一種攻擊男人本身的激進的女性主義；試圖重新評估「女性活動」的那種有關差異的女性主義；和把跟父權制密不可分的資本主義看成是主要敵人的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因此，有站在不同的婦女從屬方式這一基礎上來建構一種對抗的言說形式的多元性。同理，生態學也

是反資本主義的、反工業主義的、威權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反動的等等。因此，有關一種絕不是預先決定的對抗的那些接合的形式，乃是文化霸權鬥爭的產物。這種肯定有重要的後果，因為它意味著這些新的鬥爭不必然有一種進步的性質，因此像許多人做過的那樣，認為它們自然而然地在左派政治有的環境中占有它們的位置，那就是錯誤的。許多人從一九六〇年代以後，全心全意地尋找新的有特權的、可以出來取代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因為工人階級被看成是在它解放的歷史任務中已經失敗了。生態保護運動、學生運動、女性主義和邊際的群眾，都曾經是最為一般人所喜愛的、執行這種新的角色的候選人。可是可以看得出來，這種研究方向並沒有避開傳統的問題設定，而只是取代它而已。並沒有任何一種獨特的有特權的、始終如一的作用的延續性可以延續下來，結果改造了整個社會的這種立場。所有的鬥爭，不管是那些工人的或者是其他的政治主體的鬥爭，放任它們去的話，都只具有部份的性質，都可以把它們跟非常不同的言說接合起來。正是這種接合，而不是它們出身的所在，才把它們的性質賦予它們。所以並沒有任何主體——此外，也沒有任何的「必然性」——是絕對激進的，而且因為占主導地位的體系而是無法復原的，也沒有任何主體成為整體改造的一種絕對保證的出發點。（同樣的，沒有任何永遠保證既定體系穩定性的東西。）正是涉及到這點，我們才認為某些非常有意思的、像是陶萊納（Alain Touraine）和高茲（André Gorz）的那些分析，在它們跟傳統的問題設定決裂時並沒有走得足夠遠<sup>20</sup>。例如，假定高茲賦予「非工人的那些非階級的人」那種他並不賦予無產階級的特權，那麼他確實無非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倒過來而已。它還是在生產關係的層次中起決定作用的所在，即使在（像在

高茲的例子那裡)革命的主體是用沒有那種涉入的方式來說明的時候。至於陶萊納，他對於能夠在「循序漸進的社會」起工人階級在工業社會所起的那種作用的社會運動所做的研究，很明確地指出來，他同樣沒有懷疑有關能夠在一定社會帶來激進變革的這種社會力量的獨特性的觀念。

抵抗新的從屬形式的這些形式是多義性的，而且能夠非常恰當地把它們接合到反民主的言說裡去，這點已經由於近年來「新權利」的挑釁而得到明顯的證明了。它奇怪的地方在於：它成功地接合成一系列關於對社會關係的變革採民主抵抗的新自由派言說。人民支持雷根(Ronald Reagan)和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粉碎福利國家的構想，由這個事實得到說明，即他們成功地把一整個系列抵抗新國家組織形式的那種官僚性質的活動動員起來對抗後者。每一個文化霸權的接合所組織起來的連串的同等，能有非常不同的性質，這點顯然通過這種新保守主義的言說得到證明，即圍繞著官僚化組織起來的對抗性，是在捍衛性和種族的這些傳統不平等中被接合起來的。這種捍衛已經取得的建立在白人、大男人主義基礎之上的那些權利的作法，助長了保守派的反動，因而擴大了它文化霸權作用的範圍。一種對抗性因而在兩端之間被建立起來：「人民」，它包括所有那些捍衛傳統價值和企業自由的人；和他們的敵人：國家和所有的顛覆份子（女性主義者、黑人、青年人和每一類的「極端放縱的人」）。有人因此打算建構一種新的歷史性集團，把多元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層面接合起來。例如，哈爾(Stuart Hall)已經指出來，柴契爾的民粹主義如何把「有機的保守主義——國家、家庭、天職、威權、標準、傳統思想——那些共鳴的論點，跟再生的新自由主義——自私自利、競爭性的個人主

義、反國家的思想——的這種侵略性的論點結合起來。」<sup>②</sup>在美國的情況中，杭特（Allen Hunter）則證明，新右派對於福利國家的攻訐是文化的批判和經濟的批判聚合在一起的所在。這兩人都肯定，國家「以像有道理的平等主義之名義，妨害了市場經濟和倫理特質。他們也因為國家在像是兒童的社會化和兩性關係這些領域中，介入到人民的私生活和社會的道德結構裡，而抨擊從事社會福利的自由主義。」<sup>③</sup>

恰恰是每一種對抗的這種多義性，才使得它的意義取決於文化霸權的接合到這種地步，即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文化霸權實踐的領域是從社會基本的含混性、從不可能以明確的方式來確定任何鬥爭的意義（不管是孤立地來考察，或者通過它在相關聯的體系中的固定性）這裡頭組織起來的。一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裡有文化霸權的實踐，是因為這種徹底的不固定性使它不可能把政治鬥爭看成是對立力量的一致從一開始就被組織起來的一種遊戲。這意味著任何具有文化霸權抱負的政治，從來都沒有把本身看成是一種**重複**，看成是產生在劃定一種純粹內在性界線的這一空間中，而總是一定在領域的多元性上把自己動員起來。如果每一種鬥爭的意義從一開始就都不是既定的，那麼這意味著它是只有在這種範圍中，即鬥爭移到本身之外，而且通過一連串的同等，把自己在結構上跟其他的鬥爭結合起來時，它才是一部份——固定著的。讓每一種對抗本身自行其事，每一種對抗就是一種浮動的指符，就是一種「任性」的對抗，它是不預先決定能夠藉以在社會形態中把它跟其他的組成成份接合起來的那種形式的。這就能夠讓我們在當前的社會鬥爭和在民主的革命之前發生的那些社會鬥爭之間，建立徹底的差異。民主革命總是在否定**既定的**、相對地穩定的一致這種環境中發生的；因此，對抗的邊界是明白可見的，並不

需要被建構起來——政治的文化霸權領域因而是**不存在的**。可是在目前的工業社會中，普遍有別的分裂所在增多起來，所有的社會一致不穩定的性質，也都造成了邊界的模糊不清。結果，分界線這一被**建構起來**的性質就因為分界線越來越不穩定，而變成更加顯而易見，而且邊界的移動和社會內部的分化就變成更加劇烈。正是在這種領域和從這種思考角度，新保守主義的構想才取得所有它文化霸權的領域。

### 第三節 反民主的攻勢

新保守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的「新右派」所質疑的東西，就是讓民主的自由主義證實國家介入到對抗不平等的這種鬥爭裡和建立福利國家是合理的這種說明。對於這種變革所做的批判不是晚近發展的事情。早在一九四四年時，在《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就對干涉主義的國家和這時被移植進來的種種形式的經濟計劃，進行過猛烈的攻擊。他宣稱，西方社會是處在變成集體主義的過程中，因此往極權主義的方向學樣了。按照他的說法，集體主義的門檻這時候已經跨過去了，即法律不再是監督行政的工具，而是被行政利用來把一些新的權力加在自己的身上，加速官僚主義的擴張。從這個地方開始，免不了法律的權力就沒落了，而官僚的權力就增加了。實際上，通過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待解決的問題是十九世紀期間完成的在自由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那種接合<sup>②</sup>。是多重鬥爭產物的這種自由主義的「民主化」，最後對於藉以思考自由的那種觀念的形式會有深刻的影響。從洛克（John Locke）的那種傳統自由的定義——「自由是不受限制和不受他人侵犯的」——開始，我

們隨著穆勒（John Stuart Mill）轉變為把「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參與接受下來，當作是自由的重要組成成份。最近，在社會民主黨的言說裡，自由已經變成意即做某種選擇和對一連串的現實選擇保持開放的「能力」。正是這樣，貧困、缺乏教育、生活條件非常不相稱，在今日才被認為是對於自由的攻勢。

新自由主義所想研究的，正是這種轉變。海耶克無疑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本身盡最大的全力，投入到重新提出自由主義原則的這種努力當中，以便向那些已經容許自由擴大和深化的那種意義的轉變挑戰。他提議重新把自由主義的「真正」性質確定下來，把它說成是力圖把國家的權力降到最低限度的這種學說，以便最大程度地增加重要的政治目標：個人自由。自由再一次地結果被以否定的方式界定為：「某些人被其他人強制在社會中盡可能地降低的那種人的處境。」<sup>24</sup>政治自由在表面上是從這種定義中被排出去了。按照海耶克的說法，「民主本質上（是）保衛內心平和和個人自由的一種工具、一種功利的設計。」<sup>25</sup>想回到傳統的、把自由說成是不妨害無限占有的權利，和不妨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那種自由概念的企圖，努力詆毀每一種自由的「肯定」概念，把它說成可能是極權主義的。它肯定，一種自由的政治體系只有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架構中才能夠存在。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資本主義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裡宣佈，這是唯一的一種尊重個人自由原則的社會組織，因為它建立唯一的能夠協調許多人的活動，不用依賴強制的經濟組織。所有國家的介入，除了跟不能通過市場來規劃的那些事情有關聯者外，都被認為是對於個人自由的一項侵害。社會或者重新分配的正義這一觀念，在它被引用來證實國家介入的這個範圍內，是新自由派的一個有利的

目標。按照海耶克的說法，它是在自由社會裡完全無法理解的一種觀念，因為「在每一個人都被容許爲他自己的目的來利用他的知識的這種體系裡，『社會正義』的這一概念必然是空泛的和無意義的，因為在它裡頭，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意志能夠決定不同的人的相關所得，或者防止他們部份地取決於偶然。」<sup>26</sup>

諾齊克 (Robert Nozick) 從「自由主義」的思考角度出發，同樣質疑這種觀念，即有像國家應該提供一種分配的正義的這樣一種東西存在<sup>27</sup>。根據他的看法，國家唯一跟自由相容的作用，就是在國家沒有權利開徵超出政策活動的發展所需的稅款時，保護正當地屬於我們的東西。跟美國極端的、拒絕一切國家介入的自由主義者相反<sup>28</sup>，諾齊克證明了最小限度的國家——這是說，法律和秩序——存在的正當性。可是超出範圍的國家將得不到合理的證明，因為在那種情況中，國家將侵犯到個人的權利。總之，諾齊克認爲，沒有任何一種現成可使用的東西是能夠由國家在法律上來分配的，因為每一件存在著的東西都是個人所占有的，或者是在個人正當地控制之下。

侵蝕自由主義和民主之間接合的這些暗中破壞的作用，另外的方式就是以新保守主義的方法，重新以這樣的一種方式來說明民主觀念本身，即限制它應用的領域，和把政治參與限制到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還要狹小的範圍之內。例如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提議，要「逐漸地把政治體系從社會中區分開來，開始把兩者看成是獨立的實體。」<sup>29</sup>目標是要把公共決策逐漸地從政治控制中移開，使公共決策成爲專家們專門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中，結果會是使經濟層次以及社會和政治層次中的基本決策非政治化。在他看來，這樣的一種社會「在一種自由主義的意義上」會是民主的；「民主的，這不是按照行

使有關決策的基本選擇權的角度來看的，而是按照維繫提供給個人自我表現的某種自主性範圍的角度來看的。」<sup>30</sup>雖然民主的理想並沒有遭到公然地抨擊，但它也是一種企圖，想把民主理想所有的實體都掏空，提出實際上有助於讓一種政治參與完全不存在的政權正當化的新的民主定義。

在法國新右派的理論家內部，對於民主有更加大膽無恥地和直截了當的批判。例如它主要的發言人班諾斯特 (Alain de Benoist)，就公開宣稱，法國大革命標誌著西方文明退化的幾個階段之一——這種退化是從基督教，即「古代的布爾什維主義」開始的。他進一步說，我們所必須拒絕的，正是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的精神本身。班諾斯特以很有技巧的方式從一九六八年的運動奪回一系列的自由主義的論點，他認為，在把重要的角色賦予普選權時，民主是把所有的個人都放在同樣的層次上，並沒有承認他們內部的重要差異。因此，就使公民身份一致化和一體化，他們的身上被硬性扣上證明民主必然的極權性質的一種簡單的規範。面對著一連串的同等平等=一致=極權主義時，新右派宣揚「差異的權利」，同時肯定這項結果：差異=不平等=自由。班諾斯特寫道：「我把『右派』稱為一種這樣的態度，它把世界的分歧，因而是 $\neq$ ，看成是一種善，而且把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雙重千福國的言說所支持和產生的世界逐步的同質化，看成是一種惡。」<sup>31</sup>

低估重新界定諸如「自由」、「平等」、「正義」和「民主」概念的這些企圖的重要性，會是一個錯誤。把次要的重要性賦予居政治哲學中心地位的這些問題的那種左派傳統的教條主義，本身是把基礎建立在這些問題的「上層建築」性質上面。最後，左派本身有興趣的只在



於有限範圍、跟下層結構以及在裡頭組織起來的主體有聯繫的問題上面，而整個文化的和以它為基礎的關於現實的定義的這廣泛領域，整個執行文化霸權來重新接合多種多樣的言說形態的努力，都自由地放任給右派主控。而且實際上如果整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概念（在跟右派聯繫起來的時候）都被單純地看成是資產階級宰制的上層建築形式的話，那麼要考慮有可能的不同態度——不陷入到粗俗的機會主義中——也是有困難的。不管怎樣，一旦我們放棄了基礎／上層建築的區分，不接受這樣的看法，即存有有特權的、能夠從這裡進行解放的政治實踐的地方，那麼就可以看得出來，就只有從有關把東西集中起來和政治建構的一種複雜過程，才能夠產生組織執行文化霸權的左派選擇的工作。沒有任何一種在社會現實的任何領域建構起來的文化霸權的接合，能夠對它漠不關心。能夠藉以把自由、平等、民主和正義在政治哲學的層次加以說明的形式，在多種多樣的其他言說層次中會有重要的結果，因此在關鍵的地方有助於形成群眾的常識。自然地，不能把這些擴散作用看成是在「思想」的層次單純地採用一種哲學的觀點，而是應該把它看成是一批比較複雜的言說—文化霸權的運作，它們包含多種多樣的、制度設施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層面，通過這些運作，某些「論點」就被轉變成為言說形態（亦即歷史性集團）的波節點。如果新自由派的思想已經取得了毫無疑問的政治共鳴，那這是因為它們能夠讓反對社會關係逐漸官僚化的這些抵抗，接合上我們早先提到過的東西。因此，新保守主義已經成功地提出它粉碎福利國家，捍衛個人自由來對抗壓迫者的國家的綱領。但是為了要使一種哲學成為「有機的意識形態」，在它所建構的這類主體和在其他社會關係的層次上組織起來的主體立場之間，就必須有某種的類似。如果關於個人

自由的論點能夠這麼有效地動員起來，那麼這也是因為自由主義一直保留麥克菲森(C. B. Macpherson)所謂的「占有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來作為個人的生產母體。「占有的個人主義」把個人的權利看成是在社會之前就存在了的，而且時常跟社會是對立的。在越來越多數的主體在民主革命的架構中要求這些權利的這個時候，占有的個人主義這個母體免不了就要破產，因為有些人的權利是跟其他人的權利相互衝突。正是在這種民主自由主義危機的環境中，才必須把這種攻勢的位置找出來，這種攻勢力圖瓦解自由主義和民主之間的接合有的那種暗中破壞的有生力量，因為它重新肯定自由主義作為捍衛個人自由，反對所有來自國家的介入，而且跟民主的、建立在權利平等和人民主權這個基礎之上的組成成份對立的這一中心地位。但是這種要限制民主鬥爭領域和要維護存於一些社會關係裡頭的不平等的努力，需要捍衛已經被自由主義本身危及到的階層制和反平等主義的原則。正是因為如此，自由派才越來越仰賴來源於保守主義哲學的一些論點，因為他們在裡頭找到了必要的組成成份來證實不平等的合理性。我們這樣就足以證明新的文化霸權構想、自由—保守派的言說出現了，這些言說是力圖把新自由派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作法，跟保守主義深刻的反平等主義文化和和社會傳統思想接合起來的。

#### 第四節 激進的民主：左派的選擇

保守派的反動因此具有明確的文化霸權的性質。它尋求深刻地轉變政治言說的條件，也想創造新的「現實的定義」，這些東西在捍衛「個人自由」的口實下，將使不平等正當化，並且恢復以前幾十年的鬥爭

已經破壞了的那種階層制的關係。在這裡生死攸關的東西，實際上是有關新的歷史性集團的締造。被轉變成為有機的意識形態的那種自由—保守主義，通過圍繞著個人主義的權利定義和否定性的自由概念把多重的主體立場統一起來的一套同等的體系，將建構一種新的文化霸權的接合。這時我們再度面臨了社會邊界的替換。在跟福利國家對映的文化霸權形態裡，被承認是**正當的差異**的一系列主體的立場，從社會肯定性的領域中被排除出去，而且被說成是否定性的——它們包括社會安全的寄生蟲（柴契爾夫人的「偷小東西的人」）、跟團體的特權有關的無效率，以及國家的補助津貼等等。

因此，可以看得出來，左派的選擇**只能夠**由建構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社會分化的不同的同等體系的這個活動組成。面對著重建階層制的社會的這一構想，左派的選擇應該是由把本身完全放在民主革命的領域，把對抗壓迫的那些不同鬥爭之間的一連串同等詳細加以說明的這點來組成。**左派的任務因此不能夠是跟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斷絕關係，而是相反的，要在激進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來深化它和擴充它。**除了這個事實，即這項任務有可能從討論個人權利的自由派言說的**意義**不是明確地固定下來的這種事實產生出來之外，我們要在下面幾頁說明這項任務的重要性；而且正像這種不固定性可以讓它們利用保守派言說的組成成份來接合一樣，所以它也可以有加重民主環節的不同接合形式和重新說明。這就是說，像利用任何其他社會的組成成份一樣，組成自由派言說的組成成份從來都不是以具體化的方式出現的，所以可以成為執行文化霸權鬥爭的領域。不是在放棄民主的領域時，而是相反的，正是在把民主的鬥爭擴充到整個市民社會和國家時，左派的文化霸權戰略才有可能性存在。如果左派希望成功地建立完全

座落在民主革命領域，而且意識到目前場合要求的那些文化霸權接合的深度和多種多樣性的一種政治實踐，那麼理解在左派的政治設想中是必要的那種變革的激進程度，就還是重要的。這項任務的基本障礙，就是從本書一起頭我們就注意到的這個東西：即本質主義的先驗思想。它是這樣的一種信念：社會是在某個地方已經縫合起來了，從這裡，就有可能把不以任何接合的實踐為轉移的任何事件的意義都固定下來。這種看法已經使人無法理解構成社會形態波節點的這一經常替換的狀況，而且使人按照嚴重地限制左派行動和政治分析能力的、有關「先驗的有特權的地方」的一種邏輯角度，來把言說組織起來。有關有特權的地方的這種邏輯，是在多種多樣的方向中產生作用的。從制約基本對抗性的觀點來看，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基本的障礙就是**階級主義**：亦即，工人階級是社會變革的基本動力之所繫的這個有特權的當事人的代表這個想法——這種想法沒有領悟到工人階級的那種取向是取決於力量的政治平衡，和多元的、有很大部份決定於階級本身**外部的**這種民主鬥爭的激進化。從凝聚完成變革的可能性的**社會層次**觀點來看，基本的障礙是**國家觀念**——即國家角色的擴張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的想法；和**經濟主義**（尤其以它的技術官僚眼光來看）——即有成功的經濟策略，才必然有能清楚地講出的政治效果的連貫性的想法。

可是如果我們尋找屬於這種本質主義固定性的最後核心，我們會在刺激過左派政治設想的基本波節點中找到它：那個波節點就是以雅克賓的模式來思索的「革命」的古典概念。自然，如果就「革命」那個概念我們所理解的是有關一批鬥爭在政治決裂點上的多元決定，結果是遍及整個社會組織的多種多樣的作用，那麼在這種「革命」的概

念裡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對它提出反對的意見。如果這是所有的已經被包括進去的東西，那麼無疑的，在許多情況中，暴力推翻鎮壓性的政權就是每一種民主發展的條件了。但是這種革命的古典概念不只包含這些東西：它包含著革命行動的**基本**性質、屬於權力凝聚點能夠從這裡把社會「理性地」重新組織起來的這種制度設施。這是跟激進的民主所需要的多元性和變動性相互矛盾的思考角度。再一次地把某些葛蘭西的概念激進化，我們就可以找到能夠容許我們重新把革命行動本身切削成合乎規格尺寸的理論工具。「陣地戰」的概念確實包含著每一種激進變革的**過程**性質——革命的行動完全是這一過程的內在環節。政治空間的多重化和防止權力集中在一個地方，這時就是每一種社會真正的民主變革的先決條件了。古典的社會主義概念假定，生產工具的私有制消失將產生一連串的影響，它在整個歷史時期中將導致所有的從屬形式根絕。今天我們都知道，情況不是這樣。例如，反性別歧視和反資本主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而且兩者之間的統一性也只能夠是文化霸權接合的產物。可見，在各別的、只在社會的**某種**領域中才發揮它們同等和多元決定作用的這些鬥爭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把這種接合建構起來。這需要鬥爭領域的自主化和政治空間的多重化。這些都是跟古典的雅克賓主義以及和它不同的社會主義變種所含有的權力和知識的集中相互矛盾的。當然，每一種激進民主的設想都必然包含著一種社會主義的特性，因為它必然剷除是許許多多從屬關係的根源的這些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可是，社會主義是激進民主設想許多組成成份當中的一種，非反之亦然。因為這樣，在我們把生產工具的社會化說成是激進和多元民主戰略的一種組成成份時，我們就必須堅持這種說法不能只是意味著工人的自治，因為生死攸關的東西

是全部的主體所進行的真正參與，決定什麼東西要生產，要如何來生產，和分配產品的方式。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有社會生產的占有。把這個問題歸結為工人自治的問題，就是忽略掉這樣的事實，即工人的「利益」能夠以這種方式來建構，即他們不須考慮生態保護的需求，或者不屬於生產者，但是受到在生產領域中所採取的決策影響的那些其他團體的需求<sup>②</sup>。

那麼從文化霸權政治的觀點來看，傳統左派思考角度的關鍵限制就是，它企圖**先驗地**決定變革的當事人、社會領域中產生作用的層次，以及有特權的地方和決裂的環節。所有的這些障礙結集成為一種共同的核心，則拒絕放棄一種業已縫合起來的社會這種假設。可是一旦把它拋棄了，就產生了整批我們現在應該處理的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總括成三個我們依次要說明的問題：(1)我們要如何來確定**浮現出來的對抗性的一些外觀和接合的形式**，這些東西就是激進民主的一種構想所應該包含的？(2)激進的民主所特有的多元主義，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是跟一如我們所見的成為每一種文化霸權接合特點的那些同等的作用相容？(3)隱含在民主設想的替換裡的這一邏輯，在什麼樣的程度上足以說明一種**文化霸權的構想**？

在第一點的地方，明顯可見的是，正如同隱含在社會地形中的先驗思想已經證明是站不住腳一樣，所以也不可能**先驗地**說明要在其上組織對抗性的那些外觀。例如，雖然可以在某些環境中思考幾種左派的政治，並加以說明，可是沒有**任何一種**左派的政治它的內容能夠從所有的環境指涉物孤立出來加以規定。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所有想**先驗地**著手進行這種規定的打算，都必然是片面的和武斷的，在大多數的環境中都是不具有妥當性的。戳穿了政治意義的獨特性——它是跟

不平衡的聯合發展現象聯繫在一起的——就瓦解了按照左派和右派的區分這一角度來把指意固定下來的每一種可能性。比如說，我們打算界定構成所有要在其中使用詞語的這些環境之基礎的關於左派的一個根本內容：我們就永遠找不到不出現例外的這樣的內容。我們完全是處在維根斯坦語言遊戲的領域裡：我們能夠走得最近的是找到「語族的相似性」。讓我們考察幾個例子。近年來關於需要加深國家和市民社會分界線的話談得很多。可是不難理解，這些提議並沒有用任何有關浮現出來的對抗性（它是能夠不理會有限數目的一些形勢來概括的）的這種外觀的理論來滋養左派。這點看起來是意味著每種形式的宰制都是被體現在國家裡頭的。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市民社會也是一些壓迫關係的所在，結果也是對抗和民主鬥爭的所在。由於對抗和民主鬥爭的結果的多少有跡可循，所以諸如阿圖塞關於「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的分析此類的一些理論，就努力想要創造一種概念的架構，以此來思考宰制領域中的這些替換的現象。在女性主義鬥爭的情況中，國家是在向性別歧視挑戰的立法中影響一種時常跟市民社會相違背的進展的重要工具。在許多低度開發的國家中，中央政府職能的擴張，是在對抗占有土地的寡頭進行剝削的那些極端形式的鬥爭中建立一種邊界的工具。還有，國家不是一種同質的媒介，不是由一道溝渠跟市民社會劃分開來的，而是一批力量懸殊的部門和職能，只有通過在其內部產生的那種文化霸權的實踐，才能夠相對地整合起來。尤其是，不應該忘掉，國家能夠是許多民主對抗的場合，它的程度達到這樣：一批在其內部的職能——例如，專業的或者技術的職能——在國家的內部，都能夠成為跟想限制它們和扭曲它們的那些權力中樞對抗的這些關係的一部份。自然這不是意味著說，在某些情況中，國家和市民社

會的區分**不能夠**構成基本的政治分界線：這是在國家已經被轉變成爲通過對社會其餘的部份施加壓硬扣上去的一種官僚贅生物時所發生的事情。例如在東歐，或者在蘇慕沙（Anastasio Somoza Garcia）的尼加拉瓜（Nicaragua），國家就是由軍事機器維繫的一種專政。總之，顯然不可能**先驗地**把國家或市民社會指出來當作是浮現出來的民主對抗的一種外觀。在問題是從左派的政治觀點來決定某種組織形式的肯定的或者否定的性質時，同樣可以這樣說。例如，讓我們考察一下「黨」的形式。黨作爲政治的制度設施，在某些環境中可以是充當群眾運動制動器的官僚主義體現的場所；可是在其他的環境中，它能夠是分散的和政治上純潔的群眾的組織者，因此能夠充當擴充和加深民主鬥爭的工具。重要的地方是，因爲作爲政治分析一種有根據的架構的「社會一般」這個領域消失了，所以在一些地形學的範疇——這是說，是這樣的一些範疇，它們以永遠的方式把某些內容的意義作爲能夠放在有關聯的複合體內部的差異固定下來——的基礎上來建立**一般的**政治理論的可能性也消失了。

從這項分析能夠取得的結論是，不可能**先驗地**說明浮現出來的對抗性的一些外觀，因爲沒有任何一種外觀不是經常被其他外觀多元決定的作用所暗中破壞的，同時結果也是因爲有一種顯示某些領域向其他領域發展那些特色的這些社會邏輯的經常替換。此外，我們在民主革命的情況那裡看到，產生作用的正是這種「證明的作用」。民主的鬥爭能夠使得把它在內部孕育出來的某些空間自動化，而且跟不同的政治空間中的其他鬥爭產生同等的作用。正是就這種社會的多元性來說，激進民主的構想才被聯繫起來，而且它的可能性是直接從社會當事人耗散的性質、從把社會的當事人組織成爲主體的這種言說的多元性，



以及從發生在那種多元性內部的替換散發出來的。民主思想原有的形式是被人跟肯定的和統一起來的人的性質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而且到那種程度，即它們有助於建構一個單獨的空間，在這種空間內部，人的那個性質就必須顯示它激進的自由和平等的作用：正是這樣，一個跟公民身份的觀念有聯繫的公共空間才被組織起來。公共／私人的區分構成了一種空間和多元性的私人空間之間的劃分，在前者裡頭，差異由於公民普遍的同等而被抹去了；在後者裡頭，那些差異的全部力量都被維繫住。正是在這個地方，跟民主革命有聯繫的這些作用的多元決定，才開始取代公共和私人之間的分界線，才開始使社會關係**政治化**：這是說，使這些空間多元化，在這些空間裡頭，同等的新的邏輯瓦解了社會有差異的肯定性：這是從十九世紀的工人鬥爭，一直延伸到婦女、多種多樣的種族和性別上的少數人、多種多樣的邊緣團體，以及本世紀新的反制度的鬥爭那裡的長期過程。因此，已經被戳穿出來的東西是關於政治組織的獨特空間的這種觀念和現實本身。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是比任何我們過去所知的還要激進的一種政治化，因為它有助於瓦解公共和私人之間的區分。看出這點所根據的角度不是統一起來的公共空間侵蝕了私人，而是嶄新的和不同的政治空間增多起來了。我們面對著**多元主體**的出現，它們的組織形式和多種多樣性，是只有我們放棄了作為被統一起來的和統一的本質的這個「主體」的範疇，才有可能去思考的。

可是政治的這種多元性，不是跟同等的作用（一如我們所見，它是對抗性的條件）產生出來的統一相互矛盾嗎？或者換句話說，激進的民主特有的這些政治空間增多起來，跟在同等邏輯的這一基礎上建構集體的一致這之間，不是有矛盾嗎？我們在這裡再一次地面對著自

主性／文化霸權明顯的二分法，我們在前面一章已經談到這點，我們現在應該考察它的政治含義和作用。讓我們從兩種思考角度來考察這個問題：(1)從這種二分法能夠把自己表現成爲排他性的這一領域的思考角度；以及(2)從可能性的思考角度和那種排他性的領域出現的歷史條件。

那麼讓我們從考察同等的作用和自主性之間這一矛盾的領域開始。首先，關於同等的邏輯。我們已經指出來，因爲對抗不僅僅是在組織它的已經二分的空間產生出來的，而且也是在總是溢出那一空間之外的這種多元的社會領域裡產生出來的，所以正是由於它本身產生出來，和把外在的組成成份用文化霸權的辦法整合起來，對抗性兩端的一致才得到鞏固。因此，強化特殊的民主鬥爭，需要把擴充到其他領域去的這一連串的同等擴充出來。例如，反種族主義、反性別歧視和反資本主義之間的這種同等的接合，就需要一種文化霸權的建構，這種建構在某些環境中，可以是鞏固這些鬥爭當中的每一種鬥爭的條件。那麼關於走到它最後的結果去的這一同等的邏輯，就會意味著構成這每一種鬥爭的空間自主性瓦解了：這不必然是因爲它們當中的任何一種鬥爭都變成了從屬於其他的鬥爭了，而是因爲嚴格地說，它們全部都已經變成了獨特的和不可分割的鬥爭的這些同等的象徵。這種對抗性因此已經取得了完全透明的條件，它的程度達到這樣：所有的不平衡都被消除掉了，組織每一種民主鬥爭的這些空間有差異的特殊性都已經消失了。其次，關於自主性的邏輯，這些鬥爭當中的每一種鬥爭就跟其他的鬥爭有關來說，都保留了它有差異的特殊性。組織它們當中的每一種鬥爭的這些政治空間，都是不同的，而且是彼此不能夠溝通的。可是很容易就看得出來，這種顯然是自由主義的那種邏輯，

只有在新的鎖合的基礎上才能夠維繫得住。因為如果每一種鬥爭都把它特殊性的環節轉變成為一致的絕對原則，那麼我們就只能夠把這些鬥爭的方向看成是走向**絕對的差異體系**，而且我們只能夠把這種體系想成是一種封閉的總體。這就是說，社會的透明性完全從同等體系的獨特性和可理解性，被轉移到差異體系的獨特性和可理解性。不過在這兩者的情況中，我們是正在研究通過言說的範疇，努力要宰制作為一個**總體**的社會的那種言說。因此，在兩者的情況中，總體的環節不再成為一種**視野**，而是變成為一種**基礎**。正是只有在這種理性的和同質的空間中，同等的邏輯和自主性的邏輯才是矛盾的，因為只有在那兒，社會的一致才被表現為是**已經取得的**和固定的，因此也正是在那兒，兩種**根本**矛盾的社會邏輯才找到這些**根本**作用能夠完整地發揮出來的領域。但是在定義上，因為這種根本的環節從來沒有抵達，所以同等和自主性之間的矛盾消失了。每一種變革的身份是：它不再是一套社會秩序的**基礎**，而是一套**社會邏輯**，它們在組織每一種社會一致中做不同程度的介入，而且部份地限制了它們相互的作用。從這點，我們能夠替一種激進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概念推論出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拒絕——在知識上或者政治上——宰制每一種社會被認定的「**根本基礎**」。每一種力圖把本身建立在關於這種基礎的知識的這一基礎之上的概念，都發現它本身遲早要面對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弔詭。按照這種弔詭的說法，人應該不能不是自由的。

發生在某些概念的身份裡頭的這種變革，即把以前是基礎的東西轉變成為社會的邏輯，能夠讓我們理解一種民主政治所根據的多種多樣的尺寸。首先，它能夠讓我們嚴謹地指出我們可以稱之為「民主的同等原則」的那個東西的意義和範圍。我們能夠指出這種意義來，因

爲它變成可以看得出來，關於平等主義設想的這種單純的替換，是不足以產生這種替換所產生作用的有關這些團體的一致的一種轉變。在平等原則的這一基礎上，以團體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團體能夠要求它跟其他團體平等的權利，除非到達這種程度，即不同團體的要求不同，而且在許多情況中，在它們內部是有矛盾。這就不會造成種種民主需求之間的任何真正的同等。在所有的那些情況中，因爲占有的個人主義的這個問題設定是被維繫作爲生產不同團體一致的母體，所以這種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就要成爲一種「民主的同等」而論，某些其他的東西是必要的：即要建構改變不同團體的一致的這種新的「常識」，這樣一來，每一個團體的需求就跟其他團體的那些需求被同等地接合起來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各個人自由發展爲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就是說，同等總是通過文化霸權的整合，因爲同等不單單是在既定的利益之間建立起一道「聯盟」，而且也是修改從事那種聯盟的這些勢力的那種一致。因爲在損害婦女、移民或者消費者的權利的情況下，不能夠捍衛工人的利益，所以就有必要在這些不同的鬥爭之間建立一種同等。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對抗權力的鬥爭才會變成真正是民主的，對於權利的要求才不是在個人主義的問題設定這一基礎上，而是在尊重其他從屬團體的平等權利這個背景下來進行的。但是如果這是民主同等原則的意義，那麼它的範圍也是明確的。這整個同等從來都是不存在的：每一種同等都是被導因於社會的不平衡性的這種組成成份的不穩定性所滲透。程度達到這樣，所以每一種同等的的不穩定性都需要由自主性的邏輯來補充它或限制它。正是因爲如此，光要求**平等**才是不夠的，需要由要求**自由**的這點來平衡，這就使我們能夠談到激進的和**多元**的民主。一種激進的和非多元的民主會是這樣的一種

民主，它在同等的邏輯無限制運作的基礎上，組織一個平等的獨特空間，並不承認多元性空間的這一不可歸結的環節。這種空間劃分的原則是要求自由的基礎。正是在它內部，多元主義的原則才存在，多元民主的構想才能跟自由主義的邏輯聯繫起來。不是自由主義本身應該受到質疑，因為作為一項捍衛個人自由以實現他或她的人類能力的倫理原則，它在今天還是比以往還要更加正當。可是如果自由的這個特點是每一種民主的和解放的構想的組成成份，那麼它就不應該在我們對某些「全體主義」的無度做出反應當中，使我們完完全全地回頭捍衛「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所涉及的東西是關於另一種個人的生產，他是不再從占有的個人主義的這種母體中被建構出來的一種個人。先於社會的「自然」權利這種觀念——實際上，連同整個個人／社會的這種錯誤的二分法——都應該拋棄，代之以另外的提出權利問題的方式。從來不可能孤立地界定個人的權利，例外的情況只存在說明一定主體立場的那種社會關係的背景中。因此，總是權利的問題才牽扯到參與同樣社會關係的這些其他的主體。正是在這種意義下，才必須瞭解「民主權利」的這一觀念，因為這些都是只能夠集體地行使的權利，這些都是需要以其他人有同等的權利為存在條件的權利。構成不同的社會關係的這些空間，按照是否這些牽涉到的關係是那些生產的、公民的、鄰居的、夫婦的等等關係，而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民主的形式應該也是多元的，因為它們必須適合於所討論到的社會空間——直接民主不能是唯一的組織形式，因為它只適用於被縮小了的社會空間。

因此，有必要超出「公民身份」這個有限制的傳統領域，擴大民主權利行使的領域。至於民主的權利從古典的「政治」領域延伸到經

濟的領域這方面，這是特殊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的領域。跟肯定經濟是「私人」的領域、自然權利之所在，以及民主的標準沒有理由在它裡頭適用的那些捍衛經濟自由主義的鬥士相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捍衛社會當事人平等的權利，和作為生產者而不僅僅是公民的那種參與的權利。在這方向的若干提昇，多元主義學派諸如達爾(Robert Dahl)和林德布隆(Charles E. Lindblom) ㉞此類的理論家已經做過了，他們現在承認，在多國公司的時代把經濟說成是私人的領域，是無意義的，因此有必要接受工人參與管理企業的某些形式。我們的思考角度確實是非常不同的，因為正是那種觀念，才會存有我們希望研究的那種「私人」的自然領域。公共的／私人的、市民社會／政治社會這之間的區分，只是某種文化霸權接合的產物，它們的範圍按照一定環節中現有的力量對比而有不同。例如，可以看得出來，今天新保守主義的言說本身，不管近幾十年中在不同的民主鬥爭影響下私人領域已經被縮小了，還是在發揮限制政治領域的作用，而且發揮重新肯定私人領域的作用。

讓我們在這個地方再次討論我們有關同等和自主性之間有相互的與必然的限制的那種論證。關於多元性的政治空間這一概念，只有在一種封閉的體系的假設上才是跟同等的邏輯相矛盾的。但是一旦放棄了這種假設，就不可能從空間增多起來和社會基本的不確定性推論出不可能有把本身說成——因此把本身想成——是一種總體的社會，或者推論出這種總體化環節跟激進民主的構想是矛盾的。利用同等的作用建構政治空間，不僅不跟民主的鬥爭矛盾，而且在許多情況中還是它的一個要件。例如，不管新保守主義的攻勢如何，建構一連串民主的同等，就是左派在目前環境中為文化霸權而鬥爭的其中一個條件。

這種矛盾性因此不在於作為一種社會邏輯的那種同等。它只從這種環節中產生出來，在這種環節中，同等的這個空間不再被認為是其中一個政治空間，而且最後被看成是讓所有其他的空間從屬，並組織所有其他空間的這一中心。這是說，它是在這種狀態中產生出來的，在這裡不只產生了在某種社會層次上的這些同等的結構，而且也產生了這一層次成為把其他的層次歸結為它內部不同環節的統一原則的這種轉變。很奇怪的是，這時我們看到，正是具有不確定性質的和對差異進行民主顛覆的那種邏輯，才在今日的社會中創造比以往更加激進的一種鎖合的可能性：它到達這種程度，即對於傳統的差異體系所做的抵抗被打斷了，而且不確定性和含混性把更多的社會組成成份轉變成為「浮動的指符」，可能性就產生出來，使人有可能嘗試把徹底地消除自主性邏輯的一種中心安置下來，同時以它為中心重新把社會機體的總體組織起來。如果十九世紀每一種激進民主的嘗試，它的範圍在橫跨過社會關係廣大領域的舊式從屬的殘跡中可以找得到，那麼現在那些範圍就是由新的、在民主的那個領域產生出來的可能性，即極權的邏輯所提供了。

列福特已經證明過，「民主的革命」作為一種新的、以象徵層次深刻的變動為其存在條件的領域，如何包含著一種社會制度設施的新形式。在早期按照神權—政治的邏輯組織起來的社會裡，權力是體現在君王個人身上，它就是上帝的代表——這是說，它是至高無上的正義和至高無上的理性的代表。社會被看成是一種機體，它的成員的層級結構是仰賴無條件的排列順序這個原則。按照列福特的說法，民主社會引進來的這種徹底的差異是，權力的場合變成了一種空泛的空間；跟先驗的保證物的關聯消失了，而且連同它一道，有關社會實際統一

性的這種表述也消失了。結果，權力、知識和法律的層次之間產生一種分裂，它們的基礎不再獲得保證。因此，這種可能性就打開了無盡地質疑的過程：「沒有任何有關一種法律能夠是固定的，它的統轄權不受競爭的，或它的基礎能夠不被質疑的；總括之，並沒有任何有關一種社會中心的這種表述：統一體不再能夠消除社會的分化。民主開創了一種無法被局限或者控制的社會經驗，在裡頭，人民將被宣告為至高無上的，但是在裡頭它的一致從來都不是決定性地一定的，而還會是潛在的。」<sup>34</sup>按照列福特的說法，正是就這點來說，才必須理解浮現出極權主義的那種可能性，這種極權主義是由一種嘗試所構成的，它打算重建權力的所在、法律和知識之間的那種民主業已粉碎的統一性。一旦所有跟社會之外的權力的關聯已經通過民主革命剷除了，純粹的社會權力就能夠出現，把自己表現成爲整體，而且單獨從它本身抽取法律的原則和知識的原則。權力利用極權主義，而不是利用指出一個空泛的場所的手法，力圖使它本身在一種認定自己是**統一**的人民的代表的機關裡，變成爲要素。在取得人民統一體的這個口實下，社會分化就因爲在那上面被否定掉的民主邏輯，而變成爲可見。這種否定構成了極權邏輯的核心，而且是在一種雙重的運動中完成的：即「取消國家和社會那些分化的記號，以及取消社會內部那些分化的記號。這些包含取消支配政治社會組成內容的那些層次的區分。不再有從權力分離開來的法律的基本標準，或者知識的基本標準。」<sup>35</sup>

如果我們按照我們的問題設定來考察它們，就有可能把這些分析跟我們已經說成是文化霸權實踐領域的東西聯繫起來。正是因爲沒有更多從先驗的體系產生出來的、取得保證的基礎，因爲不再有把權力、法律和知識結合在一起的一個中心，所以就變成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



把某些政治空間通過文化霸權的接合統一起來。不過這些接合總是會是部份的，受到競爭的，因為不再有一個最高的保證物。打算要建立一個明確的縫合，和否定民主邏輯所確立的那種社會完全不確定的性質的每一種企圖，都促成了列福特說成是「極權主義」的那個東西：這就是說，促成了一種政治建構的邏輯，這種邏輯是由建立一種出發點的作法所組成的，我們從這裡就可以完全地支配社會和理解社會。這是一種**政治邏輯**，不是一種社會組織，這點已經由下列事實得到證明：不能把它劃歸成爲一種特定的政治取向：它可以是「左派」政治的產物，按照這種政治的說法來說，可以消除每一種對抗，可以讓社會完全可知，或者可以讓社會成爲以威權的方式把社會體系固定在國家所建立的層級結構中的這一產物，一如在法西斯主義的情況那裡一樣。但是在兩者的情況當中，國家都是把自己提高到社會體系真理唯一占有者的地位，不管這是以無產階級之名義，或者以國家之名義。同時，國家也力圖控制所有社會生活的架構。儘管民主打開了這種徹底的不確定性，可是民主還是包含了一種企圖，它打算重新硬加上一個絕對的中心，同時打算重建這樣一來將恢復統一性的這種鎖合。

不過如果毫無疑問地，威脅到民主的那些危險之一是打算超越過對抗性的構成性質，否定多元性，以便恢復統一性的那種極權主義的企圖，那麼也還有屬於跟這種統一性沒有關聯的那種並列地對生出來的危險。因爲假定社會關係之間沒有接合，即便是不可能有接合，爲了要防止社會內爆，以及爲了防止缺乏任何共同的參照點，保有一個視野還是必要的。這種因爲象徵架構的破壞而產生出來的關於社會組織的說明，是使政治消失的另外一種方式。跟以威權的方式強加上永遠不能改變的接合的這種極權主義形成對照，在這裡問題是缺乏可以

讓不同的社會主體共有的那些意義建立起來的那樣的一些接合。在完全一致的邏輯和純粹差異的邏輯之間，民主的經驗應該是連同承認把多重的社會邏輯接合起來有其必要性一起，由承認社會邏輯的多重性這點組成的。可是應該經常地重新把這種接合建立起來，而且重新通過談判達成這種接合，因為並沒有任何可以決定性地取得平衡的那個最後的時刻。

這點把我們引導到我們的第三個問題，即民主邏輯和文化霸權的構想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上來。從我們到現在為止說過的每一件東西可以看得出來，要提出任何文化霸權的構想，光是民主的邏輯並不足夠。這是因為民主的邏輯只是把平等主義的設想同等的替換到比以往更加廣濶的社會關係上，而且就本身來說，它也只是消除從屬關係和平等關係的一種邏輯而已。民主的邏輯不是一種社會肯定性的邏輯，因此它不能夠建立以此為中心把社會組織重建起來的任何一種波節點。但是如果民主邏輯這種暗中破壞的環節和社會制度設施的這種肯定環節，不再是通過把它們轉變成為一個簡單過程的正面和反面的人類學基礎統一起來，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每一種這兩者之間統一的可能形式都是偶然的，因此它本身是一種接合過程的產物。情況是如此，所以沒有任何一種文化霸權的構想能夠專門建立在民主邏輯的基礎上，它也必須由一批關於社會的肯定組織的計劃組成。如果從屬的團體的這些需求，純粹作為暗中破壞某種體系的一種否定的需求被提出來，沒有跟任何可見的重建社會特殊領域的構想聯繫起來，那麼它們以文化霸權的方式來行動的能力，將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出去。這是可以稱之為「對立的戰略」的東西和「建構新體系的戰略」之間的差異。在第一種情況中，某種社會或政治體系的否定的組成成份占

主導地位，但是這種否定性的組成成份，不是跟打算建立不同波節點的任何真正的、能夠從這裡把社會組織不同的和肯定的重建過程建立起來的企圖一起存在的——因此，這種戰略被判定是微不足道的。這是含有有關「飛地政治」(enclave politics)的不同說法的情況，不管它們是意識形態的說法或者組合主義的說法。相反的，在建構新體系的戰略情況中，社會肯定性的組成成份是占主導地位，不過這樣的事實產生了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也產生了跟民主的這種暗中破壞的邏輯有的一種經常的緊張性。文化霸權的形勢會是這樣的一種形勢，在這種形勢裡頭，關於社會肯定性的經營和關於多種多樣的民主需求的這種接合，已經達到了一個最大限度的整合——它就是會跟一種有機的危機相對映的對立的形勢，在這種形勢裡頭，社會的否定性使得每一種穩定的差異體系都瓦解掉了。這就讓我們能夠看出我們能夠在裡頭把激進民主的構想說成是左派的選擇的這一意義了。這點從各種邊際的立場來看，不能夠是由一種肯定，即一些反體系的要求組成的；相反的，它本身必須以尋找這兩者之間的一個平衡點為基礎，即一方面是廣泛領域內的民主革命的最大進展，另一方面是從屬團體執行文化霸權的指揮和肯定地重建這些領域的能力。

因此，每一種文化霸權的立場都是以不穩定的平衡為基礎：從否定性開始建構，但只有在它成功地組織社會肯定性的範圍內才得到鞏固。這兩個環節不是從理論上接合起來的：它們是概括了組成不同政治場合的特殊性的這種矛盾緊張性的空間。(一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兩個環節的矛盾性質並包含著我們論證中的矛盾，因為從邏輯的觀點來看，存在於相互限制本身作用的形式裡頭的兩種不同的和矛盾的社會邏輯，其共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社會邏輯的這種多元性是一

種緊張性的特性，那它也就需要把它們組織起來的一種多元性的空間。在建構一種新體系戰略的情況中，有可能在社會肯定性中引進來的這些變革，不僅取決於執行那種戰略的勢力多少民主的性質，也取決於其他的一些邏輯——在國家機器、經濟等等層次上——建立起來的結構領域。在這裡，重要的是不要滑入不同形式的、力圖忽視組成那些結構領域的這些多種多樣空間的烏托邦主義，或者滑入不同形式的、從有可能由內部貫徹的這些變革有限的性質這種角度，來排斥傳統政治領域的非政治觀點。但是，最重要的也是不要力圖把政治的領域限制在經營社會的肯定性上面，和不要只承認有可能在目前完成的那些變革，而拋棄能耐遠超出那些變革的每一種否定性的承載量。例如，近年來關於「政治世俗化」的要求談了很多。如果就這點我們理解的意思是對於傳統左派的本質主義（談「黨」、「階級」或者「革命」這類絕對的範疇）所進行的批判的話，那我們沒有任何的異議。但是這種「世俗化」時常是意味著非常不同的東西：把烏托邦完全地從政治的領域排除出去。那麼，除開我們能夠威脅到它的那一點外，沒有烏托邦，沒有否定一個體系的那種可能性，構思一種激進的設想也就完全沒有可能性了——不管是民主的或者任何其他類型的設想。這種設想表現成爲一些把某種社會體系整體化爲否定性的象徵意義，對於組織所有左派的思想來說是絕對重要的。我們已經指出來，政治的文化霸權形式總是以這種設想和社會肯定性的經營這之間的一種不穩定的平衡點爲條件的；但是這種緊張性應該加以肯定和捍衛，因爲它是把不可能有顯而易見的社會這點顯現出來的形式之一。每一種激進的民主政治，都應該避免由理想國的極權主義神話和沒有構想的改良主義的實證主義典範所表現出來的這兩種極端。

把社會基本上不完全的和不定性質賦予社會的這種緊張性、不確定性的環節，是激進民主的每一種構想應該開始制度化的東西。成爲民主社會特點的這種制度設施的分歧性質和複雜性質，應該以有別於複雜的官僚體系特有的職能多樣化的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式，來加以思考。在後者裡頭，總是唯獨有關把社會經營成爲肯定性的這一個問題，結果是有關在一種合理性內部產生的每一種多樣化的這一個問題，才支配著整個領域和職能。黑格爾關於官僚作爲一個普遍階級的這種概念，是這種思考角度的完美理論體現。只要社會內部層次的多樣化——照功能主義的、結構主義的或者任何其他的思考角度的說法——跟組成宰制著層次，把層次的意義賦予層次的一種可理解的總體各環節的那些層次之一的一種概念聯繫在一起，那麼它就被轉移到社會學的層面了。但是在激進的民主特有的多元主義的情況裡，**多樣化**已經被改變成爲一種**歧異**，因爲這些多種多樣的組成成份和層次當中的每一種，不再是超越它的那種總體的表現。空間的多重化和跟它在一起的制度設施的多樣化，不再是由職能的理性揭示來組成，它們也不再服從組成所有變化的理性原則的一種秘密的邏輯，不過它們正確地表達了反面的東西：通過這種歧異和多元性不可歸結的性質，社會建構了它本身不可能的性質的這一印象，並且也經營著它自己的不可能的性質。每一種安排具有的妥協、不穩定的性質，即對抗性，都是基本的事實，同時只有在這種不穩定性的內部，才有肯定性的環節和它的經營才產生。因此，提出一種激進民主的構想，意味著迫使理性的和可以理解的社會的這一神話一直退到社會的視野上。社會變成了一塊「烏有之地」(nonplace)，變成了它本身的不可能的性質的象徵。

可是就因爲這樣，有關左派的那樣一種**統一的言說**，其可能性也

被除掉了。如果種種的主體的立場，以及多種多樣的對抗和分裂所在，構成了一種**歧異**而不是**多樣化**，那麼可以看得出來，不能把它們倒回到能夠通過一種單獨的言說來全部包容它們和說明它們的那個地方。言說的**不連續性**變成了基本的和構成的東西。激進民主的這種言說不再是關於普遍性的一種言說：「普遍」階級和主體能夠從那裡來說話的這種認識論上的合適所在，已經被連根拔掉了，而且已經為多種的聲音所取代了，它們當中的每一種都把它自己不可歸結的言說上的一致構築起來了。這個地方是關鍵：沒有放棄關於普遍性的那種言說，沒有放棄它的隱含假設，即是有可以接近只有數目有限的主體才能取得的那種「真理」的一種有特權的地方，那麼就沒有任何激進的和多元的民主。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正如同沒有任何一種外觀是具有讓對抗性浮現出來的**先驗**特權一樣，所以也沒有任何言說區域是激進的民主綱領應該**先驗地**排除掉，不把它當作是鬥爭的可能領域的。法權的制度設施、教育體系、勞動關係、關於邊陲地帶的人們抵抗的言說，都構成了社會抗議原始的和不可歸結的形式，從而都對應該在這上面把激進民主的綱領建立起來的所有那些言說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起了一份作用。社會主義的古典言說是一種非常不同類型的言說：它是關於普遍性的一種言說，它把某種社會的範疇轉變成為具有政治和認識論特權的貯藏處；它是關於社會內部不同的起作用層次的一種先驗的言說——因此，就以這種方式，它把它認為能夠並且正當地產生作用的那些言說外觀的領域縮減了；最後，它是關於有特權的、能夠推動歷史變革——革命、總罷工，或者作為部份進展積累的、不可逆轉性質的一種統一範疇的「進化」——的地方的一種言說。每一種激進民主的構想，一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都必然包含社會主義的特點

——這是說，剷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過它不接受這樣的觀念，即從這種剷除接下來一定是消除其他的不平等。結果，不同的言說和鬥爭的耗散與自主性、多重的對抗性，以及它們能夠在裡頭來肯定自己和發展起來的那些多元性空間的建構，都是能夠取得——無疑地應該加以擴充和重新提出來的——社會主義古典理想不同的組成成份的那種可能性的**絕對必要**條件。而且正如同我們在這幾頁已經充份地論證過的一樣，這種多元性的空間並不否定（毋寧說是需要）它在某種層次中產生的作用是多元決定的，也不否定隨後在它們之間進行的文化霸權接合。

讓我們做個結論。本書是圍繞著文化霸權概念的興盛榮枯、在它裡頭隱含著的社會新邏輯的世代交替，以及從列寧到葛蘭西為止，妨礙人理解它激進的政治與理論有生力量的那些「認識論上的障礙」的新陳代謝，這樣構思起來的。只有全然地接受社會不確定的、非縫合的性質，拒絕總體和組成成份的本質主義時，這種有生力量才變成清楚可見，而且「文化霸權」最後才能夠構成爲左派政治分析的一項基本的工具。這些條件本來都是在我們已經稱之爲「民主革命」的領域中產生出來的，但是它們只有在激進的民主構想裡頭的一切它們的解構作用中，或者換句話說，只有在不是建立在關於任何「社會本質」的教條假定，而是相反的，建立在肯定每一種「本質」的偶然性和含混性，和建立在社會分化和對抗的構成性質之上的政治形式中，才能夠獲得充分的重視。它是肯定只有通過否定其基本的性質才能夠存活下來的一塊「基地」；肯定只有作爲對於失序作部份限制才能夠存在的一種「秩序」；肯定在面對著無意義的時候，只有作爲累贅和弔詭才能夠建立起來的一種「意義」——換句話說，作爲遊戲空間的政治領域，

從來都不是「零和」的，因為規則和玩遊戲的人從來都不是完全明確的。這場避開概念的遊戲，至少確實有一個名稱：即文化霸權。

- 
- ① Arthur Rosenberg, *Democrazia e socialismo. Storia politica degli ultimi centocinquanti anni (1789-1937)* (Bari, 1971).
  - ② *Ibid.*, p. 119.
  - ③ 嚴格地來考察一下，這種肯定自然不是誇大。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這些勢力的重新結盟也需要文化霸權的運作，和包含某種有關聯盟的變革：思考一下關於諸如汶第（Vendée）此類的這些插曲。只有從歷史的思考角度，只有跟說明歐洲史隨後幾個階段的這種文化霸權接合的複雜性質比較一下，我們才能夠論證在法國大革命進程當中有關基本分化和對立的這種架構的相對穩定性。
  - ④ 關於「打斷」的概念，請參考David Siverman and Brian Torode, *The Material Wor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Chapter One.
  - ⑤ 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8), p. 109.
  - ⑥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p. 55.
  - ⑦ Gareth Stedman Jones, "Rethinking Charitism," in *Language of Class*, by Gareth Stedman Jo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⑧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Vol. 1 (Paris, 1981), p. 115.
  - ⑨ Craig Calhoun,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140. 相關的論證，請見L. Paramio, "Por una interpretación revisionista de la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europeo," in



*En Teoria*, No. 8/9 (Madrid, 1982).

- ⑩關於這種論點，請見Carmen Siriani, "Workers Control in the Era of World War I," i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9, No. 1 (1980)和Charles F.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ter 4.
- ⑪Micha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 117.
- ⑫請參考Manuel Castells, *La question urbaine* (Paris, 1972).
- ⑬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 No.1 (1982).
- ⑭Benjamin Coriat, *L'atelier et le chronomètre* (Paris, 1979), p. 155.
- ⑮Claus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1984), p. 263.
- ⑯請參考Frances F.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 ⑰Jean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68), p. 183.
- ⑱Samuel Huntington, "The Democratic Distemper," in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by N. Glazer and I. Kristol (eds.)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p. 37.
- ⑲Daniel Bel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1972).
- ⑳請參考Alain Touraine, *L'après-socialisme* (Paris, 1980); André Gorz, *Adieux au prolétariat* (Paris, 1980).關於陶萊納有趣的討論，請見Jean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 Massachusetts Press, 1982).
- ① 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 (eds.),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3), p. 29. 把性別歧視動員起來，給柴契爾主義創造一個民眾基礎的方式，下列作品指出來了：B. Campbell, *Wigan Pier Revisited: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the '80s* (London, 1984).
- ② Allen Hunter,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in *Crisi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Reader*, edited by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p. 324. 關於美國政治目前政治場合的深入分析，請見D. Plotke, "The United States in Transition: Towards a New Order," in *Socialist Review*, No. 54 (1980); D. Plotke,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ransition," in *Socialist Review*, No. 55 (1981).
- ③ 麥克菲森 (C. B. Macpherson) 已經分析過這種接合，請見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④ Friedr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 11.
- ⑤ Friedrich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 52.
- ⑥ 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 69.
- ⑦ 請參考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
- ⑧ 關於他們的立場的一種說明，請參考M. N. Rothbard, *For a New Liberty*.

*The Libertarian Manifesto* (New York: Fox & Wilkes, 1973).

②引自Peter Steinfels, *The Neo-Conservatives* (New York: S & S, 1979), p. 269.

⑩ *Ibid.*, p. 270.

⑪ Alain de Benoist, *Les idées à l'endroit* (Paris, 1979), p. 81.

⑫ 除開把我們的反省放在非常不同的問題設定裡，否則對於需要把跟多重的主體立場對映的這些多元形式的民主接合起來的這種我們所做的強調，就會把我們的研究跟「參與的民主」的理論家所做的研究區別開來。我們還是跟這些理論家同樣具有許多重要的關懷。關於「參與的民主」，請見C. B. Macpherson, *op. cit.*, Chapter 5 和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⑬ 請參考Robert Dahl,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和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⑭ Claude Lefort, *L'invention démocratique* (Paris, 1981), p. 173.

⑮ *Ibid.*, p. 100.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份：

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列寧，〈遠方來信。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階段〉，《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羅莎·盧森堡，〈群眾罷工、黨和工會〉，《盧森堡文選》，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 二、英文部份：

Adams, P., and J. Minson, "The 'Subject' of Feminism," in *m/f*, No. 2 (1978).

Aglietta, Michael,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Alexander, Sally, "Woman, Class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History Workshop*, No. 17 (Spring 1984).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 Ancona, Clemente, "La influencia de De la Guerra de Clausewitz en el pensamiento marxista de Marx a Lenin," in *Clausewitz en el pensamiento marxista* (Mexico, 1979).
- Anderson, Perry,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New Left Review*, No. 100 (Nov. 1976/Jan. 1977).
- Arato, Andrew, "L'antinomia del marxismo classico: marxismo e filosofia,"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Turin, 1979).
-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 Badaloni, Nicola, *Il marxismo de Gramsci* (Turin, 1975).
- Badia, G., "L'analisi dello sviluppo capitalistico in Rosa Luxemburg," in *Annali* (Milan: Feltrinelli Institute, 1973).
- Balibar, Étienne, "Sur la dialectique historique.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á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 in *Cinq études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Paris, 1984).
- Baudrillard, Jean,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68).
- Bauer, Otto, "Was ist Austro-Marxismus," in *Arbeiter-Zeitung* (3 November, 1927).
- Bell, Daniel, "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1972).
- Benveniste, Emil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 Benvenuti, N., *Partito e Sindacati in Germania* (Milan, 1981).
- Berger, Suzanne, and Michael Piore,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Bergounioux, A. and B. Manin, *La social-démocratie ou le compromis* (Paris, 1979).
- Bernstein, Eduard,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Schocken, 1978).
- Bottomore, Tom, and Patrick Goode, *Austro-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12, No.4 (1979).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 No.1 (1982).
- Braverman, Harry,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 Brewster, Ben, "Fetichism in Capital and Regarding Capital,"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5, No. 3 (1976).
- Brossat, A., *Aux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permanente: la pensée politique du jeune Trotsky* (Paris, 1974).
- Brown, B., and M. Cousins, "The Linguistic Fault: The Case of Foucault's Archaeolog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9, No. 3 (August 1980).

- Buci-Glucksmann, Christine, *Gramsci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 Burawoy, Michael, "Terrains of Contest: Factory and State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 *Socialist Review*, No. 58 (?).
- Calhoun, Craig,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Campbell, B., *Wigan Pier Revisited: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the '80s* (London, 1984).
- Castells, Manuel, *La question urbaine* (Paris, 1972).
- Castoriadis, Cornelius, "Le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sous le capitalisme moderne," in *Capitalisme moderne et révolution*, Vol. I, by Cornelius Castoriadis (Paris, 1979).
- Charzat, Michel, *Georges Sorel et la révolution au XXe siècle* (Paris, 1977).
- Cohen, Gerald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ohen, Jea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2).
- Colletti, Lucio,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 in *New Left Review*, No. 93 (September/ October 1975).
- Colletti, Lucio,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 Colletti, Lucio, *Tramonto dell'ideologia* (Rome, 1980).

- Coriat, Benjamin, "L'opéraïsme italien," in *Dialectiques*, No. 30  
(?).
- Coriat, Benjamin, *L'atelier et le chronomètre* (Paris, 1979).
- Cutler, Antony, Barry Hindess, Paul Hirst and A. Hussein,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Vol. I, (London:  
Rouledge & Kegan Paul, 1977).
- Dahl, Robert,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Davis, Mike, "Why the US Working Class is Different," in *New  
Left Review*, No.123 (September/October 1980).
- de Certeau, Michel,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Vol. 1 (Paris, 1980).
- de Gaudemar, Jean P., *L'ordre et la production. Naissance et  
formes de la discipline d'usine* (Paris, 1982).
- de Giovanni, Biagio, "Lenin and Gramsci: State, Politics and  
Party,"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de Paola, Gregorio, "Georges Sorel, dalla metafisica al mito,"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Milan, 1979).
- de Tocqueville, Alexis,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Vol. 1  
(Paris, 1981).
- 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Dreyfus, Hubert L.,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2).
- Edgley, Roy, "Dialectic: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lletti," in *Critique*, No. 7, (1977).
- Edwards, Richard,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 Elster, Jon, *Logic and Societ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le Worlds* (Chichester: Books on Demand, 1978).
- Ferrero, Guglielmo, *L'Europa giovane. Studi e viaggi nei paesi del Nord* (Milan, 1897).
- Foucault, Michel,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1972).
-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Tavistock, 1970).
- Friedman, Andrew L., *Industry & Labour, 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7).
- Furet, François,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8).
- Gadet, François, "La double faille," in *Actes du Colloque de Sociolinguistique de Rouen* (1978).
- Gadet, François, and Michel Pêcheux, *La langue introuvable* (Paris, 1981).
- Gay, Peter,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London:

- Octagan, 1979).
- Geras, Norman,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 Gordon, David,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Gorz, André, *Adieux au prolétariat* (Paris, 1980).
- Gramsci, Antonio, "Notes on the Southern Question," in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26*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 Gramsci, Antonio, *Quaderni dal Carcere*, vol. 2 (Turin, 1975).
- Gramsci, Antonio, *Quaderni dal Carcere*, vol. 3 (Turin, 1975).
- Hájek, M., "La bolscevizzazione dei partiti comunisti,"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3,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Turin, 1980).
- Hall, Stuart, and Martin Jacques (eds.),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3).
- Hayek, Friedrich A.,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Hayek, Friedrich A.,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Hayek, Friedrich A.,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 Heath, Stephen, "Notes on Suture," in *Screen*, Vol. 18, No. 4

(Winter 1977/1978).

Hindess, Barry, and Paul 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7).

Hindess, Barry, and Paul Hirst,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Hirst, Paul Q., "Althusser and Theory of Ideolog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5, No. 4 (1976).

Hirst, Paul, and Penney Wooley, *Social Relations and Human Attributes* (London: Tavistock, 1982).

Hunter, Allen,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in *Crisi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Reader*, edited by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Huntington, Samuel, "The Democratic Distemper," in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by N. Glazer and I. Kristol (eds.)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Hölderlin, Friedrich, "Hyperion Fragment," in *Hegel*, by Charles Taylo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Jessop, Bob, *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2).

Julliard, Jacques, *Fernand Pelloutier et les origines du syndicalisme d'action directe* (Paris, 1971).

Kant, Immanuel, "Il concreto delle quantità negative," in *Scritti precritici* (Bari, 1953).

Kautsky, Karl,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Norton, 1971).

- Labriola, Antonio, "In memoria del Manifesto del Comunisti," in *Saggi del materialismo storico*, by Antonio Labriola (Rome, 1968).
- Labriola, Antonio, *Saggi sul materialismo storico* (Rome, 1968).
- Laclau, Ernesto,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 Laclau, Ernesto, "Populist Rupture and Discourse," in *Screen Education* (Spring 1980).
- Laclau, Ernesto, "Togliatti and Politics," in *Politics and Power*, No. 2(1980).
- Lefort, Claude, *L'invention démocratique* (Paris, 1981).
- Lidtko, Vernon L., "Le premesse teoriche del socialismo in Bernstein," in *Annali*, 15th year (Milan: Feltrinelli Institute, 1973).
- Lindblom, Charles E.,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 Löwy, Michael, *The Politics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 Macpherson, C. B.,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aggi, Michele, *La formazione dell' egemonia in Francia* (Bari, 1977).
- Marglin, Stephen, "What do Bosses Do?"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6, No. 2 (1974).

- Marramao, Giacomo, "Tra bolscevismo e socialdemocrazia: Otto Bauer e la cultura politica dell' austro-maxismo,"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3,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Turin, 1980).
- Marramao, Giacomo, *Austro-marxismo e socialismo di sinistra fra le due guerre* (Milan, 1977).
- Matthias, E., *Kautsky e il kautskismo* (Rome, 1971).
- Miller, Jacques-Alain, "Suture Elements of the Logics of the Signifier," in *Screen*, Vol. 18, No. 4 (Winter 1977/1978).
- Milner, J. C., *L'amour de la langue* (Paris, 1978).
- Monod, Jacques, *Le hasard et la nécessité* (Paris, 1970).
- Mouffe, Chantal,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Mouffe, Chantal, "Hegemony and the Integral State in Gramsci: Towards a New Concept of Politics," in *Silver Linings: Some Strategies for the Eighties*, by G. Bridges and R. Brunt (London, 1981).
- Mouffe, Chantal, "The Sex/Gender System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in *Rethinking Ideology: A Marxist Debate*, edited by Sakari Hänninen and Leena Paldán (Berlin: Argument-Verlag, 1983).
- Normand, C., "L'arbitraire du signe comme phénomène de déplacement," in *Dialectiques*, No. 1-2 (1972).

- Nozick, Robert,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 Offe, Claus,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1984).
- Paci, M., *Mercato del Lavoro e classi sociali in Italia: Ricerche sulla composizione del proletariato* (Bologna, 1973).
- Paggi, Leonardo, "Intellettuuali, teoria e partiro nel marxismo de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Introduction to Max Adler, *Il socialismo e gli intellectuali* (Bari, 1974).
- Pannekoek, Antonie, "Marxist Theory and Revolutionary Tactics," in *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 edited by A. Samart (London: Pluto, 1978).
- Paramio, L., "Por una interpretacón revisioninta de la his 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europeo," in *En Teoria*, No. 8/9 (Madrid, 1982).
- Pateman, Carole,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Piven, Frances F.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 Plekhanov, Georg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s Company, 1969).
- Plotke, D.,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ransition," in *Socialist Review*, No. 55 (1981).
- Plotke, D., "The United States in Transition: Towards a New

- Order," in *Socialist Review*, No. 54 (1980).
- Popper, Karl R., "What is Dialectic?"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by Karl R. Popper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69).
- Poulantzas, Nico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 Przeworski, Adam,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from Karl Kautsky's *The Class Struggle* to Recent Controversie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No. 7 (1977).
- Przeworski, Adam, "Social Democracy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New Left Review*, No. 122 (July-August, 1980).
- Racinaro, R., "Hans Kelsen e il dibattito su democrazia e parlamentarismo negli anni Venti-Trenta," in *Socialismo e Stato. Una ricerca sulla teoria politica del marxismo*, by R. Racinaro (Bari, 1978).
- Racinaro, Roberto, *La crisi del marxismo nella revisione de fine secolo* (Bari, 1978).
- Rosenberg, Arthur, *Demobrazia e socialismo. Storia politica degli ultimi centocinquanti anni (1789-1937)* (Bari, 1971).
- Rothbard, M. N., *For a New Liberty. The Libertarian Manifesto* (New York: Fox & Wilkes, 1973).
- Rubin, Gayle,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by Rayna R.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5).
- Sabel, Charles F.,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Salvadori, Massimo, "La socialdemocrazia dedesca e la rivoluzione russa del 1905. Ildibattitosul lo sciopero di massa e sulle differenze fra Oriente e Occidente,"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edited by Eric J. Hobsbawm et al. (Milan, 1979).
- Salvadori, Massimo, "Gramsci and the PCI: Two Conceptions of Hegemony,"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by Chantal Mouf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Sand, Shlomo, "Lutte de classes et conscience juridique dans la pensée de Sorel," in *Esprit*, No. 3 (March 1983).
- Siriani, Carmen, "Workers Control in the Era of World War I," i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9, No. 1 (1980).
- Silverman, David, and Brian Torode, *The Material Word* (London: Roulledge & Kegan Paul, 1980).
- Sorel, Georges,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New York: AMS Press, 1961).
- Sorel, Georges, *Saggi di critica del marxiamo* (Palermo, 1903).
- Stedman Jones, Gareth, "Rethinking Charitism," in *Language of Class*, by Gareth Stedman Jo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teinberg, Hans-Josef, "Il partito e la formazione dell' ortodossia marxista," in *Storia del marxismo*, Vol. 2, edited by Eric



- J. Hobsbawm et al. (Turin, 1979).
- Steinberg, Hans-Josef, *Il socialismo tedesco da Bebel a Kautsky* (Rome, 1979).
- Sternhell, Zeev, *Ni droite ni gauche. L'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ance* (Paris, 1983).
- Steinfels, Peter, *The Neo-Conservatives* (New York: S & S, 1979).
- Stone, Katherine, "The Origins of Job Structure in the Steel Industry,"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6, no. 2 (1974).
- Sturmthal, A., *The Tragedy of European Labour, 1918-1939* (London, 1944).
- Symmachos (Karl Kautsky), "Verschwörung oder Revolution? " in *Der Sozialdemokrat* (20 Februar, 1881).
- Taylor, Charles,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hompson, Edward P., *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 Todorov, Tzvetan, *Théories du symbole* (Paris 1977).
- Touraine, Alain, *L'après-socialisme* (Paris, 1980).
- Trendelenburg, A.,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Hildesheim, 1964).
- Tronti, Mario, *Ouvriers et capital* (Paris, 1977).
- Trotsky, Leon D., *1905*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1).
- Weeks, Jeffrey,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n, 1981).

-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The MacMillan, 1983).
- Wright, Erik O.,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 Zinoviev, Gregory, *Pyaty vsemirnyi Kongress Ko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17 iuniya-8 iuliya 1924 g. Stenograficheskiï otchet, I.* (Moscow-Leningrad, 1925).



# 譯名索引

## A

- |                           |   |
|---------------------------|---|
| Adler, Max                | 麥克斯·阿德勒 37, 38, 58, 63, 199, 269  |
| Aglietta, Michel          | 阿格里塔 215, 256, 259  |
| Althusser, Louis          | 阿圖塞 123, 132, 133, 134, 135, 136, 139, 141,<br>147, 148, 157, 193, 197, 238, 259, 266 |
| Anderson, Perry           | 安德森 61, 68, 120, 260  |
| Arendt, Hannah            | 阿倫特 208, 255, 260   |
| Austro-Hungarian Monarchy | 奧匈君主國 37  |
| Austro-Marxism            | 奧地利馬克思主義 37, 38, 62, 260, 261   |
| Axelrod, Paul             | 阿克雪里羅德 69, 73   |

## B

- |                   |                                      |
|-------------------|--------------------------------------|
| Badaloni, Nicola  | 巴達洛尼 35, 62, 260                     |
| Balibar, Étienne  | 巴里巴爾 136, 193, 260                   |
| Baudrillard, Jean | 波德里亞 218                             |
| Bauer, Otto       | 鮑威爾 37, 38, 39, 62, 63, 99, 260, 268 |
| Bell, Daniel      | 貝爾 215, 221, 256, 260                |

Benveniste, Emile	奔汶尼斯特 144, 194, 197, 260
Bergson, Henri	柏格森 51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斯坦 15,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1, 56, 63, 64, 97, 98, 113, 224, 261, 267
Berth, Edouard	柏爾斯 55
Bolshevism	布爾什維主義 55, 231
Bömelburg	彭梅布格 63
Bowles, Samuel	波勒斯 106, 124, 256, 261
Braverman, Harry B.	布雷夫曼 107, 110, 111, 113, 124, 125, 261
Brown, B.	布朗 194, 261
Brzezinski, Zbigniew	布里辛斯基 230
Burawoy, Michael	布拉瓦伊 110, 125, 262

## C

Calhoun, Craig	卡亨 210, 255, 262
Castells, Manuel	卡斯泰爾 215, 256, 262
Chartists	憲章派 201
China	中國 74, 86
Clausewitz, Carl von	克勞塞維茨 96, 122, 260
Cloward, Richard A.	克羅華 218, 256, 269
Colletti, Lucio	科萊蒂 60, 63, 64, 165, 199, 200, 262, 264
Comintern	共產國際 80, 82, 86
Coriat, Benjamin	科利亞特 125, 216, 256, 263
Cousins, M.	柯辛 194, 261
Creuzer	克拉哲 57
Croce, Benedetto	克羅齊 35, 51

Cuba	古巴 86
Cunow, Henrich	庫諾 42
Cutler, Antony (et al.)	庫特勒 (等人) 137, 139, 162, 193, 194, 199, 263

## D

Dahl, Robert	達爾 245, 258, 263
Darwinism	達爾文主義 28
Davis, Mike	戴維斯 59, 263
de Benoist, Alain	班諾斯特 231, 258
de Certeau, Michel	德塞陀 60, 263
de Man, Henri	德曼 61, 101, 102, 111, 123, 124, 209, 215, 229, 256, 258, 261, 262, 267, 270
de Paola, Gregorio	帕歐拉 54, 65, 263
de Tocqueville, Alexis	托克維爾 208, 209, 214, 255, 263
Déat, Marcel	德亞特 102
Derrida, Jacques	德希達 120, 151, 196, 263
Dimitrov, Georgi	季米特洛夫 86
Dreyfusards	支持德雷法斯的人 52, 194

## E

Edgley, Roy	埃德格萊 166, 167, 200, 264
Edwards, Richard	愛德華 108, 111, 125, 264, 265
Elster, Jon	埃爾斯特 166, 200, 264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35, 37, 42, 60, 62, 196, 259
Erfurt Congress	「愛爾福特大會」 40

Erfurt Programme	《愛爾福特綱領》 20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歐洲社會民主黨 99,124

## F

Ferrero,Guglielmo	費雷洛 32,61,264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戰 98,99,211
Fordism	福特主義 215
Foucault,Michel	傅珂 11,143,145,155,194,197,205,261,263, 264
French Revolution	法國大革命 179,201,208,209,231,255
Freud,Sigmund	弗洛伊德 133,155
Friedman,Andrew	安德紐·弗利德曼 111,126,264
Friedman,Milton	弗利德曼 229
Furet,François	富雷特 208,255,264

## G

Gadet,Francois	高達特 196,197,264
Gaudemar,Jean-Paul	高德瑪 108,125,263
Gay,Peter	高伊 44,63,64,198,264,270
General Commission of the German Trade Union	德國工會總委員會 24
Gentile,Giovanni	金第勒 35
Geras,Norman	杰拉斯 57,265
German Romantics	德國的浪漫派 128,129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德國社會民主黨 20,40,42,58

- |                               |  |
|-------------------------------|--|
| Germany                       | 德國 13,14,15,23,24,27,56,57,58,100,201,<br>211  |
| Gintis,Herbert                | 金第斯 106,124,216,256,261  |
| Gordon,David M.               | 高登 111,125,265   |
| Gorz,André                    | 高茲 225,226,256,265   |
| Gramsci,Antonio               | 葛蘭西 8,9,12,15,32,41,48,55,56,61,62,69,<br>80,90-98,103,115,117,120,122,123,<br>147,148,154,176,180,182,183,184,<br>202,236,254,260,262,263,265,268,272 |
| Great Depression              | 經濟大蕭條 99,100,102   |
| <b>H</b>                      |  |
| Hall,Stuart                   | 哈爾 226,257,265   |
| Hayek,Friedrich A.            | 海耶克 228,229,230,257,265  |
| Heath,Stephen                 | 黑斯 119,120,265   |
|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 黑格爾 28,37,60,129,130,132,165,170,193,<br>252,266,272   |
| Hegelianism                   | 黑格爾主義 28   |
| Heidegger,Martin              | 海德格 151,155  |
| Hilferding,Rudolf             | 希法亨 41   |
| Hindess,Barry                 | 興達斯 136,141,193,194,199,263,266  |
| Hirst,Paul Q.                 | 希爾斯特 136,139,141,193,194,197,199,<br>263,266   |
| Hölderlin,Friedrick           | 荷爾德林 128,193,266   |
| Hunter,Allen                  | 杭特 227,257,266   |
| Huntington,Samuel             | 杭廷頓 221,256,266  |



- Husserl,Edmund 胡塞爾 143
- I
- Italy 義大利 90,91,108,123,201,211,223
- J
- Jacobins 雅克賓黨人 204
- K
- Kant,Immanuel 康德 38,45,165,266
- Kautsky,Karl 考茨基 20,21,22,23,24,25,26,27,30,31,32,  
33,34,38,41,43,44,49,59,60,61,63,64,  
78,83,87,96,97,115,123,222,266,268,  
270,272
- Keynsianism 凱因斯主義 101,102
- Korsch,Karl 科西 123
- L
- Labriola,Antonio 拉布里奧拉 25,34,35,36,37,54,59,61,62,  
97,154,222,267
- Lacan,Jacques 拉康 119,152
- Lagardelle 拉格德勒 25
- Lassalleans 拉薩爾派 24
- Lefort,Claude 列福特 209,246,247,248,258,267
- Legien,Karl 勒吉恩 58
- Leibnitz,Gottfried Wilhelm 萊布尼茨 140

- Lenin, Vladimir Ilich 列寧 7,27,33,41,56,63,73,76,78,82,83,84,  
85,91,103,121,122,180,254,259,260,  
262,263,273
- Leninism 列寧主義 11,37,56,77,78,80,82,83,85,86,  
91,92,93,96,97,123
- Lindblom, Charles E. 林德布隆 245,258,267
- Lukács, Géörgy 盧卡奇 94,123
- Luxemburg, Rosa 羅莎·盧森堡 12,13,14,15,16,17,19,20,22,  
34,35,44,48,49,54,56,57,88,116,222,  
259

## M

- Mach, Ernst 馬赫 37
- Macpherson, C. B. 麥克菲森 233,257,258,267
- Mao Tse-tung 毛澤東 86,89,122,130,134
- Marcuse, Herbert 馬庫色 118,215
- Marglin, Stephen 馬吉林 107,108,124,267
- Marx, Karl 馬克思 23,37,53,60,62,124,134,196,204,  
243
- Masaryk, Thomas 馬薩里克 25
- Maurras, Charles 莫拉 55
- Mearleau-Ponty, Maurice 梅洛-龐蒂 195
- Mensheviks 孟什維克派 73
- Mezzogiorno 義大利南方地區 90
- m/f* 《男人／女人》 158,198,259
-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52,119,193,195,229,266,268,273

Millerand 米勒蘭 52  
Monod, Jacques 蒙諾德 60, 268  
Müller, Herman 米勒 52, 100, 101, 119

## N

Nazis 納粹 86  
*Neue Linke* 《新左派》 10, 34, 57  
Nicaragua 尼加拉瓜 239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51, 155  
Nozick, Robert 諾齊克 230, 257, 269

## O

Offe, Claus 歐費 217, 256, 269

## P

Panzieri, Raniero 潘齊耶里 109, 125  
Pareto, Vilfredo 帕累托 55  
Pêcheux, Michel 皮喬克 196, 197, 264  
Piven, Frances F. 皮汶 218, 256, 269  
Plekhanov, George 普列漢諾夫 26, 32, 33, 37, 49, 61, 64, 69, 73, 269  
Pokrovsky, M. N. 波克洛夫斯基 74, 75  
Popper, Karl R. 波柏 166, 200, 270  
Poulantzas, Nicos 普朗札斯 110, 112, 113, 126, 186, 270  
Przeworski, Adam 普雷則瓦斯基 23, 58, 124, 270

## R

- |                          |                                     |
|--------------------------|-------------------------------------|
| Reagan, Ronald           | 雷根 226                              |
| Reich, Michael           | 賴希 111, 125, 265                    |
| Renner, Karl             | 倫納 39                               |
| Risorgimento             | 民族復興運動 90                           |
| Rosenberg, Arthur        | 羅森堡 201, 202, 203, 255, 270         |
| Russian Revolution       | 俄國大革命 73                            |
|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 俄國社會民主黨 11, 56, 68, 70, 71, 73, 189 |

## S

- |   |   |
|---|---|
| Salvadori, Massimo                          | 沙瓦多利 56, 123, 271, 272  |
| Sartre, Jean-Paul                           | 沙特 8, 195   |
| Saussure, Ferdinand de                      | 索緒爾 72, 144, 152, 196, 197  |
| Second International                        | 第二國際 9, 12, 16, 28, 55, 67, 68, 72, 78, 79, 83,<br>87, 94, 97, 100, 222                 |
| Second World War                            | 第二次世界大戰 102, 212, 214   |
| Socialist Council of People's<br>Commissars | 社會主義的人民委員會議 99  |
| Somoza Garcia, Anastasio                    | 蘇慕沙 239   |
| Sorel, Georges                              | 索列爾 39,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61, 64,<br>65, 98, 101, 120, 154, 262, 263, 272 |
| SPD   | 德國社會主黨 40, 58   |
| Spinoza, Baruch                             | 斯賓諾沙 27, 140  |
| Stalin, Joseph                              | 史大林 9   |
| Stedman Jones, Gareth                       | 瓊斯 209, 255   |

Sternhell,Zeev	史泰恩黑爾 65,272
Stone,Katherine	史東 108,124,207,272
Struve,Peter B.	司徒盧威 33
Sturmthal,A.	史特姆塔爾 100,124,272

## T

Taylorism	泰勒主義 107,110
Thatcher,Margaret	柴契爾 226,234,257,265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9,176
Thompson,Edward P.	湯普森 157,197,210,220,272
Todorov,Tzvetan	杜德洛夫 57,272
Togliatti,Palmiro	陶里亞蒂 86,123,267
Touraine,Alain	陶萊納 225,226,256,272
Trendelenbury,A.	特蘭德倫堡 130
Trilateral Commission	「三邊委員會」 221
Tronti,Mario	特隆替 109,125,272
Trotsky,Leon	托洛茨基 56,69,71,73,74,75,76,77,84,120, 261,272

## V

Vico,Giovanni Batista	維科 49
Vietnam	越南 5,86

## W

Welfare Rights Movement	社會福利權利運動 218
-------------------------	--------------

- 
- |                      |  |
|----------------------|--|
| Welfare State        | 福利國家 101,102,175,212,216,217,226,<br>227,228,232,234,256,269 |
| Wittgenstein,Ludwig  | 維根斯坦 146,147,151,169,195,238,273                             |
| Wooley, Penney       | 伍利 139,194,266   |
| Woolstonecraft, Mary | 伍史東克萊夫 207   |
| Wright, Erik Olin    | 萊特 112,113,126,273   |

**Z**

- |                   |                  |
|-------------------|------------------|
| Zinoviev, Gregory | 季諾維也夫 85,121,273 |
|-------------------|------------------|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彈路／拉克勞 (Ernesto  
Laclau ), 莫菲 (Chantal Mouffe) 著; 陳璋津譯  
， -- 初版， -- 臺北市：遠流，民83  
面； 公分.-- (新馬克思主義新知譯叢; 7)  
譯自：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32-2340-6(平裝)

1. 社會主義 2. 文化

549.2

83006197

# 沈默但堅定

1989年，遠流出版公司成立**第三編輯室**（負責學術性圖書與工具書的策劃、編輯工作），正式踏進**學術出版**的領域。

學術出版是無法急切求功的，我們深知這個特性，願意一點一滴匯聚中文世界的學術資源，與學術界密切合作，階段性地提出一部分成績給讀書界。

1991年開始，我們已有能力每年出版學術圖書100種，我們還會不斷努力……

## 遠流學術圖書書訊暨郵購

如果您擔心錯過遠流出版的學術圖書，請填寄一張「讀書社群索閱單」，我們會經常將最新的出版消息提供給您。

### 《讀書社群》索閱單

我希望能獲得更多有關遠流學術書的出版消息，請寄贈《讀書社群》給我。

姓名：\_\_\_\_\_

性別：男 女 年齡：\_\_\_\_\_

住址：\_\_\_\_\_

學校或服務機關：\_\_\_\_\_

\*請剪下或影印索閱單，填好各項後寄「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84號7樓之5遠流出版公司讀者服務部收」即可。

如果您在書店找不到書目上所列的書，可以利用郵撥0189456 1遠流出版公司帳戶郵購（九折優待）。請在劃撥單上填明所要的圖書暨寄書地址，書款在新台幣200元以下者，請依定價再加20元郵費暨手續費，書款在200元以上者，無需再付郵雜費。郵撥購書處理時間約需2~4週。